

暴力时代 乱世蒋介石

序言

历史周期律很简单，但运用起来有点难。因为历史事件本身就多变复杂，全面了解已经不容易，理解更不容易，运用周期律阐述现实更难。鉴于之前从没有人试图用几条简易的规律按照立体模式全方位地阐述历史故事，本人也算是摸着石头过河，且行且珍惜。

为体现规律和历史事件的契合度，本人的主要方式是化繁为简，把握主体脉络，再去理清细节故事，最终把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

本人认为，凡是孤立的历史都是伪史，凡是孤立的历史事件都类似木乃伊，所有历史的根须最终都会延伸到现实中来，并且影响未来的趋势。

本人认为，凡是把历史和现实割裂的历史学家、教授、学者、专家都是不称职的。

民国三十八年围绕着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三个巨头运转。代表民国政治理想的孙中山和代表民国政治现实的袁世凯对立，导致前期动乱。蒋介石以孙中山继承人的身份终结了北洋政府，试图弥补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之间的裂痕。历史给了他机会，他却没有抓住。

根据历史周期律原理，民国是历史周期律第三个层次中的“炮灰”，和秦与隋的历史地位相似，不同之处在于近代中国体制变更属于被动性更迭。体制主动性更迭过程中的短命政权吸收历史更迭时的毒素便

完成使命。体制被动性更迭，因为外来力量强力干涉而出现更为复杂的历史走势。如果没有工业帝国入侵，农耕的中华帝国体制最终也会解体，但不会在辛亥年。因此民国历史走势发生变化，在短短的三十八年中迅速演绎成一个小周期，北京国民政府垮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虽然同属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差别很大。

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只是乱，大师们头脑的混乱，文人笔杆子的混乱，军阀枪杆子的混乱。南京政府时代，这些混乱依然存在，但更为暴力。北京政府时代虽然混乱，但大规模的战争不多，而且持续时间短。南京政府时代的暴力体现在：大规模战争不少，而且持续时间长。这个周期的漩涡中心便是蒋介石，他开启了中华民国的暴力时代。

暴力时代，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惊悚。

提到暴力，就会想起街头古惑仔，会想起黑社会，想起那些电影的场景。它们确实让人讨厌，但它们只是暴力衍生出来的细节末梢。所谓暴力的本质是利益分配之争。

所谓利益的本质，是社会财富和资源。它们表现为有形（财产）和无形（权力）两种。

当利益分配可以通过开会或谈判解决，那便是和平年代；否则，就要动乱。

说到动乱，便是在历史周期律作用之下的社会变革，就是不同阶层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阶层利益变更越大，暴力指数越高。如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百国战争，数百年方才达到平衡。因为在历史

周期律之下，那段时间涉及到体制变更，涉及到旧时代主体的阶层瓦解和社会利益根本性重新分配。再看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同样是数百年的思想碰撞和征伐，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方才平衡。同样因为在历史周期律之下，涉及到旧时代主体的阶层瓦解和社会利益根本性重新分配。民国也是一样。

为了能更清晰地解释一切，先绕一个圈，谈点宏观的东西。

公元元年之前的六百年，人类社会经历了一次智力大爆炸。东方华夏文明圈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等百家巨星；南亚次大陆上，释迦摩尼在菩提树下修悟；希腊半岛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做学问。

巨星褶褶生辉，欧亚大陆的文明因子就此生根发芽，但结下的文明之果实却差异巨大。释迦摩尼的思想基本局限在精神范畴，把那里人的思想引入务虚状态，所以南亚大陆上的人们对现实的事不太关心。所以印度历史，分裂是常态，统一很短暂；上层统治者基本都是外来人，最后连佛教都绝灭了。

东方百家诸子思考的结果：东方奴隶制的瓦解，最终始皇帝完成大统一、建立了一个世俗的以农耕为核心的中央帝国。此后一千七百年，中华帝国走在世界前列。

西方巨星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对政治体制思考不多。柏拉图写《理想国》，更像从学术上阐述一种理想。所以古希腊大师们没有改变西方的政治体制。从希腊到罗马，把奴隶制从城邦演绎到帝国。那个时候的西方世界流行各种各样的宗教，百教争鸣。

东方“百家争鸣”随着中华帝国成型、汉武帝“尊儒术”而结束。

西方“百教争鸣”随着罗马帝国壮大、君士坦丁大帝“尊基督”而结束。

尊儒术也好，尊基督也罢，实际都是一种梦想。尊儒术，实际是想建立一种自上而下的秩序，寻求一种世俗的和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梦。尊基督，实际是妄图建立一种以宗教为核心的统治秩序，寻找一种信仰的和谐（信基督、进天国、得永生）。随后儒学虽然分成很多派别，旗帜都是“孔圣人”；基督虽然分成很多派别，旗帜都是“耶稣”。从此以后，东方和西方分别在各自的梦境中固化。

东方在帝国梦中沉睡。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战乱中的西方世界掀起一股复兴希腊罗马文化之风潮（文艺复兴），催生出人类历史上另外一场智力大爆炸。西欧国家以宗教改革的名义完成政教分离，形成基督教之新教世界，也就是英法德三个国家，再加上新大陆的美国，构成基督教之新教世界四大天王。

按照历史大定律：每个文明系统完成政教分离都会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华夏文明圈最早完成政教分离，过渡到农耕文明，所以工业时代来临之前，中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基督文明圈因政教分离的时间晚，直接过渡到工业文明，所以主导工业世界到如今。

在新教世界，基督远去之后，各种政治思潮迸发而出，比方说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每一种思潮背后都有一个世俗梦想，可行或不可行，都会影响一部分人。它们最终伴随着工业成果（坚船

利炮）传入清末和民国，导致东方世界一系列雪崩，造就出一系列大师。这些事前面已经说了，这里再简要回顾一下。

东方人在自己的梦想中一醉不醒，在王朝更替中轮回，直到“上帝东来”，方才明白自己缺席了这场智力爆炸的盛宴，环顾左右，已经落伍太多。

上帝主义东来，导致洪秀全等人“上帝主义中国化”和曾国藩等人的反对。经过一系列博弈之后，曾国藩等人胜出，随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为了拯救帝国，康有为登台变法，掀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催生出一系列大师。

民国大师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品种齐全，堪比阿里巴巴商城。把这一系列大师分类的话，大致可以归为两大派：旧派和新派。

所谓旧派大师，共同特征都是试图以东方思想为主，吸纳西方学说。在戊戌变法前后诞生的那一系列大师，如康有为、辜鸿铭、王国维、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人。他们支持或反对爱新觉罗家族和帝国体制，有人既爱孔子又爱中华帝国又爱爱新觉罗家族，有人爱孔子爱中华帝国不爱爱新觉罗家族，有人爱孔子不爱中华帝国也不爱爱新觉罗家族。他们为此争吵斗争，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的共同点便是无一例外地沦为老古董，因为他们心爱的大清帝国灭亡了，因为他们依靠的北洋政府把国家权力的四层特性摧毁殆尽，因为他们信仰的传统中华帝国农耕文明在崭新的工业文明面前全面落伍。

所谓新派大师，共同特征就是站在西方思想的立场上，对东方思想进行批判或否定。他们是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冯友兰等

人。他们和旧派大师一样鼎鼎大名、才华横溢、思想敏锐、能言善辩，但却与旧派大师们的立场尖锐对立。他们和旧派大师之间隔着一场运动——五四运动，或者说是近代史上第二场文化大革命。如果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催生出一系列革命党人和改革家，导致民国的诞生；那么第二场文化大革命则导致了民国的灭亡。

五四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一个梦想和一个国家。

内容简介

关于《暴力时代：乱世蒋介石》，描述了一个字——乱。

蒋介石生于乱世，那时候的清王朝已经腐朽不堪。

蒋介石成长过程中，伴随着中日甲午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闹革命、八国联军、辛亥革命。还能找到更乱的时代吗？难。

辛亥革命之后，蒋介石从日本学成归国，踏入乱哄哄的中国大地。那是北洋军阀和革命党人联合演出的乱世大戏，身在乱世之中的蒋介石决定当主角。

决定当主角的蒋介石给世界带来新的混乱：从早期的一无所有，到形式上统一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又以中国战区最高领袖的身份赢得胜利，可以说是一个政治手腕极高的谋略家。

纵观蒋介石的一生会发现：他出入过各种场合，接触过各种人，拉拢过各方面的力量，和所有有实力的军事政治集团打过也和过，但从来没有真正摆平各方面的力量。他的一生都在拉拢各方面力量，拉

拉扯扯，设法以乱制乱，却无法融合，最后只能是一个烂摊子。

如果用一个字评价蒋介石，那就是——乱。

蒋介石，生于乱世，长于乱世，乱中求胜，最终焦头烂额，了却混乱的一生。

蒋介石以乱制乱，终结乱世，制造乱世。

目录

第一篇 梦想和主义

一章 大变革-----	1
二章 第二场文革-----	11
三章 三巨头和一巨头-----	25
四章 蒋介石其人-----	39
五章 大哥和领袖-----	50
六章 主义和机遇-----	65

七章 黄埔一亩三分地	76
------------	----

第二篇 止乱之功

一章 东征止乱	92
二章 精英	104
三章 第三位历史绝命者	117
四章 手腕和目标	130
五章 逆流而动	144
六章 顶级机谋	157
七章 谁主沉浮	172
八章 长袖善舞	186
九章 巅峰与选择	200
十章 蒋介石的爱情	212

第三篇 致乱之祸

一章 梦想缺失：致命的失误	226
二章 征伐西南	242
三章 瓦解西北军	256
四章 大决战	269
五章 无法完成任务	280

六章 错乱的攘外与错乱的安内 -----	291
七章 运气和劫数-----	304

第四篇 山河与战火

一章 一九三六年-----	320
二章 横向战线的聪明和愚蠢 -----	339
三章 纵向线之争夺 -----	352
四章 节点和压力-----	365
五章 逆向而动的共军 -----	378
六章 大局势 -----	390
七章 神与魔-----	402

第一篇 梦想和主义

一章 大变革

世俗世界的终极梦想

梦，总是迷人的。

迷人的梦，总是难以实现。越是迷人的梦，越是难以实现。

柏拉图描述的理想国在哪里？没有人知道。陶渊明梦想的桃花源在哪里？没人知道。摩尔看见的乌托邦有其他人看到么？没有人。因为那些都是梦。上帝的天国，俗人更无法得知。所以世人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必须理解和认知这个世界。

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之后诞生的各种“主义”都在指向一个结果——让上帝远去。

曾几何时，欧洲人眼中看到的一切都归上帝管。随着宗教改革的兴起和工业世界的来临，世俗世界归世俗之人管理，上帝变成一个信仰符号。于是国王走上断头台，资本家掌控权力，开启资本操控政治的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时代。

有一种“主义”干脆把“上帝”一笔勾销，认为这个地球、太阳系、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都是唯物的存在，宗教不过是骗人的鬼把

戏，上帝不过是精神麻醉剂。人类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物质财富，最终实行按需分配的大同世界，也就是共产主义。

如果说活人永远看不见上帝的天国，理想国只是柏拉图站在局外人角度上的一番描述，桃花源只是陶渊明到此一游，乌托邦是空中楼阁，那么共产主义看起来则适合所有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具备现实基础，可操作性很强。因此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有无数人为之奋斗。

卡尔·马克思，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哲学家之一、社会活动家之一，最聪明的犹太人之一，他发明了共产主义理论。柏拉图从来没有为他的理想国奋斗过，陶渊明也没有带人去游览桃花源，摩尔没有推销过乌托邦，但马克思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了一生。因为他相信，这个理想一定能实现。

犹太人，人类历史上最聪明、最顽强的种群之一。他们在宗教（如基督）、政治（马克思）、科学（如爱因斯坦）等方面对人类历史走势影响巨大。整个二十世纪，前五十年可以归纳为马克思主义的崛起，诞生了红色苏联和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挑战基督世界；后五十年的世界主流为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因此有人说，二十世纪的战争，不管是前五十年的热战还是后五十年的冷战，都是犹太人（耶稣对阵马克思）内战。

什么是共产主义？没有人能确切回答，因为没有人见过那个世界。马克思自己也不知道那个世界的样子。但马克思本人按照逻辑推理，认为它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

在那个社会中，不会为任何物质发愁，衣食住行的问题，不需要

考虑。

在那个社会中，没有剥削压迫，公平和正义如同阳光一样布满天空。

在那个社会中，公民的精神境界都很高，远离忧愁和烦恼。

总之一句话，不是天堂，胜似天堂，除了长生不老，那里有人类幻想的一切。要知道基督教只是允诺了一个天堂，只讲信仰，没有给出任何逻辑依据。

马克思生于一八一八年，那是欧洲历史上最乱的年代之一，拿破仑远征俄国惨败，法兰西帝国崩溃。接下来一个世纪，欧洲人虽然可以满世界抢劫，却也是战乱连连，多数人的生活困难重重。可以想象这个理论的诱惑力。

要实现共产主义，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因为共产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是唯物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和宗教是对立的；要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就要和既得利益者对立。要做到这一切，很难。确切说要动王室、资本家、政府、军阀、大盗、土匪、地痞流氓等等所有阶层的奶酪，和所有既得利益者为敌。中间没有妥协的余地，唯有暴力。

一句话，诱人的梦想，需要很大的暴力。

最难之处在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按需分配。换句话说，还是要走政治操控资本的路线，和整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体制完全对立。应该说那个太难了，难如登天。

但是人类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总有人为了理想而奋斗。

马克思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第一人。按照马克思的学历、知识、能力，甚至社会地位，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活得很好。但是在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他面临的是饥寒交迫的困窘，一辈子没过几天舒心日子，漂亮的老婆因为贫困提前衰老，孩子饿死了好几个。幸好他有个善于经商、且乐于为理想而奋斗的朋友恩格斯。要不然，他的《资本论》第一卷未必能问世。

马克思和恩格斯奋斗了一辈子，没能看见共产主义的影子。因为按照马克思的构想，需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同时行动，方能推翻旧世界。然而在那个时代显然不可能成功。

马克思出生、生活、学习、思考，基本都在西欧新教世界。那地方恰好是资本主义核心世界，主导世界走势，满世界耍流氓。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方兴未艾，正是开拓殖民地、聚集财富的黄金时代，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分一杯羹。至于世界其他地方，要么原始落后（非洲和美洲），要么在低谷中挣扎（如东亚），甚至还没有资本主义概念！至于资本家，数量有限，质量不高，本身还可怜巴巴地博同情呢。

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有难以克服的缺陷：资本的贪婪没有限度，社会财富有限度。有限的财富无法满足无限的贪婪。

所以马克思死后二十年，世界被瓜分完毕。列强想要新财富，必须彼此厮杀。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确切说，它是欧战列强之间的内战，或者说是基督教世界（英法俄德奥意）的内战。说它是基督教之新教世界（英法德）之内战，也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四年，中间产生了三个影响未来世界走势的

结果。

结果之一：爱因斯坦在一九一五年发现了广义相对论。它的出现颠覆了科学界，影响力超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他当时冒着很大的风险反对战争。这个暂且不谈。

结果之二：苏联诞生。

列宁和他的苏联

公元三九五年，东方的汉帝国灭亡一百七十五年之后，罗马帝国在西欧蛮族的攻击下分裂，依托于罗马帝国躯壳的基督教随即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随后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分裂成若干小国，混战不休。天主教控制了欧洲，随后又因为英法德宗教改革而分离出新教。

东正教依托于东罗马帝国在东欧发展。一千年之后，东罗马帝国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征服，东正教核心从君士坦丁堡迁往莫斯科，冉冉崛起的沙俄帝国成为东正教国家。

沙俄自认为属于文明的欧洲世界。但是在西欧人眼中的“远亲”，扮演着野蛮人和救世主的双重特性。拿破仑想征服欧洲，必须先征服沙俄帝国，把文明向东方传递，沙俄被视为野蛮人。拿破仑失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成为欧洲的拯救者。日后希特勒也是一样。每当欧洲发生大事件，沙俄总会卷入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一样。

当德皇威廉二世试图恢复“神圣罗马帝国”之时，以“第三罗马帝国”自居的沙俄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打仗无非是抢夺地盘财富或

转移内部矛盾。沙俄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被动成分，即抑制德国东扩；也有主动成分，转移内部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沙俄内部矛盾重重。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沙皇）因改革被刺杀，尼古拉二世又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如此情况，对嗜血的沙俄而言，局势更为动荡不安，各种思潮泛滥，各种类型的革命者层出不穷，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最为致命。

列宁生于一八七零年，比孙中山年轻四岁。

一八八七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三十九年之后，《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二十年之后，卡尔·马克思逝世四年之后，十七岁的列宁进入大学。那一年，他的哥哥因行刺亚历山大三世失败而被处死，他决心成为一名革命者。随后他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

此后十五年，列宁学习、流浪、被流放、结婚，完成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到领袖的转变。一九零三年，列宁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核心，提出列宁主义。大致在相同的时间，孙中山完成从革命者到领袖的转变，三民主义思想成熟。

所谓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延续。它不再要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搞革命，指出一个国家也可以搞。相当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二十年之后，毛泽东又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马列主义中国化），得出毛泽东思想。

列宁试图推翻沙俄，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当然喽，相比丰满的理想，现实依旧很骨感。列宁一次又一次失败，一次又一次

次流浪，如同辛亥暴动之前的孙中山。对比孙中山，列宁很不幸又很幸运。

不幸之处在于：孙中山虽然头戴通缉犯的帽子十几年，却没有经历过牢狱之灾。列宁时不时被抓捕，在牢房用牛奶当墨水写作。当孙中山在辛亥年终结了封建王朝，列宁还在失败。

幸运之处在于：相比孙中山，沙俄没有袁世凯。列宁坐到领袖位置上不用让位。也就是说列宁的俄国革命干得很彻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列宁带来转机。沙俄在战争中表现惨淡，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列宁趁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引爆沙俄内部危机。终于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份，马恩河决战即将结束之际，俄国内部暴动，沙俄结束，史称十月革命。

苏联诞生，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最基层劳动者为基础政府正式成立。

苏联诞生，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唯物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正式成立。

之前的政府，要么是君权神授，要么直接由神或神的使者统治，要么由权贵选择代理人，总是由少数人为统治阶级。新生的苏联，理论上多数人为统治阶级，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至于弊端，那是以后的事。

辛亥暴动之际，孙中山不在场。十月暴动，列宁也不在场。辛亥暴动之后的孙中山回国，一屁股坐在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上，还没捂热，便让给了袁世凯。十月暴动之后的列宁一直在领袖位置上，成为共产

主义运动第一个实践者而名垂青史，和马克思一起登上共产主义神坛。

新生的苏联非常弱小，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列宁施展了一系列手腕。

对内：枪毙沙皇尼古拉二世，把沙皇皇室连根拔起，至上而下镇压消灭各种敌对阶级。列宁因此得罪了很多，自己险些被暗杀。过程非常残酷，但效果很好。

对外：为退出世界大战，和即将失败的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卖国程度堪比《二十一条》（袁世凯日后之所以被骂卖国，是因为败得很惨。没人骂列宁卖国，是因为苏联把失去的东西重新拿了回来）。同时列宁认为沙皇政府与中国签定的条约是非法而无效的，主张“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俄政府和俄国资本家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徐树铮就是瞅准这个机会，方才果断收复外蒙。如果中国当时是团结的，甚至有机会拿回黑龙江入海口。可惜啊，可惜！

列宁的苏联引起世界格局的强烈震荡，它在西方列强眼中成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对东方困境中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模板范例，直接刺激了中国人（共产党诞生），直接刺激到孙中山（调整三民主义），日后国共合作再分裂，都和苏联有直接关系。

第三个结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号，法国元帅福熙坐在一辆特殊的火车上等德国人前来投降（签停战条约）。那辆车是当初普法战争之后，战败的法国签耻辱条约之处。现在法国胜利了，把它拖出来，羞辱德国人。所谓停战条约，就是任人宰割。确切说，就是土地、枪、钱。

土地方面：德国丧失所有海外殖民地，三分之一的国土被瓜分。

——可怜的德国人，一夜回到俾斯麦时代之前，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就不用想了。

枪杆子方面：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只能保留十万陆军，交出各种军舰潜艇两百多艘、全部飞机、五百门大炮。

——相当于废掉德国武装。

金钱方面更是敲骨吸髓：赔款两百三十一亿美元（不可能赔完）。

如此苛刻的条件，相当于把德国肢解掉，让日耳曼民族做牛做马。看起来并不像“和平条约”，更像“泄愤条约”。所以不堪屈辱的德国人一直在寻找机会，十年之后希特勒崭露头角，二十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打。这是后话。现在的问题是分赃。如此多的地盘、装备、金钱，相当于一个诱人的大蛋糕，大家都想多吃点。

为了把面子工作搞得漂亮点，分赃要开一个会，以和平的名义。由于法国是主要对德作战的国家，便成了和平会议的东道主。巴黎和会应运而生。

巴黎和平会议，实际一点也不和平。小国就没有发言权，一切都是三巨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与美国总统威尔

逊)说了算。三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吵架。

克里孟梭打算趁机谋求法国的欧洲霸权地位。因此拿回普法战争中丢失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还不满意，还要德国的萨尔区(工业中心)。有了那些地盘，离控制欧洲就更进一步。

劳合·乔治继续维持英国的全球霸权，步骤之一便是欧洲大国彼此制衡，所以帮助法国打败德国之后，转而反对过分削弱德国，不同意法国得到萨尔区。

两人为此大吵。争吵更激烈的是战争赔款。

劳合·乔治：“你们法国拿百分五十，我们英国得百分三十，怎么样？”

克里孟梭：“不行，绝对不行！这次大战，法国损失最大，我们应该得百分五十八。”

威尔逊试图让美国利益均沾，在中间充当老好人：“我们美国一分钱都不要。你们两国都牺牲些，让别的国家也得点好处，法国得百分五十六，英国得百分二十八，可以吗？”

大国之间尚且如此，其他国家更不用说了。但是有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无视，便是列宁的苏联。英法虽然和沙俄不对路，时不时打打仗、给对方使绊子什么的。但是苏联的体制和意识形态是英法的天然死敌，巴黎分赃会议虽然没有苏联，但英法都在盘算着事后搞死苏联。

灭苏联，必须东西方同时夹击，所以必须拉住日本。

明治维新以来，英法和日本就合作愉快，一起围堵沙俄。

英法尝到甜头，限制了沙俄在亚洲的扩张。

日本尝到甜头，在东北亚扩张势力。

详细表现参考日俄战争。要拉日本，必须给日本足够多的利益。
要给日本利益，就要损害中国的利益。英法决定和日本狼狈为奸。
它们的贪婪和傲慢引爆了中国。
五四运动爆发。

二章 第二场文革

根据本人理解，历史周期律四个层次的运转过程中，中国发生过
三场文化大革命。

第一场文化大革命为维新变法，仅仅局限于精英世界，功能相当
于把精英的思维从帝国时代拉出来，让他们睁眼看世界，试着改变。

第二场文化大革命为五四运动，把变革范畴推广到知识青年阶
层，在校学生放下书本走上街头玩政治，年轻人把传统学问一扫而空，
彻底西化。

第三场文革才是共和国立国十七年到二十七年那段，把变革推向
工农兵，造成前无古人、后估计无来者的社会变动。那是后话。这里
先看看第二次文革。

按照主流观点，一九一九年五月四号爆发的那场运动是伟大的爱

国运动，是近代国人觉醒的标志性事件。没人否定这个观点。本人认为，还可以深挖一些。

前面说过，古代的东方尊孔、西方尊基督。工业时代的西方世界主动变革，实际是一种世俗世界“去基督化”过程，到共产主义（彻底无神论）诞生为巅峰。东方世界被动变革，实际是一种“去孔子化”过程，到马列主义中国化为巅峰。

五四运动就是“去孔子化”的一个标志。

为什么要去孔子呢？很简单嘛，尊孔子为圣的中华帝国不行了，帝国体制要变更，首先要意识形态变更。然而很遗憾，维新变法的思想诉求还是尊孔。辛亥暴动之后，中华民国诞生，依然换汤不换药。把持北洋政府的那些人，都是满清时代过渡而来。虽然不再考科举、写八股文，但孔子依然是孔子、依然是圣人。大家的思考方式，武如袁世凯、文如徐世昌，还停留在帝国时代。尊孔子为圣人没有关系，但孔圣人是帝国时代的灵魂，帝国的基础是农耕，以农耕为核心的帝国已经无法在新时代立足。

现实之中，新诞生的中华民国处境同样不怎么样。袁世凯、孙中山、段祺瑞都想把国家搞好，却又迫于时局仰日本人鼻息，给予日本人巨大好处。满清政府很窝囊，好歹是打完仗，败了，技不如人，窝囊。民国巨头则是没打仗先屈膝，送利益换取贷款。拿到的钱还不用在正道上，打内战，内斗。

好在当时世界大战，列强忙着在自家拼杀，如果可着劲折腾，屈辱更多。

当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中国沸腾了。中国好歹也是战胜国一员。大战期间，虽然没有派兵，却有十几万劳工去欧洲帮助协约国干苦力，很多人命丧异国他乡，付出巨大的牺牲。所以上至大总统徐世昌，下到市民学生，高兴得不得了，欢庆胜利。

北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三天。北京城旌旗满街，鼓乐喧天，东交民巷至天安门拥挤不堪。年轻的学生们更是热血沸腾。各界名流纷纷发表演讲，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拉着一帮教授去天安门发表演说，并让北大学生放下书本上街庆祝。

中国太需要一场胜利了。尽管胜利有些廉价，但廉价的胜利也是胜利。

国人记忆中，鸦片战争以来，都是失败的耻辱。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在很多汉人精英眼中，袁崇焕的宁远大捷之后，汉人就没有欢庆过胜利。

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描述：“国家无论大小，皆有平等地位，彼此尊重对方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正义似乎就要来了。然而这个世界终究是现实的，希望越大，往往失望越大。因为正义往往要让位于利益。因为国际关系中，弱者渴望的正义，往往需要强者施舍。但是强者的眼睛经常盯着自身利益而忽略正义。

其实中国的要求很简单，把德国在中国的特权收回来即可。英法为了对付苏联拉日本，需要牺牲中国的利益，选择和日本狼狈为奸，把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转让给日本。日本甚至连劳工都没有派遣。美国倒是很仗义，支持中国，很遗憾当时的世界老大还是英国，美国无法

主导巴黎和会，自己都没有加入英法主导的国联。

好不容易熬到战胜国头衔，却要失去领土。是可忍孰不可忍！

巨大的欢乐瞬间转变为愤怒，欢乐的神州大地成为一个愤怒的火药桶。按照惯例，点燃火药桶需要导火索和火星。这两样东西都是现成的，内乱。

当时欧洲和中国相隔万里，通讯并不发达。所谓电报电话等通讯设施有限，都是高端货，而且处于被垄断状态，一般人很难得知信息。但巴黎和会的内容源源不断地见诸报端，透露消息的不是别人，正是大总统徐世昌和知识界领袖梁启超。

当时段祺瑞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扳倒冯国璋，利用安福国会扶徐世昌上台，希望他当盖印机。徐世昌希望可以做堂堂正正的大总统。大战刚刚结束，徐世昌委派梁启超去欧洲打探消息，想办法把德国的特权收回，风光一把。梁启超到欧洲之后，正碰见三巨头争吵，探得的消息和期望完全相反。那么问题来了。

慑于列强的实力，段祺瑞主张接受“巴黎和约”，希望趁机解决外蒙和外东北。

站在徐世昌的立场，如果是好消息，当盖印机就算了，在丧权辱国之事上盖印，找骂，坚决不能干。所以他选择把消息放出来，给段祺瑞制造麻烦。根据实际情况，徐世昌想隐瞒也做不到，因为消息来自梁启超。

梁启超原本和段祺瑞合作，也是主张对德参战的。但是安福国会选举之后，他的研究系只分得很小一块蛋糕，仅够塞牙缝，梁启超心

灰意冷。如果接受“巴黎和约”，梁启超也将被骂。梁启超本身就书生气很浓，加上对段祺瑞失望，自然不愿意背黑锅。

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如果接受“巴黎和约”，对日本适当妥协，趁苏联弱小之际收复外蒙和外东北，很划算。因为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仅仅是一些租界合同，都是有期限的，可以慢慢解决；外蒙和外东北是没有期限的，时机稍纵即逝。

风暴

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建京师大学堂。日后变法失败，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近代大学之开端。清帝国亡了，京师大学堂变成北京大学。三年之后，蔡元培担任校长，北京大学迎来黄金时代。

蔡元培生于一八六八年，浙江绍兴人，原本学霸型人物，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进翰林院坐冷板凳。然而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如同两把扫帚，扫除了蔡元培对满清的念想。蔡翰林最后成了革命者，和章太炎陶成章一起组建光复会。不同的是结果：陶成章是纯粹的革命者，章太炎是学术大师兼教育家，蔡元培成了教育家。

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蔡校长的管理下，北大既有陈独秀李大钊那样的激进派，也有胡适那样的自由派，还有辜鸿铭那样的老古董。大家畅所欲言，为所欲为。那种氛围如果是在和平

时代，学术之花必然绽放；混乱时期则是学生运动之沃土。

五月一号，北京大学的学生得知“巴黎和会”情形，怒火燃烧。

五月三号，北京高校的学生们开始汇聚，表示要奋起救国。

他们制定的救国方案如下：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号国耻纪念日（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日子）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自己上街。当一个国家需要学生放下书本去救，基本烂透了。

五月四号，北京高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乐章走向高潮。

同学们用笔墨和鲜血写出各种条幅“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边走边发传单：“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一群年轻人越走越生气，越喊越生气，想到国家如此窝囊，主权沦丧，皆因国贼作怪。好吧，那就惩罚国贼。谁是国贼呢？

既然日本如此可恶，强迫中国签订卖国条约，驻日公使章宗祥是亲日派，国贼。曹汝霖是财政总长，负责借款，亲日派，国贼。同学们充分发挥学有所用之精神，在天安门南竖起一面大白旗，上面写着：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末行写“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千古”。

学生们越骂越生气。恰好又有官员前来劝大家回学校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云云。学生们更生气了，国家都被一帮王八蛋搞得乌烟瘴气了，报效有何用？他们决定用行动惩罚卖国贼。他们试图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抗议，未果，便去了赵家楼曹汝霖官邸。

曹家宅邸戒备森严，有警察把守。愤怒的学生高喊“打倒卖国贼”，直接冲过去。还有人绕到后方，砸烂玻璃入内，找曹汝霖算账。

曹汝霖当时在家，一看情形不对，立刻翻墙逃跑，充分发挥主场地利优势，三十六计走为上，算是躲过一劫。当日章宗祥恰好在曹总长家谈天，他原本以为学生找曹汝霖麻烦，和自己无关，便假装淡定，正好被同学们抓住。

“卖国贼章宗祥在此！”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章公使，既然你自己送上来，那就不客气了。拳脚无眼，你就好好享受吧。一群年轻人不由分说把章宗祥围在中间，怒火找到出口。大家能上拳头就上拳头，能上脚就上脚，上演史上最壮观且毫无悬念之乱战。

拳脚虽然没有章法，却足以让章公使鼻青眼肿、头破血流，满眼星星。幸好个人体积有限，能同时承受的拳脚有限。那些没机会出拳脚的同学在旁边配音：打得好。

最后章公使带着满肚子委屈躺在医院里：“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

国，真是太冤枉了。我出力借债是为了拥护段合肥的武力统一政策，怎知带兵的将军领了军饷归入私囊，今日要开拔费，明日要特别费，外债借了就光，国家依旧分裂。如果要追究责任，真正祸国的是这些武人。可是这班年轻学生却根本不能深入看问题，徒凭血气之勇，加罪于我，我姓章的无兵无勇，太好欺负了，实在令人痛心！”是啊，章公使有气愤的理由。但国家正处于内战前夜，怪武人或学生都没用。

同学们没有找到曹汝霖，很火，顺手放了把火，烧了曹汝霖家。军警来了，逮捕三十二人。客观说，学生们的行为并不可取，很暴力。任何时候，火烧总长之家，把外交官打半死，都是很严重的行为。但是放在当时环境中，很解气。

北洋政府愤怒了：教育部把高校校长召集起来，要他们查明煽动者，并给予开除处分。

学生愤怒了：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否则继续闹。

高校愤怒了：派代表去教育部、国务院、总统府请愿，要求释放学生：如果爱国有罪，高校全体职员情愿全体罢职。

双方各不相让，最后闹到大总统那里。徐世昌发命令：“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事，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若再有借名

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弛！”

这道命令如同空气一般，虽然存在，任何人都可以当它不存在，因为它相当于什么都没说。徐世昌是老狐狸，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当然不愿意得罪任何一方。于是各方面继续不满意，热闹继续。但是接下来闹大了。

曹汝霖受辱和章宗祥挨打的正式报告送到总统府。慑于段祺瑞的压力，同时徐世昌自己也觉得学生太过分，便发布命令逮捕学生送交法庭。蔡元培随即辞职抗议。同学们原本就很来火，一看政府对外无能，只会对自己人动手，全面罢课挽留蔡校长。

老狐狸徐世昌千算万算却忘了一条：对巴黎和会表示很愤怒的人不仅仅是学生。社会各界纷纷表态支持，连正在“和谈”的南北双方总代表都通电表示支持。为缓和气氛，政府决定在国耻纪念日把所有被捕学生送回学校。同时上海学生闹开了，东京留学生也闹开了。

再往后，南北“和谈”破裂，杭州、太原、西安、南京的学生纷纷登场，重复北京学生和上海学生的故事。他们各种学联，彼此呼应，壮大声势。政府用软硬两手应对。

政府硬的一手：北京加强军警巡逻，严查报纸和邮电，秘密监视学生，逮捕报刊编辑和学生，试图把学潮强压下去。同学们的应对策略：化装成国货销售员，三两个人一起，在军警不注意的地方宣传反日。

政府软的一手：提前放假回家休息。同学们拒绝，在北京街头继续闹。

这么一闹腾，全国抵制日货，日本腆着很无耻的脸表示很受伤，外交抗议的同时，开军舰到沿海进行恐吓。北京政府怕了，继续维护亲日派，并让学生回去上课。

同学们看到政府如此没出息，索性不再躲猫猫，大摇大摆走上大街，堂堂正正地去宣传反日，让警察去逮捕。国家如此落败，空留一腔热血又如何呢？北京两万五千学生分成五十组，轮流上街。如果前面被捕，后面会有更多人。

六月三号，学生运动爆发一个月之后，同学们组队上街。

负责警卫的段芝贵立刻宣布北京戒严，并逮捕学生一百七十八人，不给食物、不许亲友探望。为增加威慑，大批军警占领北京大学，在周围划警戒线，甚至架起大炮。这是典型的流氓行为，大兵对付秀才的办法。如果一个大兵对付一个秀才，流氓行为可行。国家受辱之际，军人无力御敌，而是对自己人要流氓，是极端心虚的表现，只会起反面效果。

六月四号，更多的学生走上街头。军警也不客气，逮捕七百人。警察厅看守所容不下，押解到北大法科。同学们并不逃走。未被逮捕的学生不忍弃同学而去，前往法科监狱，要求入狱。军警们以为他们来劫狱，阻止他们入内，发生打斗。

更多的学生奔向法科。他们的行为触动了很多人，部分市民和部分教师加入其中，女学生史无前例地出现在队伍当中。队伍越来越大，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学生，而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他们表达国人不堪屈辱的心思，他们唱着歌，走向监狱。

军警一看这等阵势，傻了眼。关键时刻，政府下令无条件释放所有学生。军警赶紧撒丫子走人。毕竟他们也是中国人，中国的耻辱也有他们的一份。但同学们拒绝出狱。滑稽的一幕出现了：学生们自己代替撤退的军警，把自己拘禁，而且向警察厅要粮食（算工钱吧）。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政府终于明白民心所向，只好对话。教育部次长出来赔笑脸，表示军警以后不再过问学生的事。同学们跑到警察厅发表演说。

好吧，秀才战胜大兵，总算扬眉吐气了一把。

北京的胜利波及到上海，上海的学生影响了上海的商人。自古以来，商人追求利益。但是国遇耻辱，他们选择罢市声援学生。大小商店关门。巡捕房前来巡视，只见店外挂着白旗。上海是长三角龙头，上海商人的行为波及到长三角，沿长江向上达武汉。

随后工人罢工。学潮运动终于引起全国性的浪潮。

他们决定“万众一心，同声呼吁，力抗汉奸，唤醒政府”。徐世昌认为对付学潮不该过激，应该把拒绝出狱的那些学生劝导出去。但学生们要求“罢免国贼”。

政府没法，罢免了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輿，并决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胜利。但如果仅仅是这些，还不足以冠以“伟大”二字。五四运动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影响了后来人，改变了后来的局势。维新变法仅仅在精英阶层，便催生出一帮人，导致民国诞生。五四运动波及到范围更大的知识阶层，影响更大。

影响力之一：大浪淘沙之后，金子闪耀。一群面孔刻在了书本上，陈独秀等人既是五四运动领袖，也是共产党创始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不仅参与了五四运动，更是终结了民国，主导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走势，并影响世界历史格局。这是后话。

影响之二：思想传承

前面专门介绍过大师和老古董，但没有说清梁启超为何沦为老古董。以守护现有体制为己任，总是走在时代前列，聪明善变的梁启超怎么会沦为老古董呢？这里给出答案。

五四运动的旗帜有两面：民主和科学。

去欧洲考察之前，梁启超也是这两面大旗的忠实粉丝。去欧洲之后，梁启超去英国的代议制民主的发源地——威斯敏斯特教堂——听了两小时的下议院辩论。梁启超看到双方对各自主张“虽是丝毫不肯放让，对于敌党意见，却是诚心诚意的尊重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反观中国。议员们非但不倾听民生疾苦，反而结党营私、趋附权贵，本该神圣的国会完全沦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工具。两相对比，云泥之别。

梁启超忽然明白：英国的国民素质是英国议会制度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础。“我想一个国民若是未经养成这种精神，讲什么立宪共和，岂非南辕北辙！”梁启超认为目前中国最要紧的不是改朝换代的革命，而是培养具备法治精神的“新民”。

去了欧洲大陆，梁启超看到欧洲战火之后的凄凉：下榻的酒店没有暖气，抽烟找不到火。

看见满目疮痍的欧洲大地，梁启超的“科学万能主义”破灭了。那坚船利炮的生产地，那高高在上的洋大人的故乡，曾经让无数中国人艳羡不已的欧洲物质文明，竟然在军国主义血腥的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梁启超那颗温柔的心，碎了。

梁启超不断听到西方学者的悲观论调。当他和几位名人讲孔子和墨子的思想，他们竟然跳起来说：“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梁启超感叹“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他想到东方自古重视精神文明的传统正好可以补救西方对物质文明的过度崇拜，便重拾“东方文化救世论”。

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扩展到巴黎。六月二十八号，是“巴黎和会”签字日。巴黎留学生和华侨商人等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警告“如敢出门，当扑杀之”。代表们留在寓所里向报界发表声明拒签和约。

飘荡在运动上空的两面大旗正是“民主”和“科学”，正是梁启超之前坚持、如今质疑的东西。为了那两样东西，新生的知识分子提倡“新”，反对“旧”。

所谓“旧”，就是经、史、子、集，就是汉武帝之后独尊两千年的“儒术”。

就是打倒“孔家店”，批判孔老二。

就是放弃文言文，读白话文。

就是批判和过去有关的一切。

这些都超过梁启超的承受极限，他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子。梁启超再次拿起笔墨，恢复了战斗力，和五四运动新巨头打口水仗。十五年前，类似的事情已经出现过一次，梁启超和章太炎在日本关于“革命还是保皇”的口水仗打了好几年。

客观说，五四运动有很多地方很过分，比方说主张把汉语改变成拉丁字母，看起来极为荒谬。但当时包括鲁迅在内的很多人均如此主张。此外，全盘西化有很多弊端，如今也需要反思。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五四运动：思想主张很暴力。

暴力的思想是暴力行为的前奏。

梁启超拿起笔，义无反顾地保卫“传统”。和十五年前一样，梁启超再次惨败。

行动上，和孙中山决裂。理论上，和新文化巨头决裂。于是曾经被他启蒙过的胡适、陈独秀等人抛弃了他，他成了一个过时的偶像。如此情况除了沦为老古董，还能干什么？

梁启超看见英国人彬彬有礼，以为国人民主精神还不够，却不去找适合中国的民主方式。

梁启超看见物质发达的欧洲人自相残杀，却不想，没有物质的中国人只有被杀的份。

梁启超先生，并不是剃了光头就能劝别人放下屠刀。手中没有伏羲魔杖，就要轻声念佛经。关于这些，你学生的女婿（钱学森）就比你

想的透。

沦为老古董，也该。

三章 三巨头和一巨头

所谓“新”，就是各种各样的“主义”如同商品一样摆上货架。当时有很多主义：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仅社会主义一项又分为：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仿佛每个人都有一个主义，没有主义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那些所谓的主义，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打口水仗，自欺欺人的鬼把戏。很多人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开口就出来了，以拯救中国的名义。那种情况下，跑出去留学，基本上都会学一大堆主义回来。

这些“新主义”如同长江后浪，让前浪（梁启超、章太炎等）死在了沙滩上。后浪之中有三颗巨星，分别是胡适、李大钊、陈独秀。

胡适生于一八九一年，安徽绩溪人；家庭生活方面，缺失父爱；教育经历，念过私塾，上过各种学校，十九岁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在美国一住就是七年，学过农学、文学、哲学。他读书很多，兴趣爱好广泛，十三岁开始写文章，随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一九一六年，二十五岁的胡适把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陈独秀把它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新青年》上，引起巨大争议。因

为它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大胆程度堪比当年孙中山提倡推翻清政府。胡适由此名扬天下。

随后鲁迅跟进一篇白话文《狂人日记》，引起更大的争议。鲁迅由此名扬天下。

随后又有更多的人因写白话文而名扬天下。白话文逐渐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胡适此后写过很多文章，涉及很多领域。他写过这样的诗歌：“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水平堪比小学生。同时他也写过《中国哲学史大纲》，水平是大师级。

胡适的名气很大，赢得无数博士头衔和教授桂冠。他风度翩翩，他温文尔雅，他妙趣横生。和前辈梁启超不同，他涉足政治，但只是蜻蜓点水。他支持过“联省自治”，随后不提。他赞同汪精卫的对日政策，随后不提。他敢于“批评”蒋介石，但别人“批评”蒋介石他便为蒋介石辩护。他是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之楷模，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正因如此，胡适在政治上的存在感不强，为超然的自由派，但影响力巨大。如此超然的自由派，在当时尚且如此激进，可见当时思想界的激进和暴力。

胡适是新派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旧派比起来，新派在学问上并不占优势，只是立场和生活方式不同而已。旧派立足国学，吸收西学；新派立足西学，批判国学。

旧派大师都会有几个姨太太，还时不时逛妓院，喝花酒；新派大师名义上追求爱情，实际上很乱。胡适自己和伴娘搞婚外情，对方大肚子逼婚，老婆要动刀子，吓得胡适赶紧跪地求饶。胡适时不时拉着徐志摩去烟花之地转转。徐志摩有老婆，却爱上师兄之妻林徽因，没追求到手，又爱上朋友之妻陆小曼。用现代话说，贵圈很乱。但新派大师之中，有个人在感情方面堪称楷模，便是李大钊。

李大钊生于一八八九年，河北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陈独秀初次去李大钊家做客，一个又老又丑貌似村妇的女人给他端茶，服务态度很棒。陈独秀说，守常兄真会选佣人啊。李大钊告诉陈独秀，这是我妻子。李大钊十岁那年，家里给他娶了一个十五岁的村妇。李大钊到北京当教授那会，三十出头，风华正茂，对妻子依然不离不弃。如此对待糟糠妻子，堪称楷模。时至今日，依然是楷模。

李大钊身上延续了古燕赵之士的气节、操守，又有现代社会推崇的情义，赞。

相比胡适，李大钊和陈独秀则有强烈的使命感。如果说李鸿章试图引工商业入中国，康有为试图引君主立宪入中国，宋教仁试图引政党政治入中国，那么按照这个顺序，李大钊和陈独秀试图引马列主义入中国，想利用更广泛的暴力革命解决问题。

国人中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应该是梁启超。那是一九零二年，梁启超还在做《新民丛报》的主编，介绍西方各派思想，马克思主义便是其一。事实上梁启超很欣赏马克思主义，一直很欣赏，但他反对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革命。因为梁启超很温柔，不喜欢暴力革命。

苏联的成功刺激了中国的年轻人。五四运动之中，对国事失望的热血之人把希望寄托在苏联那里，希望中国能变成苏联那样的平等之地，给下层人希望，不受列强摆布，自己国家的事自己说了算。李大钊和陈独秀便是他们的领袖。

五四运动之际，李大钊是名满天下的思想界明星，北大图书馆馆长。通过李大钊的关系，一位放弃出国的湖南年轻人去了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月薪八块大洋，相当于北大教授工资（三百多块）的四十分之一。尽管薪水微薄，但年轻人很满足，解决生存问题之余，还能读更多的书籍，接触到更多精英，了解更多思想，挺好。他就是毛泽东。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从一个民主革命主义者（写文章要求改善民主和教育）向马列主义者（要求实现彻底的平等）转变。李大钊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就在于学习俄国共产党。

五四三巨星对毛泽东都有影响。日后毛泽东走上领袖地位，发动第三次文化大革命，批判陈独秀和胡适，唯独对李大钊保持好感。批判胡适，志不同道不合。为何要批判陈独秀呢？

超巨星陈独秀

能制造轰动效应，那叫明星。

能把轰动效应延续下去，那叫巨星。

把轰动效应一直延续下去，并且影响时代走势，应该叫超巨星。

近代史上，知识界有两位偶像常青树，便是梁启超和陈独秀。

一九一九年之前二十年，梁启超是知识界的超级偶像，知识青年无人不识梁启超。

一九一九年之后二十年，陈独秀是知识界的超级偶像，知识青年无人不识陈独秀。比方说周恩来去日本留学，比方说刘少奇去苏联，都会带着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胡适的成名作、鲁迅的成名作均发表在《新青年》上面。

陈独秀，字仲甫，生于一八七九年，安徽怀宁人，幼年丧父，跟随爷爷学习四书五经。一八九六年，十七岁的陈独秀考中秀才，而随后的戊戌变法却断了他进一步升学的机会，遂改学西学，因发表对清政府不满的言论被开除。那时候，周恩来才刚刚出生。

之后的陈独秀从发表反清言论上升到反清活动，光荣成为通缉犯，平生第一次流亡日本（此后还有很多次流亡）。他一边在早稻田大学念书，一边跟改良派的各位理论家（如章士钊）混，又觉得没前途，逐渐激进，成为革命派。

应该说陈独秀混得还不错，辛亥革命之后，谋得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职位，本想大干一番，奈何碰见袁世凯战胜孙中山，被迫逃亡，非常郁闷。跑到芜湖时，他想到军阀龚振鹏见死不救的卑劣行为，书生意气一把，直接跑到龚振鹏的司令部去骂人，很有章太炎的风采。事实上陈独秀的坐牢和章太炎有几分类似。

狂，都要付出代价。龚振鹏眼见陈秀才如此嚣张，怒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要闯进来，来人，绑了，待日后杀掉祭旗。好

在陈独秀人缘还不错，有人前来说情，才没有因为一时冲动丢了命。这是陈独秀一辈子第一次坐牢，也是一系列坐牢的开始。

搞革命坐牢很正常。但是陈独秀坐牢不同，每一次坐牢总能闹出一系列动静，而且动静越来越大。第三次坐牢时，就惊动了孙中山。等到一九三二年第五次坐牢时，竟然惊轰动了海内外。胡适、蔡元培、林语堂等人轮番托人找关系，把蒋介石烦得不行。是不是很轰动？更轰动的是，连欧洲的杜威和罗素都惊动了，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最轰动的是，竟然引起伟大的爱因斯坦声援：政府不应该抓陈独秀。所以当时蒋介石杀共产党无数，屠刀却硬生生在共产党创始人的脖子上停下。

更为搞笑的是，陈独秀把坐牢演变成一出话剧。当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是中央军中的二号人物，传讯陈独秀结束，竟然向陈独秀索要题词，以示仰慕。陈独秀给了何部长面子，挥笔写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其他人等，索要签名者络绎不绝。犯人做到那个程度，非常有面子。

陈独秀坐牢像章太炎，但经历很像一直在变的梁启超。

陈独秀原本生为清王朝人，看见清王朝无望，反清，跟着改良派混，看他们不爽，转而革命。梁启超也是一直求变，成为孙中山的死敌之后，变不动了。陈独秀接过梁启超的火炬，只是比梁启超更激进。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抄起笔当武器，亲自冲锋陷阵。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写稿、审稿、编辑一人包办，相当于一个人搞一份报刊，牛！更牛的是，居然把那份报

刊搞成历史的坐标！

《新青年》大概是民国时代最重要的一份杂志，它为无数迷茫之中的年轻人指明了方向。周恩来去日本留学时，身边就带着那份杂志，苦闷时拿出来看一看，如同享受一顿精神大餐，神清气爽，气息畅通。

那个杂志有啥魔力呢？它有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一句话，提倡白话文。

从这些经历看，陈独秀是一个热血、叛逆、有才、精于变通的人。这些特征让他成为一个时代的坐标，也导致了他悲催的结局。

一九一七年，陈独秀获蔡元培邀请，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类似系主任）。当时北大没有副校长的职位，而且只有三个科目：文科，理科，法科，其中文科是最重要的科目，陈独秀的地位相当于北大二把手。陈独秀去北大，可谓《新青年》和北大珠联璧合。杂志一直是陈独秀一个人搞，其他教授（如李大钊，刘半农，鲁迅，周作人，阵容空前豪华）可以写文章发表高见。所以陈独秀号称“五四运动总司令”，巨星中的巨星，超级巨星。因为过于闪亮，惹得北洋军阀不满，上演坐牢第三季。因为人气指数高，很快便出狱。

陈独秀推广的正是马列主义。

按照经典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最先听到炮声的两个人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正是他们长袖善舞，使得马列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他们的工作让国人更为清晰地听到十月革

命的炮声，那炮声震惊了那个时代的巨人孙中山。

陈独秀出狱之后南下上海，并且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和李大钊二人可以说是共产党在中国的开山鼻祖，共产党从理论到实践的缔造者，堪称中国共产党之父。稍后召开中共一大，陈独秀依然毫无悬念地当选为总书记，而且一干就是好几任。毛泽东之前，陈独秀是中共担任最高领导人时间最长、威望最高、名声最大、付出最多的领袖。但陈独秀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他正和孙中山谈国共合作的事儿。

孙中山的困惑

五四运动之后，辛亥暴动前后的风云人物，要么早已去世（袁世凯、黄兴），要么寂寂无声（黎元洪、冯国璋），要么失去价值（梁启超、章太炎）。尚在台上掌权之人如段祺瑞，被众人反对，终日不得安宁。只有孙中山是例外，声望越来越高。

但孙中山也很困惑，因为他总是在失败。

辛亥暴动之前在失败，好吧，那是革命，总有曲折，不可能一蹴而就。

辛亥暴动成功，大权却落到袁世凯手上。二次革命，败在袁世凯手里。好吧，袁世凯太狡猾，实力太强大，挫折难免。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府院之争”引起张勋复辟，废除《临时约法》。孙中山打算借助西南派进行“护法战争”，遭西南派排挤，

未出战而失败。

面对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孙中山再次组织护法战争，再次失败。

随后专心对付南方军阀，好不容易战胜陆荣廷，打算北伐，被陈炯明破坏，失败。

每一次失败都有理由。但失败的次数多了，即使拥有钢铁般的神经，也会困惑。孙中山的梦想是建立民国，实现三民主义，开创新局面，建设新国家。

然而从三民主义问世以来，仅仅完成民族主义而已。但民族主义带来的却是分裂和战乱，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还没有机会实施。孙中山把自己的想法写在《建国大纲》之中，但从没有机会实施。他提倡的三权分立和五权宪法，都是一纸空文，如今更是成为传说。

孙中山试图集权，组建中华革命党，遭革命党反对。

孙中山试图寻找外援，甚至和日本签订堪比《二十一条》的《中日盟约》。但日本人并没有真心帮助孙中山，而是试图寻找军阀为代理人。孙中山试图寻找欧美帮忙，收获甚少。原因很简单：孙中山的想法过于理想主义，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事难以实现，此其一；其二，列强绝不希望中国统一强大。所以英美宁愿支持旧派军人吴佩孚，而不愿意支持基督徒孙中山。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看见了外援的希望，便是苏联。

列宁和孙中山一样是理想主义者。两人是同一代人，生日相差不远，祭日相差不远，寿命也差不多。两人干的事业也是大差不差，都是推翻了旧帝国，建立新国家，而且就连成功的过程都很类似。迷茫

中的孙中山从列宁那里看到了改造时局的希望。

列宁的苏联虽然顶住了内外敌对势力，但生存异常艰难，土豆都是奢侈品。至于土豆烧牛肉嘛，想想都流口水，多数人只能想想而已。列宁也需要盟友。推翻满清帝国的孙中山是他的天然盟友。位于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的那个人是陈独秀。陈独秀把马列主义引入中国，创建中国共产党，视苏联为楷模、视列宁为导师。

陈独秀与孙中山

中国近代史上，孙中山是毫无疑问的革命先驱，革命党之父。陈独秀可以说是共产革命先驱，堪称共产党之父。然而两人的结局却大不相同：孙中山死后形象越来越高，被海峡两岸共同接受，如今大幅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对面，和毛泽东隔着马路对望；陈独秀原本起点也很好，生前身败名裂，生后印象模糊。为啥呢？原因很有趣。

孙中山喜欢革命者。陈独秀也是一个敢闯、敢拼、敢造反的人，而且能写文章，名气很大，能量很大，正是孙中山钟爱的类型。当初孙中山为拉拢梁启超，下了巨大的本钱，最后以敌人收场。陈独秀不同，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都算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对于陈独秀编写的《新青年》，孙中山也表示很重视。

五四运动，陈独秀被抓。广东的孙中山表示：我很震惊。当时孙中山正和南方军阀缠斗，忙得不亦乐乎，仍然抽空接见北洋军阀代表徐世英，很霸气地表态：“独秀我没见过，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

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

出狱后的陈独秀南下，和孙中山首次见面，把酒言欢，其乐融融。当时孙中山正在改组国民党，陈独秀将要创建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一辈子可以分为两段，创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前，完全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名声巨大；之后则完全是政治家的生活。陈独秀从事政治活动之后，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如何推广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更直白一点，如何跟国民党合作。

国民党是当时全国第一大党，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人。陈独秀想要共产党和国民党党外联合，在平等基础上对话，孙中山当然不同意，他的意思是党内联合，说白了，就是把共产党兼并了。陈独秀当然不乐意。怎么办呢？很好办。

不管孙中山还是陈独秀，都绕不过苏联那道坎。苏联希望中国能稍微硬气一点，牵制日本，帮苏联分担一部分压力。苏联的想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让共产党配合国民党（陈独秀失去领导权，形象模糊）；二，帮助孙中山建军，筹建黄埔军校（二次创业成功）。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掀起共产国际运动。马克思领导第一共产国际，恩格斯领导第二共产国际。列宁创造的第三共产国际和第一、第二国际有很大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国际，都是比较理想化的。第三共产国际就在莫斯科。斯大林上台之后，第三国际基本上变成服务于苏联利益的结合体。

陈独秀创建的共产党，原本是本土政党，中共一大时还没有加入

共产国际。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号到二十三号，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决议第十七条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支部都必须执行”。第二十一条规定：“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这一条也适用于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代表”。

从此，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便正式成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共产国际为了苏联利益，让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国民党又不同意和共产党党外联合。没办法，陈独秀挖空心思帮助共产党搞了一个创造：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如此总算保全了共产党组织的独立完整性。

如此，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变成了国民党员。

可以说是双赢，也可以说是双输。

双赢：从国民党看，好像兼并了共产党，一统天下；从共产党看，搭上孙中山牌革命顺风车，可以发展壮大自己。

双输：国民党和共产党立场差异很大。国民党本质上还是精英革命，从上而下。共产党是基层革命，从下而上。组织方式上看，国民党相对松散，内部斗争激烈，难统一。共产党虽然也斗争，但是一旦

形成决策，就统一执行。如此差异，为日后分裂埋下伏笔。

孙中山在世时，巨大的个人威望还可以维持合作局面，继续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死后，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国共分裂。

对陈独秀而言，成为共产党领袖之后，闹出来最大的动作就是国共合作。

因为国共合作，共产党迎来第一个黄金时代，从一个小党发展为拥有六万党员的大党。

因为国共合作，共产党遭遇了第一次黑暗低谷，党员从六万变成一万。

正所谓成也国共合作，败也国共合作。或者说成也孙中山（活着），败也孙中山（死了）。

对孙中山而言，国共合作同时赢得苏联的支持，完成二次创业。

孙中山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似乎一生都在创业。在本人看来，只有两次。国共合作之前和国共合作之后。因为国共合作之后，孙中山抓住了重点——枪杆子。

孙中山革命三十年，二十八年东躲西藏、东拉西靠，说到底就是没有枪杆子。所谓枪杆子，不是枪本身，而是培养用枪的人。确切说，就是创建黄埔军校。

为了抓枪杆子，孙中山把他的主义具体化，提出革命三部曲。

第一步为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

一。

第二步为训政时期，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进入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

第三步为宪政时期：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

如此三部曲，造就了蒋介石，又毁了蒋介石。之所以说造就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成功掌控了黄埔军校，成为军政时代最大的受益人。

一部中国近代史，将近半个世纪的征战，军人基本来自三个地方：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北洋政府创办的保定军校，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它们是将军的摇篮。

天津武备学堂的精英为袁世凯所用，所以袁世凯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角，得到光照神州的机会，只是棋差一招，没有抓住。

保定军校落到段祺瑞手中，所以后袁世凯时代，段祺瑞为北洋政府实际意义上的主宰。可惜段祺瑞没能物尽其用，败在保定毕业生吴佩孚和蒋介石手上。

孙中山死后，黄埔军校成了蒋介石的后花园。所以蒋介石和袁世凯一样获得光照神州的机会。然而蒋介石同样犯了错。

蒋介石同志，出场吧。

四章 蒋介石其人

人间事，总是脱不了两个话题，历史和现实。

中国是一个被历史眷顾的地方。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是唯一一个从古文明进入现代文明的国家。文明的历程，烙在史书上，一页一页。把史书翻到最后一页，就是关于现实的部分。

在中国，浙江是一个被现实眷顾的地方。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历史。中国的现实，是追求财富的现实。现实的浙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追求财富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看看国际性的港口宁波，看看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那些来来出出的车辆和船只，都是财富。实业方面，可以看看永康的五金，可以看看东阳的木雕。如此等等，都是真金白银。如果来点虚的，可以研究一下狼群一样四处掠食的温州商人。

财富和生活是分不开的。如果想要生活，可以到西湖之畔感受所谓的人杰地灵，品黄酒、观越剧。如果你是才子，可以找佳人，上演才子佳人之续篇。反过来也一样，佳人也可以去找才子。即使是一只妖，也可以效法白素贞，找一个小白脸过日子。这些是和谐的部分。还有不和谐的部分：那就是财富带来的腐朽和堕落，应有尽有。

地点交代了，该到人物了。那么生活在浙江大地上的是哪些人呢？当然多数是普通人。在普通人之外还有一个群体，叫牛人。各种各样的牛人。

首先想到伟大的鲁迅先生，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

他的铮铮傲骨已经融入国人的脊梁，他的尖酸刻薄也侵入国人的神经。

说起牛人，自然要有思想家。王守仁就是其中的光辉代表。

在科学界，古有沈括，今有钱学森、竺可桢。

中国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度，在政治这一栏，浙江前有传奇的范蠡，后又神奇的刘伯温。

经济方面，阿里巴巴的马云、网易的丁磊都是现实世界的佼佼者，赚钱赚到手抽筋。

甚至在特务方面，都有戴笠那种声名显赫之人。

看看上面这一系列牛人，涉及到各个领域，但还有一栏是空的：领袖。

所谓领袖，是把人事、政治、军事、经济抓在手里，对时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

所谓领袖，会因为自身选择而影响历史的走势。

按照这两条标准，两千年帝国时代，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浙江，没出现过一个达标的领袖级人物。领袖这一栏中，一直是空白，空了几千年，直到蒋介石出现。

蒋介石，生于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号。当时清帝国还有最后一丝余晖，康有为正在准备登台表演，袁世凯正在朝鲜练兵，孙中山正试图干点事。

性格：多疑，坚韧。

特长：精于算计。从近代史上看，只有李鸿章、袁世凯、徐世昌

可以和他比肩。

乱世家事

按照惯例，写一个人，总要从他的祖先说起。某人发迹了，肯定要对祖坟和族谱修饰一番。比方说李唐王朝把祖先追溯到老子李耳。深受传统思想影响、一心要把自己打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代言人的蒋介石自然也要对自己的祖先精心打扮一番。然而在中国百家姓上，蒋姓在历史上并不怎么闪耀，要找祖先不容易。

经过饱读史书的陈布雷一番考证之后，终于找到一个，三千多年前，周朝的开国牛人周公的第三个儿子伯龄被封往——蒋——地，便是蒋姓起源。蒋介石就以伯龄为祖先。当然这是忽悠人的。其实在蒋氏家谱上，最有名的人是蒋介石的爷爷蒋斯千，做贩卖私盐的生意。原本食盐是国家垄断的，鸦片战争之后，托洋大人的福，宁波成了通商口岸。蒋斯千抓住机会，一边在宁波内地批发盐，同时对外贩卖茶叶，内贸外贸，坚持两手抓，效果很明显，银子滚滚而来，成为传说中让人羡慕嫉妒恨的暴发户。

然而好景不长，太平军来了，蒋斯千的生意被破坏。等到太平军滚蛋，蒋斯千年事已高，已无心力争名夺利，便吃斋念佛。好在蒋斯千有个好儿子蒋肇聪，就是蒋介石的老爹，享受过富二代的荣耀，也遭受过家境衰落，深知人生不容易，便发奋图强。蒋肇聪精明能干，赢得埠头黄鳝之称谓。黄鳝，狡猾精明之意。也就是说，蒋肇聪天生

是做生意的料，别人休想占他便宜。正是凭借那份精明，蒋肇聪扩大了蒋斯千的业务，成为显赫一时的地方富豪。不仅如此，他还把那份精明遗传给了蒋介石。在日后的故事里，常常能看到一个精于算计的蒋介石。不过不是像蒋肇聪那样算计生意上的利益，而是以算计利益的方式算计竞争对手的千军万马。蒋肇聪娶了三个妇人，第三任便是王采玉，蒋介石的妈妈。王采玉之前嫁过一个姓俞的，那人早死，便在二十二岁那年嫁给了蒋肇聪，第二年生下蒋介石。

蒋介石对他的富豪老爸并无太多印象，因为蒋肇聪在一八九五年死了。此前一年，蒋斯千也死了。蒋介石由王采玉抚养长大，所以蒋介石的记忆中全是他妈妈的好。

王采玉是一个对现代人而言已经说不清的女人，早年家庭也不错，熟读诗书，为人通情达理；另一面却是极为封建。蒋介石曾经有个弟弟叫蒋周传，三岁夭折。王采玉悲痛异常，决定给蒋周传娶个鬼新娘（找到一个早夭的女孩和蒋周传合葬）。后来蒋经国出生，王采玉硬逼着蒋介石把蒋经国过继给蒋周传。当然不能用现代眼光去看王采玉，事实上在那个年代，王采玉已经是个优秀的女人了。

蒋家的富贵由蒋斯千和蒋肇聪创下。二人死后，蒋家家道中落。当时和现在不一样，又没有稳定的金融系统，把钱存进去吃利息。那是乱世，所谓生命财富来去就在旦夕之间。原本受人羡慕的家庭，转眼之间就成了被人觊觎的对象。

蒋肇聪死时，王采玉也才三十来岁，还是个少妇。当时兵荒马乱，各种宵小之辈横行于世。一个死去靠山的年轻寡妇，又有一些家业，

肯定会招惹苍蝇。苍蝇们是恶心的，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图才图色，如不成功，又会暗地里造谣，甚至明里欺负。当时的蒋介石年纪尚小，对很多人事无能为力，也只能在心中愤恨一番。在那种情况下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蒋介石，将不可避免地多疑和敏感。因为他的内心是痛苦的。

多疑和敏感正是蒋介石一生的性格特征，再加上从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精明强干，后来玩弄政治的蒋介石，虚虚实实，让人琢磨不定。下属们，尤其是军人们，对琢磨不透的领袖自然是战战兢兢、毕恭毕敬。

就生活条件而言，蒋介石的早年生活绝对强过大多数人。但是面对家道中落，孤儿寡母被各种鱼龙之人图谋欺凌，却又是极少数人能体会到的。而那极少数中的大多数又成了破落世界之中的多余人。而蒋介石则非常强悍，从种种不利环境下破围而出。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内心的痛苦旁人难以知晓，其中的煎熬也只有自己方能理解。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种痛苦磨练了他的心智。所以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

内心没有经历过痛苦锤炼之人，很难成就事业。因为成就事业意味着承担责任，承担责任需要一颗强大的心。人生而平等，人心也是平等，人性也是一样。当他在平等的众生中脱颖而出时，在那个光环之下，是别人看不见的痛苦。俗话说，要想回报，必先付出。付出，从内心开始。苦其心志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其他，比方说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比方说奴隶，一辈子生活在镣铐下，筋骨够疲劳，身体够

空虚，却不知道反抗，只能一直当奴隶。

然而按照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样一个顺序，一个人在心智上得到锤炼之后，身体上再经过磨练，就必然会有一番作为么？不尽然。很多心智很苦、身体很劳的人物最终成了芸芸众生，原因就是孟子还少说了一点，在苦其心志和劳其筋骨之间应该还有一点：充其头脑。那段名言应修改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充其头脑，劳其筋骨……

脑袋和筋骨

那么如何充其头脑呢？就是教育了。

王采玉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避开种种诱惑，抵抗了种种谣言，勇敢地面对生活，用中国女性固有的坚韧撑起了那个因为失去顶梁柱而日渐没落的家。她操持家务，经营店铺，一个人当几个人用。最重要的是，她把蒋介石教育成人，把自己的坚韧传给了蒋介石。

作为富家子弟，蒋介石享受到完善而传统的教育：去最好的私塾念四书五经。

站在现在的角度看，很多人都认为所谓四书五经无非就是那些条条框框，一大堆老古董，毫无价值。那是一个大大的谬误。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世界的精华，国人学之习之实践之千百年。尽管四书五经禁锢了中华民族的活力、创造力、积极性，把中国搞得稀里哗啦，近代直接落后于西方世界。但作为传统世界的精华，经历过千百年的实

践考验，四书五经自有其玄妙之处。

玄妙在哪里呢？主要就是四书五经中间蕴涵着一个独立封闭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讲什么服从、顺从、忠义之类的道理，让人反省自己、服从领导、必要时自我牺牲等等。总之是一切想要走上权力巅峰之人，一切想要集权之人，一切想搞独裁专制之人忽悠众人的必备手段，甚至是杀手锏。当然这些都是蒋介石自我意识觉醒之后、想要争霸天下之后的事。

早年的蒋介石读那些条条框框，也跟普通人差不多，磕磕绊绊，不胜其烦。他能做的也就是在家长和教书先生的双重压力下，把那些条条框框按照填鸭的方式做成一个压缩包，存放在自己的小脑袋里。如果蒋介石默默无闻地过一辈子，那个压缩包或许没有任何作用。然而当蒋介石走上社会，经历了丰富的社会实践，把那个压缩包中的条条框框和社会现实融合在一起时，巨大的威力便出现了。于是乎，搞军阀的军人如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人玩不过蒋介石；于是乎，搞党务的书生如胡汉民、汪精卫也玩不过蒋介石。至于黄埔师生，要么理想主义，要么被现实压迫，年轻冲动，嫩着呢，更是惟蒋介石马首是瞻。很简单嘛，蒋介石的脑袋里库存着传统世界的精华，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发酵。当时的世界虽然正在激烈地变革，但当时的人还是传统的中国人，所以大家玩不过蒋介石也是应该。若非中间出现几招致命失误，估计天下就是蒋介石的了。

那个乱世，是绝不容许蒋介石这样一个破落子弟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于国，耻辱不断，传统世界正在支离破碎，念再多的经书也没用，

无法靠当官发财致富娶小老婆；于家，家道中落，孤儿寡母受欺凌。年轻的蒋介石无疑非常痛苦。

那么如何来改变现状呢？那就只能选择行业了。当时最热门的行业是当军人。因为那是乱世，通行的规则：要么欺负别人，要么被别人欺负。当军人的好处就是欺负别人的概率更大一点。于是蒋介石决心去上军校。

一九零六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晋升列强，加上“亲华”政策，对年轻一代吸引力大增，十九岁的蒋介石第一次东渡日本，打算学军事。但是大清政府和日本也有约定，除政府认证，其他人等不准去日本学军事，免得回国闹革命捣乱。所以蒋介石白跑了。当时王采玉也比较担心，希望剪掉辫子的儿子不要折腾了，就给蒋介石发电报，说你大妹要嫁人了，做哥哥的赶紧回来送亲。蒋介石便回国了，军事也没学到。

蒋介石的性格中，虽然多疑敏感，却另有可贵的一面，就是一旦认准一件事，就会一口气干到底，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比方说反共，比方说搞独裁，常言道不到黄河心不死，蒋介石是到了黄河心也不死。既然在日本不能直接读军校，那就走中国的路子。保定军校（校长段祺瑞）毕业生可以去日本镀金，当时规定每省只有四十个名额，浙江省各类军校保送生就占了二十六个，全省有一千多人报名，竞争相当激烈。蒋介石凭借一腔热血，硬是闯关成功。

军校里的蒋介石表现怎么样？各种传记似乎都把那一段给忽略了。吹鼓手写传记，也就是泛泛地写几个例子，证明年轻的蒋介石是

革命的、爱国的，完全忽略了那长达数年的规律生活对一个年轻人的影响。

蒋介石一九零七年进入军事学校，差几个月满二十周岁，辛亥革命之后回国搞革命。他在保定军校待了一年，随后东渡日本，去了振武学校（比士官学校低一档次），待了将近四年，从二十岁到二十四岁，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时光。

长达四年的军校生活对人生有着难以抹去的影响。

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呢？基本上什么也没发生。军校里的蒋介石表现平平，既没有出色到让人铭记，也没有落后到被淘汰。因为他多疑敏感的性格，社交能力也就一般。另外他的牛脾气也不可能受欢迎。可以想象他一定是孤独的，敏感多疑的人总是孤独的。

尽管没有事实，但可以做一个大致推断。因为那段时间对蒋介石的一生非常之重要。

不管在任何时候，军人生活总是清苦的。一天到晚就是操练：各种动作，各种阵型，训练之余还要学习各种兵法，把人累得不行。蒋介石那个年代，兵法主要还是传统教程，都是文言文老古董。苦行僧也就罢了，军人是一个国家的根基，追求的是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追求的是史诗一样的荣耀。

然而任何一个学员脑子里都会有这样一个问号：中国军人有荣耀吗？

孤独中的蒋介石也会思考这个问题，在孤独中静悄悄地思考人生。思考轨迹无法得知，根据没沾过权柄的热血青年的思考定律，主要内

容应该有两大块：国家命运，个人前途。在自己的世界里做一些假大空的假设之类的玩意释放内心的冲动。但是有一点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交汇点，就是个人职业问题。蒋介石选择的职业是军人，那就想一想乱世之中军人应该如何去做。做得好，个人前途有，国家也有希望。

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堪比现代国足：大打大败，小打小败，没有人来打就内斗不断。

可以想象一下军校学生，白天在课堂上学习伟大的兵法，讲孙子兵法如何被世界追捧，讲戚继光如何把鬼子揍得哇哇乱叫，晚上就听见鬼子又来中国抢地盘了，又听见洋人强奸中国人了。一个有着伟大军人传统的国度堕落到任人宰割，那个屈辱——不说也罢！

在那种情况下，军校学生有三个选择：有钱有势的可以风花雪月自我麻醉；没那个条件却想自我麻醉的，那就自私自利，混得好的，将来变成军阀坑蒙拐骗，不然就卖身给军阀，助纣为虐。如果继续保持理想，救国救民，不好意思，继续痛苦吧。如果没有在痛苦中死掉，那就继续忍受痛苦。毫无疑问，蒋介石没有资本在第一条路上堕落，也不愿意在第二条路上沉沦，于是他走了第三条路。

当时的蒋介石过着苦行僧一样的刻板生活，看到的又是生活尽头毫无希望的屈辱。在日本，他见识到了真正的军人。振武学校在日本虽然档次不高，但训练也是原汁原味的日本模式。

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走在了军国主义大道上。它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在体现在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军国主义侧面之一：日本人会把小孩子扔到冰天雪地里锻炼意志。

军国主义侧面之二：日本人坚持用冷水洗脸。如果有人不这么干，旁边就有人指指点点，说那家伙软骨头。一个人用冷水洗脸，就可以立刻精神焕发，就可以立刻高效率地投入工作。一个国家的人用冷水洗脸，就可以让国家快速强大。这种品格非常可贵。

军国主义侧面之三：每个家庭都要吃冷饭。比较富裕的人家早晚烧两次饭，两热一冷，穷人家，两冷一热。这种生活就和日常军事训练差不多，在有形无形之中磨练了国民的意志。民风如此强悍，追求丛林法则，让人坐卧不安。

一般民众生活尚且如此，军校生活就更为清苦。蒋介石出生于浙江溪口，典型的江南水乡，气候温润，民情柔和，要适应日本那种艰辛的军校生活，要费很大力气。而蒋介石的表现并不差，他在振武学校的生活是这样的：清晨早起，用冷水洗脸，如果还不行，那就用雪擦擦身体，提神。然后去马厩擦马，要从马蹄、马腿擦到马背，经过马背擦到马头、马尾。马的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肌肉，都要用手掌尽力地摩擦。这样大概经过一个小时，将马的浑身擦热了，马的血脉流通了，而蒋介石也早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血脉畅通了。擦完马之后，还要将马牵到马厩外雪地里的马槽去饮水和喂料。马吃好了，蒋介石才能去吃早饭。傍晚，同样的事再干一遍，然后才吃晚饭。

每天要各种操练，还要各种学习，又处在青壮年时期，按道理应该多加点营养。然而日本人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减少饭食供应。每人每餐只许吃一碗米饭，每星期要吃几餐麦饭。至于菜嘛，有时是三

片咸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只有星期日才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无论能否吃饱，都不允许回头。是不是太残忍了？看起来确实很不人道。但战场上，拼到最后比的就是耐力。所谓耐力，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忍住不吃不喝不拉不撒。日本人在战场上尤其坚韧，这都源于他们的民风 and 军训。

训练中的残忍就是战场上的关爱。后来蒋介石的军队打不过日本人，除了装备上的差别，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战士的耐力。好不容易熬到鬼子回家，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发起内战。然而他面对的共军生活比鬼子还要清苦，比鬼子耐力还强。等他明白过来，天已亮了。

三年的时间里，异国他乡的蒋介石付出了比日本人更多的代价。这个事说明了两点：一，中国人不比日本人差，只要政策对头，日本人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二，蒋介石真心要干一番事业。想干事业，除了自身素质之外，还要在合适的时候遇到合适的人。

蒋介石的事业之路上，有两个人异常重要，陈其美和孙中山。

五章 大哥和领袖

陈其美生于一八七八年，年长蒋介石九岁，浙江湖州人。

陈其美的身世和蒋介石很像，也是出身商人家庭。尽管不如蒋介石家富有，吃穿还是没有问题的。陈其美非常聪明，早早读书，早早上学，正常情况下也应该早早找对象生孩子。问题是陈其美十五岁那

年，爸爸死了，家道中落。不同的是，蒋家家底丰厚一点，蒋介石依然能够念书；陈其美却被迫辍学打工。他想继续做一个商人，在一个当铺当了十二年学徒，失败了；去闯荡上海滩，试图在花花世界放纵一番，又失败了。

能在一个行业内干十二年，表示陈其美是一个很执着的人。所谓执着，也就是牛脾气，认准的事就会咬住不放。这点和蒋介石也比较像。如果这样一个人在一个行业混十二年而混不下去了，表示那世界也就完蛋了。一个执着而精明的人，在正当行业会给社会创造价值。如果社会断绝了他的生路，那他就会反过来破坏社会秩序。所有的革命党人都是这么来的。生意干不下去，其他也不让干，还让不让人活了？

不让活，我自己活。干他娘的，革命！

陈其美在国内搞了一些小动作，没啥可说的。当时国内虽然暗潮汹涌，但整体形势并不明朗。陈其美是浙江人，却没能靠上光复系。正经营生没出路，革命找不到门路，偌大中国没有饭给他吃，没有房子给他睡，没有工作给他干，只能出去闯一闯了。

一九零六年，二十八岁的陈其美东渡日本，去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这个在当时绝对是冷门。国内乱哄哄的，学成回国也没用啊！但他在日本结识了大批社会不安定分子，于是陈其美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党。当初的同盟会组织并不严谨，内部派系山头众多，想赢得话语权要么有人（如陶成章），要么有钱（如张静江）。陈其美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没关系，可以拉人。陈其美拉了不少浙江老乡入伙，

其中一人便是蒋介石。

蒋介石见到陈其美，相当于干柴遇到烈火。由于两人身世相似，性格相似，又是老乡见老乡，啥也不说了，效仿桃园三结义，搞日本三结义。陈其美是大哥，蒋介石是三弟，中间还有一个二哥叫黄郛（比蒋介石早两年去振武学校，早一点加入同盟会，日后担任过几天北洋内阁总理），上虞人，离蒋介石家也不远，智囊型人物。

蒋介石和陈其美的关系如下：陈其美是蒋介石的革命引路人。但陈其美如果不死，蒋介石很可能捞不到黄埔军校校长的位子、可能是总教头（何应钦的位置）。

大哥陈其美比小弟蒋介石大九岁，社会经验更为丰富。当时的蒋介石虽然家道中落，好歹也是留学生，正常情况下回国找工作还是可以的。当时的蒋介石具备了种种优点，还没有真正踏入社会，还是一只年轻的小菜鸟。如果没有特别的机缘，他很可能就回国找工作。毕竟干革命是刀口添血，搞不好哪天就人头落地了。即使要干革命，也可能是回国混一段时间，不如意之后才去干。毕竟没有谁天生喜欢把脑袋栓在腰上。

陈其美和蒋介石身世和性格相似，使得蒋介石从陈其美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将来。精明的蒋介石很快便发现：以陈其美的精明能干，在社会上混了十几年还是一事无成，自己就算回国也是没有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干革命。另外陈其美已经加入了同盟会，可以直接推荐自己。同盟会里面大多数是书生，动嘴皮子的，蒋介石那种军人属于稀缺性人才。

另外陈其美属于江湖人物，精于应对三教九流之人物，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经常在青楼里从事革命事业。那种不检点的革命行为对蒋介石有何影响？答曰影响很大，而且比较怪异。陈其美那种看似不正面的革命行为对蒋介石产生的正面影响：蒋三弟开始模仿陈大哥的生活行为，学会了吃喝嫖赌。这些应该是负面影响啊，怎么就正面了呢？莫急，待本人慢慢道来。

在日本的蒋介石尽管已经完成知识积累，性格也在慢慢成熟，具备了干大事的基本条件。但是要干大事，仅有知识和性格是不够的，还需要技术手段。所谓技术手段，就是了解社会，搞定各种人。当时蒋介石的阅历仅限于溪口老家、学校、以及少数人，肯定不具备后来在国民党内斗中那种精巧有效的技术手段。他的那些手段，主要受益于陈其美。

当蒋介石和陈其美相见之时，蒋介石还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首先在母亲的监督教导下成长，然后在军校里过着刻板的生活，尽管对心智和身体的磨练大有裨益，但这些是不够的。如果想要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还要有足够的手腕和应变能力。而手腕和应变能力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花花世界中磨练出来的。

当时蒋介石已经有老婆的人，但他对第一任老婆毛福梅并无感情。即使毛福梅替他生下蒋经国，依然没有感情。不管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蒋介石都处在一个压抑的状态。如果想要理解市井生活，那么必先到市井生活中放纵一番。当时的陈其美已经是花花世界的大师级人物，蒋介石却还是一个菜鸟。菜鸟跟着大师，学习起来自然非常

便捷。

蒋介石和陈其美是有感情的。蒋介石一辈子有过很多结义兄弟，后来的许崇智、张静江、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等等，每一个义兄都有自己的价值，比方说冯玉祥和李宗仁帮助他在早期掌握大权，比方说张学良帮助他赢得中原大战，但是蒋介石对他们基本上都是利用再利用。如果说蒋介石一生对谁有过兄弟之情，便是陈其美。

陈其美和孙中山

陈其美东渡之前并无很深的革命背景，跟孙中山自然也扯不上关系。辛亥暴动之前，陈其美的存在感很弱。辛亥暴动之后，陈其美登上革命舞台，开始华丽演出。前后如此大的差别，原因就在孙中山身上。

孙中山搞革命很久，但号召力大于实力。孙中山号召的那些人，多半都是豪侠之士，共同特点是思想前卫、满腔热血、敢想敢干，比方说邹容，比方说黄花岗那些烈士们。社会需要那些有血性之人，他们的行为也很有感染力。但是他们有一个缺点，就是对基层市井生活不够了解，行动能力差。典型代表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可以说个个英雄好汉。然而他们死了，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现实，势单力孤。

陈其美是另外一种人，出身于商人之家，有商人的精明，又在基层摸爬滚打十几年，基本上接触过各类人。比起宋教仁、章炳麟他们，陈其美的学问不够高，文章写得也不够好，但是行动能力强。高文化

的知识分子搞革命，鉴于道德的约束，很多事放不开。在他们看来，搞革命是一种崇高的行为，跟妓女小市民之类的打成一片成何体统。他们搞革命有点像为了革命而革命，就像那种追求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的。破落商人之子、了解市井之道的陈其美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他可以一边搂着妓女的小蛮腰一边策划革命行动。

由于陈其美的世界观中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所以行动起来也很方便。他可以在茶楼中和遗老遗少们喝茶聊天，探听信息；也可以到赌场、鸦片馆里跟各类青帮瘪三去套取情报；甚至还可以掏钱雇一帮小瘪三当马仔。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跑去妓院。他在妓院里长期包养情人，解决生理需求的同时，还可以掩护身份，一举多得。如果革命没有钱了，陈其美同志会去贩卖假钞。总之是，需要啥，就干啥。

评：陈其美是一个模版，在那个模版上写着早期革命者的丑与美。

这些是孙中山信任并重用陈其美的基础。想进入孙中山的法眼并不容易。孙中山一辈子都生活在不安定的世界里，常常面临危险，所以不会轻易信任别人。那么陈其美是如何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呢？两个字，忠心！

先看两个实例。实例之一：公事。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革命党人被袁世凯算计，灰溜溜地流亡日本。孙中山决定重新整合革命党人，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绝对服从孙中山。这个做法惹起大多数老同志的不满，比方说黄兴避走美国。只有很少的人按手印加入，陈其美就是其中之一。陈其美不仅按手印宣誓对孙中山效忠，而且给黄兴写了一封信《致黄克强劝一致服从中

山先生继续革命书》。那封信中，没啥文化的陈其美创造性地把政党划分为两个群体：一个是先知先觉一贯正确的党魁，一个是包括黄兴和他自己在内的后知后觉的众多党徒。抚今追昔，结合自身的经历，陈其美总结说：“征诸过去之事实，则吾党重大之失败，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误之耶？抑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而反对之致于失败耶？惟其前日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皆致失败；则于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怀往事而欲痛涤吾非者也。”

——翻译过来就是两个凡是：

凡是按党魁意见去做的，就一定成功；

凡是未按党魁意见去做的，则必归失败，党员对党魁绝对服从为天职。

这封信的思想，就是蒋介石后来追求的境界，与之前革命党人的思想政治背道而驰。但是孙中山非常欣赏。陈其美对孙中山的追随是全方位的，帮助也是全方位的。

实例之二：私事。

宋家三个女儿长大成人。辛亥暴动之后，宋霭龄给孙中山当秘书。年轻的宋霭龄对孙中山有好感，但是孙中山对宋霭龄无感，倒是见了宋庆龄如见爱神一般。

陈其美看见孙中山的尴尬，想办法替领袖分忧。他把孔祥熙介绍给宋霭龄。孙中山呢，成功在爱情的魔沼中突围而出，最后和宋庆龄有情人终成眷属。

领袖需要啥，他就去干啥。

正是因为陈其美和孙中山的关系密切，后来蒋介石走向孙中山时就有了捷径。正是在那条捷径上，蒋介石成功地登上永丰舰，然后又因为永丰舰事件登上黄埔军校校长的宝座。这些都是后话。现在先看看蒋介石是如何因为陈其美走向孙中山的。或者说完成知识储备、性格蜕变之后的蒋介石以菜鸟的身份来到世界上，首先干了什么？答曰：他干了大事。

干了什么大事呢？革命者嘛，总是要从事危险事业的，比方说起义啊、制造混乱啊，尽力给当局制造麻烦。而蒋介石不同，他化身为刺客，杀掉陶成章。那是蒋介石一辈子干的第一件影响时局走势的大事，之后又引发一系列新的混乱，也是他一生之缩影。

另类的陶成章

那是一个刺杀横行的时代。天生的革命者徐锡麟刺杀恩人恩铭，书生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都曾轰轰烈烈。但那些都是发生在辛亥暴动之前，属于敌我矛盾。陈其美和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则是另外一个样子，开启了同志之间的杀戮，为民国内战之不祥征兆。

陶成章，绍兴人（徐锡麟老乡），生于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比陈其美小十天。和陈其美实在混不下去了才投身革命不同，陶成章天生就是搞革命的。他还没有踏入社会找工作就成了一个反清分子。他老家原本就有反清传统，清军南下、剃发易服，在那一带遭遇激烈

反抗而血腥屠城。光复会诞生在那一带并非偶然。

另外陶成章酷爱历史。历史书上都是啥？都是强汉盛唐这类的内容，都是中国如何强大，中华文明如何先进。对比一下现状，中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懦弱、腐朽、任人宰割。如此环境中，陶成章成为一个反清分子也就能理解。

八国联军进中国带来深重的耻辱。陶成章想刺杀慈禧太后，干一票大的。他趁乱潜入颐和园，没有得手。当时的陶成章年仅二十二岁，彼时陈其美还在当铺当伙计，蒋介石刚刚在母亲一手包办下娶了不爱的女人毛福梅为老婆。行刺未遂的陶成章没提前去北方考察地形，想搞点武装起义啥的。盘缠没了，步行七天七夜，差点革命未成身先死。

陶成章是一个汉人民族主义者，和徐锡麟、秋瑾等人一样，把中国的软弱和汉文化的衰落归结于满清的野蛮统治，所以今生今世就和满清干上了。然而诡异的是，作为一个真心和满清干的人却死在另一个真心和满清干的人手上。

同盟会诞生之际，大家推孙中山当老大有三个原因：孙中山年纪最大，搞革命时间最长且自主创业，这是次要因素；主要原因是孙中山能筹措到银子。孙中山也就是一介布衣，之所以能够一次一次烧钱搞革命，秘密就在于他能够筹款，为革命化缘。

陶成章加入同盟会主要是为了寻求支援。陶成章说：咱们要继续搞武装起义，闹腾满清那帮王八蛋。孙中山说：好的，你干吧，我们支持你。

陶成章把手一伸：给我经费！

孙中山把手一摊：没钱。

徐锡麟和秋瑾都商定好了在浙江和安徽同时起义，要钱和武器。有了武器就可以装备革命同志，有了钱就可以买武器装备革命同志，同时还能拉拢更多的革命同志。这时候孙中山竟然说没钱！结果因为准备不充分，起义失败，徐锡麟和秋瑾牺牲。

怨愤还表现在私生活上。陶成章破衣敝屣为国奔走，若干次经过绍兴也不回家，从不贪图享乐，是墨子式的革命者。孙中山从来不是一个人煎熬，他有老婆，也有情妇，在日本也有情妇。孙中山最忠实的追随者陈其美不仅仅有情妇，连道德底线都没有，完全是风花雪月型。可以说，陶成章和陈其美虽然是同志兼老乡，又是同年同月生，根本就是两类人。

在陶成章看来，吃喝嫖赌是需要钱的，养情人也是需要钱的。如果把吃喝嫖赌和养情人的钱拿过来做革命经费，那么徐锡麟和秋瑾或许就不会死。陶成章因为没有得到孙中山的支持而怨愤，决定回到原来的山头，领着光复会的同志干。他还在南洋华人中宣传，说这些人捐款的经费都被孙中山挥霍了，光复系的章太炎看见孙中山的名字就想骂。

当然这个只是表面上，深层次的原因还是陶成章要带着光复会干，抢夺革命话语权。辛亥暴动成功，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代表革命党和北方谈判。但在长三角地带主要是光复会的势力，陶成章不愿意被孙中山代表。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上，正对面有袁世凯的威胁，旁边有陶成章质疑，耳边有章太炎骂人。

孙中山让陈其美担任上海都督，陈其美当了上海都督还想谋求浙江都督。陶成章当然不干！你小子吃喝嫖赌老子管不了，想抢老子的劳动成果，没门！陶成章和陈其美翻脸。

浙江是光复会的地盘。陈其美是兴中会的，根基在两广。陈其美要在浙江跟陶成章争，胜算不大。但是随着陶成章和孙中山关系的继续恶化，陈其美看到了铤而走险的机会。

陈其美是孙中山最忠实的粉丝。但陈其美首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的陈其美不会因为陶成章“质疑”孙中山而去杀人。因为质疑孙中山的人多了去了，陈其美杀不完。但是杀了陶成章可以赢得很多利益。

从孙中山的角度看，除掉陶成章，可以稳固长三角。

从陈其美的角度看，除掉陶成章，可以趁机控制江浙，扩大自身影响。

陈其美认为，杀掉陶成章，既可以替自己谋利，又可以替领袖分忧，干！

考虑到陶成章的影响很大，又是同一战壕的革命同志，必须小心谨慎，保证万无一失。用谁呢？没有人比蒋三弟更合适了。

一桩血案与一生缩影

所谓打虎亲兄弟，陈其美决定使用蒋介石。原因如下：

第一个原因：素质。

蒋介石自一九零八年去日本之后，一直接受日式军人训练。鬼子办事很认真，对军人更是认真。即使是刘阿斗，在那种残酷的环境中训练几年，也会变得思维敏捷、冷酷无情，杀人放火如吃饭。何况当时的蒋介石还具备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坚韧的意志。几年训练下来，二十四岁的蒋介石完成暗杀工作是绰绰有余。

第二个原因：身份。

蒋介石在出国之前还是个良民。所谓良民，就是除了相貌出众，走在大街上也没人在意的那种人。蒋介石在辛亥革命之后回国，由于资历太浅，加上没有搞过社会实践（如暗杀或策划起义等），实际还是无名小卒一个。当时的无名小卒蒋介石，除了陈其美对他有所了解之外，几乎没有人拿他当根葱。当时的蒋介石逛大街，没人愿意多看他一眼（极端花痴除外）。这种影子一样的人最适合杀人放火搞破坏。找一个明星去杀人，反而会因为签名而浪费时间。

第三个原因：个人意愿。

经过童年的欢乐、少年的心酸、青年时代的苦苦思索之后，蒋介石已经明白，当时的环境下，走传统路线找工作上班是不行了，职业军人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干革命。陈其美就是他的光辉榜样和靠山，他的前途和人生希望，很大一部分寄托在陈其美身上。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忠实粉丝，蒋介石是陈其美的粉丝。当时的蒋介石尚未成熟，加上脑袋里那一整套传统的条条框框和在日本军校接受的等级训练，陈其美说东就是东，陈其美说为了伟大事业需要杀掉陶成章，蒋介石就会去干。对蒋介石而言，杀掉陶成章，可以扬名立万，增加革命资本。

当时的蒋介石概括起来就是，军人出身，生面孔，在强烈的意识形态驱使下，是一个完美的杀人选手。兄弟二人谋划一番之后，蒋介石决定动手，步骤如下：

杀人第一步：寻帮手。

杀人，特别是暗杀，是一个技术活，需要可靠的帮手，连伟大的荆轲都需要帮手。帮手选不好，直接影响任务的完成质量，详情参见荆轲刺秦王。而且精明的蒋介石意识到，此次任务非同寻常，帮手的任务除了杀人之外，还有另一个功能——当替死鬼。

帮手需要具备如下素质：一、要冷酷无情；二、要对陶成章的生活规律有所了解；三、受到陶成章的威胁。这样的人不好找，但蒋介石足够机敏，很快找到了王竹卿。

光复会的前身是暗杀团。王竹卿就是当年暗杀团里的一名大盗，杀人越货，逍遥自在。光复会变成革命组织之后，也就多了很多规矩，王竹卿也就无法逍遥自在地杀人越货了。加上陶成章本人一心革命，也不搞生活享受。王竹卿觉得实在没意思，便背叛光复会，继续杀人越货逍遥自在去了。蒋介石找到王竹卿说，陶成章打算惩罚光复会叛徒。江洋大盗被蒋介石一阵威逼利诱（不同意就把你交给陶成章，同意有酒有肉等等），就同意再干一票。

杀人第二步：寻找刺杀对象。

万事俱备，只欠陶成章了。陶成章在哪里呢？陈其美、蒋介石、乃至王竹卿都很急。陈其美急，是因为陶成章多存在一天，就是个威胁。蒋介石急是因为陈其美急。王竹卿急是因为想赶快干掉陶成章，

继续潇洒地杀人越货。

要杀陶成章并不容易。陶成章本人长时间游走在刀锋上，原本就不容易找。加上当时有风声说陈其美对他不利。陶成章对革命党人太了解了，对那一套也太了解了。因为陶成章本人就搞过暗杀，所以更加小心谨慎。原本飘忽不定的陶成章更为飘忽不定了。

那年冬天格外寒冷，蒋介石在上海滩寻找陶成章分外艰苦。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上天帮了他一个忙。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号夜，大雪飞扬，马路上行人稀少，蒋介石像往常一样寻找陶成章的踪迹。马车经过福州路（租界）时，狂风卷起了窗帘，大雪穿过窗子打在蒋介石的脸和脖子上，蒋介石抬眼一看，见路旁陶成章正在屋檐下避雪。

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如果是在电影中，接下来的镜头通常是拔枪结果陶成章。然而作为杀手的蒋介石也是一个超级杀手。他抑制住心中的狂喜，急忙停车。蒋介石并没有贸然动手，而是下车步行上去打招呼，礼数周到，态度和蔼可亲，行为举止恭恭敬敬，一口一个前辈，无形之中马屁拍得啪啪响，搞得陶成章心里暖洋洋的。

陶成章和蒋介石是在日本认识的，大家都在同盟会混过，只是地位相差甚远。陶成章是元老级革命家，蒋介石只是菜鸟。关于蒋介石和陈其美的关系，陶成章也略知一二。但蒋介石的伪装术实在过于出色。陶成章见蒋介石如此对待自己，有孺子可教之感，遂卸下防备。

大雪之下，两个人在空旷的大街上相谈甚欢，如同真正的革命同志那样。谈到最后，蒋介石表示，老前辈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还在为

革命奔走，实为我辈学习楷模。当然陶成章并非在为革命奔走，而是躲在租界疗养。蒋介石探知陶成章在广慈医院，以后辈特有的虔诚和热忱把陶成章送回病房，并记下了陶成章的病房号码，二零五，然后告别而去。

第二天，也就是一月十三号，蒋介石又以后辈兼粉丝的身份带着礼品去看望老前辈，又是一番无声无息的马屁，麻痹了陶成章的神经。

当天夜里，一月十四号凌晨，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广慈医院病房二楼。他们把帽子压得很低，如同幽灵一样摸到二零五门前。这二人正是蒋介石和王竹卿，他们扮演了黑白无常的角色，去索取革命同志、先行者、老前辈陶成章的命。他们学护士的腔调，轻轻敲门曰：“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陶成章正在熟睡中，也没多想。等他起来开门时，外面进来的不是医务人员，而是子弹。等听到枪声，医院反应过来时，凶手已经跑得没影了。

故事的结局很老套：陶成章的死讯传出，社会一片哗然。王竹卿很快被抓住，很快被处死。由于风声很紧，蒋介石被迫再次东渡日本避风头。

整个事情的经过可以理解为：陈其美揣摩到孙中山的心思，干了孙中山想干而无法干的事。另一面，陈其美又用革命大义和私人感情忽悠了蒋介石，所以得以成功。从孙中山代表的南方系来看，陈其美无疑干得相当成功。陶成章死后，光复会失去了台柱，只剩下脸面人物蔡元培（身在同盟会）和章太炎（擅长写文章和骂人），从此一蹶不振。

然而陈其美并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浙江都督，连上海都督都丢了。因为袁世凯来了。这事前面已经说过。蒋介石刺杀陶成章这事引起一系列混乱，成了他一生的缩影。

六章 主义和机遇

受益人

可以说刺杀陶成章就是一出赤裸裸的多层次的悲剧。

悲剧之一：以浙江为根据地、以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和以两广为根基、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争夺革命门面。大家一起（大点说为民族国家、小点说为个人前途）闹革命，刚刚有点起色，就为了争夺革命经营权而舍命相搏，太让人伤感失望了。

这或许就是文化中的糟粕吧，凡事都要恶性竞争，连干革命都一样。光复会和兴中会都是干革命，却各有各的干法，彼此不顺眼。在革命没有真正成功之际就开始内斗，不管以哪种方式，哪一方获胜，结果都是革命力量被恶性削弱。

此次内斗还是一个征兆，就是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不管结果如何，中国必然是一党专政，不可能出现民主合作的局面。事实也证明孙中山给中国设计的——从美国抄袭过来的——那一套（三权分立和五权宪法）在中国玩不转。因为自己就在为了革命经营权内斗嘛，凭

啥让众人相信你那一套所谓的民主政策？正因如此，孙中山革命了一辈子，困惑了一辈子。蒋介石比较干脆，直接抛弃了那一套面子工程，好歹也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悲剧之二：刺杀陶成章相当于打开了一扇门，一扇暗杀之门。之前也有过暗杀，但那是革命党对付清政府，敌我矛盾；从来没有如此对付过内部同志。陶成章的死让人明白，对付革命党人也可以如此这般。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号，在陶成章被杀一年两个月又六天之后，宋教仁被杀。宋教仁比陶成章年轻几岁，干革命方面和陶成章有某些相似之处，都是理想主义者。陶成章为了革命事业奔走劳累，如同苦行僧一般，放弃了个人的一切；宋教仁死的时候也是家徒四壁。陶成章的理想就是为了革命放弃一切，不图享受，不计个人安危，并因此和陈其美发生冲突；宋教仁的理想当是缔造一个全新的中华民国。

按照重要人物被刺杀都会变成无头案的传统，陶成章被刺，只有小喽罗王竹卿伏法。宋教仁被刺，也只有一个小喽罗被缉拿归案。正因为宋教仁案和陶成章案相似，以至于有一派观点认为是陈其美杀掉了宋教仁。在宋教仁死后三年一个月又二十八天，即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号，杀人高手陈其美自己被刺杀。要他死的人很明确，就是袁世凯。陈其美遗言：“惜乎讨贼未成，身死小人之手，此为憾事！”

十年之后，孙中山的继承者之一，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国民党总部大楼门前被刺杀。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死在了自己人手上。蒋介石自己也很多次被刺杀。这些都是后话。

每件事都有受益人。从陈其美杀掉陶成章，到他自己被杀，算是经历了一个轮回。这个轮回之中，孙中山不是受益人，陈其美不是受益人，甚至整个革命党都不是受益人，那么总该有人受益吧。如果要找一个受益人的话，只能是蒋介石。

刺杀陶成章标志着蒋介石登上历史舞台。虽然被迫到东京流亡了一段时间，但蒋介石彻底得到了陈其美的认可，之后陈其美泡妞也带着蒋介石。在那个过程中，蒋介石认识了一生中第一个给他带来欢乐的女人，姚冶诚。陈其美混黑社会，也把蒋介石带在身边，蒋介石因此了解了上海黑帮。陈其美搞起义，总是把蒋介石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虽然起义并不成功，但蒋介石的军事才华得到实践的机会，并且在历次起义中慢慢累积资历人望。正是那种实践锻炼和资历人望为他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第二层益处，通过陈其美的栽培和推荐，蒋介石得到和孙中山沟通的机会。在任何一个行业内，想要大干一番的前提就是要和领袖搭上关系。北洋军阀巨头都要和袁世凯搭上关系，革命党巨头都要和孙中山搭上关系。蒋介石第一次得到孙中山的召见，就是陈其美推荐的。

第三层益处，蒋介石找到了一种杀手锏。

从一九一二年杀死陶成章到一九一六年陈其美被杀，蒋介石的分量并不重。但是那段时间对蒋介石而言非常重要。再回到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号那个夜晚，蒋介石在大雪之夜找到寻找许久的猎物陶成章。他压抑住自己的全部感情（找到猎物的喜悦和对敌人的恨），伪装成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卸下了陶成章的防卫，又经过一系列侦查，

在风险最小（午夜，陶成章熟睡）、成本最低（伪装护士喊门）的情况下，射出了恶毒的子弹。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冷静、机智、残忍让人心寒。此后的岁月里，蒋介石把那种伪装发挥到极致。他可以一边笑着表示尊重胡汉民，一转眼就把他给扣押了；之前谈国共合作，转眼挥舞屠刀。

能够一边笑一边拔刀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权术大师。

人嘛，对自己的初次成功总是难以忘怀。蒋介石也是一样，初次暗杀得手之后，好像就迷上了这个办法，把它当成了杀手锏使用。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人士，只要是碍手碍脚且不能通过法理除掉的，都用这个杀手锏除之。并且以此杀手锏为出发点，建立了广泛而有效的特务系统，形成一个杀人机器。尽管这一手给他和他的政府信誉带来了损失，但非常有效。简单来讲，就是通过陈其美的影响，蒋介石精通了实实在在的斗争手段：对付不同意见的同志的手段和对付不同意见党派同志的手段。这一套已经悟到了中国传统政治厚黑学之精华，再加上日本军校训练而来的狠辣，放眼中国，虽是乱世却罕有匹敌者。

领袖之心

领袖级的人物，光有冷酷精明的手腕还不够，还需要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东西，领袖之心。诸葛亮的才华谋略远在刘备之上，但他不是领袖，因为他没有领袖之心。所谓领袖之心，便是要谋得天下。

拥有领袖之心之人需要一种超强的自信面对这个世界，需要平视天下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需要复杂多变的手腕解决这个问题的各种。从晚清到民国，无数人试图逐鹿中原，但真正有机会成功的人只有四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

陈其美对蒋介石的影响：以刺杀开始，又以刺杀结束。上面分析了以刺杀开始，那么以刺杀结束又是咋回事呢？这个就是领袖之心的问题。

纵向看待蒋介石的一生，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开始，他的所有动作都指向一个目标：首先成为国民党领袖，再成为民国唯一的领袖。为了成为国民党领袖，对党内革命同志，该关的关，该杀的杀，不能明杀的就暗杀。为了成为民国唯一的领袖，对其他党派更是大打出手，尤其是对共产党，一次不行两次，输赢都要分高低。

为啥要费尽心思讨论领袖之心呢？答案很简单，蒋介石是领袖级的人物。对于领袖级的人物，在他的领袖之心形成之前和形成之后完全是两个风格。领袖之心是啥玩意呢？说实话不是个玩意。但是对于领袖级的人物而言，那是他一生中最为关键的转折点。

就个人事业而言，蒋介石最为光辉的时刻无疑是一九四五年。就人生境界而言，则是在领袖之心形成的那一刻。正如伟大的思想家在思想融会贯通的那一刻一样，比方说王阳明龙场悟道，比方说默罕默德听到上帝使者的声音。

就领袖而言，天籁之音便是领袖之心形成的时刻。

领袖之心形成之前，蒋介石吃喝嫖赌，以仰视的心态去吃喝嫖赌，

心智上可能会迷失。领袖之心形成之后，蒋介石也有吃喝嫖赌，但是以俯视的心态去吃喝嫖赌，那是根据需要而定，需要戒赌的时候就戒赌，需要戒嫖的时候就戒嫖。这就是为何早年吃喝嫖赌成性的蒋介石走上领袖地位之后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变得洁身自好的原因。这也是蒋介石区别陈其美等人的地方。陈其美到死都没有经历过这个转变。

蒋介石和孙中山都是领袖型人物，都想成为新时代的领袖，但做事方式非常不同。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失败者。走向领袖的过程中，他的行为总是过于理想化，得孙大炮之称谓，有效行动少得可怜，所以总是失败，最终没有机会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

蒋介石和孙中山恰好相反，凡事总是以自己为中心，所有权谋都围绕自己运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算计别人，总是赢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最后却输得一无所有。

归根结底一句话，孙中山是理想主义者，蒋介石是权谋主义者。

孙中山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国家，但因内容空洞乏味而失败。蒋介石想要“天下为我所用”，但因为过于注重手腕、忽略梦想而失败。后来的毛泽东把孙中山的理想和蒋介石的谋略结合起来，终于成为近代乱世之终结者。

蒋介石生于一八八七年，一九一二年因刺杀陶成章登上历史舞台，一九二四年实现人生腾飞，腾飞的机遇源于一九二二年。那一年恰好是北洋军阀争斗最为激烈的时刻。

蒋介石的机遇和陈炯明的事业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的人生陷入灰暗期。他又结拜了不少兄弟，混迹上海滩。他已经接近孙中山，但要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还需要考验。蒋介石的运气很好，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来自陈炯明。历史上的陈炯明一直是个特殊的人。由于反对孙中山，两岸三地都看不顺眼。其实不是那回事，他是一个有政治理念的军人。事实上陈炯明的真实身份应该是政治家，虽然和宋教仁比起来差很远，却也是有自己想法的人。

陈炯明，广东人，孙中山的老乡，生于一八七八年，和陶成章、陈其美同年。陈炯明小时候顽皮异常，少年后性情转变，发奋读书，曾中秀才，但没有继续走下去，转了行。和其他老牌革命党人不同，陈炯明学法律，一直学到一九零八年，已经三十岁，世界观已经形成。也许正是对法学的理解，导致了他和孙中山最后决裂。

陈炯明搞革命的时间比较晚，直到一九零九年才加入同盟会。虽然来得晚却不少干活，暗杀、策划起义忙得不亦乐乎。他在辛亥革命后任广东代都督。要知道广东是孙中山的老家，革命大后方。由老乡陈炯明坐镇，孙中山比较放心。和陈其美那种无条件跟随不一样，陈炯明有自己的主张。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时，陈炯明就不愿意按手印。

随后孙中山讨伐袁世凯，以及护法运动，陈炯明始终伴随左右，

被孙中山任命为粤军总司令，并且在福建漳州地区占了一块地盘，一共二十六个县，开始军阀生涯。此时陈炯明已经四十岁，不惑之年。也正是从不惑之年开始，他逐渐表现出自己的特质。

陈炯明在闽南二十六个县都干啥了？按照后来国民党对陈大叛徒的描述，应该是看见漂亮女人就去霸占，看见谁家住房好就去征用，看见谁家有钱就去收保护费。实际正好相反，根据《国家历史》记载：陈炯明建设了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还建设了贫民工艺厂、迎宾大旅馆，在公园的门口，竖着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他甚至还想揽人才办大学！是不是很奇怪？在他的努力下，闽南二十六个县成了一个“模范小中国”！正是他干得很成功，成了政治明星，受到百姓支持，才能以弱胜强，搞定广东全境。正是他搞定了广东全境，才帮助孙中山搞定了广西的陆荣廷。

陈炯明在广东还是老一套，建公园、图书馆、游乐场、商会等等。与此同时，陈炯明还干了一件非常牛叉的事：禁赌成功。这可是了不起的事，中国人的赌瘾那是世界一流。陈炯明硬是在同一时间内强力封掉了所有赌馆，雷厉风行程度堪比林则徐当年禁烟。如此一番折腾下来，广东成了当时全中国最为开放的省份，同时生活作风相当健康。

怎么看都不像军阀。事实上陈炯明是“联省自治”（唯一）的忠实信徒：先把自己的广东省管好，再把广东省的经验向全国推广，无需武力统一，因此他反对孙中山北伐。

不管陈炯明有没有私心，这一套看起来都很美。但也就是看起来很美而已，美的像现代乌托邦。如果乌托邦可以实现，那么早在古代就实现了，用不着现代人来推广。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家（如韩国），或者在海岛上（如台湾），陈炯明的美梦或许可以成真。

不管陈炯明如何想，孙中山认定必须武力统一全国。在陈炯明看来，他只要搞定广东，再把广东经验输出就行了。如果两个人只是利益纠纷，让一让就可以了，都是大人物，拿得起放得下。然而理念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孙中山要北伐，需要很多钱，需要增加税收。陈炯明要推广乌托邦。矛盾不可调和怎么办呢？那就用矛和盾解决。

孙中山的策略是联合段祺瑞和张作霖，打直系，拉拢冯玉祥。吴佩孚也不含糊，私下联络陈炯明，让他拖住孙中山。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入关之后才发现，孙中山和段祺瑞都靠不住，败退关外之后修生养息。与此同时，陈炯明和孙中山摊牌。

六月十六号，粤军围攻总统府，叛乱发生了。有趣的是，叛军在开炮之前把消息透露给了孙中山的人，让孙大总统赶紧跑。后又有传言说，叛军射向总统府的炮弹是空炮。不论如何，叛乱终究是叛乱。但是必须承认，此次叛乱的主要目的并非是要杀掉孙中山。

陈炯明很清楚孙中山是革命党人的旗帜，无论他有怎样的理由，杀了孙中山都会有人要他的命。最好的局面是，孙中山离开广东，到别的地方搞革命，把广东留给我陈炯明。我会把广东经营好，并且在精神上支持孙大总统你革命的。

孙中山在少数卫士的保护下冒着枪弹威胁到达海军司令部，在海

军司令温树德的陪同下到达白鹅潭。六月十七号，登上永丰舰，相当狼狈。孙中山一辈子有过各种狼狈，但是被同志、手下、老乡整得如此狼狈，平生有且仅有这么一回。孙中山的目的是建设新中国，现在连小小的广东都搞不定，还革命个什么啊！好你个陈炯明，我跟你拼了。

孙中山就在水面上不走了，一定要给陈炯明点颜色看看。但周围都是空有一腔热血、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孙中山给蒋介石发电：赶快来帮忙。于此同时，汪精卫也是惊慌失措，给蒋介石发电：老弟啊，赶快去救总理大人吧。军人出身的蒋介石赢得大展身手的机会。

一九二二年的蒋介石已经三十五岁。从之前的形势看，蒋介石继承领袖衣钵的可能性无限趋向于零。虽然在日本接受过军事训练，但在派系林立的粤军中，一个浙江小军官几乎是举步维艰。得知孙中山被困，蒋介石突然来了精神。领袖身陷险境，亲自召唤，机会总算来了！普通人都讲患难见真情，如果是跟领袖共患难，那是一辈子难得一遇的事啊。

机会，也是陷阱。孙中山在水上，陆地都被陈炯明占去了。蒋介石要通过陆地到水上的孙中山身边并不容易。首先通过陆地就不容易，被抓住可不是闹着玩的。就算陈炯明不想置孙中山于死地，对小角色蒋介石应该没啥顾虑的。临别之前，蒋介石写信向张静江托付后事：如果兄弟不幸遇难，请江兄照顾家母云云。

不得不承认，搞军事的就是不一样，在汪精卫急得不行时，蒋介石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通过层层障碍到了孙中山身边。蒋介石于六月

二十五号，事变九天后从上海南下，并于四天之后的二十九号抵达广东。然后通过一系列潜行伪装，终于登上了永丰舰。此后几十天的时间里，一直守护在孙中山身边，替孙中山分忧。把孙中山感动得一塌糊涂。

人说蒋介石起于黄埔军校，实则起于永丰舰。日后蒋介石飞黄腾达，是打着革命法统，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说直白一点也就是挟“法统”以令军阀。在国民党内斗的那些年月，蒋介石不论胜败都是中央军，为何？法统也。

法统的力量有多大，参照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当袁世凯没有当皇帝之前，是以大总统身份代表革命法统的。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拼尽全力去搞二次革命，很快输得一干二净，灰溜溜跑到日本。当袁世凯放弃革命法统去穿龙袍，孙中山两封《讨袁宣言》就要了袁世凯的命。

如果这些还不够，可参照古人挟天子以令诸侯。说起挟天子以令诸侯，必然想起曹操。其实之前就有人玩过了，而且玩得很成功。东周末年的那些霸主们，为啥能成为霸主？晋文公、齐桓公等人说白了就是以供奉周天子的名义搞定其他诸侯，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前身。再说曹操，三国末年英雄并起，曹操起于草莽之间，原本毫无优势可言。直到迎接了汉献帝，才有了代表正统的政治资本。

所谓革命法统，也就是政治资本，功能和之前的天子相当。后来的蒋介石传记，无不对永丰舰浓墨重彩，用意就是寓意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接过了革命法统。其实当时孙中山身边还有一帮人，但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只有蒋介石，仿佛永丰舰上只有孙中山和蒋介石两人，连

宋庆龄都隐藏了。蒋介石所到之处，必然高悬孙中山画像。南京守不住了，也得把孙中山的衣冠冢给带走。为何？革命法统也。就凭这一点，蒋介石就高出孙中山其他追随者一节。

永丰舰上，蒋介石不是自己出现在孙中山面前，而是把自己的心拿给孙中山看。领袖看到了吧，心是红的、是热的，配得上你的信任。

八月九号，孙中山登上英国人的船去了上海。陈炯明暂时达到了目的：把孙中山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赶走。陈炯明暂时的胜利，换来的却是未来永久性的毁灭。答案很简单。按照陈炯明自己那一套，他陈炯明不可能统帅中国。未来就算孙中山不在了，不论谁接班上岗，都会打着孙中山的旗帜来消灭陈炯明。

三年之后，蒋介石带领黄埔子弟兵东征，通过打垮陈炯明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七章 黄埔一亩三分地

陈炯明叛变后果之一：蒋介石成为孙中山心腹。

陈炯明叛变后果之二：孙中山终于意识到平生最大的错误：只顾忙着建党建政搞起义，忘了建军。党务也好，政务也好，靠的是脑细胞，是口水、是笔杆子。要想顺利地喷口水要笔杆子，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来保证要笔杆子、喷口水的安全。那个基础就是枪杆子。

就因为缺乏枪杆子，才被袁世凯威逼。若非袁世凯认为大总统制

服穿起来很别扭，一心想换上传统的龙袍，孙中山的革命史也就到那时为止了。

也不能怪孙中山天真，先行者嘛，凡事都得摸索。等到把所有事都摸索一遍，已经垂垂老矣。正是孙中山的这番摸索，蒋介石才坚定地枪杆子往政权渗透。毛泽东更绝，直接枪杆子出政权。那些继承孙中山遗愿的书生理论家，如汪精卫、胡汉民、陈独秀等人统统失败了。他们的失败不过是重复了孙中山的失败。蒋介石则继承了孙中山的转变，潜心于枪杆子，但终究在和党内笔杆子的内斗中耗掉太多精力。

然而蒋介石虽然冒死解救孙中山，却并没像当初的陈其美那样对孙中山死心塌地、言听计从。而是选择和孙中山保持一定距离，待价而沽。

早在永丰舰之前，孙中山也用过蒋介石，是当作小角色用的。蒋介石不爽，常常离开工作岗位开小差。孙中山回上海之后，革命阵营中的晚辈后生们争相为领袖送上温暖。那么帮孙中山脱困的蒋介石呢？按照一般人理解，应该就此鞍前马后跟着孙中山干，面包黄油总会来的。蒋介石不是一般人，直接丢下孙中山就跑回家了。大家都莫名其妙。

孙中山拖着衰弱的病体重整河山，很忙的。蒋介石倒好，不但不帮忙，还跑了；跑回家干嘛呢？也没干嘛。如果硬要说干嘛，就是游山玩水了。孙中山喊他干活，他不回，继续游山玩水。实在需要交代了，就回应：我有病！

蒋介石确实有病，心病。

三十五岁的蒋介石已经完全成熟，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大干一番。他要测试一下自己在孙中山心中的重量。这是政治家的心机。

心病总需心药医。

孙中山明白蒋介石的专业是军事（政治天赋还没有机会展现），把蒋介石放在身边喷口水耍笔杆子也不合适，应该把蒋介石放在军队里。何况孙中山想建军，需要人才，蒋介石正是急需的人才。孙中山也不管他，让他生病。其实他这是以进为退、含蓄地表达不满：领袖啊，用俺用错了，俺本来是杀牛的刀，为啥总是杀鸡呢？要杀牛！杀牛！

如何安排那位大爷呢？这事没有难倒孙中山，因为孙中山已经把牛准备好了。

孙中山要建军，其实很简单，就是抛弃那帮老兵油子，培养自己人。首先要培养军官。培养军官需要军校，建军校需要地盘、钱、技术支持。

中国人有地盘，没有问题，孙中山借助其他军阀的力量暂时打败了陈炯明，有了广东，可以在黄埔岛建学校。钱嘛，中国历来不缺有钱人，但是孙中山没钱。革命党人有活动能量，凑合凑合也行。关键是技术支持，这个就可悲了。偌大一个中国，就是没有技术支持。可悲不？当然可悲。技术这玩意可不是银两，赚不来可以革命。技术是硬通货，必须有支持。谁支持呢？鬼佬们只希望中国乱，让中国人打中国人，永远革命下去，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鬼佬们支持革

命却不支持技术的原因。

困境之中，同样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列宁伸出援助之手：给你提供技术、人才、和经费。

黄埔军校就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了，这就是孙中山准备的牛。有趣的是，黄埔军校这头牛，孙中山原本准备让蒋介石的新任大哥许崇智上。结果许崇智临时有事走不开，蒋介石成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负责人之一，还有一个负责人是共产党人张太雷（共产党元老之一，在广东起义时牺牲）。蒋介石带人到苏联转了一圈，回来写了份《游俄报告》给孙中山，时间是一九二三年，随后国民党临时中央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号，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革命三十年，无数次失败、徘徊、苦闷、心碎之后，无数优秀的革命同志死去之后，终于迎来第一次代表全国人民的机会。孙中山百感交集。

就是那次大会上，确立了国共合作，确立新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就是那次大会上，确定黄埔军校正式招生。有了黄埔军校，蒋介石一飞冲天，终结乱世，又制造乱世。反过来，黄埔军校之所以如此成功，也正是蒋介石担任校长的缘故。

国民党事业，成也蒋介石，败也蒋介石。

所有蒋介石主导的乱世和暴力，都是从黄埔军校开始。

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民国最著名的军校。

它诞生于混乱复杂的年代，消失于连天炮火之中。它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却如午夜昙花那般耀眼，如同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浩瀚的历史苍穹。

它座南面北，面临珠江，侧视海洋；身在绿荫之中，炮台四周环绕。大门上有副对联：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

贪生畏死勿入斯门。

横批：革命者来。凡经得起考验者，皆英雄豪杰，名动一时。

那里有过陈赓和蒋先云的机智活跃，有过徐向前和林彪的沉默寡言。那里有过强悍机敏的陈明仁，儒雅的杜聿明，狡猾的胡璉。国共风云，也就是黄埔风云。

风云中的骄子们在那里唱歌曰：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随后又歌曰：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向前进，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自从伟大的孙中山先生批下一亩三分地之后，伟大的周恩来曾经在那里播过种，无私的廖仲恺在那里浇过水。在那一亩三分地里，有很多园丁在除草。更有机智无双的蒋介石校长在那里收获果实。黄埔军校领导班子如下：

党代表：廖仲恺。

校长：蒋中正。

教练部正主任：李济深；副主任：邓演达。

政治部正主任：戴季陶（后为周恩来，周恩来之后还有好几位）。

教授部正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

总教官：何应钦。

另有教官工作负责人多位，国民党一方有顾祝同、刘峙、王柏龄、钱大钧、陈诚等人；共产党一方，有聂荣臻、叶剑英、萧楚女等人参与；苏联方面提供技术人员。

前面说过，论精明，从晚清到民国，只有李鸿章、袁世凯等少数人能与蒋介石相比。他们都是谋略大师，都有翻云覆雨之能力。但三人象征着三个时代的三种选择。李鸿章心里满满的帝国梦和大清帝国，愿意为爱新觉罗家族的江山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袁世凯懂得利用世事变迁，敢于顺势而为，最终还是暴露了灵魂深处的帝国梦。蒋介石对帝国的一切已经没有感觉，他的手腕和谋略都围绕着自身利

益展开。

但三人有一个共同点：对军校很在意。李鸿章创办天津武备学堂，试图重整淮军；袁世凯下令筹建保定军校，试图培养北洋军；蒋介石依靠黄埔军校武装了一支中央军。

但黄埔军校和此前的武备学堂或保定军校差别很大。李鸿章也好，袁世凯也罢，都是以德国陆军为参照物，黄埔军校以日军为参照。尽管德军战斗力不在日军之下，尽管日军也曾参照德军，但德国离中国很远，德国军校毕业生有限；日本离中国很近，黄埔军校很大一部分教官都是日本军校毕业，直观感受很深。

当初蒋介石在日本，感触最大的便是日本军人的秩序。

当年的中国虽然衰败，却也不乏热血男儿。当时的军队虽战斗力不强，军中也不乏血性之士。然而中国那些有血性的汉子没有形成一种秩序，只有个人战斗力而没有集体战斗力。中国有过有秩序的军队，那都是冷兵器时代。中国人虽然发明过火药，虽然最先把火器用于作战，但对热兵器并无概念。热兵器出现在古老帝国门前的时候，直接冲垮了大清帝国。在大清帝国坠落的那些日子，军人也就没了尊严可言。随处可见吃喝嫖赌的将军，随处可见吊儿郎当游手好闲的兵油子。

日军训练极为残忍。那只是一小部分，关键在于等级森严，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二等兵之上是一等兵、下士、中士、曹长、特务员，然后是正式军官，都要层层服从。军官让士兵去撞墙，士兵只能去撞墙。说不好听点，上级让下级去吃屎，下级也得去吃，如果不吃，肯定会遭到比吃屎更严厉的处罚。这么一路服从下去，整个军队就变

得井然有序，宛如一个有机整体，自由伸缩，指哪打哪，团结，高效。

蒋介石在日本的时候写过一首小诗《述志》：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这首诗是蒋介石的代表作，诗歌水平还不如乾隆，却说明了蒋介石的志向：试图复制日军的纪律和细节。他的办法是什么都要管。比方说，学生跑操问题，属于教官的职责，蒋校长亲自管。不但管，而且以身作则，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蒋校长亲自去跑操，比年轻学生还早。比方说，学生睡觉问题，属于生活范畴，蒋校长也亲自去管。按照规定时间，学生都睡了，蒋校长还不睡，还要看看有没有调皮捣蛋鬼。

这些已经够繁琐了，还有更为繁琐的，就是不管蒋校长有多忙，都坚持找同学们见面谈天。凡是黄埔学子，基本上都要跟校长面谈。稍微活跃一点的，都要面谈好几次。黄埔三杰那个级别的，谈的次数更多。这点大家想必会觉得不可思议。咱们现在上大学，好几年见不到校长面都是正常现象。每个人都跟校长面谈，简直难以想象。蒋校长每天和学生面谈是固定节目。

如果说这些已经够忙了，还有更细的细节。蒋介石在日本军校的

时候，对日本教官抓细节问题印象深刻。比方说上课之前要检查门窗是否干净，下课之后要检查被子是否整齐等等。蒋介石认为那就是日军的秘密，在黄埔也来那么一手，目的是使得年轻的学生们保持一种紧张感。只有平时保持紧张感，上了战场才不会松弛，不会白白送命。只要有机会，蒋介石就去检查清洁问题，检查卫生问题，检查门窗是否干净，马桶是否清洁。那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台湾。据李敖回忆，他在台湾做预备军官时，蒋介石还要亲自检查厨房和厕所，为了应付检查，厕所清干净后不准使用，大家只好拉野屎。

是不是很有些诸葛亮的味道？问题是诸葛亮是辅助刘备的。

蒋介石一生都在试图建立一个如此高效的团队，但是很遗憾，并不成功。他的特长还是玩权谋，而非建军。蒋介石的谋略是坚持两手抓：学生一生，教官一手。

两手抓

一九二四年的蒋介石已经三十七岁，已经阅尽人世百态，接触过的人、干的事业之复杂，普通人活三百七十年也未必能全部体验一遍。三十七岁的蒋介石性格已经成型：矛盾互补。他那早年便有的敏感，加上日后身处险境的磨练，使得他形成了一种罕见的能力，对世事非常敏感：能够先一步预见到局势的走向。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并不容易，除了正常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还有各种人际关系要摆平，他要对付两大风险：共产党抢人才和国民党

政敌的内部渗透。

自家园子里的桃子被别人摘了，那是园主人的悲哀。

蒋介石干的那些事，什么早起跑操啊，查寝啊，约学生谈心啊，说穿了就是宣誓自己的存在，拉拢人心，防火防盗防共产党的侵蚀。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分别建立多个小团体，让小团体之间相互利用、监视，从而纷争不断，最后都依赖蒋校长。蒋介石干的这一切，和园丁给自己的园子施肥、浇水、除草、安装摄像头、拉电网是一个道理。

正是通过层层防御，蒋介石帮助国民党赢得了黄埔军校绝大部分毕业生。他们中有一些属于顶尖的军事人才，比方说杜聿明，温和儒雅，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从不讨价还价。

比方说胡宗南，参与各个阶段的征战，不遗余力。

比方说戴笠，作为蒋介石的神经末梢，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探听信息。蒋介石想要某个人的资料，想要除掉某个讨厌的人，戴笠就可以出马了。尽管戴笠没有赫赫战功，但他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位将军。

比方说陈明仁在四平证明，如果不考虑民心背向，国军不见得比共军差。就连毛泽东也笑着对陈明仁说：我看林彪打仗不如你。

比方说胡璉，战场上狡猾的狐狸，不论对日作战还是对共军作战都不吃亏。三峡石牌狙击日军展现了国军的血性和勇敢。对共军作战，战绩辉煌。即使国军崩盘，胡璉逃到台湾之后，依然在金门送给共军一场惨败。

张灵甫则是一头狮子，尽管在孟良崮因为战略失误而惨败。

他们都是蒋介石辛苦工作的结晶，都是一亩三分地里长出来的诱人果实，他们构成蒋介石横行天下的基石。未来的二十年中，他们帮助党国赢得了一个大大的江山，然后又弄丢了。

蒋介石虽然开足马力鼓足干劲设置了多层防护，但依然漏掉不少尖端人才。比方说黄埔一期的徐向前，他在红军时代让国军吃足了苦头。当然可以理解为徐向前“隐藏”得太深了：内向腼腆、口齿又不清楚，外形也不好。加上蒋校长很忙，目光都被黄埔三杰之类的同学给吸引了。错过徐向前很可惜的话，林彪就更可惜了。因为林彪虽然也不爱说话，却是表现了才华的，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最后一念之差，悔之晚矣。

最让蒋介石纠结的是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完全是重点关照对象啊，还在战场上救过蒋介石的命。蒋介石是一心想把陈赓带走，然而陈赓死活跟着共产党跑了。另有蒋先云、黄公略、段德昌、刘志丹、左权、彭雪枫也让蒋介石头疼过。

在共产党抢夺人才时，也要注意共产党那些负责人。比方说陈赓，基本上是被周恩来拉走的。比方说林彪，一时就业困难，通过聂荣臻之手到叶挺独立团上班的。如果没有聂荣臻，林彪很可能被迫等蒋介石北伐回来。

另一手

但凡干一件事，开始总逃不过质疑。大家观望不前，观望一阵之后，有利可图，就一窝上；没有利益，那就掉头走，然后发表一番高论曰自己早就怎么怎么样。把好处抢到手，坏处留给别人，流氓逻辑。比流氓更流氓的是玩政治的。

刚刚诞生的黄埔军校，在孙中山的大力推动下，在廖仲恺、蒋介石、周恩来等人的辛苦耕耘下，黄埔军校的功能隐隐浮现。毕竟一批一批军官走出校门，战争淘汰下来的也都是精英。那些年轻人走到军队中，一开始可能只是小排长，两场战争不死就可能升为营长。再机缘巧合立点功，团长师长不在话下。而当时啥都缺，就是不缺战争。

当黄埔师生们站在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身后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国民党那些喷口水耍笔杆子的大佬们开始行动了，想方设法往军校内部渗透。他们要比共产党难对付。共产党行事虽然严密，虽然无处不在，但终究是共产党。国民党大佬不同，他们资格很老，地位很高，每个人都是前辈，以参观、视察、学习之名搞关系，那是比洪水猛兽还难以防范的。这个情况在一般人看来还真不好对付。

但蒋介石不是一般人，他找到了完美的手段：搞关系。

一个新兴事物的诞生，力量在底层，而非上层。国民党元老们都是上层人物，搞关系也是跟军校上层人物搞。军校上层人物是左派廖仲恺，一个非常讲原则的人，几乎是茶水不进。其实廖仲恺怎么样不要紧，要紧的是把下层的教官和学生抓在手上。前面提到，蒋校长整日整夜睁大眼睛在学生中寻找人才。只要碰见出色的，那就像鲨鱼见了血，一定要得手。但是蒋校长毕竟是校长，大部分训练的事还是要

教官干。教官基本上每天都和年轻人直接接触，潜移默化的影响远比政客的嘴皮子管用。

所以，必须把一帮教官抓住。学生嘛，进进出出，如同流水。在黄埔军校的大营盘上，教官才是台柱。怎么抓住教官呢？也就是搞人际关系，这点难不倒蒋介石。上海滩三教九流的人物都能搞定，还搞不定一帮舞枪弄棒的？

就在廖仲恺作为党代表周旋于各种力量之间时，蒋介石悄悄地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小团体。主要有五个人：何应钦、刘峙、钱大钧、顾祝同、蒋鼎文，他们被称为蒋介石早期的“五虎将”。何应钦是黄埔军校总教官，其他几个人是教官。所以刘峙、钱大钧、顾祝同、蒋鼎文几个人又被称为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一听这名字，就能了解其中的关系了。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历次重大战役的负责人，总是那么几位。

何应钦，一直是黄埔系中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即使在整个中央军，甚至整个国军中，也是仅次于蒋介石。所以抗战胜利，何应钦代替蒋介石在中国战区面对鬼子（冈村宁次）受降。一般人不明白，何应钦是哪根葱，战场上也不怎么露脸，但是人家地位高、资格老啊。黄埔军校总教官的头衔，随着黄埔师生的崛起，就够吃一辈子了。

五虎将加上张治中、陈诚、陈继承，就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八个人都是黄埔军校管事的。在黄埔军校的学生挑大梁之前，他们几个人就是蒋介石的台柱子。如果国民党赢得中国的统治权，评军衔的话，八大金刚有一半要评上元帅，另有一半是大将。

蒋介石就利用那套班底，把军校牢牢抓在手里。这就是蒋介石的秘诀。特别是在廖仲恺遇刺之后，黄埔军校整个落在蒋介石手中，谁也没办法跟他竞争了。

在蒋介石的经营下，黄埔军校成了一条生产流水线，源源不断地生产军官。黄埔出产的军官中，一部分死于战争，少数归了共产党，其余部分构成中央军主干。中央军则是蒋介石赖以压倒党内同志的基础，也是蒋介石赖以成为领袖的基础。

蒋介石的事业中有两个支柱，一个是黄埔师生构成的中央军，就是枪杆子。另一个支柱就是江浙财阀，钱袋子。蒋介石一辈子都在用枪杆子守护钱袋子，同时也用钱袋子装备枪杆子，二者相互依存。

枪杆子之中，数何应钦最为重要。这里就先说说蒋介石和二号人物何应钦的关系。

在蒋介石一生中，何应钦是一个异常重要的人物。两个人的故事，如同一部长长的电视连续剧，跌宕起伏，精彩纷呈。酸甜苦辣之处，都在茶余饭后的谈资中。

此后二十五年，蒋介石带领黄埔子弟止乱或致乱，经历东征、北伐、内战、抗战、决战五个系列的战争，从无到有，从高峰到低谷。

按照一般规律，人生在世，首先要安身立命。若无安身之本，一切免谈。乱世之中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经过立身之战。

蒋介石系列战之一，东征对付陈炯明，为立身。

立身之后，若不能进一步发展，最多也就是乱世军阀，为害一方。想要摆脱军阀的帽子，建立一番功业，只有一条路可走：消灭别的为

害一方的军阀。

蒋介石系列战之二，北伐对付袁世凯粉丝，为腾飞之战。

如果能把军阀消灭干净，还天下太平，拯救华夏，那便是光耀神州大地之荣耀。蒋介石虽然北伐获胜，却并不彻底。消灭了旧军阀，却弄出新军阀，同时和共产党决裂。

蒋介石系列战之三，内战对付兄弟们（新军阀）和共产党，致乱之战。

内战如果合理，赢天时地利民心，便可以胜利。否则便永无尽期，祸害更大。蒋介石因为自身失误，既没有消灭新军阀也没能消灭共军，却导致更大的混乱。与此同时，外敌进逼。

蒋介石系列战之四，抗战耗日军，延续民国之香火，可称巅峰之战。

与其说抗战，不如说熬战。国共双方依托华夏“大”地和国人熬死了日本。蒋介石作为最高领袖，再一次获得光照神州的机会，却再一次犯下致命错误。

蒋介石系列战之五，和共军决战，为历史周期律中的中华民国画上句号，归为尘土。

第二篇 止乱之功

蒋介石的一生就一个字，乱。

乱有两层，止乱和致乱。

所谓止乱，便是终结乱世和杀戮，和历史大趋势契合。

所谓致乱，便是制造乱世和杀戮，和历史大趋势背离。

中华帝国史，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止乱和致乱之中循环。

民国三十八年，在更高一层的历史周期律作用下，混乱达到巅峰。

民国三十八年，种类繁多的军阀都在终结混乱或制造混乱。但军阀们的功能只限于局部某个地方，而蒋介石能覆盖整个中国。唯一能和蒋介石比肩的是袁世凯。辛亥暴动，南北对峙，内战一触即发。袁世凯用他无与伦比的手腕实现了满清到民国的和平过渡，止乱。然而和平最终没能维持，袁世凯称帝，天下大乱，致乱。袁世凯止乱和致乱的本事都是一流，但对比蒋介石，还是差一点。

蒋介石一九二四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那时候直奉战争正如火如荼，张作霖和吴佩孚试图以旧派军人那一套逐鹿天下。加上曹锟贿选大总统，冯玉祥临阵倒戈。那种情况下，没有人还能维持和平，段祺瑞不能，孙中山也不能。谁也没想到终结旧军阀混乱的人会是蒋介石。那时候的蒋介石只有一群结义兄弟，没几个军阀视他为对手。当时的蒋校长，苦苦追求宋家三小姐，但只能看见一个背影。这一切在接下来的四年发生了改变。

一九二八年，张学良改旗易帜，中华民国再一次完成名义上的统一。蒋介石名义上已经成为千万平方公里国土（包括外蒙）的领袖，所有军阀的眼睛都盯着他。宋大小姐主动找上门，谈蒋宋联姻的可能，骄傲美貌的三小姐终于出嫁。

四年时间，两次东征，两次北伐，蒋介石登上领袖之位，还天下一个理论上可以和平之环境。单看那四年，蒋介石可以和历史上的开国者比肩。论止乱之能力，朱元璋北伐之后，除四五年到四九年的毛泽东，神州无人可与之比肩。和辛亥年之后的袁世凯一样，蒋介石得到光照神州之机会。袁世凯玩砸了，蒋介石同样玩砸了。

如果袁世凯止乱之后没有致乱，那么民国将躲过历史炮灰律。蒋介石也一样，如果没有致乱，民国也不会倒在历史炮灰律的漩涡中。随后蒋介石因为裁军而引起新军阀内战，同时要对共产党赶尽杀绝，与此同时，对虎视眈眈的日本却一再退让，终于酿成西安事变。再往后抗日，再次得到止乱之机。抗日结束，再次致乱。

一系列画面，精彩纷呈，残酷无边。民生凋敝，生灵涂炭。

好吧，这里先谈止乱。

一章 东征止乱

话说当初因为陈炯明叛乱，蒋介石赢得孙中山的信任。按人一般人际关系，蒋介石应该感谢陈炯明。但在角逐最高权力的舞台上，蒋

介石向陈炯明表达感谢的唯一办法就是灭了他。

当时孙中山只有广州一隅，想进一步发展，必须建立根据地，巩固广东，灭了陈炯明，但没做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孙中山去北方和段祺瑞与张作霖谈合作。蒋介石抓住机会在南方大干一番事业。

一九二五年二月份，在孙中山去世前夕，蒋介石第一次率军东征，自己写诗：

亲率三千子弟兵，
鸱鸢未靖此东征。
艰难革命成孤愤，
挥剑长空涕泪横。

好吧，这首诗的水平勉强赶上乾隆。当然蒋介石写诗，并非为艺术水平，而是有感而发。那是他第一次以统帅的身份走上战场，试图影响天下局势。十二年前，他也曾影响局势，以个人身份刺杀革命前辈，坏影响。如今他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机会。如果成功铲除陈炯明，将会稳固革命党的根据地，将会赢得孙中山的信任，黄埔师生将会变成将军，黄埔军校会变成将军的摇篮、变成铁打的营盘。前途很光明，但道路很曲折。那好吧，我将带领黄埔子弟兵勇往直前，百折不回。

要胜利并不容易。陈炯明在广东和福建声望很好，他控制的军队为粤军精锐，且熟悉地形。黄埔师生是菜鸟上战场。因此过程和结果

都超出蒋介石的预料，而且极富有戏剧性。

东征之所以是蒋介石的立身之战，不在于消灭了陈炯明，而是在消灭陈炯明的过程中锻炼出一支崭新的队伍：国民党中央军。

比起李鸿章的淮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蒋介石带出来的中央军更贴近那个时代。淮军在甲午战争中输掉裤衩。北洋军没有经历过外战的考验，自己败给自己。中央军经历了各个层次的内战和外战，虽然最后败给更为出色的解放军，但至少熬过了抗日战争。解放军之前，中央军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出色的军队。

中央军的核心就是黄埔教官和学生。第一次东征陈炯明，黄埔教官出彩。第二次东征陈炯明，黄埔学生崭露头角。可以说是陈炯明锻造了中央军。

黄埔教官

从二月十五号东征军攻克淡水开始，一路胜利不断。捷报飞往北京（孙中山抱病北上和段祺瑞探讨人生），重病之中的孙中山深感欣慰，让汪精卫复电蒋介石奖励前线将士“努力杀敌，以期三民主义之实行”。陈炯明当然不甘心丢地盘，一面固守惠州老窝，一面调迁猛将林虎和刘志陆对抗黄浦师生。

三月十二号，孙中山逝世那天，林虎的粤军和蒋介石的黄埔军在棉湖遭遇了。黄埔军迎来东征中最为重大的一次战役，也是最为严峻的一次考验。如果成功，东征胜利。若失败，功亏一篑。那一天，黄

埔教官集体出彩，蒋介石收获颇丰。

蒋介石收获的第一个将军是何应钦。

何应钦，贵州人，生于一八九零年。他是蒋介石身边的一个符号，中央军二号人物，树大根深；生活清廉，为国军将士之楷模。

何应钦的性格属于绵中有针类型，做事井井有条，人生最重要的事便是遇到蒋介石。

何应钦的先人是当兵的，后来转行做生意，后又转行种地。何应钦出生在大山深处，是个典型的山里娃，身子骨很好，而且调皮捣蛋、兼勤奋好学。十六岁那年不小心玩弄老爸的手枪走火，打穿屋顶，害怕被责骂，一个人出走，看见军校招生便去投军，成为一名军校学生。随后去振武学校念书，是蒋介石的学弟，但和蒋学长并无交集。何应钦比蒋介石念书强，更进一步去了日本士官学校。何应钦毕业回国，几经沉浮之后，在学长王柏龄的推荐下去了黄埔军校。

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原本头号心腹为好兄弟王柏龄。二人一起从保定军校到振武学校，关系很铁，曾经一起扛过枪（搞革命），一起去青楼。黄埔军校筹建过程中，王柏龄确实干了不少事。但王柏龄干事，纯粹玩票性质，心情不好立马去青楼喝酒。想干一番事业的蒋介石找王柏龄，经常不见人影，急得直骂娘希匹。

于此同时，王柏龄推荐的学弟何应钦却非常敬业。不论啥时候，随找随见，随叫随到，遇到事情当场解决，自觉加班加点，也不要加班工资。完全一副“我把一生献给军校，军校就是我家，为了大家我可以舍弃小家”的模样。蒋介石很欣赏何应钦的作风，让他当总教官，

地位在王柏龄之上。据说王柏龄经常抱怨蒋大哥不够意思。

第一次东征，何应钦的教导第一团一直是先锋兼主力，遇山开道，遇水搭桥，遇城攻坚，遇敌野战，充当蒋介石的拳头。何应钦拿出平生所学，忘我战斗。加上黄埔学生军都是有志青年，一根筋精神很足，冲锋啥的毫不含糊，所以一开始进展顺利。

棉湖之战，何应钦面临林虎的正面冲击，蒋介石命令王柏龄的第二团绕到敌人后侧进攻。战斗持续到下午。由于林虎军队占据数量上的优势，教官钱大钧没有及时到位，侧翼袭扰的战术没起作用，正面打狙击的第一团反而渐渐被包围，指挥部都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中，伤亡惨重，战力已经到了极限，到了可能崩溃覆灭的边缘。如果扛不住，那么整个东征就完了。如果在孙中山去世那天遭遇惨败，对整个国民党都将是一个恶毒的诅咒。

人生总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机遇，就看你能否准备好。如果抓住了，此后的道路将是一片金光。如果没有，那就继续在苦闷彷徨中寻找下一个机遇，也可能永远找不到，孤独地迈向黄泉路。黄埔军危急时刻，蒋介石危急时刻，一个天大的机遇出现了。谁能解蒋介石之围，解黄埔军之围，那么前方就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等着他。

要说做准备，战场上都在做准备，大家上了战场就准备扬名立万、甚至青史留名的。那些在此战中充当了炮灰的黄埔学子们，如果不死的话，也许将来就能横扫千军如卷席。那些后来成为名将的人，无非是运气好一点。第一个准备好的人就是何应钦。

论资历，何应钦和蒋介石一样，都是早在辛亥革命时代就参加战

斗了，号称军界前辈。之前经常跟人家吹牛说老子当年如何如何，现在就廉颇老矣？

论学历，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拥有连蒋介石都不曾拥有的正宗文凭，海归，喝过洋墨水，学过先进军事经验的。眼前的困难都搞不定的话，难免让人怀疑文凭造假。要不然的话，堂堂大日本军校培养的高材生怎么连陈炯明手下的土鳖都搞不定？

就何应钦本人而言，也是奔四的人了。之前的人生也是起起伏伏，没得到一个很好的发挥平台。难道等老了回忆往事，只有失败？不，绝对不可以！

好吧，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到了考验勇气和意志的时候。战场之上，最勇敢最坚强的人反而最容易活下来。何应钦把精神意志提升到最顶层，以大无畏的勇气带领教导团拼死冲锋，置之死地而后生。当一个人把生死置之度外，能量是恐怖的。如果那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是领导，感染力是强悍的。如果那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领导是在战场上，往往能创造奇迹。

奇迹出现了：第二团迂回到位，打败林虎，奠定了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基础。

战斗结束后，蒋介石拉着何应钦的手说：“我们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要永远记住三月十二号这一天，这一天是我们生死与共的日子，我们结拜成兄弟吧！”于是，两人喝了血酒，发了毒誓，蒋介石年长三岁为兄，何应钦为弟。为共患难之典范。然而遗憾的是，日后富贵了，两兄弟之间却生出许多裂痕和争斗。

四个老虎

当然胜利并非何应钦一个人的功劳。他只是五虎将之首，另外的老虎也有精彩演出。

国军之中，刘峙、钱大钧、蒋鼎文几个人贪污受贿乱搞男女关系，可谓声名狼藉，很难和“老虎”联系起来。但那都是以后的事，一九二五年那会儿，他们还是革命者，扮演光辉勇敢的正面形象。

五虎将中，蒋鼎文最年轻，此前和蒋介石并称为孙中山身边的两蒋。他们是同乡同事，在一起上班，别人都讲普通话，唯有蒋鼎文可以用宁波方言和蒋介石对话，那感觉不是一般的亲密。黄埔军校挂牌营业，年仅二十九岁的蒋鼎文拿出革命魄力：丢掉兵站肥缺，连降四级，去黄埔军校当了一个小教官，从此成为蒋介石心腹。所以不论蒋鼎文干了多么烂的事，总能安然无恙，而且任职必是肥缺，原因很简单，雪中送炭嘛。

东征时代的蒋鼎文还没有精于吃喝嫖赌抽，战场之上敢打敢冲。因为冲锋过于勇猛，胸部中弹，被勤务兵从死尸中背出，急送医院抢救。但何应钦却怀疑蒋鼎文临阵脱逃，派人验伤，查的结果：子弹从左肋穿入，也就是说蒋鼎文是在冲击时受伤的。事后蒋介石送去五千块奖励。十二年后的西安事变中，蒋鼎文再次受伤，蒋介石怀疑蒋鼎文和张学良勾结，蒋鼎文脱上衣用伤口铭志。也不能怪何应钦小人之心，实在是蒋介石的另一位兄弟王柏龄的表现过于让人印象深刻。此

君原本是黄埔军骨干，让他带第二团迂回，但他公子兵发作，临阵脱逃，不见人影。幸好钱大钧顶上，才把第二团及时带到位。

五虎将之中，钱大钧最富有最帅气，女人缘最好。上海滩淑女欧阳氏姐妹花先后嫁给他。钱大钧的爷爷曾经是贡士，有资格当官，爸爸是做生意的，很有钱。用现代话说，他是典型的高、富、帅出身。随后父母双亡，家道中落，念书没钱，投笔从戎，后去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和何应钦等人为校友，此后进入黄埔军校当教官，搭上了蒋介石的客船。

东征时代的钱大钧，还没把心思放在泡女人上，也没一门心思捞钱，还不是后来的“钩大钱”。眼见王柏龄逃走，便带队上前。但钱大钧打仗水平一般，腿脚不麻利，好在最后完成了任务。东征之后，便转行行政工作，专心享受金钱和姐妹花娇妻之乐趣。

五虎将之中，顾祝同的心思最机敏，刘峙的故事最多。如果把二人的故事写完，足够写一本书。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多说。第一次东征，顾祝同没啥表现，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副官长，天天跟着蒋介石，揣摩蒋介石的心思。蒋介石只要一个眼神，顾祝同立刻就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比情人还默契。退到台湾的国军将领中，只有陈诚比他混得好。

东征时代的刘峙还不是后来的长腿飞将军，还是常胜福将。虽然没有像蒋鼎文那般到鬼门关转了一圈，也没有像钱大钧那般带着大队人马玩心跳，但刘峙在何应钦身边，以自己的实在抵挡了正面敌人。在第一团正面狙击的过程中，刘峙充分发扬模范军人的优良品质，奋

不顾身，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带着自己的人马和敌人拼老命。他的优良表现得到何应钦、苏联顾问、黄埔学生的一致认可。

有了这样五个人，中央军早期核心就诞生了。但这五个人的功能也就限于早期。日后何应钦的地位越来越高，时不时和蒋介石摩擦生热，和桂系眉来眼去。蒋介石觉得那些老家伙不太靠谱，开始扶持新派系。何应钦本人地位越来越高，实权越来越小。抗战胜利，何应钦代表中国接受日军投降，然后靠边站，成为一个符号型将军。

但蒋介石也不好动何应钦。国军之中腐化堕落成风，何应钦能洁身自好。何应钦是国军中的一朵奇葩，犹如北洋军中的段祺瑞。区别在于，段祺瑞得到施展的机会，何应钦没有。何应钦本人也觉得很无趣，避走美国。到台湾之后，除顾祝同之外，其他几人均不得志。

新派核心人物就是陈诚。陈诚也是起于三月十二号。

陈三炮

陈诚生于一八九八年，浙江青田人。

国军内部，陈诚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为人还算可以，作风还算清廉，搞关系也有一手。陈诚处处模仿蒋介石，深得蒋介石之宠信。在很多人眼中，陈诚就是蒋介石的影子。

如何评价这样一个人呢？一个词，政治将军。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共军中的政委，但又不是政委的意思。所谓政治将军，就是军人之中善于玩政治的，政客之中玩军事的。当他担任地方长官时，用军人手

腕禁毒，很有效；担任军事长官时，又用行政手腕治军，比方说在东北面对林彪就搞得一团糟。犹如蝙蝠，飞鸟中的走兽，走兽中的飞鸟。

陈诚的爸爸是前清秀才，家中小有薄产。他念过几年书，找不到工作，闲着没事，就和一个同学的妹妹结婚了。婚后拿着老婆的嫁妆费跑到杭州体校进修，半年之后毕业，想找一个小学教师当，不成功。阴错阳差之下，跟着一个父亲的朋友去了保定军校。因考试成绩太差，走后门进去的。那个时候的陈诚，要求很简单，有口饭吃就行。

军校毕业后，陈诚到绍兴当了一个见习少尉。身在流行吃喝嫖赌的旧军队，陈诚能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等待机会不消极，这点与何应钦也很像。套用句俗话说，不要低估了一颗向上的心。终于他等到了邓演达，并跟随他一起南下广东，进入黄埔军校，依然积极向上。

有一天晚上，陈诚访友归来，长夜漫漫无心睡眠，便起来找点事干。军校清贫，也没啥娱乐，就在微弱的灯光下阅读孙中山的著作。

蒋介石把黄埔军校当成自己的后花园，没事就去转转，除草捉虫。蒋介石深夜查寝，发现竟然还有房间亮着灯，以为有人捣蛋，气愤之下推门而入，发现有人在看书，正要发作，发现人家看的是《三民主义》，剧情就这么反转了。

蒋介石又根据偶像曾国藩的相面术，发现眼前其貌不扬的年轻人举止神态都不一般，眉宇之间好像还有一种传说中的灵气。蒋介石对眼前的小军官有了一个初步判断：敏而好学。

两人交流了一下，相当融洽。分别时蒋介石拍拍陈诚，小子，好好干。

那情形和毛泽东首次碰见林彪，发现林彪竟然在跟大兵们唠叨武装割据的道理有几分相似。区别只在于战场上的林彪比陈诚强。第二天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

蒋介石很开心：发现了一匹千里马。

陈诚也很开心：遇到伯乐了。

这只是开始，真正的欢喜还在后面。一九二五年元旦，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第一连连长。炮兵，部队的尖子，曹锟提拔吴佩孚就是让他先去带炮兵。

三月十二号，决定生死的棉湖之战，何应钦带领大家正面苦战，其他人积极帮衬。

蒋介石见林虎部下逼近，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一起驱车赶到炮兵阵地，迎头对着陈诚就吼：“娘希匹，你的几门山炮都哑了吗？你这个炮兵连长也不想想办法，把炮架起来！”

此时陈诚右臂挂了彩，炮兵连压力很大。根据奸商的一贯德性，炮弹也不大好用，加上大家都是新手，难免不灵光。生死时刻，陈诚展现出英雄本色，咬牙上炮台，亲自将炮瞄向城垛内指挥所，亲自发射炮弹，亲自连开三炮，亲自把三发炮弹送到城垛中。正如何应钦在正面冲锋激励了将士一样，陈诚也起到了模范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伙一看连长如此神勇，拍拍身上的泥土，抖擞精神向敌人开炮。正是炮兵的威力，黄埔军得到反败为胜之机会。

陈诚三炮起家的美誉诞生了。又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蒋介石

觉得自己很有眼光，再次给陈诚升官；陈诚也很开心，觉得当兵这一行也有搞头。

随后的战争中，陈诚一次次打仗，一次次升官。在接触到共军之前，在国民党内斗中，陈诚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不仅表现出不错的军事才能，同样表现出不错的政治水平，让蒋介石觉得孺子可教，可以提拔栽培。

一九三一年，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陈诚表现出色，蒋介石再次给他升官嘉奖。也就是那一年，蒋介石抓住了一直反对自己的邓演达。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也是陈诚的恩师（保定军校）兼恩人（把陈诚带到黄埔军校）。陈诚闻知邓演达被捕，从前线致电蒋介石，请求“为国惜才，贷其一死”。蒋介石回电表示“准从宽大处理”。陈诚“深信总座之伟大，决不我欺”。但是蒋介石私下处死了邓演达，陈诚很受伤，电告蒋介石，要辞职。蒋介石发电报给陈诚大骂一顿。陈诚感叹：“现在卖国自荣和弃职辱国者，均逍遥自在，独择生兄抱憾以死，为革命而死，死何足惜”。

陈诚这么干是非常危险的。任何一个领袖都不能容忍自己的手下大将和政敌有瓜葛，何况蒋介石生性多疑。蒋介石并没有办陈诚，而是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糖果。宋美龄出面，把自己的干女儿谭祥嫁给了陈诚，谭祥是谭延闿的女儿。

谭延闿是老革命，中年丧妻。孙中山曾想把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谭延闿婉拒，转而做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介绍人。谭延闿死时，把乖女儿谭祥托付给蒋介石和宋美龄，让他们在青年军官中为谭祥找个老

公。谭祥本是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回国后经常跟着老爹到蒋家走动，却自降一辈，认宋美龄为干妈。总之是关系很复杂。复杂到最后，就是谭祥和陈诚结婚了。如果陈诚拒绝，接下来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陈诚很识时务，休掉家中发妻，做了蒋介石的干女婿，成为蒋介石心腹。相比之下，胡宗南和陈明仁就没有那种觉悟。所以最后陈明仁愤然跟随共军，胡宗南到台湾后很难过。

陈诚在军中既是蒋介石的耳目又是四肢，蒋介石不愿做的事，陈诚做。所以黄埔军校师生，只有陈诚一人始终得蒋介石信任。遗憾的是在战场上，陈诚遇见林彪就是败。当然就战力而言，陈诚的“土木系”还算可以，尤其是那“狡如狐、猛如虎”的胡璉，很不错。

二章 精英

第一次东征之后，蒋介石并没有乘胜追击，把陈炯明连根拔起。因为孙中山死后，广州大本营再次出了乱子，广州商团叛乱。蒋介石回师平叛，克复广州，上演攘外先安内之第一季。之后蒋介石兼任广州市卫戍司令，军权更上一层楼。

一九二五年十月一号，蒋介石再次东征，预计一个月之内干掉陈炯明，巩固广东根据地。如果说第一次东征，黄埔教官经受住考验，撑起了中央军骨干；那么第二次东征，黄埔学生开始崭露头角，走上

历史舞台，影响天下风云。蒋介石正是凭借黄埔学生打天下。

东征第一目标是惠州城。惠州是东江的门户，易守难攻，是陈炯明的堡垒。一九二六年，黄埔四期毕业前夕，蒋介石让同学们分析惠州战役。其他人夸夸其谈，唯有林彪沉默寡言，到黑板上把惠州地图详细地画了出来，让蒋介石印象深刻。惠州之战的英雄是黄埔一期的陈明仁。陈明仁和林彪都是纯粹的军人，同出黄埔一脉，但作战风格相生相克。日后国共决战，两人在四平较量的较量，堪称经典。只可惜陈明仁为人过于耿直，军事才能未能得到充分施展。实际上陈明仁是黄埔学子最早的英雄之一。

陈明仁，湖南人，生于一九零三年四月七号，念过私塾和新学，中学毕业后当教师混饭吃。由于乱世之中混饭吃不容易，最后选择投笔从戎，成为黄埔一期毕业生。这段是不是很眼熟？很对，一期天才徐向前也是教师出身。只是蒋介石的“面相术”不太过关，竟然认为徐向前不堪大用，日后得知徐向前的才华，已经晚了。

十月十一号，惠州攻坚战打响。双方拿出看家本领死磕，经过两天激战，均损失惨重。当时陈明仁是见习排长，但作战勇敢。眼看久攻不下，团长决定组织敢死队。陈明仁担任敢死队长，写下血书，进攻。顺便说一下，那支敢死队阵容相当豪华，除陈明仁之外，还有杜聿明和陈赓，陈赓还在战斗中伤到脚。

冲锋过程中，团长死了，身边战友死了，陈明仁受命运眷顾，活了下来，第一个冲上城头，把青天白日旗插到了惠州城上！城下督战的蒋介石用望远镜看到这一幕，兴奋不已。

手持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头的是谁？

陈明仁！

战后蒋介石在惠州城给陈明仁开庆功会。蒋介石命部队号兵吹三番号，向陈明仁表示崇高的敬意。还嫌不过瘾，蒋介石带头高喊：向陈明仁学习！并当场宣布陈明仁升任营长。

那是对英雄的崇高敬意。随后宋美龄出现了，托人给陈明仁介绍对象，陈明仁婉言谢绝。后又有来客表示说亲是蒋介石的意思。如果陈明仁愿意搞关系，那是最好的时机。陈明仁投军之前已经娶妻，乡下人，还比他大一岁。那个年代三妻四妾（如刘峙、钱大钧）也可，离婚（如陈诚）也可。

但陈明仁没有忘记家中糟糠之妻。他清楚地记得，当初家人并不同意他从军，控制他的经济来源，是他那深知丈夫之心的妻子偷偷卖掉娘家的一头猪，给他筹得去广东的路费。面对名利和情义，很多人会选择名利，但陈明仁选择了感情。陈明仁表示，“家有糟糠之妻，不能当现代陈世美。”名利可以争取，姻缘不能抛弃。陈明仁，真汉子，重情义。

陈明仁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为了战争，他敢顶撞蒋介石。这点很像林彪。但林彪顶撞毛泽东，平台不变。陈明仁顶撞蒋介石，虽然也有升迁，但直到最后也就止步于军长。论战功，陈明仁在国军将领中赫赫声威。不仅如此，他还被排挤。国共决战，陈明仁在四平保卫战中战绩出彩，再一次赢得蒋介石的嘉奖。然而战后不久，陈明仁却因为政治原因被陈诚调走，远离战场。四平陷落，国军在东北举步维艰。

陈明仁心死，随后在程潜的劝说下投共。毛泽东曾笑着对陈明仁说：我看林彪打仗不如你嘛！

论风格，国军之中，只有陈明仁克林彪。

城府很深的胡宗南

蒋介石视曾国藩为偶像，为人处世多有模仿，对曾国藩的“相人术”钦佩不已。蒋介石用他自己的办法相中了三位浙江老乡，分别是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人之中，陈诚最善于搞关系，胡宗南城府最深，汤恩伯破坏力最大。

胡宗南生于一八九六年，浙江镇海人，文化程度尚可，也是小学教师（注意这个职业）。他个头不高，很好强。二十七岁那年，因为和别人竞争校长失败，又因反对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结识了一帮江湖人士，其中包括顶级刺客王亚樵，未来的特工之王、当时还在流浪的戴笠，蒋介石的心腹陈立夫。可见其交友能力之强悍。

黄埔军校招生，胡宗南因个头矮被淘汰，他不甘心，当场大哭一场，一边抹眼泪一边质问相关人等为何不让他革命？拿破仑也是矮个子，也可以建功立业。表演相当豪放，惊动了一把手廖仲恺。廖仲恺判断胡宗南是个人才，破格招他入学。不得不承认，廖仲恺眼光很准。黄埔学子中，胡宗南第一个当上军长、集团军司令。

可以说胡宗南是黄埔一期之中唯一一个“哭”着入学的，若要以此认为他是情绪化之人，便大错特错。看他结交的那些人就知道，胡

宗南绝非池中之物。入学之后，胡宗南就把目光锁定在蒋校长身上。蒋校长爱早起，很早就去操场跑步，风雨无阻，胡宗南便决定更早去操场跑步。

蒋介石发现居然有人起得比他还早，便产生了兴趣，调查之下，发现是浙江老乡，便刻意培养。东征之际，胡宗南担任机枪连连长，和陈诚一个级别，比陈明仁的起点还要高。胡宗南也没有让蒋介石失望，作战勇敢，战后升级为营长，跟随何应钦和刘峙作战。

惠州之战之后，黄埔军遭到陈炯明残兵反扑，遭遇华阳之败（东征唯一的败仗）。胡宗南率部在不利情况下守住阵地。为了先占领高地“横峰”，胡宗南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带头冲锋。那一刻，他矮小的身躯高大起来。战场形势扭转。随后胡宗南的身影日渐高大，变成营长、团长、军长、司令、西北王。

胡宗南的一生中，蒋介石对他的影响最大。蒋介石治理黄埔只有一个“严”字：“军事学校的训练一定要严格，而本校是党团与军队二重的训练加在一起，是更不能不严肃果决了。我们一定要明白军事学校，不是那旁的学校优柔的、放纵的、文弱的、自由的教育，可以训练得出钢筋铁骨、恶战苦斗、严守纪律的军人的。”胡宗南严格遵守，一生保持对蒋介石的忠诚。

国军高级将领中，胡宗南即便级别很高，仍然能保持相对清廉俭朴的作风。但是这种风格却成了致命伤。战争后期，国军高层腐化，清廉之士往往是共产党。胡宗南最信任的参谋熊向晖便是共产党最杰出的特工之一！以至现在还有人考证胡宗南是不是共产党。

是不是很讽刺？更大的讽刺并非胡宗南一人。蒋经国称赞有加的郭汝瑰，也是共产党。最大的讽刺是，日后国民党抓共产党，直接看生活作风即可。

时也？命也！为何如此，后面会分析。

人杰与选择

尽管胡宗南城府很深，但在黄埔一期之中并不是特别冒尖。黄埔一期之中，最杰出的三个人分别是蒋先云、贺衷寒、陈赓，号称黄埔三杰。

黄埔一期英才云集，能脱颖而出绝对是精英中的精英。三人无论玩笔杆子、打口水仗、还是实践操练，均高人一等。尤其是蒋先云，从入学到毕业，各科都是第一名！如此成绩，黄埔军校历史上无人能破，堪比石原莞尔在日本军校以及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的记录。贺衷寒演讲，那是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感染力极强。

蒋介石对他们三人极为重视，先后把他们调到身边当秘书，加以拉拢感化。因为蒋介石明白，他们是黄埔一亩三分地里最好的秧苗，绝对不能让共产党，尤其是周主任拉去了。

国民党为何败给共产党？这个问题有很多面，其中一个面就是黄埔三杰的选择。三人之中，只有贺衷寒跟着蒋介石走，但也没有在军方发展，而是成了特务头子。蒋先云和陈赓都选择了共产党。如果蒋先云跟着蒋介石，那么黄埔学子中的第一个师长、军长绝对轮不到范

汉杰和胡宗南。因为蒋介石允诺蒋先云：师长起步。蒋先云的入党介绍人是毛泽东。若非意外战死，一直跟随毛泽东的话，后来林彪的那个位置应该是蒋先云。

三杰中只有陈赓成就了一番大业。东征过程中，陈赓参与过敢死队。论英勇程度，陈赓不如爬上惠州城头的陈明仁耀眼。论重要程度，无人能及陈赓，因为陈赓救了蒋校长一命。拿下惠州之后，蒋介石见陈炯明大势已去，想趁势扫荡，便指挥第三师进攻华阳。奈何第三师是刚刚收编的旧军队，都是兵油子，遇到优势火力，争当不吃眼前亏的好汉，纷纷逃走。

蒋介石知道形势不好，希望可以凭借自己的英明神武扭转局势。眼见潮水般溃退的队伍，蒋介石铁青着脸、咬着牙对身边的陈赓说：“我命令你代理三师师长，指挥三师反冲锋，快去！”前几天还是小连长，半个月就是代理师长，好快啊。

陈赓也想好好表现，高喊：“蒋总指挥命令我指挥你们！我是师长！”兵油子一边跑，一边给了他一个鄙视的眼神：“赶快逃吧，小子，还当什么师长”！陈赓反应机灵，知道局势已不可为，转身对蒋介石说：“校长，我们已经落到环形包围圈，要转移！”其实也就是逃命。没等蒋介石反应，陈赓上前架住蒋介石，就朝山下跑。

蒋介石郁闷到极点，颜面扫地之际拔出短剑假装自杀：“我在黄埔一直教导你们，战死则罢，不战死则杀身成仁，今天我要实现自己的诺言！”

陈赓当然不会让他自杀：“你是总指挥，你的行动会对整个战局

发生影响，这里没有黄埔的军队，赶快离开这里，再不走就晚啦！”

内心旁白：都啥时候了，还矫情。

蒋介石对陈赓说：“我实在走不动了！”陈赓说：“我背你走”！二话不说，不顾之前的腿伤，背着蒋介石就跑，跑了几里路到河边，过河，暂时安全。

蒋介石当然不想自杀、也不是自杀的人。蒋介石真的走不动了么？这倒不至于，他行伍出身，坚持锻炼，向来身体不错。在日本军校用雪洗澡，如今依然每天一大早就起来跑步。此举既不是矫情，也不是在作秀。更为合理的解释是：考验一下陈赓是否可靠。证据是，过河之后，蒋介石迈开大步就走，比陈赓还快，一点儿也不像走不动的人。

过河之后并不安全。因为部队溃散，蒋介石实际上仍然处于孤立的境地。要想脱困，必须联系周恩来和何应钦，需要有人去送信，蒋校长环顾左右，无人应声。因为当时蒋介石离周恩来大约一百多里，都是山路，不好走，而且是敌占区，搞不好要挨枪子的。遇见土匪，被绑票了啥的也不是没有可能。蒋介石叹息之际，又是陈赓挺身而出，拖着伤腿冒险去找周恩来，一路上机警地躲过土匪和敌军，联系上周恩来，搬来救兵。蒋介石脱困。

此后蒋介石对陈赓另眼相看，极力拉拢。稍后国民党召开二大，蒋介石特意安排陈赓为湖南学生代表列席参加。数年之后，陈赓依然选择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因为陈赓背后，还有一只手在拉他，那是周主任的手。

蒋介石视黄埔军校为自家菜地，时刻防止外人偷菜。最难防的那个人就是政治部周主任，周恩来总是想方设法把最好的秧苗转移到共产党那边。八一南昌起义打响共军旗帜，骨干都是周恩来从黄埔军校移走的秧苗，比方说林彪、陈赓、许光达、周逸群、王尔琢……

蒋介石原本有机会光照历史，但出现了致命的失误，错过机缘。陈赓的转身，只是蒋介石错过历史机缘的一个征兆。周恩来和蒋介石决裂，才是标志。这是后话，暂且放一放。此时蒋介石的主要任务是争夺孙中山留下的遗产。

遗产争夺战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号，忙碌了一辈子的孙中山见上帝去了。作为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失败者，他配得上任何称赞。但任何称赞都不能改变事实：孙中山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烂摊子上有各种军阀，形形色色的军阀，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住在守卫森严的房子里，吃着山珍海味，怀里搂着偷来、抢来、引诱来的美女，挺着小肚子，需要消化了就舞枪弄棒、摆弄各种武器，需要思考了就盘算着打仗、估算打别人或者被别人打的概率和胜算，需要意淫了就幻想一统天下当皇帝、天下人都匍匐在自己脚下的场景，却从不问老百姓的死活，也不管同胞们的血肉，甚至不顾四方环伺的打中国主意的鬼子们。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打更多仗，抢更多地盘，占有更多金银财宝和美女。

烂摊子上有各种卖淫者，有各类出卖身体的妓女和嫖客；也有各种出卖精神的专家教授学者。身体卖淫者靠自己的皮肉赢得一点点可怜的生存基础或片刻的精神麻醉。精神上的卖淫者则是靠无耻地贩卖各种犯贱的观点赢得颜如玉和黄金屋。

烂摊子上有各路强盗。不管是经商还是走路，可能不小心就被黑了。如果你有财，就有人劫财。如果你有色，就有人劫色。如果你啥都没有，而强盗以为你有，也会被劫。最可悲的情况是，你明明啥都没有，强盗们假设你啥都有，结果没有劫到，结果……请自己发挥想象吧。那不是个案，而是现实。

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孙中山也是痛心疾首，深感历史使命没有完成，便勉励同志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那么孙中山寄予厚望的同志们该怎么办呢？当然是继续革命。孙中山没想到，继承者们在继续革命之前要耍一耍千年以来老祖宗留下的国粹：内斗。

一部革命史就是一部别样的内斗史。孙中山在世，和革命派中的其他人内斗。孙中山不在了，其他革命者围绕着孙中山的遗产而内斗。

孙中山的遗产中有一项特别有价值：继承权。

领袖不在了，革命继承权由谁来继承？孙中山忙碌了一辈子，没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导致同志之间上演了几十年的内乱，实在是失策。

革命党内有四人能量巨大，分别是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四元老，是巨头，四大派系。他们如同国民党内部的四大龙王，位高权重，光辉耀眼，打个喷嚏都能让很多人感冒。但是在蒋介石眼

中，四人都多余，真正应该继承孙中山衣钵的人应该是自己。

孙中山死时，蒋介石和四人地位相差甚远。八个月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蒋介石通过两次东征，把陈炯明连根拔起。陈炯明被视为革命叛徒，消灭陈炯明，相当于清理门户，这是其一。其二，消灭陈炯明之前，革命政府只有广州那一片地盘，还不稳固；消灭陈炯明之后，整个广东变成了革命根据地，并且和广西新桂系建立了联系，地位很稳固。可以说打下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为第一功。

但在喜欢讲资历的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只是打了几场胜仗而已，还没到众望所归的地步。四大巨头之中，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玩政治出身，并且一直玩政治。蒋介石想要在短时间内从政治上超过他们三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的真正对手是玩军事的许崇智。

许崇智，广州人，生于一八八六年。

许崇智本是富家公子哥，衣食无忧，完全有成为纨绔子弟的潜质。十五岁那年去日本留学，只是为了混个文凭、见见世面，一不小心碰到了孙中山那群人，踏上革命之路。革命道路上的许崇智一直被孙中山所吸引，以忠义为信条。别人或多或少对孙中山不爽，特别是军人（参照老乡陈炯明），时不时造反，唯有许崇智，咬牙紧跟孙中山，生死相随，屡败屡战，如同一个烈女子，成为孙中山可以信赖的少数军人之一。陈炯明背叛之前，孙中山北伐，总司令是李烈钧，总指挥就是许崇智。可以说许崇智是少数一直追随孙中山的军人。

孙中山要建黄埔军校，首先想到许崇智。许崇智之所以没当上校长，原因有公有私。公的一方面，筹备黄埔军校需要去苏联考察，许

崇智当时在广东搞军事，走不开。私的一方面，许崇智当时位高权重，在广东吃香喝辣享受生活，大老远跑到人生地不熟的苏联，还不知道啥样呢。当时国民党比较乱，人事安排变动很大，外出跑一圈，回来可能啥就没了。这就是凡是掌权之人均不愿挪屁股的原因。如果黄埔军校校长是许崇智，那么蒋介石的命运必然更加坎坷，那么近代史必然是另外一个走势。

孙中山死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许崇智被任命为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地位仅次于国民党三巨头的汪精卫、廖仲恺和胡汉民，在蒋介石之上。

蒋介石看得很明白，笔杆子很假，枪杆子很真。想要紧握枪杆子，必须跨过许崇智。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为了发展，再次拿出结拜兄弟的绝学，和许崇智结为兄弟。陈其美是混政治的，军事为副业。许崇智恰好相反，混军事为主，政治为副业。两人在生活作风上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比方说在享受生活方面半斤八两。但是蒋介石看陈其美，怎么看都像大哥，对许崇智却怎么看都不顺眼。其实许崇智为拉拢蒋介石，对他也不错。但是蒋介石在许崇智身上再也找不到大哥的感觉，只看见许大哥生活腐化、指挥打仗不行。

论生活腐化，蒋介石绝对不输许崇智。在指挥作战方面，人家许崇智好歹也独当一面。当孙中山被陈炯明赶出广东时，是许崇智领兵回归，迫使陈炯明离开广州，孙中山得以返粤重组革命政府。至少从表现上看，许崇智不比蒋介石差。

但是蒋介石就是看许崇智不行。究其原因就一点：许崇智在军界的资格比蒋介石老，地位比蒋介石高。蒋介石看的很清楚，成为革命领袖之前，首先要成为军方领袖，成为军方领袖之前，必须让许大哥挪动一下。怎么挪呢？最好用政治手腕。

政治三巨头中，廖仲恺也是老资格，身后有蒋介石的黄埔军，旗帜鲜明地拥护孙中山的新三大政策，以左派面貌出现。胡汉民也是老资格，身后有许崇智，以右派身份出现。汪精卫呢，因为老革命（刺杀过摄政王）、老资格（跟随孙中山很早）、被信任（孙中山遗嘱是汪精卫代为起草的），就以左派脸孔出现，实际上是个中间派，左右摇摆，哪边肉多就往哪边倾斜。如此利益纠缠，剪不断理还乱。按常理，不知何年何月能分出一二三。

然而意外出现：廖仲恺被刺杀！

一八九八年，谭嗣同走上刑场，满汉精英决裂，随后十几年，朝廷和革命党之间战争不断，生灵涂炭，国人遭殃，终于在辛亥年，朝廷失败。谭嗣同，历史绝命者。

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和袁世凯决裂，随后十几年，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国人遭殃，袁世凯死，混乱没有结束，孙中山死，胡乱也没结束。宋教仁，历史绝命者。

廖仲恺则是历史第三位绝命者。他的死，意味着国共决裂不可避免。

三章 第三位历史绝命者

廖仲恺生于一八七七年，大蒋介石十岁，祖籍广东，生于美国旧金山。

和那个时代的革命精英一样，廖仲恺中西兼修。能写诗，字也练得不错，算个才子。不仅是才子，还和佳人何香凝结合，上演了才子佳人的传统剧。甲午战争之后，廖仲恺心碎了，开始醉心于西方文化。

一九零三年，年轻的廖仲恺携新婚妻子何香凝去日本留学，研究政治。在那里，因为结识了一帮革命者而成为革命者；之后追随孙中山，成为同盟会元老级人物之一。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廖仲恺按手印宣誓效忠。廖仲恺因为自己的活动能力赢得孙中山的赏识，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负责管理财政（革命化缘）工作。从此就在财政部长的位置上干了下去。

一九二一年广东革命政府成立，廖仲恺还是财政部长，全力筹款，支持孙中山北伐。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冒险跑了，财政部长廖仲恺没跑掉。陈炯明把廖仲恺拴上铁链子，关在一个兵工厂里，不给饭吃。后经多方面营救，特别是妻子何香凝积极奔走，廖仲恺得以脱险，到上海和孙中山汇合。此次劫难对廖仲恺影响很大。

廖仲恺认为必须抛弃之前的思维模式，要不然革命将陷入死角，陈炯明就是例证，所以他积极推动孙中山转变政策。廖仲恺认为，孙中山可以效仿列宁，中国可以变成苏联，前提是要和苏联建立关系。廖仲恺用他的法学知识，积极奔走，多方演说，在国共合作之际出尽

风头，一时间大有孙中山最大他第二之势。特别是黄埔军兴起，东征胜利，廖仲恺的巨头地位更为明显。因为廖仲恺才是黄埔军校一把手，蒋校长只是第二位。

孙中山死后，廖仲恺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新政。十年之前，宋教仁因坚持南北议和、坚持实行内阁制度，在国民党内部遭到孤立，甚至被扇了耳光。十年之后的廖仲恺所处的环境也差不多，因为坚持联俄联共被右派孤立。十年之前的宋教仁终究因为过于执着于政治理想而惨遭杀害。十年之后的廖仲恺结局也是一样。

国民党高层多半都是那种一边享受生活，一边卖弄嘴皮子。大家在开会的时候吵吵嚷嚷，必要时争得脸红脖子粗，实在气不过就挥巴掌舞拳头，但是之后还是该干嘛干嘛。正因如此，孙中山才政策左转，开始扶助农工，试图改变精英革命路线，把工人和农民拉进来。廖仲恺的工作作风非常踏实，整天到基层演讲宣传，不辞劳苦，不计回报，属于那种埋头苦干之人。十年之前的宋教仁也是为了政治理想积极奔走，却惨遭杀害。

按照传统来看，廖仲恺的结局已经注定。因为廖仲恺的工作模式注定要得罪很多人。

那么廖仲恺接班概率如何呢？先看看孙中山死前留下的三份遗嘱，即著名的《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家事遗嘱》暂且不提，看看《国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

先看《国事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作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中华民国十四

年二月二十四日

孙文 三月

十一日补签

再看《致苏俄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予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

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

逸仙（签字）

按照这两份遗嘱交代，政策将按新政策走。按照当时的形势，如果按照既定政策走，廖仲恺最有可能上位，继承孙中山的衣钵。

如果政策回到老三民主义，就是胡汉民上位。但是政策不论往前还是往后都不容易。因为左右两派都自诩为孙中山的追随者，代表孙中山的革命方向。谁反对自己就是反对孙中山，就是反对革命，就该千刀万剐一百遍。似曾相识的一幕再次出现了：你死或者我亡！

已经有领袖之心、决心登上领袖之位的蒋介石在干嘛呢？他站在廖仲恺身后，在外围默默观察局势，寻找机会。因为他暂时还没有机会角逐领袖宝座。

廖仲恺之死

孙中山死后两个月，面对汹涌的暗潮，廖仲恺发表《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现在吾党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回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制我国最大多数之工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进不续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反有反革命的行为，便立刻变成反革命派。”文章很形象地描述了右派，包括孙科在内的国民党老派人物受到很大的刺激，觉得廖仲恺很不像话。

不仅如此，廖仲恺明确表态支持武力解决一系列军阀，非常时期完全不搞和稀泥艺术。即使是孙中山本人，一辈子都被军阀折腾得头大。廖仲恺同志还没登上领导岗位就敢这么讲话，不是给自己找麻烦么？

廖仲恺不仅仅嘴上说，还在行动上表达出来，天天和工人学生混在一起，宣传、鼓动、发表演说，还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要知道，罢工那些活都是共产党干的，是要发动基层对付上层的革命。国民党一直走精英革命路线，上层那些人都是国民党的赞助者，衣食父母，廖仲恺这么搞法相当于挖国民党的根基。孙中山本人那么搞，已经惹很多人不爽。何况廖仲恺还不是孙中山，连孙中山的革命法统都没有得到呢。

一九二五年八月，孙中山死后五个月，一股熟悉的风在广州吹过：传言有人要刺杀廖仲恺。汪精卫亲自写条子给廖仲恺：有人将对你不利。同样的风在一九一二年刮过，那时传言要杀陶成章；一九一三年也刮过，那时传言宋教仁有生命危险。

估计很多人会很纳闷：既然要杀人，干嘛还要吹风呢？

答曰：政治上杀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风险极大。政治舞台虽然很残酷，但和自然界的丛林法则是两回事。丛林之中，是大吃小，强吃弱，天经地义。政治舞台考验的是智慧和耐心。能混到被刺杀的，都是领袖或者是一个派别的领导人。那种人通常能量极大，背后有一大堆支持者。支持者之中，既有饱读诗书的才学之士，也有亡命之徒。弄不好是要引来报复的。看看当年蒋介石杀了陶成章，赶快逃到日本去避祸。要不是后来国内形势大变动，估计蒋介石同志要长时间在日本流亡了。

所以政治上杀人，那是威逼利诱统统无效之后，逼不得已的选择。首先是利益交换，能谈拢最好，大家都不吃亏。谈不拢，那才是威胁。吹风，相当于最后通牒。

如果在一九一二年风起时，陶成章表态孙中山是光辉伟大白璧无瑕的革命领袖，表态支持陈其美当浙江都督，那么陶成章不仅不会死，还会成为陈其美的贵客，说不定还会义结金兰，成为蒋介石的“二哥”。如果一九一三年风起时，宋教仁表态说俺累了，想去国外休养一阵子，那么他不仅不会死，还可以从当时的大总统那里领到一笔丰厚的路费，不够花还能继续要。同理，如果一九二五年风起时，廖仲恺表态

总理不在了，还要依靠老革命同志领导，要防范苏联亡我之心，要防止共产党人对我党渗透，那么他不仅不会死，还真有可能得到右派支持，跻身为最高领导人，就像后来蒋介石所做的那样。

为啥没有出现那种和谐的情况呢？因为每个人都有原则，都有自己的底线。以一九一二年的陶成章为例，浙江是人家光复军拿下来的，凭啥要退让？再看一九一三年的宋教仁，一生的理念和信仰就为了那个制度。让人家放弃理想，相当于要了人家的命。没了理想，生命也就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抗争一番。一九二五年的廖仲恺也是一样，他坚信凭借新三民主义可以让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像俄国那样。

所以别说吹风，就是刀架到脖子上也休想让他屈服。

八月十八号，国民政府一次会议上，也就是被暗杀的前两天，汪精卫写了张条子给廖仲恺：有人将对你不利。廖仲恺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有顾忌！

八月十九号，被暗杀的前一天，又有人将确切消息告诫廖仲恺，廖仲恺回答：“值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颇有千年之前的凯撒之硬气和百年之前的林肯之洒脱。

八月二十号来了。上午八点钟，廖仲恺和何香凝去中央党部开会。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廖仲恺登至第三级石阶时，突然跳出两个暴徒向他开枪射击，大门铁栅内也有暴徒同时开枪，共射出二十余发子弹。廖仲恺身中四枪，在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和宋教仁一样，廖仲恺死在人生最巅峰，在人生最华美的时刻凋零。

评，一个正直勇敢的人牺牲了，国民党历史上最大的丑闻诞生了。

丑闻和利益

如果说当年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可以解释为对孙中山、对革命法统的维护。如果说宋教仁的被杀可以理解为反动势力对革命势力的迫害。廖仲恺的死，只能解释为国民党内部肮脏的分赃不均。廖仲恺的死是一个分水岭：革命理想主义败亡，剩下的只是利益纠纷。

廖仲恺死后，国民党的态度是避而不谈，把廖仲恺当成革命烈士供奉起来，但是在追查凶手方面却是避重就轻，玩的是权术运用和利益交换。

那么是谁杀了廖仲恺呢？怀疑对象只有三个：蒋介石，胡汉民，许崇智。

蒋介石杀廖仲恺的理由有很多。一，此人有暗杀前科。二，廖仲恺在，就轮不到蒋介石上台，因为蒋介石的力量都在黄埔军校，廖仲恺是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如果蒋介石想走上领导岗位，必须跨过廖仲恺。廖仲恺死后，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黄埔军校代表，并且可以参与最高核心决策。三，廖仲恺死，蒋介石是最大的受益者，并且得到了最大的利益。四，蒋介石是一个崇尚实际利益的权谋主义者。

胡汉民杀廖仲恺的理由：一，直接利益冲突，左派右派争夺革命法统，你死我活。二，维护国民党传统。胡汉民本质上也是一个书生，也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他认为自己才代表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三，他

认为廖仲恺的所作所为伤害了国民党基础。利益可以交换，而原则不可以交换。讲原则的胡汉民去杀掉讲原则的廖仲恺完全可能。

许崇智杀廖仲恺的理由：几个人中，许崇智最没有杀廖仲恺的理由。因为不论往哪里走，许崇智都没有机会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但右派掌权显然对他益处更大，特别是他和胡汉民关系很近，如果联手干掉廖仲恺，他二人极有可能联手控制当时的局势。

有趣的是，廖仲恺死后，由蒋介石、汪精卫、许崇智组成特别委员会，控制局势和负责案件处理。那是蒋介石第一次进入核心决策层。他作为左派人物出现。汪精卫因为是摇摆人没有嫌疑，入选。许崇智作为右派人物的代表。

特别委员会工作很有效率，很快抓住几个凶手。审理之下，竟然发现凶手和胡汉民的堂弟以及许崇智的心腹梁鸿楷有关系！也就是说胡汉民和许崇智都脱不了干系。

其实不用审也知道，敢在国民党党部大楼门前杀人者必然和国民党巨头千丝万缕。更为有趣的是，抓住的几个凶手不是真正的凶手。廖仲恺身中四枪，其中有三颗子弹出自大口径枪支，但并不在致命处。真正的致命伤是第四颗子弹，从小口径枪中射出。也就是说在暴徒行凶之际，还有人在打暗枪。是谁打的暗枪？从哪里打暗枪？现场就在国民党党部大楼门前，暗枪的子弹来自大楼内部。

对这个结果，三人组表示很惆怅。惆怅之余，则是各有各的打算。许崇智就不说了，一身泥水，能涉险过关就已经谢天谢地。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心则在别处。两人相视一望，心中有了一本帐：何不如此这

般？

对汪精卫而言，原本左派和右派争得不可开交，他夹在中间胜算不大。这下好了，廖仲恺被杀掉，而胡汉民则深陷泥沼。左右两个竞争对手一下子没了，孙中山的宝座在前面向他招手。汪精卫在心里大笑三声曰：天助我也！但是他隐藏了欢喜，换上一副正义悲愤的神情，发扬痛打落水狗之精神，决心置胡汉民于死地，以绝后患。

八月二十五号夜，廖仲恺被杀之后的第五天，一小队人马直扑胡汉民家。他们是汪精卫和蒋介石指使的黄埔学生军，奉命逮捕胡汉民。他们得到的命令很特别：“如果胡汉民同志不配合，可以就地正法。”就是想要胡汉民的命。

当时胡汉民刚刚睡下，听到门外嘈杂的声音，得知不妙，赶紧以最快的速度下床穿上衣服从后门逃跑。不愧是干革命的，敏捷程度堪与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媲美。

跑到街上的胡汉民脑子里一片空白，静下来之后立马就推断出一个大概：此时此刻敢在广州动老子的，有能力动老子的，肯定是汪精卫和蒋介石那对浙江佬。想趁机要老子的命，没门！先躲一躲，日后再跟你们算账。问题是往哪儿躲呢？大家在一起这么多年，彼此了如指掌，就广州那点地方，都熟悉。胡汉民感到危险在逼近。突然之间，脑袋里打了一个雷，灵感来了：那个地方肯定安全！

不一会，汪精卫家的门铃响了，汪精卫老婆陈璧君看见了衣衫不整的胡汉民，非常惊讶。胡汉民的情形可以构成一行字：陈璧君救我！嘘寒问暖之下，胡汉民讲了事情的大致经过，概括起来就一个意思：

汪兄误会我，要杀我。陈璧君很郁闷，大家同志这么多年，也没有深仇大恨，精卫哥哥也不是狠人，何故此时痛下杀手？不行，要问个明白！陈璧君立刻打电话给汪精卫曰：“胡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你要派人深夜前去缉捕？”

汪精卫估计胡汉民不会束手就擒，死定了。听到电话响了，还以为是好消息，哪知是家中那位强悍的女领导。汪精卫也很纳闷，事情很严密，自家领导怎么知道的？现在不是怀疑的时候，领导是万万得罪不起的，为了避免误会，只好义愤填膺曰：“反动派就要捉，捉了就要杀！这样做是大快人心！”

陈璧君低声曰：“胡先生现在我们家里。”汪精卫直接把电话给扔了。

当晚胡汉民住在了汪精卫家。第二天大家听到消息，再次一片哗然。

廖仲恺死，民愤很大。那是因为廖仲恺很重要，死得不明不白，社会需要真相。胡汉民和廖仲恺一样，分量很大，而且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胡汉民就是凶手，贸然抓人，那是践踏游戏规则。当然如果前一天晚上直接把胡汉民捕杀了，捏造一点证据，又另当别论。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汪精卫和蒋介石明白，除掉胡汉民的机会过去了。对蒋介石而言，胡汉民并不是首要目标，他甚至不想胡汉民死。胡汉民死了，汪精卫直接上位，事情就不好办了。胡汉民活着，以后可以在二人之中耍手段。

蒋介石之所以和汪精卫合作，主要是为了换取汪精卫的支持，来

对付自己的大哥许崇智。胡汉民是汪精卫高升一步的绊脚石，许崇智则是蒋介石统领军界的绊脚石。

分析一下生活习惯就知道：许崇智早年革命，身居高位之后，生活渐渐腐化，是不思进取的征兆。蒋介石恰好相反，未能掌权之前生活放荡不羁，身居高位之后则苦心经营社会形象。从性格上看，蒋介石是无所畏惧，认准的事就会一往无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成功或者彻底失败。许崇智既没有成为领袖的欲望，也没有成为领袖的手腕。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在许崇智和蒋介石身上再一次得到验证。

九月十八号，基本摆平胡汉民的汪精卫成了老大，让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全权处置粤局”。当时以许崇智实际掌控的力量，如果调粤军入广州，谁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在许崇智看来，如果一个军人太过刺眼，必然会引起未来领袖的猜疑。许崇智相信蒋老弟会暗中帮一把，然而许大哥没有成为领袖的野心不代表蒋老弟没有成为领袖的欲望。身为军人的许大哥不明白，蒋老弟是奔着领袖去的，没必要在军方和稀泥。

蒋老弟不仅将许大哥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杀廖仲恺的事给捅了出去，还添油加醋地把许大哥之前干过的贪赃枉法等种种劣迹一并散布。这是第一招，毁其名节，占领道德制高点。第二招则是防患于未然，为了防止许大哥动粗，蒋老弟还争得粤军之外的其他各军的支持。第三招，分化瓦解，使出搞关系的绝活，设法拉拢对许大哥不满的粤军将领。许大哥一看这情况，心里拔凉：这个蒋老弟是想要我命啊！

此时许大哥才想到防人之心不可无，想调回部队，以武力保卫自

己的地位，但为时已晚。蒋老弟已经先下手为强，命令黄埔军校学生军抢占战略要地，防止粤军回师广州；同时又派遣党军和学生军包围了驻在虎门、太平、东莞、石龙等地的粤军，将其全部缴械。不仅如此，蒋老弟的黄埔学生军还包围了许大哥的住所，和许大哥畅叙旧情。

怎么叙的呢？蒋老弟深夜派人送了一封亲笔信给许大哥，信中历数了许大哥种种不够意思的举动，说许大哥如不“卸职”，就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归纳起来就是，不滚蛋就让你好看。当然也不全是威胁，还有利诱。蒋老弟在信中对许大哥许诺：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盘缠老弟已经给大哥准备好了：去上海，路费两万块。许崇智眼见大势已去，灰溜溜去上海了。此后又出国，蒋老弟再次资助路费二十万。

此后，许崇智便从国民党的舞台上消失了，再回国已无用武之地，晚年居香港。

从八月二十号廖仲恺被杀，到九月份胡汉民和许崇智黯然离开。

后孙中山时代的权力架构实现重组。四巨头一死两伤，原本不是巨头的蒋介石凭借超强的政治手腕成为新巨头。

廖仲恺死后，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试探共产党的虚实，一年之后挥舞屠刀，屠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开启攘外先安内的模式，随后国共内战十年，未分胜负；再联手抗战八年，之后又是四年内战，终于分出胜负。但台湾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究竟是谁杀了廖仲恺？是谁用小口径手枪射出了那颗致命的子弹？答曰，谜。

廖仲恺，第三位历史绝命者。

四章 手腕和目标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号到十九号，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比两年前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情况要好很多。两年之前，孙中山还在，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国民政府还是风雨中的一叶扁舟，就广州那么一点地盘，而且还不安稳，时刻面临陈炯明的威胁。孙中山就好比清苦的家族长，带着一帮人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睡觉都有雨点打来。两年之后的国民党虽然也只能偏安广东一隅，但可恶的陈炯明不见了，而且广西的新桂系对中央政府也很客气，有了一个安稳的大后方。

人事方面，两次大会差别很多，最大差别有二。

差别之一：领袖孙中山不在了，廖仲恺死，胡汉民逃，汪精卫成了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

差别之二是蒋介石：第一次开会时，蒋介石看起来还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对孙中山的召唤欲拒还迎。第二次开会时，蒋介石已经成为军界领袖，和汪精卫一起，一文一武，成为国民党的两根台柱。汪精卫虽然名义上是老大，但蒋介石才是基石。商团叛乱是蒋介石平定的，陈炯明是蒋介石搞定的，军人叛乱也是蒋介石出手摆平的。

人红是非多。在蒋介石崛起的过程中，自然招来很多怨恨，不然

就不会有人对他一而再地玩刺杀。同时也招来很多荣耀，很多人视他为英雄，特别是广西新崛起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以及西北的冯玉祥，对蒋介石颇有好感。然而蒋介石并不满足，他要继续崛起，招惹更多人的怨恨和荣耀。往哪儿崛起呢？自然就是跨过汪精卫，成为国民党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要实现这一点，还是两手，军事和政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回顾一下蒋介石的崛起之路，也是这两手。军事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国民政府打下了革命根据地。政治上，利用廖仲恺案，通过权谋运作，搬掉了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

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模式，没必要改变。那么军事上如何继续经营呢？很简单，就是打下更多地盘，这就有了北伐。政治上如何继续权谋运作呢？同样很简单，就是继续制造案件，利用案件，推动人事变更，这就有了清党。

为了执行那两步战略计划，蒋介石决定先搞一个演习，看看效果如何。怎么演习呢？就在中山舰展开吧。蒋介石一生都在攘外与安内中徘徊，起点就在中山舰。

中山舰演习

中山舰前身就是永丰舰，是清朝末年从日本那里定制的，编入北洋海军，后来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起义。永丰舰战斗力并不怎么样，由

于国民党当时一穷二白，永丰舰成了招牌，和孙中山联系在了一起。孙中山去世时，国民党人为寄托哀思，把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号晚上，欧阳钟去中山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家，说蒋校长让你明天去黄埔执行任务。第二天李之龙开着中山舰由广州去黄埔，找到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命令。邓演达说，没事啊。当天下午，李之龙又开着中山舰回到广州。整个过程就这样，看起来屁大一点事，但杀机就在那屁大一点事里。

右派放出风声：共产党要暴动，李之龙要造反，要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

与此同时，蒋介石表态，自己没有下命令。

如此情况，按照常理，应该调查。特别是涉及到两党，更应该调查清楚。

然而军方新领袖蒋介石则迅速行动：当天夜里，秘密逮捕李之龙、解除中山舰武装；在黄埔军校抓共产党人；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以及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住宅，还扣押了军内国民党代表四十多人。

这些动作极为反常。要知道廖仲恺是国民党左派，蒋介石和汪精卫均自称左派，国民党左派是支持联合联共的。这么几招下来，蒋介石完全控制了广州。

接下来蒋介石干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电令驻扎潮汕的第一军，将全军党代表撤销并驱逐。为表示抗议，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

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大致过程就是这样。事件发生之后，举世震惊。

蒋介石得到哪些利益呢？首先除掉了李之龙。

李之龙是共产党员，这个并不重要。因为蒋介石身边有很多共产党员。重要之处在于李之龙是中山舰长。当时中山舰在广东巡逻，负责海上稽查。之前蒋介石利用中山舰稽查过广东商团的军火，利益丰厚。蒋介石很想让自己人当中山舰长，但是汪精卫用李之龙。

蒋介石的开销很大。虽然黄埔军校的财政由国民政府支持，但数额仅限于有账可查的公共费用。蒋介石要搞关系，要给自己的军队搞装备，都需要额外的收入，也就是走私。在革命的光环背后搞走私虽然有违常理，但一直是个常规性的存在。孙中山搞革命时，就搞走私。蒋介石要想装备自己，也搞走私。但是李之龙是共产党人，信仰不同，比较有原则，就增加了蒋介石走私的困难。最重要的是，蒋介石要搞政治，是不能有污点的。万一走私的把柄被抓住了，那是要污染羽毛的。所以中山舰长就成了蒋介石喉咙里的一根刺。

第二个好处是找到了对付汪精卫的办法。中山舰事件闹大，汪精卫出走。不管怎么样，汪精卫都是老大。蒋介石虽然打心眼里瞧不起汪老大，但是如何挪动汪老大，心里却没底。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找到了对付汪精卫的办法，那就是只要事情闹大，汪精卫就撑不住了。一年之后，蒋介石闹出了更大的动静，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和汪精卫对抗，汪精卫撑不住了。解决了汪精卫，国民党内部再没人可以和蒋介石竞争。

蒋介石最大的利益还是军方。借中山舰事件，驱逐了身边一部分碍手碍脚的苏联代表。最厉害的一招还是整军，把第一军的共产党全部清理出去。在东征过程中，蒋介石指挥的军队中有很大部分共产党，比方说何应钦的第一军，党代表就是周恩来。共产党虽然帮助他打陈炯明，但不会完全服从蒋介石。蒋介石借此机会让共产党全部走人，第一军就完全变成了蒋家军。日后蒋介石就是靠这支蒋家军起势，通过北伐扩张，构建了南京政府。

通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试探到了共产党的虚弱。特别是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一再退让，无休止地退让，让蒋介石更加肆无忌惮。整个共产党高层，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主张用强硬手段反击蒋介石，声音微弱。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此后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农民，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去上海组织工人运动。

蒋介石虽然在整个事件前后卖萌，不过是政治手腕高明而已。必须承认，从权谋角度上看，蒋介石干得非常艺术。首先，当时去给李之龙传“假命令”的欧阳钟是欧阳格的侄子，欧阳格是当时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是孙文学派，也就是国民党右派的人。但是欧阳格的搭档是蒋介石那个精于吃喝嫖赌、善于打垃圾仗、把革命当玩票的小弟王柏龄。当时蒋介石的面孔还是左派，可以继续以左派的脸孔卖萌。

为把卖萌进行到底，蒋介石在达到全部目的之后表态曰：这是个别事件，不关乎团体，革命阵营内部还是和谐团结的。共产党高层，尤其是领袖陈独秀，相信了蒋介石的话（除了相信别无选择）。仅仅

几句漂亮话不足以摆平一切，蒋介石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本人会继续革命。为革命，本人愿意继承总理遗志，北伐扫荡牛鬼蛇神。如此可以扩大地盘，如此可以建立更大的功勋，可以更为接近领袖地位，因为这是暴力时代，正是施展武力的大好时机。如此战略性的决策，需要时机和帮手。

时机

暴力时代来临之前，军阀也有内战，总体上格局分明。北洋派占据大半江山，西南派偏居一隅，革命党往返奔波。世界大战结束，列强再次对中国加强干预。经过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北洋军已经分崩离析。冯玉祥倒戈之后，北方乱成一锅粥，各派势力重新整合，西南派也没能幸免。吴佩孚湖南撤军之后，西南派立即展开各种形式的内斗。

西南和东北一样，原本处于内斗的边缘位置，远离中央政府，向前可以干预国内局势，向后可以退守自保。清末民初，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对西南用兵均以失败告终。张作霖统一东北之后，便可逐鹿天下。如果有人能统一西南，也可以像张作霖一样干预天下，至少可以在短时间内成为国内一极，犹如三国演义中的刘皇叔那般。

天下未乱蜀先乱。西南内战，首推四川。辛亥年之后的二十年，四川军阀之间如同不和谐的夫妻，内战无穷多。四川的内乱引起云南唐继尧的兴趣，他试图效法刘皇叔入川。滇军初期推进到重庆，唐继

尧威风了一把（龙云在重庆以帝王礼仪迎接他）；然而滇军战斗力有限，经过两年挣扎还是战败了。败军之将顾品珍退回云南之后进军昆明，试图夺取唐继尧的统治权。唐继尧毫无准备，在龙云的护送下逃离云南，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随后龙云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讨伐广西陆荣廷。

陆荣廷之前和冯国璋结盟，试图在更大的舞台上有一番作为。然而陆荣廷没有统一西南，冯国璋又在和段祺瑞的斗争中失败。更要命的是，孙中山就在陆荣廷身边。当初为了给北洋政府施压，陆荣廷曾把孙中山抬出来当门面。但陆荣廷始终是旧派军人，对信仰耶稣基督的孙中山搞的那一套不感冒。陆荣廷想利用孙中山控制广东，进一步统一南方。孙中山想利用陆荣廷北伐。结果两败俱伤：孙中山北伐没成，陆荣廷也没有控制广东。

直皖战争前夕，陆荣廷和吴佩孚相约，桂军在南方驱逐孙中山，直军在北方对付段祺瑞，然后共商天下事。直皖战争之后，吴佩孚打败段祺瑞，陆荣廷指挥桂军进攻广东，第一次粤桂战争爆发。孙中山名义上是粤军领袖，实际避居上海，粤军由陈炯明和许崇智指挥。战争开打之后，桂军并不占优势。经过两个月的拉锯战，桂军内部出现变故，李福林宣布“独立”，桂军溃败，退回广西。孙中山返回广东，召开非常国会，担任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的举动动了很多人的奶酪，招来各方不满。北洋大总统徐世昌通电不承认。陆荣廷再次进攻广东，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过程和第一次一样，因桂军内部分化而战败。陆荣廷通电下野，避居上海，

并向北洋政府求援。此时直奉战争迫在眉睫，北洋政府也没空管。

两次粤桂战争让陈炯明实力大增。陈炯明一心联省自治，听孙中山唠叨北伐就烦，才有了粤军炮轰大元帅府，蒋介石永丰舰表忠心的一幕。

龙云在讨伐陆荣廷的战争中壮大，把唐继尧迎回云南。数年之后，龙云取代唐继尧统治云南十八年，成为赫赫有名的云南王。随后吴佩孚打赢第一次直奉战争，陆荣廷再次找到靠山，回到广西掌权。经过这么上下折腾，桂系双雄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新势力趁乱崛起，向孙中山靠拢。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溃败，陆荣廷再次下野，桂系双雄亲广东政府。

随后蒋介石消灭陈炯明。南方新兴势力联合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

帮手

北伐战争有两条路：东线出广东、过福建、进入长三角；西线出广东、过广西、进入长江中游。东线沿海、多山，不好走，影响力有限；近代以来，长三角租界区和通商口岸的洋大人惹不起。至于西线，原来太平军已经做过示范。

孙中山时代，就因为陆荣廷在广西扯后腿，总失败。桂系双雄和蒋介石一样野心勃勃，试图对北方用兵，大干一场。事实证明，蒋介石第一期北伐事业中，一半功劳归李宗仁和白崇禧。正因如此，北伐

尚未结束，两边便翻脸，算是粤桂战争的延续。

北伐关键一个点在湖南。民国时代，那里一直是南北战争的焦点。

当初湖南人驱逐黑心军阀张敬尧，迎来谭延闿搞联省自治。谭延闿玩不下去了，赵恒惕上场，折腾几年没有头绪，和云南、广西一样，新派军阀唐生智出场。

如同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广西崛起一样，唐生智以第四师师长的身份搞定赵恒惕，兼代理省长。唐生智和赵恒惕二人之间的关系算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但赵恒惕和吴佩孚关系很好。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系势力趁机扩展到长江流域，但经营不善。孙传芳趁机驱逐奉系，赢得东南五省的地盘。吴佩孚再次站稳脚跟，支持赵恒惕对付唐生智。唐生智只能靠两广国民政府。

李宗仁首先利用自己的力量帮唐生智稳住阵脚，随后去广州找蒋介石，建议以接济唐生智为名北伐抢地盘。李宗仁认为，蒋介石一定会爽快答应。哪知蒋介石直接泼冷水：你刚来，不了解这里的情况，复杂着呢，没法搞。

其实蒋介石正从心坎里巴望着北伐呢，日夜都想着北去抢地盘，想着先占领东南半壁江山，学一学孙权，然后图谋中国。那么机会来了，怎么不行动呢？

他心中自有算盘。

当时的情况是，李宗仁的部队在前线支援唐生智，每天都在损兵折将，实在拖不起。李宗仁一看蒋介石那样，开始游说别人，得到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支持。又经过开会讨论，大家同意北伐，并宣布唐

生智为第八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

万事俱备，只差蒋介石。但奇怪的是蒋介石并不行动，嘴上同意北伐，屁股一直坐在板凳上。大家搞不明白。拖不起的李宗仁灵光一现，老蒋没有理由反对北伐啊，是不是想当领导啊？李宗仁就私下和李济深商量，这个北伐总司令还是让老蒋当吧，毕竟这段时间他战功最大，名头最响，又是黄埔军校校长。二人商议好之后，通过张静江和谭延闿把这个消息私下传给蒋介石。蒋介石私下推脱一番，随后又开了一个会，推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

蒋介石撕下半死不活的面具，顿时生龙活虎起来！

大家松了一口气：原来秘密在这里啊！事实证明蒋介石非常精明。北伐军总司令的头衔那是意义非凡啊。最主要有两点好处。最直接看得见的好处：蒋介石以北伐总司令的名义把北伐军人事大权掌控在自己手里。北伐开始只有八个军：

一军：军长何应钦，这是蒋家军，没的说。北伐过程中，蒋介石把自家军队放在最有利的位置上摘最大的桃子。

二军：军长谭延闿，实力不强但站队很正确，先跟着孙中山，再跟蒋介石，死后还把女儿嫁给了陈诚，做人圆满。他这一路人马，算是蒋介石的亲信。

三军：军长朱培德，朱德老同学，跟着孙中山经历过各种战争，起于滇军，反对过蒋介石。北伐过程中，挺进湖南，进攻江西，随后成了江西老大。在武汉和南京对立时，朱培德倾向于支持武汉的汪精卫，因为那时汪精卫代表正统。总体来说，朱培德是孙中山的追随者，

对共产党人持同情态度。在国民党清共产党时，他的江西没有屠杀共产党，只是恭送出境。南昌起义之后，朱德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带着人马在朱培德的队伍里躲过一段时间。但朱培德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在蒋介石夺得正统之位之后，他又尽力扶持蒋介石。遗憾的是朱培德在抗战之前死去。蒋介石对他比较尊重，亲自为他守灵。

四军：军长李济深，许崇智之后的粤军代表，让蒋介石吃过不少苦头。北伐时，李济深留在广东看家，任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蒋介石在前方指挥作战）。同时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四军军长等职，总揽广东党政军大权。他的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攻必克，战必胜，获得“铁军”的光荣称号。蒋介石在南京建都之后，李济深一直是蒋介石的苦主，先是拥戴胡汉民为旗帜反对蒋介石，胡汉民死后亲自反蒋介石，一直反到抗日战争。

五军：军长李福林，跟过孙中山、袁世凯、陈炯明、蒋介石，谁强跟谁混，典型的墙头草。他的队伍最后被蒋介石给吞并了，既无力反蒋也得不到蒋介石的青睐。但人生还算顺畅，大富大贵，享尽清福。

六军：军长程潜，也是孙中山的老资格追随者，打了很多仗，是一个蒋介石搞不定的人物。他和蒋介石之间的恩怨足够写很多文章。程潜最后在解放战争后期投奔了中国共产党，不仅自己投降，还拉着陈明仁一起投降，气得蒋介石咬牙跺脚大骂娘希匹。

七军：军长李宗仁，蒋介石最有力的朋友，也是最危险的敌人。

蒋介石一辈子的对手之中，除了伟大的毛泽东，就数李宗仁最难对付。在国民党内，真正能威胁到蒋介石的，不是胡汉民或汪精卫，而是李宗仁。蒋介石一辈子三次下岗，两次拜李宗仁和白崇禧所赐。

八军：军长唐生智，也是蒋介石的苦主。唐生智原本没啥力量，但是北伐过程中，处在两湖前线的他实力急剧膨胀。特别是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唐生智成了武汉国民政府的柱石。如果武汉国民革命军最初东征蒋介石，而又胜利的话，唐生智将复制蒋介石的传奇。

看看这八个军，就是国民党当时打天下的全部家底。蒋介石能控制的嫡系人马只有第一军。经过中山舰事件清理共产党，第一军已经成了标准的蒋家军。蒋介石比较精明，把他的第一军主力留在潮梅，让何应钦伺机出广东、过福建、挺近长三角、占沃土、抢钱袋子。

至于其他几个军，除谭延闿的第二军可以算蒋介石的人，其余都不是善茬。蒋介石下面除何应钦之外的七个军长，五个资历比蒋介石老，他们虽然也在革命，实际是在借革命的机会壮大自己。正因如此，北伐扫荡旧军阀的同时，新军阀一直在诞生。所以蒋介石一边止乱，一边致乱。

从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开始北伐，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份清党，前后十个月的时间，国民革命军从两广出发，搞定了江西、两湖、进入河南，东边则越过福建，进入长三角。十个月的时间，蒋介石带着一帮各怀心思的人赢得中国半壁江山，百万平方公里的地盘，非常了不起。

如此巨大的胜利中，蒋介石带着他们有啥好处呢？好处就在于那个北伐总指挥的位子。当然不是那个名头，而是那个名头下面的人事

调动权。在进军过程中，凡收编的部队，都被蒋介石据为己有。北伐之前有八个军，清党之时变成四十个军，增加的那些人马，大部分都变成了蒋介石的人。蒋介石有黄埔军校，军官流水线。把那条流水线的产品和收编的杂牌军结合起来，就生成很多军队。比方说陈诚的土木系，就是由这个模式里扩充出来的。

黄埔军校不可怕，可怕的是让黄埔军校里的那些人带兵。东征时期，黄埔学生组成所谓的党军，结果很多人都成了炮灰。北伐之前，第一军的战斗力不见得比其他军强，特别是李济深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通过十个月的收编，蒋介石的力量一举越过所有的竞争对手。第一军成为嫡系中央军。

现在大家方才明白过来：还是老蒋高啊！但这只是第一个好处，看得见的好处。还有另一个无形的好处，看不见的好处，就是法统。

所谓法统

法统是啥玩意呢？法统不是啥玩意，说不清楚，但确实存在。

类比一下，中国之前有道统之说，那玩意是由孟子最先说的：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孔子的学说是上接尧、舜、汤、周文王，下启千秋百代，第一代就是他孟子。

后来的儒学大家都认为自己继承了那个系统。唐代的韩愈再一次论证：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简单点说，就是承传儒家的核心，仁义道德。宋代的朱熹就直接说，这是道统。看起来跟家谱有点像。家谱是靠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你是皇帝，按照血缘关系，如果你没有被干掉的话，你的后代也会有一个皇帝。道统那玩意呢，承传的是仁义道德。当然千百年来，有过无数自诩承传仁义道德之人，实际上男盗女娼的大有人在。有点扯远了哈。如果愿意，可以把道统看成一种牛人的传承图谱。

革命是近代的一个新名词，也有自己的法统（道统），承传核心就是革命。具体说，就是孙中山搞出来的三个代表（三民主义）。古人有了道统，就可以自以为代表仁义道德，然后站在仁义道德的角度对别人指手划脚。革命也一样，有了革命法统，就可以站在革命立场上对别人指手划脚。当年蒋介石去刺杀陶成章，美其名曰维护革命法统么。

那么如何继承革命法统呢？简单讲，就是孙中山的三个代表思想（三民主义）。说的更直接点，也就是模仿孙中山干事。孙中山都干了啥事？革命。如何革命？拉队伍去打别人，抢地盘，给国人画饼曰，我带你们过好日子。说白了，就是暴力打倒那些需要打倒的人。孙中山打倒过很多人，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被打倒。需要有人继承他的法统，继续打倒别人。

说得高端一些，扫荡牛鬼蛇神，创建新民国。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搞过护法运动啥的，都不成功。孙中山毕生的愿望就是北伐，武力打倒所有反对者，一统中国。孙中山两次北伐，都不成功。现在蒋介石当了北伐军总司令，就是跟孙中山同样的级别，

干同样的事，也就是在继承孙中山的革命法统。

所以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北伐总司令，又是搭建领导班子，又是整装训练，又是通电全国就任总司令，闹腾得锣鼓喧天，好像皇帝继承大位一样。大家都在嘀咕，有必要这样嘛？但是见蒋介石精神很足，也没话说。蒋介石这么干是有原因的，就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把自己当成孙中山继承人来宣传！

大家没有蒋介石那般政治觉悟，自然不了解蒋介石的意图。等到反应过来，蒋介石已经高高在上了。革命法统是个虚名，但是跟蒋介石疯狂扩张的军事实力结合在一起，那就威力大增了。好比一本武林秘籍，在一般人手中跟废纸没啥区别，落到内行人手中，那就是大大地有用。蒋介石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借机搞掉了所有不听话的人。

正如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蒋介石“挟革命以令军阀”。一九二六年夏，继东征立命之后，蒋介石迎来人生第二个系列战——北伐腾飞。

五章 逆流而动

领袖，听起来很拉风，实际要求条件极高。

因为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任何思想、理论、计划、梦想都需要实践检验。

如果是学者，那么需要学术成果，否则就是江湖郎中。

如果是官吏，那么需要政绩支撑，否则就是占着茅坑的官僚或官奴。

如此这般，都需要他人的认可。关上门统治世界，最好看看门缝关严实没有，一不小心被送入精神病院也有可能。那么领袖需要怎么验证呢？其实很简单，它不是指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很多人的利益共同体。其实也很复杂，因为利益本身有很多种，有两个硬指标不能或缺：地盘和金钱。当初蒋介石去黄埔军校上任，可谓白手起家打拼。

没有地盘，要抢地盘。没有财富，要生成财富。

自古以来，打天下抢地盘就很暴力。蒋介石起于广东一隅，要当领袖，注定要掀起一番腥风血雨。因为要在帝国棋盘上完成争霸，完成历史周期律的运行，从来都很暴力。

历史周期律格局内部，中国历史大趋势都是统一。

中国历史数千年，帝国棋盘有自己的格局。总体上说，帝国争霸战中，由北向南为大势所趋。南方政权多为偏安，只有朱元璋一人由南向北争霸成功。晚清的洪秀全，原本也有成功的气象，终究棋差一步，满盘皆输。孙中山干革命，很大程度上在模仿洪秀全，试图在两广掀起波澜，再从长江中游切入长江流域。蒋介石北伐走的路线，就是孙中山梦想中的路线，和之前洪秀全走得路类似。所以从大势上看，蒋介石属于逆流而动。

他要做的事，是终结乱世，止乱。

既然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湖南的唐生智站在蒋介石的阵线，

那么接下来要从湖南进攻湖北，第一个对手就是吴佩孚。

残缺的吴佩孚

就在两年之前，吴佩孚还是《时代》的封面人物，还是中州王，还是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人物。冯玉祥临阵倒戈，半世功名尘与土，躲在河南鸡公山。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孙传芳驱逐奉军之际，吴佩孚找到了复出的机会。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号，吴佩孚离开鸡公山，复出前往武汉，担任“讨贼司令”。当时蒋介石正在征伐陈炯明，冯玉祥正和郭松龄结盟搞张作霖。吴佩孚的主要敌人是张作霖和冯玉祥。张作霖是旧仇，可以拖延；冯玉祥是新恨，必须清算。但讨贼军的旗号又是讨伐张作霖。

郭松龄兵败自杀之后，冯玉祥处境艰难，退出北京城，试图和吴佩孚和解。吴佩孚恨冯玉祥入骨，当然不肯，冯玉祥只好辞职去苏联考察。但吴佩孚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蒋介石和李宗仁已经扫平南方，打算北伐。

直到此刻吴佩孚才发现，他平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张作霖或冯玉祥，而是蒋介石！

吴佩孚有两个选择，要么联合南方对付北方，要么联合北方对付南方。

吴佩孚是老派军人，虽然争权夺利，但骨子里还是钟爱东方传统。

这个从他手不离《易经》就能看出来，从他开始支持五四运动转而镇压工人运动就能看出来，从他对信奉基督的孙中山从来不感冒就能看出来。孙中山联俄联共，他便反苏反共。蒋介石是孙中山的继承人，还没清党。吴佩孚不可能和他合作。

北方的张作霖固然可恶，终归是旧时代枭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式都一样。所以吴佩孚决定和张作霖暂时和解。张作霖虽然之前和孙中山合作，但面临和吴佩孚同样的选择。而且日本和苏联有矛盾，张作霖依赖日本。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八号，就在李宗仁找蒋介石出征之际，吴佩孚去北京和老冤家张作霖会面。曾几何时，他们以为对方是自己争霸天下的绊脚石，每次接触都是剑拔弩张。这一次双方相当客气，张作霖再也没有故意看不起吴佩孚，吴佩孚也没有装清高。因为局势变了，蒋介石的崛起让他们从争霸天下的主角变成配角。他们不习惯当配角，于是暂时结盟，试图挽回当主角的局势。他们互换金兰贴，结为八拜之交，转身对付北伐军。吴佩孚身边也有高人看清形势。蒋百里当时就是吴佩孚的参谋长，苦劝吴佩孚和唐生智合作，由南向北，顺应历史潮流。吴佩孚不肯，支持赵恒惕对付唐生智。

唐生智，湖南人，一九九零年生，比蒋介石小三岁。个性果敢，人生经历堪称传奇。

唐生智的爷爷原本是个穷小子，孤苦伶仃，受人欺负，为混饭吃加入湘军，一路追剿太平军，越干越大，最后在大渡河擒获石达开，立下大功，担任广西提督，赢得皇帝恩赐的黄马褂，追赠三代建威将

军。可惜三代未过，清亡。他爸爸是开公司的，有钱。唐家兄弟是标准的官三代富二代。但唐生智从小胆大敢为，是个血性之人。弟弟唐生明则是标准的富家子弟，精于吃喝嫖赌。

唐生智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去了保定陆军学校，给蒋百里当过学生。毕业后从军队基层干起，后来跟着赵恒惕混。一九二一年，赵恒惕和吴佩孚打仗，兵败溃退。为了阻止溃败，唐生智自己躺在马路中央，成功阻止湘军溃败，把勇气发挥到极致。

一九二四年，也就是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国民政府那会儿，唐生智拜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为师，皈依佛门学佛经，自称佛教将军，成为那个奇怪年代的一大奇观。往深处说，这是军阀的迷茫。正如自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一样，也是迷茫。

随着实力的增加，唐生智踢开和国民政府闹翻的赵恒惕，自己取而代之，投靠广州国民政府。吴佩孚出兵讨伐，拉开北伐战争的序幕。

一九二六年七月四号，广州国民政府发《北伐宣言》：“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孰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迨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贼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

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云云。矛头直指吴佩孚。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号，唐生智攻占长沙。八月十二号，蒋介石进入湖南，对唐生智的胜利表示祝贺。未来的几个月，他们将一起干一番大事业。

在湖南，革命军各位大佬讨论下一步行动：先打江西还是湖北？对南方革命党人而言，袁世凯早已远去，段祺瑞已经名存实亡，长城以南只有残缺的吴佩孚和刚刚得势的孙传芳。吴佩孚在长江中游和中原一带，元气尚未恢复。如果继续攻打湖北，就要彻底打垮吴佩孚。如果打江西，就是把吴佩孚和孙传芳一起打。

讨论结果：先争取孙传芳中立，把吴佩孚消灭干净。

蒋介石派人告诉孙传芳，咱们是友好的，希望可以继续友好下去。

孙传芳也打哈哈，咱们很友好，很友好，一直友好。

其实双方都非常明白，迟早要开打。但是孙传芳同样看吴佩孚不顺眼，想让北伐军和吴佩孚作鹬蚌之争，自己当渔翁。然而孙传芳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北伐军和吴佩孚之间不是鹬与蚌，而是狼与羊。孙传芳显然不懂：北伐军脑袋上有一顶帽子叫革命，当时那个帽子非常新潮，各个阶层争相购买。因为国人已经厌倦了旧军阀混战。如果他们能坐下来好好合作，还能多呼吸几口空气。

蒋介石对北伐军做了如下部署：

第一，第四、七、八各军为中央军，为进攻主力，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直取武汉。第八军为左纵队，由唐生智兼总指挥，经岳州向武

昌前进，并以一部相机渡长江北岸向汉阳、汉口前进；以第四、七两军为右纵队，由李宗仁任总指挥，第四军攻击平江之敌，经通城、崇阳、汀泗桥向武昌前进。

第二，第二、三军为右翼军，以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集结赣边，监视江西。

第三、第九、十两军（黔军）为左翼军，以袁祖铭为总指挥，集中津醴进取沙市、江陵，肃清鄂西之敌。

第四，第一、六两军为总预备队，第一军随第八军后推进。

从军事上讲，这个安排还算合理。第四、七、八军本来就在前方，战力较强。

真正狡猾的是最后一条：第一军随第八军后推进。啥意思呢？就是让第八军的唐生智在前面拼命抢地盘，然后第一军的蒋家军在后面接收地盘，增编军队、扩充实力。说得更直白点，就是让别人啃骨头，自己吃肉。这就是北伐总司令的好处！可谓精明到极点。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这个安排带来巨大的隐患。这个隐患暴露了蒋介石的弱点，这个弱点伴随蒋介石的一生。这点稍后分析。

北进军进展非常顺利，第七军和第四军通力合作，完成汨罗江会战。

随后第四军挺进咸宁，离武汉八十三公里。武汉是兵家必争之地。洪秀全打下武汉，太平天国兴起。曾国藩打下武汉，湘军兴盛。革命党拿下武汉，占据半壁江山。北洋军占领武汉，革命军衰退。吴佩孚复出，也是以武汉为根基。想要打垮吴佩孚，必须拿下武汉。想拿下

武汉，必须拿下咸宁。拿下咸宁，必须拿下汀泗桥。

汀泗桥，双方命脉所在，血战一触即发。

血战

八月二十号，吴佩孚同刘玉春抵达咸宁。

对吴佩孚而言，只要拖延时间，等待援兵，胜算将大增。吴佩孚身经百战，灵活而不失凶狠，自信能守住汀泗桥。然而他很快便发现不对劲：北伐军都是不要命的主。

北伐军将士明白，绝不能拖延到吴佩孚的援军到来，他们决定连夜进攻。

八月二十六号午夜，北伐军将士悄悄接近敌阵，端刺刀去拼，占领了一片阵地，天亮时发起全线进攻，经两小时浴血奋战，逐渐占得优势。吴军退到贺胜桥。

吴佩孚闻讯，抵达贺胜桥，立即命令执法队监视军人，对退缩官兵一律平等对待——砍下脑袋。一日之间连续杀掉数个团长和营长，方才稳住阵脚。二十七号傍晚，吴军反扑，把汀泗桥再度夺回。

二十八号，北伐军再次鼓起勇气，夺回汀泗桥，随后再失。

二十九号，北伐军再次夺回汀泗桥，吴佩孚无力回天。

三天时间内，双方围绕汀泗桥拉锯胶着，尸体越来越多，血越流越多。吴佩孚经历过很多恶战，但还是被击溃。他自己想不明白，因为他已经落伍了，成了老古董。正如那个时代的古典大师们最终沦为

老古董一样，军阀也是。新生的革命者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尤其是叶挺独立团，骨干分子是周恩来从黄埔军校精心挑选的精英，很大一部分都是共产党员，都是信仰坚定之人。

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吴佩孚队伍里软的、硬的、横的、不要命的都有，但还是败了。如果说不要命的怕什么？那便是有信仰之人。当有信仰之人掌握战争技巧，将战无不胜。

吴佩孚退到贺胜桥，叶挺独立团尾随而至。

八月三十号，叶挺指挥独立团将士冲入吴佩孚阵地，纵深推进。吴佩孚调集队伍，从侧面围攻。独立团将士三面受敌，伤亡很大，但是他们绝不退缩。与此同时，第七军战友及时赶到增援，双方合力击溃吴佩孚，拿下贺胜桥。

贺胜桥一战，从精神上击溃了吴佩孚。之前二十年，吴佩孚从落魄秀才成长为雄霸一方的王者。虽然也曾在战场上遭遇败绩，比方说第二次直奉战争，但非战之罪。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最致命的一次，被对手从正面击垮。从此一蹶不振。

贺胜桥一战，独立团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美称。一年之后，他们成为南昌起义的中坚力量。在那群矫健的身影中，有人成了未来的战场王者，比方说粟裕将军。

辛亥革命那会，很多地方革命军嚷嚷两嗓子便能吓唬清军。二次革命（暴动）那会，双方并无恶战。北洋军内战，基本上三五天决出胜负。吴佩孚在北洋军内部算是狠角色，但面对蒋介石统帅的北伐军，

还是不够狠。再往后，蒋介石和兄弟们内战，比这个更残酷。国共内战，把残酷推向巅峰。战争总是规模越大越残忍，总是在最残忍之后迎来和平。

所以和平弥足珍贵。

失误与精明

贺胜桥之战的最后时刻，蒋介石亲自督战。有将领建议暂停进攻，蒋介石回答：“北伐成败关键，在此一战，如果稍一泄气，以后就再也没有争取胜利的机会。吴佩孚的军队，已经是孤注一掷，只要我们能坚决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一定能获得胜利。”日后吴佩孚因此称赞蒋介石：“其用兵之妙和坚定撑持，我自愧不是对手。”——蒋介石一生中少有的来自对手的赞誉。但是武昌城下，蒋介石做了一个“蒋介石式的决定”。

蒋介石利用北伐总司令的便利，让别人在前面攻城略地，自己在后面捡好处，进展相当顺利。如此精明的算盘里却蕴藏着巨大的隐患！经过汀泗桥和贺胜桥两场战役，北伐军推进到武汉。吴佩孚被击溃，武汉战事交给了刘玉春。

刘玉春生于一八七八年，河北玉田县人，高大魁梧，真正的燕赵慷慨之士。为报答吴佩孚的知遇之恩，豁出去了。汀泗桥一战，刘玉春的三个团长全部战死，营长只剩下五个，士兵死伤过半。如果吴佩孚手下都如此作战，北伐军未必能取胜。

北伐军趁机拿下汉口和汉阳，直面武昌。四十年前，武昌暴动，冯国璋拿下汉口和汉阳时，革命军已经做好放弃准备。但刘玉春决心死守孤城。

就在唐生智指挥北伐军围攻武昌时，总司令蒋介石坐专车赶来。虽然他做了精妙的安排，让自己的部队跟在后面吃肉、长膘、壮大。但是武汉毕竟非同寻常，地理位置、乃至经济文化，在中国都很重要。如果用自己的人马拿下武汉，那绝对是一个骄傲的资本。

蒋介石告诉大家：“我们攻惠州时，就是冲上去的。我是有经验的。明天拂晓，我们第一军的一个师（刘峙部）带头冲锋，你们也跟着冲上去。”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带着副官张治中去阵前督战。没想到从早晨打到黄昏，别说爬上城墙，连墙根都没有摸到！总司令本来想拿自己的部队给大家做个示范，没想到落得一个损兵折将的下场。蒋介石担心嫡系部队伤亡太大，也不顾武汉的重要性了，带部队去江西打孙传芳，向长三角挺进。按道理说总司令说话一言九鼎，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蒋司令就硬生生把水收了回来。那个决定可以说影响深远。

武昌城下的那个决定，有人认为暴露了蒋介石一辈子最大的弱点：精于实利计算，缺少通盘战略考虑，另有人认为蒋介石干得很精明。为什么呢？答案先放一放。

蒋介石转头带部队去南昌解决孙传芳。

孙传芳，山东人，年长蒋介石两岁，也是保定军校出身。按照派

系分，孙传芳属于冯国璋一脉。当初冯国璋郁郁而终，李纯自杀，直系大旗落到曹锟和吴佩孚手中。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因冯玉祥倒戈而溃败。

张作霖以虎狼之势入关，势力渗透到长三角，隐隐有点爱新觉罗家族当年的味道。此时孙传芳抓住机会驱赶奉军，给志在称霸的张作霖迎头一棒，差点毁了张作霖的一世英名。孙传芳赢得江东地盘，成为长三角霸王，向一千八百年前的东吴老孙家看齐。短短几年，孙霸主拥有了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五个省，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地盘是中国最富有的华东（钱袋子），用糖蘸蜜吃，开心。然而好景不长，蒋介石率北伐军来了。

一九二六年九月份，蒋介石和孙传芳在江西交手时，五省联军孙司令可以掌控的资源并不比北伐军蒋司令逊色。要说差别，便是穷小子出身的孙司令只想守住自家地盘，而蒋司令对那块地盘早已垂涎三尺。早在出兵之前，蒋介石已经谋划好，自己带人从西路吸引军阀，把何应钦留在潮梅，随时北进，抢长三角。

孙传芳本来想当渔翁，高兴劲还没过，发现吴佩孚架不住了。虽然很多个夜晚，孙传芳做梦都想吴佩孚快点死，但有个前提，必须死在自己手上才安心。如今蒋介石强行插入，吴佩孚失败，孙传芳有兔死狐悲之感。唇亡齿寒，古训。

蒋介石想让吴佩孚死，孙传芳就要吴佩孚活。

那么如何去搞蒋介石呢？要听听同志们的意见，蒋百里再次现身说法。蒋百里的命运如同近代国人之缩影。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勤

劳的群体之一，近代却屡遭羞辱，被各国羞辱。蒋百里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个体之一，却屡屡碰壁，原本想在北洋政府干点事，结果被段祺瑞的人羞辱，自杀未遂。眼看国家四分五裂，蒋百里想帮助吴佩孚干点事，结果吴佩孚不去讨伐张作霖，反而和张作霖合作。离开吴佩孚之后，蒋百里给孙传芳当参谋。

蒋百里告诉孙传芳：千万不要把主力布置在江西和北伐军决战。

孙传芳本身也是个老狐狸，对蒋百里本人不信任（唐生智就是蒋百里的学生），但是对蒋百里的智慧很信任。

对于老狐狸而言，对于不信任的智者一般都会反其道而行之。蒋百里不让他江西和蒋介石对决，他偏要那么干，就把自己的十万家底分成五路布置在江西。

地理位置上的江西东邻福建，北接江浙，南达广东，西靠两湖。对蒋介石而言，拿下江西，就可以沿着长江而下，插入长三角，如同偶像曾国藩当年一样。对于孙传芳而言，在江西消灭了蒋介石，可以顺便把老冤家吴佩孚的老家收归己有。于是双方在江西拳脚相加，大打出手。最有趣的一战便是南昌争夺战，数次易手，好不热闹。

但正是在南昌，蒋介石施展权谋，影响未来。近代革命者头上都有一顶帽子，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各种标签。如上帝主义者洪秀全，如宪政主义者孙中山，如果给蒋介石也戴上一顶类似的帽子，不但款式不够新颖，做功不够别致，而且有些土，但绝对简单实用。因为蒋介石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权谋主义”者。

中华五千年，权谋延绵不绝，权谋大家层出不穷。近代更为密集，

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均堪称权谋大家，都是极端精明、精于算计之人。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权谋，在热爱中华帝国和大清帝国的框架下施展，未能挽狂澜于既倒。袁世凯的权谋，围绕“君权”而施展，最后时刻暴露了企图，倒下。革命党那边，孙中山身边基本都是书生、政客、梦想家。蒋介石崛起之后，权谋高人开始走上核心舞台，蒋介石更是罕见的权谋大家。

蒋介石的“权谋主义”，核心是他自己。蒋介石的兴衰，均由此而起。

第六章 顶级机谋

南昌

南昌，古称豫章（汉）和洪都（唐），历史名城，江西核心地带。地理位置可以搬用《滕王阁序》的介绍：“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所谓历史名城，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一带比较有名的战争，诸如陈友谅和朱元璋对决，王阳明平叛，湘军与太平军争锋。最有名的要数八一南昌起义，共军诞生，天地变色。

从南昌起义算起，共军前后奋斗了二十二年，推翻了蒋介石的国

民政府。然而历史上有一个被忽视的细节，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于一九二六年酝酿于南昌。

南昌起义之前，有一个被人忽视的细节：蒋介石在南昌翻云覆雨，奠定了蒋氏基业。

话说孙传芳不听蒋百里的话，把五路大军拉到江西，部署完毕之后，出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南昌空了。程潜则带着第六军乘虚而入，随行的还有王柏龄，在南昌城内工人和学生的积极策应下，第六军顺利占领南昌，时间是九月十九号，而彼时武昌还没有拿下呢。

攻入南昌的程潜可没有心思庆祝。因为北伐军和孙传芳在江西西边作战，南昌还是孙传芳的后方。程潜是孤军深入。孙传芳一看程潜搞偷袭，立马叫人回头反攻。刚进南昌城的程潜面对南北夹攻，成了火炉上的烤肉串。

南昌城背山面水，地理位置相当好。但程潜孤军，在两面夹击之下，变成背水一战。如果到了生死存亡关头，背水一战也没啥。古有项羽破釜沉舟，有韩信背水布阵，但是程潜不需要那么干，因为他也是军阀，绝不会为了蒋介石拼死。但是他也够意思，奋战了一昼夜，眼看撑不住了，跑，时间是九月二十三号。

程潜和王柏龄在南昌住了四天，交了高昂的旅店费：进去一支军队，出来残兵败将。

蒋介石从武昌到江西，正赶上程潜和王柏龄惨败，连忙带几个人到奉新收集残兵。他们比较走运，晚去了几个小时。几小时之前孙传芳的部队还在，蒋介石将成为网中之鱼。从东征时化险为夷，到广州

躲过刺客，到南昌晚几小时出现，不能不承认蒋司令的运气很不错，要不然历史就改写了。

蒋介石再次开会，部署攻打南昌，提出口号：打下南昌喝重阳酒。

十月八号，拉开第二次进攻南昌的大幕。第六军从南昌溃退半个月之后，再次来到南昌城下。为鼓舞士气，蒋介石亲自去南门指挥攻城。

然而南昌城的坚固程度不下武汉。北伐军缺少攻坚经验，大军囤积在坚城之下，又背水安营，犯了兵家大忌。十月十二号夜里，白天攻城一整天之后，正值疲劳之际，从南门水闸下涌出敢死队，围殴白天攻城的第六军！

全军被迫后撤，一边围城，一边观察行情。喝重阳酒的事不提了。

又过半个月，到十月底，各路大军到齐，第三次进攻南昌。

然而北伐军既缺攻坚技术，也缺乏装备。好不容易冒着敌人的炮火摸到墙根，也只能对着高大的城墙望而兴叹。在缺乏火力的情况下，只有利用夜间，搭梯爬城。

为了搞到梯子和绳子，宣传队就到附近老百姓家去征集大量的梯子、绳索，结成云梯，去攻城。什么样的梯子都有：木梯、竹梯，长梯、短梯，还有长梯接短梯、竹梯接木梯，甚至还有用长绳索和棒子连接成为一个软梯。总之就是些盆盆罐罐，跟丐帮差不多。城墙上有机枪和手榴弹，还有棉花和油脂制作的火球。

北伐军虽然占据道义高点，打着革命大旗，终究还是肉体凡胎。如果拿不下南昌，就没法继续北伐。眼看革命之火受到阻挡，革命之

火下的革命群众来了，多少人呢？一个人。然而就是那个人决定了战局。

那人前来献策：德胜门西边城脚下，有一道阴沟被堵死，可以挖通钻进城去。

接下来的故事比较老套：北伐军一边佯攻，吸引守军注意力；一边偷偷摸摸派人到德胜门下挖通那道被堵死的阴沟，突击队钻进城里去，抢占德胜门，随后攻击队如潮水般涌进城门，直奔督军公署，从中心向四面扩散，占领南昌城。

南昌守城部队少部分逃脱，其余全部成了俘虏。

那个提供线索的人是谁？已经很难知道。其实没必要知道他是谁，只要知道他是一个老百姓就够了，北伐军正是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才引来那个人。他虽然只有一个人，但是他提供了一个线索，那个线索虽然很简单，却收到特洛伊木马的效果。其实那不是一个线索，那是民心所向。其实孙传芳也可以利用民心，但是他没有去利用。原因很简单，他是军阀。如果他懂得利用民心，而又做到利用民心，他就不再是军阀，而是王者。

那并不是个案，北伐军一路走来，并非他们战斗力有多强悍，武昌城下一个月，南昌城下两个月，均受阻。他们一路走来，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那些帮助或许只是提供一个有利的线索，指出一条便捷通道，或者提供一架攻城梯子，积累起来就成了一种压倒性的优势。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如此。自古以来，王者都要顺应民心。

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显然不在意这样一个细节，他在为终于有了

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重要城市而高兴。下面是表演时间，蒋介石利用他超强的政治手腕奠定了未来南京政府之根基。他要下一盘很大的棋，那盘棋，便是帝国棋局。

古往今来，只有每个时代最杰出的精英方有资格充当帝国棋盘之棋手，且最终只有一个胜利者。当初洪秀全棋差一招，倒在帝国棋盘上。孙中山甚至没能赢得棋手的资格。蒋介石终于代表南方革命党走上舞台中央。

坐地起价

蒋介石高高兴兴地进了南昌城，准备大干一番。

回顾一下蒋介石的一生，坐地起价是拿手好戏。想当年，他还是一个不怎么如意的小人物，借助陈炯明提供的机会去永丰舰守卫孙中山，赢得黄埔军校校长的位置。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带着一帮学生消灭了陈炯明，随后成为军界领袖。如今成了北伐军总司令，打下如此多地盘，取得比孙中山北伐更多的战绩，自然就要坐地起价了。

那么他要啥呢？三个字，曹孟德。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资历浅。按照权谋主义原则，取得领袖地位之前，他要当曹操，像曹操玩弄汉室那样摆弄国民党中央政府。军事虽然胜了，但蒋介石最大的能耐是玩政治。南昌城内的蒋介石是这么玩的：主张国民政府迁都。

翻开地图看看就知道，中国有很多地方，很多古都，有很多适合

建都的地方。随便找十个，都轮不到广州。广州那地方，地势低洼、靠海，容易受攻击。正常情况下，开一艘军舰在水面上就能覆盖整个广州城。当年孙中山在广州建政府，实在是没有办法，只有广东那点地盘。说不好听点，环境险恶的情况下，广州靠海容易跑路。

通过北伐一番折腾，国民政府已经有了两广两湖和江西等广大地盘，看起来像个暴发户，再窝在广州就比较傻，自然要换一个地方办公。迁往哪里呢？实际上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就是迁往武汉。武汉地处中国腹地，扼长江正中央，向上可以讨伐巴蜀，向下可以俯视长三角，北进可攻击中原，是国民政府手中最适合行政办公的地盘。

蒋介石早就不想待在广州了。那是粤军的传统势力范围，各种势力盘根错节。要不是他洪福齐天，早就被那帮无法无天的家伙给暗杀了（蒋介石在广州躲过一次暗杀）。如果把中央政府留在广州，即使有一天当了老大，也要防火防盗放明枪暗箭。连孙中山都被折腾到不行。

刚开始，蒋介石也赞同迁都武汉。十一月中旬，中央政府派人去武汉考察地形。蒋介石还嫌迁都太慢，发电报催促。十一月二十八号，国民政府派遣首批中央委员宋庆龄、孙科、宋教仁、鲍罗廷等人先行经过南昌去武汉。他们于十二月二号到达南昌，蒋介石和他们在南昌开会，赞成中央政府迁都武汉的英明决定。

然而谁也猜不透他那亲切笑容背后的真实意图：绝不同意迁都武汉。

如果是蒋介石的人攻占武汉，迁都武汉完全没问题。蒋介石就能

效法曹操，挟中央以令军阀。然而很遗憾，蒋介石带着部队离开，唐生智拿下了武汉，控制两湖。

对蒋介石来说，中央政府离开广州相当于脱离粤系的势力范围，当然是好事。如果迁到武汉的话也不是好事，因为武汉在唐生智手中，唐生智在北伐战争中成长为一个棘手的角色。

一九二六年年底，当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时，三十六岁的唐生智正处于人生最巅峰，他盘踞在洞庭湖南北，俨然成了国民革命军中最新崛起的巨头。精明的蒋介石自然不想把国民政府送到唐生智手上。尽管唐生智相对简单，比广东那帮人容易对付。

两千年前，袁绍因为自己的愚蠢，把汉室给了曹操。蒋介石比袁绍聪明，决不能把中央政府送给唐生智。那么他为啥还要说假话忽悠宋庆龄、孙科等人呢？因为他需要时间等一批结义兄弟，帮助他下棋。

蒋介石的兄弟们

政党政治成熟之前，国人搞关系的杀手锏有两招：结义和结亲。

按照历史周期律，帝国体制崩溃之后，政党政治应该取代家天下时代的血缘政治。但是民国诞生之初，推行政党政治的宋教仁便死的不明不白，代表政治理想的孙中山和代表政治现实的袁世凯分裂。于是本来应该走政党政治路线的民国再次盛行结义和结亲。但革命党和北洋军阀又不同。

袁世凯、张作霖等北洋派大佬均有一堆结义兄弟，但主要还是靠

儿女亲家搞关系。

各位革命巨头虽然不缺老婆和情人，但革命党这边节奏太快、革命风险大，周期短、成本低的结义搞关系的效果胜过联姻。蒋介石一生就是结义的一生，很小就结拜了很多兄弟，每个年龄段都有很多把兄弟。

蒋介石的兄弟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需要依赖，如陈其美、黄郛、张静江；另一类需要消灭，如许崇智、冯玉祥、张学良。

任何一个领袖级人物必须具备三样东西：手中有枪，口袋里有钱，身边有智囊团。蒋介石在黄埔军校走马上任之前还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军人，还没有机会发扬政治天赋，甚至没人知道他的政治天赋。数年之后，蒋介石成为民国领袖，把政治谋略施展到极致。如此巨大的差别，就因为他整合了枪杆子、钱袋子、智囊团。

蒋介石的枪杆子源自黄埔军校，前面已经说过很多，这里说说智囊团。蒋介石的智囊团就是那群需要依赖的兄弟们，他们和蒋介石的关系各有特色。

第一个出场的是黄郛，浙江上虞人，也是振武学校毕业，当初在日本和陈其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回国后担任了一系列官职，巅峰时期干过几天北洋总理。蒋介石一生中，黄郛号称“半师半友”。半友，很好理解。半师，从何说起？

话说蒋介石打下南昌之后，思考接下来如何登上领袖之位。黄郛在庐山牯岭告诉了蒋介石三条计策，相当于蒋介石版本的“隆中对”，对未来影响深远。

计策之一：离俄清党。相当于通过清理共产党和左派的方式集权。

计策之二：底定东南。就是掌控中国最富有之地，抓住钱袋子。
此策让蒋介石受益无穷。

计策之三：与日英谅解。这个相当于计策之一的补充。

三个策略有两层含义：其一，把权谋斗争进行到底，逆我者亡；其二，重返精英革命路线，压制底层革命。此策出，蒋介石虽然赢得了想要的权力，但二十年杀伐不休，流血不止。

任何政策都要有人执行。在南昌帮助蒋介石和武汉中央政府死磕之人是另一位兄弟，奇人张静江。此人更了不得，有“帝师”之称谓，对蒋小弟百般呵护。

在政治党派中，有些人名气大却从来没有大权，属于偶像派。比方说汪精卫，从来没有获得和名气相对应的权柄。另一些人虽然名气不是很大，能量却极为惊人。比方说张静江，可以说是国民党中最为奇特的人物之一。

张静江，浙江人，生于一八七七年，比孙中山年轻十一岁，比蒋介石年长十岁。要比出身，估计革命党中没有人可以和张静江相比。他爷爷和外公均为江南巨商，而且是没有倒霉的那一种，所以张静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所以他二十一岁的时候，他爹就花大价钱给他买了一个清朝高级公务员。四年之后，随着驻法公使去了巴黎。刚到巴黎，他爹又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在巴黎独资经商，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啥叫有钱？这就叫有钱。说真的，这种情况下的年轻人啥事都干得出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成为花花公子。然而张静江不

同，他生性豪爽，而且眼光毒辣，看到农耕帝国气数已尽。

一九零五年，二十八岁的张静江遇到了三十九岁的孙中山，从此找到精神依靠。张静江以自己的方式向孙中山表达钦佩：“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翻译过来就是，我很有钱，没有钱来找我，我很想很高兴很乐意给你钱。

孙中山最初并没把张静江当回事，富人嘛，爱显摆扯皮很正常。然而张静江看到清朝气数已尽，下决心和孙中山走在一起。分手之时，张静江留给孙中山一封信，让孙中山到美国后去纽约市第五街五六六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领取资助革命的活动经费三万块。孙中山半信半疑，把信交给黄兴，让他去探真假。黄兴很快拿到三万块。此后张静江加入同盟会，充当孙中山的提款机和筹款机。孙中山称赞他是“革命奇人”，确实够奇的。

如果说张静江追随孙中山是看中了孙中山革命领袖的旗帜，那么押宝蒋介石只能说他眼光毒辣了。当年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只是陈其美的小弟。张静江看出潜伏在蒋介石身上的能量。陈其美被刺杀，蒋介石孤独无助的日子里，张静江向蒋介石敞开温暖的怀抱——和蒋介石结为兄弟，成为张大哥。当时张静江的身份是国民党元老，中国富豪，孙中山的亲密战友；蒋介石只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小军官。张静江肯屈尊降贵和蒋介石结拜，那是看好了蒋介石的前途。在蒋介石最无助的时候，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上张大哥那里吃免费午餐，睡免费

床铺；起义失败，还可以找张大哥策应。在无事可做的那段时间里，蒋介石还可以和张大哥一起折腾证券交易，搞股票生意，虽然亏得一塌糊涂，却不影响他们的感情。最为有趣的是，蒋介石看上一个十四岁的陈洁如，张大哥也帮助蒋老弟实现了愿望。

蒋介石对张静江的感情虽然比不上对陈其美那么热烈真诚，但也能用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来形容了。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两任领袖中，孙中山和蒋介石在性格和处事方式上差别很大，但是张静江却可以认准两个人，可见眼光之毒辣，手段之高妙。

蒋介石平步青云时，张静江也凭借自己的财力和搞关系的能力，在国民党内部悄悄攀升。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九号，张静江竟然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国民党主席。原本那个位置是汪精卫的。中山舰事件之后，汪精卫辞职出国。汪精卫之后，蒋介石便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极力推举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两个月后，张静江为树立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威望，力辞此职，提名蒋介石担任。通过张静江的步步扶持，蒋介石逐渐登上权力顶峰。蒋介石称张静江为“革命导师”。

蒋介石打下南昌，就等张静江前来出谋划策。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号，蒋介石和张静江筹划于密室。第一套方案就是尽量以迁都南昌的名义把中央控制在手心。第二套方案算预备方案，一旦第一套方案不成功，那就在平定东南后另立中央。同时参与密谋的还有戴季陶、陈果夫、吴稚晖等人。

他们是蒋介石的智囊、是兄弟；也是狠辣之人，眼光狠辣，想法

狠辣，手段狠辣。

耍流氓

耍流氓这个词听起来不太雅观，但事实确实如此。耍流氓有好几个层次，那种几个大老爷们围住一个小姑娘占便宜，是最低档次的流氓行为。中档次的流氓行为，是生意场那种以大欺小、以强欺弱，属于西装领带下的衣冠禽兽。蒋介石接下来将上演极品流氓行为。

蒋介石和张静江私下里沟通一番之后决定：把中央委员拦截在南昌，不让他们去武汉，把首都改定在南昌。——当时换成任何一个人干出如此荒唐之事，蒋介石估计都会上去扇他两巴掌，吐口唾沫，再配音曰，让你瞎胡闹！

翻开历史看看，中国那么多年历史，出现过那么多位皇帝，有谁把首都设在南昌？蒋介石明白，南昌不适合建都。蒋介石也明白，从当时中央政府的政策来讲，迁都武汉是既定政策，任何一个稍微文明正规一点的政府都要执行的。蒋介石还明白，从行为上讲，直接阻截中央委员，说轻了，叫耍流氓；说重了，叫叛变。

所以蒋介石只能从军事上找理由。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号，蒋介石和张静江把委员们召来开会。蒋介石发表长篇大论的讲话，吐沫星横飞，反复强调：现在河南军情有变，武汉的军队靠不住，所以应该迁往南昌。张静江以国民政府代理主席的身份帮腔，两人一唱一和，你来我往。但效果并不理想。大家都明

白，武汉比南昌更适合建都。

蒋介石展示了他的霸道：让中央委员们在南昌搞政治局，并且通电要求武汉临时中央取消，命令宋庆龄、孙科等人来南昌上班。时间是一月五号。又过两天，武汉临时中央开会，谴责蒋介石，让他放弃错误决定。

尽管暂时处于劣势，蒋介石是一个不会认输的人，他开始展示他的手腕。

一月十二号，蒋介石把中央委员拦在南昌，自己去武汉探听虚实。武汉的蒋介石依然笑容和蔼，他笑着告诉大家，他永远是革命的，他是总理的忠实信徒。蒋介石还笑着告诉大家，他会执行中央命令，迁都武汉。一系列微笑的过程中，蒋介石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武汉是不会屈服的。武汉不仅有宋庆龄、孙科等人，还有共产党，还有真正的国民党左派，最重要的是还有浓烈的革命氛围。

革命群众打出标语：要求总司令迁到武汉。

工人代表李立三强调：总司令应该到武汉来。

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表态：武汉是根基。

中央委员质问蒋介石：背叛分裂中央政府究竟啥意思？

连李宗仁都认为：迁都南昌是私心自用。

蒋介石找到鲍罗廷，回顾两人的传统友谊，热烈邀请他去南昌共商国是。鲍罗廷是苏联的政治总顾问，支持孙中山的苏联代表，有参与决策权。然而鲍罗廷警告他不要胡来。当时苏联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鲍罗廷的话自然有分量。失望之下，蒋介石私下回到南昌。他依

然试图说服南昌的中央委员迁都，收效依然不大。蒋介石明白，需要改变的时候到了。他认为鲍罗廷成了绊脚石，必须搬掉，于是出了第一招：号召大家驱逐鲍罗廷。依然没得到响应。

蒋介石的第二招：接下来他和张大哥继续要求武汉的同志来南昌上班，当然还是没有结果。

蒋介石的第三招：派另外一位大哥，戴季陶，带着一帮口水战士去武汉拉拢游说，试图拉人到南昌，上演耍流氓第二季。由于道理过于明显，拉人也不好拉，基本上也没啥效果。

武汉那些人也不是吃素的，虽然没有攻城掠地，但得理不饶人的本领还是有的。他们一边开会强调自己是临时中央政府，一边制造舆论说蒋介石是在军人干政，同时派人到南昌积极游说。当然他们的游说和戴季陶到武汉不一样。戴季陶去武汉游说，主要是拉拢。武汉人去南昌，主要是滔滔不绝地讲道理。

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一直战斗到二月八号，被阻挡在南昌的中央委员集体表态：蒋介石同志，俺们要去武汉，不管你同不同意，俺们要走了。

事已至此，蒋介石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发表声明说，武汉确实比南昌合适。

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到一九二七年二月八号，前后将近四十天的时间，大家就那么吵来吵去。是不是在浪费时间？那得看是对谁来讲。对武汉国民政府而言，确实是浪费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对蒋介石而言，则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九二七年一月，武汉和南昌争吵之际，蒋介石把北伐军分成东路、中路、西路三军。西路军由唐生智指挥，继续北进河南，进攻吴佩孚。他自己率领中路军从江西向东推进，对付孙传芳。至于东路军，则是北伐一开始就留在潮梅的何应钦。

何应钦是蒋介石的好兄弟，也是他的杀手锏。按照蒋介石的谋划，何应钦出马，是要摘桃子的。孙传芳的主力被引诱到江西，长三角空虚。何应钦很快沿东线一路北上，从福建进入浙江，沿途收拾并改编孙传芳的人马，继续北上入浙江，然后受阻。

狗急尚且跳墙。何况孙传芳也是一代枭雄。

蒋介石非常着急，把参谋长白崇禧叫过来，说东路军作战不利，为整个战局考虑，咱们两个人要去一个（大有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之感慨）。白崇禧一看蒋介石这高帽子，喜欢，收下。就这样，白崇禧成了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白崇禧去东路军，效果显著，一月二十六号，东路军推进到浙江中部的金华一代，随后东进，于二月十八号攻下杭州。四月初，东路军进入上海。于此同时，蒋介石自己指挥的中路军也在一月份进入皖南，三月份推进到南京，并于三月二十三日攻下南京城，四天之后，也就是三月二十七日，蒋介石进入上海。

三个月的时间，蒋介石把孙传芳的家业全部抢到自己手上，中国最甜的糖罐子从此归了蒋介石！从此之后，蒋介石抱着它吃了二十二年。当然中间有段时间被鬼子抢去了。

到此为止，北伐八个月，国民政府拥有了半壁江山，情形前所未

有的乐观。七十年前，太平军拿下南京，却在北伐中失败。十年前，革命军占据半壁江山，依然无法撼动袁世凯。蒋介石比洪秀全和孙中山都幸运。坐镇北京的段祺瑞政府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吴佩孚已经魂飞魄散，孙传芳困兽犹斗。如果继续北伐，革命军横扫天下指日可待。国人为未来的新局面欢欣鼓舞，蒋介石却另做打算。

根据兄弟们的决策，平定东南之后，还要和东南财阀和解。打天下需要枪杆子，枪杆子需要钱。财阀有钱，且需要赚更多的钱。财阀提供银两给蒋介石买武器，蒋介石则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财富安全。直白一点说，就是财富提供刀和磨刀石，蒋介石负责拿刀去杀人。

这些说听起来有些复杂，但有一个术语大家都知道：攘外先安内。这个问题先放一放，稍后再谈。因为各位狠辣的兄弟难以彻底打通江浙财阀的关系。就在江西，蒋介石迎来一个能量尚在各位狠辣兄弟之上的女人。

七章 谁主沉浮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号，蒋介石进入上海两周后，亮出手中的屠刀，犯下平生最致命的一个错误（原因后面分析）：清党。

蒋介石清党的目的有两个：消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是其一，其二便是通过消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搬开汪精卫，走上领袖地位。然而天意弄人，蒋介石虽然搬开了汪精卫，虽然走上国民党领袖的位置，

虽然基本清理了国民党左翼；却把共产党逼得置之死地而后生，把毛泽东推到历史前台，最后只剩下一条大裤衩（台湾）遮羞。

四月十六号，亮出屠刀的第四天，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

好吧，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斗不休，时不时有军阀宣布脱离中央独立，但从没有人胆敢另立中央政府。孙中山一生漂泊，被各种人反对，但革命党表面上还是以他为尊。即使陈炯明向他开炮，也没有另立中央。

蒋介石一出手便与众不同。孙中山死前告诉大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如果孙中山泉下有知，估计会被蒋介石气得活过来。

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对立，加上广州的粤系和上海一帮蠢蠢欲动的元老，天下未定，一时之间革命党竟然有四个戏台，好不热闹。北洋政府虽乱，也没乱成这般模样。

乱归乱，归根结底还是武汉和南京争夺正统，还是蒋介石和汪精卫争夺一把手。

汪精卫名义上是老大，实际没带过一天兵，没能抢占过一块地盘，一有风吹草动就跑出去避祸。之前的中山舰事件，闹得并不大，身为老大的汪精卫却跑了。指望枪杆子出身的蒋介石服从汪精卫，那是不现实的。指望笔杆子出身的汪精卫抄起枪和蒋介石干，同样不现实。

但汪精卫也有自己的旗帜：继续高举左派大旗，继承孙中山的国共合作路线，宣称蒋介石为叛徒。双方只能展开口水大战。问题是汪精卫只有口水，蒋介石除了口水还有狠招。

狠招便是经济战。因为在相同的时间段，能量尚在蒋介石各位兄

弟之上的宋霭龄找到蒋介石，促成蒋宋联姻，宋家从武汉倒向南京。蒋介石有了实现经济战的资本。

武汉中央政府养了一大批公务员，都要发薪水，开销很大。开销更大的是战争。众所周知，打仗就是砸钱。武汉那一带的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政府需要的开销主要来自珠三角和长三角。蒋介石定都南京，长三角这边的钱就断了。桂系切断了广东和武汉的联系，广东方面的税收就没有了。这样基本上武汉的财路就断了。

更狠的一招是，蒋介石下令禁止武汉中央银行的钱在自己的地盘流通，自己印钞票。这样一来，中央政府的货币流通就出了问题。与此同时，蒋介石又联络江浙财阀从武汉撤出资本。财阀们撤资本时又卷走大量现金，导致武汉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切断武汉和广东、江浙的联系，不仅断了中央政府的财路，还切断了武汉的商品交流。这是最狠的一招。武汉方面的商家大幅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就连医院都没有药品。武汉瘫痪了，军人武器不够用，后勤跟不上，公务员手里的工资成了废纸，大家都没得吃。这种情况下，军人开始反叛，四面的军阀压过来。所有这些情况加起来，一副末世之像，简直是国民党撤离大陆的提前预演。

汪精卫撑不住了，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份，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三个月之后，汪精卫向共产党人开刀。所谓革命大义被现实利益淹没。有奶便喊娘，没奶就喊狼。

武汉屈服了，蒋介石很开心，坐等汪精卫认输。但他的笑容很快僵在了脸上。因为孙传芳破坏了蒋介石的好事。

话说孙传芳想当渔翁未遂，很窝火，老子怎么会败给你呢？！老子学历比你高啊！老子起家比你早啊！老子风光时你小子在哪儿？想抢老子家业，没门！

消气之后，孙渔翁显露出老狐狸本色，找张作霖求救。摆平郭松龄内乱之后，张作霖的触角再次伸到华北，大有南下之势。孙传芳靠驱赶奉军起家，差点要了张作霖的老命，如今有求于张作霖，只好放低身段，见了张作霖就磕头，自称晚辈。搞得张作霖都不好意思拒绝他。虽然张作霖比孙传芳大十岁，但还没有达到前辈的标准。为了缓解张作霖的尴尬，孙传芳抓住比自己年轻十六岁的张学良，二话不说，结成八拜之交。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称张作霖为义父了。然后孙传芳就和他的义父谈唇和齿的利害关系。

张作霖更是老狐狸，他想参与逐鹿中原，重演满清一统天下的好戏。正因如此，已经溃败的吴佩孚才能在河南苟延残喘。现在孙传芳送上门来，自然是天助他也。两杯小酒下肚，成交。然后北方的军阀南下，拉开和革命军决战的架势。

就在南京和武汉斗得不可开交之际，孙传芳悄然南下，悄然拿下徐州，逼近蚌埠。徐州和蚌埠是南京的门户。蒋介石眼看就要战胜汪精卫，以为天下到了自己手里。偏偏这节骨眼上孙传芳来捣乱。自从在江西击败孙传芳之后，蒋介石就再没把他放在眼里。听到孙传芳南下的消息，还占据了徐州，蒋介石皱起了眉头，如同看见蟑螂一样，决定把孙传芳彻底击溃。并且在孙中山的纪念会上夸下海口：“打不下徐州，就不回南京。”

孙传芳利用蒋介石轻视自己的心理，边战斗边撤退。蒋介石一看孙传芳还是老样子，就想赶紧夺回徐州，然后回南京逼迫汪精卫就犯，于是全线出击。哪知道孙传芳阵前装孙子，背后玩阴招，派人迂回到蒋介石身后。前后夹击，蒋介石崩溃了，灰溜溜跑回南京，布置长江防线阻击孙传芳。

碰了一鼻子灰的蒋介石跑回南京，发现他的椅子动摇了。

武汉的汪精卫原本无路可走，看见蒋介石被孙传芳打败，破天荒地强硬起来，决定讨伐蒋介石，让唐生智沿长江东征。内战一触即发。

当时南京的情况是，孙传芳并不可怕，唐生智的东征军也不可怕。从武汉到南京，中间还隔着一个安徽呢，那里有李宗仁的桂系。桂系很可怕。因为不仅仅安徽，整个南京周围都是桂系的军队。蒋介石的嫡系都在东面。如果李宗仁肯阻击汪精卫，蒋介石在南京便可以高枕无忧。问题就在于李宗仁肯吗？

梦难成

汪精卫以武汉政府的名义让李宗仁当安徽省主席，李宗仁不干。蒋介石以南京政府的名义让李宗仁当安徽省主席，李宗仁干了。好像李宗仁跟蒋介石混了。其实李宗仁是跟着蒋介石等待机会，然后把蒋介石一脚踹开。李宗仁的目的是替代蒋介石！

眼见蒋介石内外交困，李宗仁不但没有伸出温暖的手掌，反而踢出一套冰冷的连环脚。李宗仁首先对蒋介石表态：武汉和南京原本是

一家，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兵戎相见为好；随后致电冯玉祥，要求他出面调停，大家一致反共；又写信给武汉的台柱子唐生智：只要你们反对共产党就好了。言下之意，咱们不要动手。

最后李宗仁来了一番公开通电：南京和武汉要好好谈谈，君子动口不动手。

——这一套是不是很熟悉？辛亥暴动之后，袁世凯就是这个调子，把清政府和革命党都要了。蔡锷护法运动，冯国璋也是这个调子，把袁世凯气死了。

李宗仁这一手相当于把蒋介石晾在枪口下，直接拆蒋介石的台。当然也不能怪李宗仁无情。蒋介石可以利用李宗仁，李宗仁也可以利用蒋介石。他们之间本就是相互利用，无所谓对与错。后来蒋介石地位稳固之后，把李宗仁逼到墙角。再后来，淮海战役关键时刻，李宗仁和白崇禧再次逼迫蒋介石下岗。他们仿佛是热恋中的情侣，信奉打是亲、骂是爱的信条。

蒋介石一看李宗仁来这手，暗暗叫苦。毕竟军队摆在那里，如果李宗仁放行的话，汪精卫的人可以直接坐船到南京开会，连车费都省了。

于是大家在南京开会。

白崇禧直接对蒋介石说：“总司令要停止北伐，去打武汉，岂不违背先总理中山先生的遗教，而令亲者痛、仇者快？我们认为本党内部的问题，还是以和为贵。”赤裸裸地拆台！

就这样吵吵嚷嚷，唾沫星子喷了好几碗。最后蒋介石愤然威胁：

“我不和！我不和！要和你们去和！要和你们去和！你们要去和，我蒋介石就离开，就辞职，我看你们有什么本事来收拾这个局面？”这个本来是气话，想威胁白崇禧：你看着办，跟着我有肉吃，不跟我连骨头都没有。如果没北伐，你们桂系也没得抢地盘。

哪知白崇禧不吃这一套，顺水推舟说：“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反了！反了！一个副总指挥竟然敢跟老大这么说话，岂有此理。

蒋介石听了如此大逆不道的话并不生气，他自信地看着何应钦。何应钦是蒋介石的心腹，如果何应钦紧要关头开口表示总司令不能离开，声音沉痛一点、渲染下气氛就更好了，必要时再掉两滴眼泪，恳请蒋介石为了革命留下，那蒋介石正好顺势下坡。

但是何应钦一直没有出声！蒋介石心凉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落井下石？同时想起之前取代许崇智大哥的经历（何应钦也熟悉），心中也亮了：好啊何应钦，竟然和白崇禧有了默契，想取代我？还早呢！蒋介石可以取代许崇智，你何应钦不要想取代我蒋介石！

蒋介石一看这情况，知道自己入戏太深。要圆场，必须假戏真做了，拂袖而起：“好！好！我就走吧。”虽然说是走了，那情形却是在说：我会回来的。

这就是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也就是所谓的白崇禧逼宫，也是蒋介石和何应钦裂痕的开始。

蒋介石无奈之际通电下岗。出道以来，从来都是蒋介石算计别人，没想到今日竟然被算计！你们等着，俺会回来的！娘希匹！

竹篮打水的汪精卫

蒋介石下岗，大家都很高兴。李宗仁和白崇禧控制了南京实权。哥俩找地方喝几杯，直到脸上泛出红光，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

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旗号是和谈，和汪精卫谈。二人发电报给汪精卫，表示尊重汪精卫的领导，打算先把汪精卫骗到南京完成宁汉合流。

汪精卫兴高采烈地发表通电：“今蒋解除兵柄，听命于党，李宗仁等复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兹经中执委会扩大会议决议，即日迁都南京。”言下之意很明显，蒋介石已经认输了，老大还是我汪精卫。洋洋得意之下，汪精卫去南京了。

对李宗仁和白崇禧而言，汪精卫暂时在哪里并不是特别重要，当务之急是解决已经到了长江以北的孙传芳。当时南京城内，蒋介石的中央军在何应钦手上。蒋介石下岗后告诉何应钦，让他把部队拉走，留下桂系在南京和孙传芳血拼。何应钦打算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办。李宗仁一边布置防线，一边去找何应钦。李宗仁到第一军军部时，何应钦正准备走人。

李宗仁对何应钦说：“首都存亡所系，你不能一走了之。”平时的客套倒是省了。

这道理何应钦也懂，但蒋介石的话不能不考虑。李宗仁一看何应钦扭扭捏捏不表态，便亮出底牌：“敬公，你真要走，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李宗仁决绝的态度惊醒了何应钦。何应钦明白，如果真的走人，南京自己打起来，只是便宜了孙传芳。与其和李宗仁打，不如和孙传芳打。和孙传芳打，还能保住南京。和李宗仁打，胜败都没有好下场。于是何应钦留了下来。

李宗仁和何应钦指挥人马与孙传芳血战于龙潭。六百年前，朱元璋和来犯的陈友谅也在那里打过一仗，揭开双方血战的序幕。孙传芳过江之后，破釜沉舟，一副打不下南京就投江的架势。那一战是孙传芳最后的机会。赢了，东山再起。输了，连回去给张作霖当干儿子的机会都没有了，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中间的轻重，孙传芳是明白的。

回想起一年之前，自己还是南京城的主人，控制着东南半壁江山，幻想一统天下。人生如梦似幻，变化起落何其之大啊！但是孙传芳没有时间伤感，他拿出了当年成为军阀的全部狠劲，逼着部下扔掉大烟枪，和李宗仁与何应钦在龙潭杀得天昏地暗。

双方在龙潭血战三天三夜，北伐军出师以来，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恶仗！

双方筋疲力尽之际，白崇禧出现了，从背后夹击孙传芳。蒋介石下岗之后，白崇禧去上海筹款，顺便筹了一支军队，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在适当的地方。

孙传芳崩溃了，坐着汽艇逃跑的。从此赫赫有名的孙大军阀退出历史舞台。

孙传芳跑了，斗争又回到政治舞台。眼见汪精卫得意洋洋地跑来南京当领导，李宗仁和白崇禧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刚刚赶走一个蒋

介石，又要放一个汪精卫骑在哥俩的脖子上么？当然不能。怎么办呢？李宗仁把目光投向其他地方。

孙中山推出新三大政策之际，国民党内就有很多人不满，但谁也不敢公开反对。孙中山死后，就有一帮人跳出来，他们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当初国共合作之际，那帮人不遭待见，被冷落。如今国共分裂，那帮人又香了。李宗仁就把那帮人拉出来充当门面。那帮人因为最早反对共产党，就看最晚反共产党的汪精卫不顺眼。

汪精卫刚到南京，得意劲就没了，看见大街上稀稀拉拉的反对汪精卫的标语，心理凉飕飕的。李宗仁对付汪精卫的王牌是胡汉民。在国民党内，资历和威望唯一能和汪精卫一较高下的只有胡汉民。廖仲恺被刺杀之际，汪精卫是铁了心要置胡汉民于死地。胡汉民机智，逃过一劫，后来被迫出国，到苏联转了一圈，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试图争夺左派领导权，被斯大林否决。国共分裂后，胡汉民再次回国，以右派面孔出现。

一九二七年的胡汉民，在南京中执委上班，地位并不是十分耀眼。得到机会的胡汉民，自然愿意修理汪精卫，一则可以泻心头之恨，二则可以通过修理汪精卫提升人气。于公于私都不会放过机会。于是胡汉民带着西山会议派那帮人修理汪精卫，理由是汪精卫“联共”，要治汪精卫的罪。“联共”本是孙中山的政策，要治罪也要把孙中山从坟墓里拉出来治罪。总之要修理汪精卫没商量。汪精卫也觉得自己反共晚了，希望去“请罪”，意思是卖个面子算了。然而人家不吃那一套。

这么一番折腾下来，汪精卫老大的位置也没有了。

桂系双雄也不行

汪精卫到南京逛了一圈，感觉被耍了，自尊心受到伤害，又跑回武汉。双方决定兵戎相见，依然是唐生智东征。在李宗仁等人和孙传芳大战之际，唐生智乘虚而入，沿江而下推进到安庆。这一番折腾下来，唐生智的军力扩展到五个军，大约十万人马。但是就军事时机而言，选择并不好。因为孙传芳已经溃逃，南京方面没有其他敌人。

为对付唐生智，李宗仁收买了程潜。程潜的士兵多半是湖南人，有返乡之心。两人约定：搞定唐生智之后，如果拥护蒋介石，天诛地灭。当然他们那种人的赌咒不能当真。

又经过一轮忽悠之后，还是开战了。开战的结果是唐生智一败再败，败到最后通电“休息”！去日本休息。名动一时的“佛教将军”唐生智就此沦落，日后起起伏伏，再也没能回到巅峰。抗战爆发之后，唐生智主持南京战事，争议极大。

如此李宗仁和白崇禧通过军事和政治手腕谋取了一系列胜利，控制广西，两湖，安徽，江苏等广大地盘，完全有理由好好庆祝一番。按道理说可以当老大了吧。

莫急，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

当年蒋介石也是一番折腾，眼看胜利在望，结果还是下岗了。原因很简单，把人得罪光了。李宗仁和白崇禧走了蒋介石的老路，取得

一连串胜利时得罪了一系列的人。那些人既然能让蒋介石滚蛋，也能让李宗仁当不成老大。

一番折腾下来，武汉中央政府没了，唐生智出国了，但汪精卫还在。汪精卫跑到广东继续和南京作对，宁汉对峙刚刚结束，宁粤对峙拉开序幕。汪精卫看似政治家，实则完全凭着名气大、资格老忽悠人，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战略。当初国共合作搞得不错，他去充当左派领袖。蒋介石清党，他原本继续高举左派大旗，举了三个月，觉得太辛苦，又反过来屠杀共产党，想要充当右派领袖。直到此时，汪精卫的一生已经完全暴露：此人虽然年轻时有过热血，但缺乏政治家的谋略和坚韧，玩政治只能充当政客。

所谓政客，就是那种不管名气多大、地位多高，只要价码够，就可以收买。

所谓政客，就是会场中的投机者，类似战场上的兵油子。

广东本来是李济深的地盘。李济深和李宗仁关系很好。李济深更愿意拿胡汉民当招牌。汪精卫去广东本来是掀不起风浪的。但是汪精卫把武汉弄丢了，没地去，只能去广东过寄人篱下的日子了。可以说身在广东的汪精卫跟一条死鱼差不多，但因为两个人的出场给汪精卫制造了死鱼翻身的机会。第一个人就是蒋介石。

汪精卫原本看蒋介石不爽，处处受制于蒋介石，大好的前途被蒋介石抢走。他曾处心积虑和蒋介石作对，然而蒋介石不在了，他依然不能如愿。因为李宗仁充当了蒋介石的角色，牢牢控制军事领域，对他威逼利诱。汪精卫对比了一下蒋介石和李宗仁。两个人同样是后生

小辈，资历和自己相差很远，都是起于军事，都拿自己当猴耍。但是被耍的过程中，蒋介石笑得更为亲切，礼数更为周到，出手更为阔绰。

李宗仁直接把胡汉民拿来给自己定罪，真是岂有此理！

在汪精卫看来，同样被耍，被蒋介石耍更有面子。于是，已经在宁汉对峙中输得一无所有的汪精卫决心从蒋介石那里寻求一丝温暖，借助蒋介石对抗李宗仁。

蒋介石下野之后回老家待了一阵子，逼迫发妻毛福梅离婚，把小妾陈洁如送出国，又去日本看了宋家老太太，把宋美龄娶回家。蒋介石不在的那段时间，以南京为中心，斗得相当欢乐。李宗仁和白崇禧得罪了很多，那些人很快又聚集在蒋介石的周围。几个月之前，也是那些人看蒋介石不顺眼。难道说抱得美人归之后的蒋介石魅力变大了？

一时之间宁、粤、沪三地再次搭起了戏台，彼此对唱起来。

汪精卫需要蒋介石，蒋介石也需要汪精卫。因为蒋介石要复出，需要借助汪精卫的政治能量。几个月前相互尊称对方为叛徒的两人，如今仍以同志相称，表示尊重彼此。汪精卫决定去上海和蒋介石商谈“国家大事”。南京怕蒋介石和汪精卫联手对付自己，就提出改蒋、汪二人商谈为宁、粤、沪三方会谈。李济深和汪精卫就去上海和蒋介石谈判了。

这么一来，蒋介石再次成为超级大赢家，风风光光地携着娇妻上岗。

一番风水布局之后，潮起潮落，涛声依旧。

下岗之前，蒋介石是老大，其他人围绕蒋介石转。大家看蒋老大不顺眼，尽情折腾。反反复复半年多，打了很多仗，死了很多人，浪费了很多银子之后，还是蒋介石当老大，还是其他人围着蒋老大转。

对蒋介石而言，下岗休息了一段时间，从私人角度讲，甩掉两个老婆，又娶了一个老婆，顺便到日本逛了一圈。从事业角度看，下岗之前，武汉为心腹之患，再上岗时没了；下岗之前，孙传芳兵临城下，再上岗时，孙传芳已经从历史上消失；下岗之前，还没有明确的境外支持者，再上岗之时，已经有了英美支持，而且从日本借了一笔钱。

对李宗仁和白崇禧而言：击溃孙传芳，搞定了唐生智，而且在南京过了一把当老大的瘾，最后却没能走上老大的位置。两个人辛辛苦苦大半年，基本上替蒋介石做了嫁衣！但二人只能把怒火向汪精卫发泄。

就在桂系坐镇南京之际，周恩来策划南昌起义，共军诞生。

南昌起义的部队理论上是张发奎的部队，张发奎理论上忠于汪精卫。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事情是汪精卫搞出来的，白崇禧认定汪精卫为“准（注意这个字）共产党”，亲自联系租界，准备抓捕汪精卫。汪精卫虽然名气很大，地位很高，怎能和凶神恶煞的白崇禧对抗，被迫战战兢兢过日子。这时候蒋介石又出来当好人，建议汪精卫兄弟“出国避一避”。

对汪精卫而言：自己和蒋介石对着干了一场，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蒋介石压倒！

汪精卫清楚地记得，两年前，大红大紫的廖仲恺被刺杀在党部大

楼门前。汪精卫同样清楚地记得，宋教仁被杀的情形，以及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情形。所以汪精卫虽然没有政治家的谋略，却有政客的机警，一有风吹草动，立马跑路避风头。

他为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为党国伟大事业出国考察。去哪儿呢？本来日本最方便。由于汪精卫经常外出考察，光考察日本也不太好意思，就换个地方，去法国。

蒋介石下岗之时，汪精卫日子虽然不好过，好歹还是武汉老大。如今蒋介石再次上岗，他只能开溜。白崇禧，恨你！

八章 长袖善舞

看看吧，几个月的时间，统一大业进行到一半，军政大佬基本上都过了一把老大的瘾，如同演戏一般，让人醉了。当然这也是一次预演，为未来各位兄弟之间打内战埋下伏笔。

蒋介石复出，面临如下问题和优势：

问题之一：国民党依然四分五裂，汪精卫、胡汉民依然实力雄厚；因为清党让共产党形成一股崭新的政治力量，战斗力由弱变强。

问题之二：军队也是四分五裂，桂系控制广西、两湖、安徽，兵强马壮。中央军内部，蒋介石和何应钦之间出现了猜忌。

优势之一：枪杆子，蒋介石的中央军扩建到六十个师，成为最为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

优势之二：钱袋子，通过清党，赢得江浙财阀的支持和列强力挺。

此情此景，领袖之心在蒋介石胸腔内猛烈跳动，一个伟大的历史形象在向他招手。此后，蒋介石需要做的事有两件：解决问题和扩大自身优势。

所谓解决问题，便是统一中国，便是要成为军政领袖。

所谓扩大优势，便是拥有更强的枪杆子和更大的钱袋子去解决问题。

蒋介石一直都在做这样两件事，他的后半生都因执着于这两件事而沉浮。第二件事一直在进行中，枪杆子越来越强硬，钱袋子越来越鼓。然而第一件事始终没做好。所有这一切从北伐就埋下了伏笔，所有分裂的种子都将萌芽。

为遮掩国民党内一系列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生生不息、难以调和的矛盾，其他人无法应对之后，蒋介石再次施展权谋，决定继续北伐打天下。也就是北伐二期。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北伐第一步需要银子。李宗仁和白崇禧未能成功，便是筹钱力度不行。蒋介石和宋家合作之后，由宋子文牵线搭桥，筹钱不在话下。蒋介石致电上海总商会以及中国、交通银行，强力推销国库券。说好听点，叫融资；说不好听，要流氓。

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民族资本家）害怕了，不肯去南京应命。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说张嘉璈的行为属于“阻止北伐”，并限张嘉璈一周之内承销一千万元国库券。张嘉璈在给宋子文的电报中诉苦：“此等电文，余无法承受。若转与余，只好复电决裂。试问：国民军自粤

而湘而赣而浙而宁，中行帮助逾千万；去年第一次库券，中行允八九百万；第二次库券，中行允六百余万；龙潭之役，孙军过江时，中行帮助几何？此次上台，中行助力几何？去年过年，中行又借几何？此谓把持何？北伐失败之罪，系于何人？非严重诘问不可，否则如此无信无义之人，何能当我辈首领！我辈牺牲为行，一生穷困，至于今日，所望事业有成、国家有裨，若因此二者而绝望，则既无兴趣，随时可抛弃地位。”

——这就是民族资本家的处境。

蒋介石不管张嘉璈怎么想，亲自到上海筹钱，声称每月军费需要千万，张嘉璈们必须服从。当然喽，拿人钱财，要保人赚钱。资本家不是慈善家，出了钱要赚回来，要更大力度地压榨工人。最后必然引起更大的阶级矛盾，给共产党更大的活动空间。但蒋介石不管这些，他就是要钱。有了钱，相当于有了粮草，就可以开动兵马了。

一九二八年一月九号，蒋介石恢复北伐军总司令之职。他宣布“二次北伐”，完成孙中山遗愿。因为蒋介石的“权谋主义”，北伐中断了九个月。如果一直继续下去，北伐军至少已经推进到山海关，而且没有内部分裂问题。

九个月的时间，国民政府唯一的变化就是蒋介石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核心人物。共产党被清理了，讨厌的左派被清理了，汪精卫不再是领袖。

但再次北伐的性质也变了。

广州北伐，旗号还是联俄联共；如今北伐军，反共反苏，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格杀勿论。为此必须镇压工人运动，取缔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党部中有关工、农、商、妇女、学生等组织，取而代之的是特务组织：陈家兄弟开始在国民党内各种调查；戴笠开始收集情报。

一次北伐的主力是七个军，二次北伐主力为四大集团军，分别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和白崇禧为核心。

蒋介石的中央军为第一集团军，以黄埔军师生为骨干，占据福建、浙江、江苏和上海，以及江西一部，拥有江浙财阀和英美列强的支持。

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第二集团军。北京政变导致北洋军分崩离析，冯玉祥接受孙中山号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孙中山死后自称西北军系。但冯玉祥得罪人太狠，把北洋巨头曹锟（被囚禁）、吴佩孚（背后挨一刀）、张作霖（差点被郭松龄夺去性命）得罪了一遍。所以吴佩孚复出之后，名义上讨伐张作霖，实际对付冯玉祥。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夹击之下，冯玉祥被迫去苏联“考察”，西北军差点烟消云散。吴佩孚被北伐军打残，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在绥远五原集旧部、誓师出征。随后带领西北军出陕甘，解西安之围，策应北伐军。宁汉对立那会，冯玉祥先后会见汪精卫和蒋介石，经过一番对比之后和蒋介石结为异姓兄弟，成为蒋介石的大哥，带领西北军集体加入国民党。

阎锡山的晋军为第三集团军，盘踞在山西。阎锡山的地盘最小，但获利最多。因为阎锡山也是老滑头，是旧军阀中的新军人，新军阀里的旧军人。论阴谋诡计，旧军阀里也许只有张作霖比他更狡猾，国

军大佬之中也许只有蒋介石比他手腕更高明。他做事，总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结果。

第四集团军就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拥有两湖和广西广大地盘，声势直逼巅峰时代的吴佩孚。二人本领很大，但太过争强好胜，不懂隐藏锋芒，为蒋介石的眼中钉。

四大集团军控制了大半个中国，大约百万将士，他们讨伐的对象仅仅是残存在山东依靠张作霖存活的张宗昌和孙传芳。张作霖的触角延伸到华北，成为北洋旧系总舵主。张作霖把自己的人马改成安国军，号称百万，分成七个军团，分别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扬宇霆、张作相、吴俊生、褚玉璞为军团总司令，在河北和山东一线摆开战场。

对决

这是袁世凯粉丝和孙中山粉丝的终极对决。辛亥暴动以来，满清退位之后，国人围绕汉人精英袁世凯和孙中山博弈了十几年。袁世凯已经去世十二年，孙中山也已去世三年。凡事总有尽头，该来的迟早会来。但战争过程却相当乏味，内容和稍后的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没法比，甚至和之前的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没法比。

第一次北伐尚有武昌和南昌两场硬仗。第二次北伐，更像走过场。

一九二八年四月七号，北伐军开始进攻，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进攻京汉路以东与津浦路以西地区。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从太原出娘子关西进。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

自武汉开拔。如此大规模的军团移动，在整个历史上都罕见。

龙潭战役之后，孙传芳已经被击溃，因此蒋介石面对孙传芳和张宗昌毫无压力。但残敌如疯狗，时不时来一口。之前蒋介石下野，就是因为被孙传芳反咬一口。如今继续北伐，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打残孙传芳和张宗昌，把山东掌控在自己手中，打通南京到北京的通道。开始推进还算顺利，但是到了蚌埠附近，张宗昌反击，蒋介石的中央军竟然疲于应对！

第一集团军中，刘峙已经升为第一军军长，顾祝同升为第九军军长。两人是北伐中坚，谁表现得好，谁将面临更好的机遇。顾祝同是一个保守的人，政治上善于揣摩蒋介石的心思，因此受宠；军事上一心求稳。稳健本是好事，但凡事都有一个度。顾祝同保守过度了。

张宗昌反击之时，刘峙的第一军实力较强，正面迎敌；顾祝同的第九军侧面迂回，和第一次东征时的战术一样。但是顾祝同谨小慎微之下产生了心魔。顾祝同记得一年前蒋介石在蚌埠和徐州之间吃了败仗，被迫下野。蒋介石为推卸责任，把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枪毙了。如今自己带着第九军重新出现在这一带，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小心到一边往前推进，一边看着身后，做好随时往回跑的准备。部队前进时随时会出现各种信息，作为指挥官要做出正确的判断。顾祝同不判断，而是等待和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好比刚入股市的散户。

皇天不负有心人，顾祝同终于等来了想要的信息：撤退！想也不想就带着三个师一窝蜂往回跑，一口气往回跑了六十公里，发现没有一个敌人追来，连一个鬼影子也没见到，完全是自己吓唬自己，

官兵面面相觑，搞得很没面子。信息是假的！刘峙没有被迷住。就在顾祝同带着人马往回跑了六十公里时，刘峙带着自己的人马往前跑了二十公里，一举拿下蚌埠，风光无限！成为北伐名将！馋得顾祝同口水直流，直到西安事变之后方才找到机会压过刘峙。搞笑的是，如此顾祝同，竟然被尊为“军中圣人”。如此国军，醉了。

但张宗昌早已残废，所谓反击，不过是苟延残喘，被西北军猛将孙良诚截断退路。四月二十二号，蒋冯两军在泰安会师，并于五月一号攻占济南，孙传芳和张宗昌失去立足之地。随后孙传芳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后又隐居天津，最后被女刺客杀掉；张宗昌辗转逃亡日本，后被迫隐居北京铁狮子胡同。

北伐主战场在河北，那里有奉系主力。晋军和奉军打得火热。晋军原本不是奉军的对手，但晋军善于防守。晋军将领傅作义率领第四师附炮兵团利用奉军换防之机，从太原深入奉军腹地，一举占取涿州，给奉军造成威胁。在晋军各主力部队失败之际，傅作义以不足万人的无援之师，死守涿州达百日之久！颇有当年袁崇焕死守宁远孤城之风采。

傅作义一战成名，踏上飞黄腾达之路。

晋军虽不敌奉军，但桂系北上，加上西北军东进，彻底改变了战场局势。北伐军相继攻占邯郸、石家庄、保定、德州、大同、张家口等地，直逼京津！

五月三十号，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命令奉军撤离京津。

六月二号，张作霖再次发通电，出关！

六月四号，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

前后不到两个月时间，没经过值得一提的战争，北伐军赢得了胜利。那个时候，国民政府理论上控制长城以南的地盘，相当于崇祯皇帝自杀之前的明帝国地盘，也算战果辉煌。身为北伐总司令的蒋介石，身形前所未有的高大。要知道他是继朱元璋之后，唯一从南向北的征服者，完成了洪秀全和孙中山梦寐以求的事业。

如果民国不是在蒋介石手中沦为历史周期律的炮灰，蒋介石在帝国棋盘里将非常耀眼。对比朱元璋，蒋介石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对手只是几个残存的北洋军阀；朱元璋的对手则是蒙古帝国。同时蒋介石也是不幸的。朱元璋的事业只是在历史周期律第二个层次中运行；蒋介石的事业则牵扯到历史周期律四个层次。他面对的问题也是空前棘手。

决定和征兆

枪炮声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又到了政治扯皮时间。主战场上，西北军和桂系出力最大，但是蒋介石却决定把北平和天津交给晋军首领阎锡山，惹得李宗仁和冯玉祥很不爽。

冯玉祥和张作霖是死敌。北伐军原本有机会追剿奉军，但蒋介石放任奉军和平出关，相当于纵虎归山。西北军韩复榘部干脆自行其是，把残存的奉军缴械。

接下来怎么办呢？按照惯例，需要搞个仪式，自我宣传。

洪秀全当初视满清为妖孽，攻下南京之后到朱元璋陵墓前祭祀，以明太祖为楷模，自称不肖子孙，要驱逐异族妖孽。

孙中山曾经以洪秀全为偶像，以驱逐鞑虏为己任，临时大总统卸任之前，到朱元璋陵墓前祭祀，称神州沉沦、心痛不已。

蒋介石视孙中山为偶像，以孙中山衣钵继承者自居，取得赫赫武功，自然要告慰孙中山在天之灵。正常情况，拿下南京就应该祭祀孙中山。然而孙中山死在了北京，死后尸体被送往协和医院，做防腐处理。按照孙中山遗愿，他希望享有列宁的待遇，保留遗体供国人瞻仰。但制作水晶棺需要时间。三月底，水晶棺从苏联运到中国时，由于初期防腐处理不理想，孙中山的皮肤已经发黑，只能改为土葬。其遗体放在北京碧云寺（建于元朝）金刚宝塔的石龛内。

七月六号上午八点，蒋介石到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之祭告典礼，随行之人有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张静江、戴季陶、吴稚晖、李烈钧等三十人。尽管不久之后，他们就要再次开战，打得血流成河。但他们都打着孙中山的旗帜，都遵守孙中山的主张，又以完成孙中山的遗愿而自居。

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襄祭。

祭祀开始，主祭蒋介石第一个哭了，不是一般的哭，是突然的“抚棺痛哭”，就是趴在孙中山的棺材上拼命哭，哭得“热泪如丝”（想想那情形吧，煽情程度超过现代所有影视剧）。蒋介石身后是冯玉祥和阎锡山，他们没有趴孙中山的棺材，却也站在那里使劲揉眼睛，最后也弄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这么一哭，戴季陶等人也跟着揉眼睛、抹

鼻涕。

祭祀主题是向孙中山汇报成果（宣读祭文）：“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西山碧云寺，致祭于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方总理哀耗抵粤之时，正中正铲除陈逆驻军兴宁之日，追忆总理‘政纲精神不在领袖’之遗言，不啻对我同志永诀之暗示……”

文章出自陈布雷之手，主要阐述两个要点：

要点之一：清党很合理。

要点之二：北伐完成，需要裁军。

至于清党，虽然很残忍，虽然违背孙中山的意愿，但已是既成事实。裁军就没那么容易了。

两天之后的七月八号，蒋介石在北平行营召开善后裁兵会议，讨论裁军问题。开会的其实就是他们兄弟几个，原本应该有话好好说，然而气氛却是紧张又诡异。

冯玉祥发言：“总司令提出裁兵，无可非议，但是裁遣对象，首先应该是总司令收编的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的二十万部队，不应先裁北伐有功的部队。况且奉系还占据着东北三省，应待东北问题解决后，再裁遣也未迟。”很明显，冯大哥要把矛头引向蒋老弟。

阎锡山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兄弟，却和冯玉祥是死对头，此时也站在冯玉祥一边，慢条斯理地表态：“焕章说得对，东北三省尚未解决，裁兵应从长计议。”

李宗仁不慌不忙地说：“裁兵裨利于民，势在必行，但焕章兄所言也甚为有理。”李老弟也不帮蒋大哥说话。反正大家都不愿意裁军。

最后冯玉祥大哥甚至开起了玩笑：“总司令老弟，你的兵天天大鱼大肉大米饭吃着，身体有多棒，裁弱留强，当然得留你的兵了。希望也给我们留几个窝窝头、一两块老腌咸菜啃吧，不然就要把我们饿坏了。”

会议在大笑中结束。蒋介石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诸侯、藩镇历来是祸患呀！”蒋介石看几位兄弟是诸侯，几位兄弟看蒋介石是独裁者兼阴谋家。

蒋介石的担忧很有道理，因为四大集团军有两百多万兵，国家养不起，必须裁。而且军阀尾大不掉，是个累赘。

冯玉祥的玩笑很有道理，因为中国谈不上统一，怎么裁军，是个大问题。

同理李宗仁和阎锡山也有道理。

那么问题来了，当大家都有道理的时候，怎么办？

裁军，既是一个决定，一个必须执行的决定，也是一个征兆，一个内战的征兆。和平手腕无法解决之时，必然要战争。

六月十五号，蒋介石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

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完全统一。东北的张学良还在犹豫挣扎。国家

统一，至少应该包含东北。如此通告相当于宣布放弃东北。用现在的眼光看，说好听点，小富即安；说难听点，卖国。

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为裁军创造氛围；其二便是日本。

日本，历史的变数。变异后的日本，虎狼之国也。

饥饿的日本

一九二八年的世界，正在经济危机的前夜，如同丛林里饥肠辘辘的各种动物。

一九二八年的日本，正在经济危机之中，尤其饥饿。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号，臭名昭著的裕仁天皇继位，他是近代史上给中国带来苦难最多的人，远胜伊丽莎白女王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此君上台三个月，日本便爆发经济危机，银行歇业，企业倒闭，一片混乱，他决定转移矛盾，侵略中国。

一九二七年四月份，日本新上台的首相田中义一（明治维新之后，长州藩走出的第二代精英）为摆脱经济危机，向外扩张，召开东方会议，把“侵华”定为国策。

千百年以来，日本梦想登上大陆，受阻于中华帝国的强悍。丰臣秀吉以后，“大陆政策”便成了日本的基本国策。继吞并琉球、朝鲜、台湾之后，日本想要东北。

但当时的日本还不足以独自撕裂中国，它的策略是寻找代理人。

袁世凯死后，日本以侵华策略之“亲华”面孔出现，先押宝段祺瑞，后扶持张作霖。然而段祺瑞和张作霖均不愿受其摆布，此其一。其二，世界大战结束，英美首先支持吴佩孚打败段祺瑞，后支持蒋介石北伐。如果北伐成功，蒋介石将统一中国，那么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在中国三十多年的布局将毁于一旦。所以日本撕下“亲华”面纱，赤裸裸地迈出“侵华”步伐。

日本的目的有两层：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

所谓最高目标，便是阻止北伐军，让中国维持军阀战乱之现状，火中取栗。一九二八年五月一号，蒋介石拿下济南，赶紧表示中日亲善友好，试图防止日本干预。但日本政府还是于五月三号派兵济南挑衅。

一八九四年旅顺屠城之后，日本中日亲善的面孔伪装了三十四年，凶残本性压抑了三十四年，如今赤膊上阵，再也不用掩饰了，露出獠牙，亮出屠刀。

一八九四年以来，晚清政府尚敢和日本一战。帝国败亡，民国尚未强大，华夏尚处于历史周期律第四层低谷期，任何走上帝国棋盘的棋手都必须直面已经进化为列强的日本。辛亥暴动之后，袁世凯政府只能接受《二十一条》，段祺瑞政府不敢违拗日本。现在轮到蒋介石。

相比袁世凯和段祺瑞，蒋介石更了解日本。他在日本求学，接受日本的军事教育，甚至和日本女人搞男女关系（参见蒋纬国身世）。黄埔军校就是仿日本军校而建，校规校训仿日本军校，中央军仿日军。但是对日本越了解，就越恐惧。

五月三号，日军对北伐军开枪，北伐军反击。蒋介石委曲求全，让北伐军停火，让好兄弟兼外交部长的黄郛和日军交涉。然而黄部长的侍卫竟然被日军缴械！可怜的黄郛，号称蒋介石身边的头号智囊，在日本人面前如此可怜。中国情形，可见一斑！

日军借口两名军人在混乱中丢了命，见人就杀。早晨还熙熙攘攘的济南城内顿时尸体满街、血流成河、哭声遍地。此时蒋介石仍然顾全大局，派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江西人，老同盟会员，爱国者）去交涉，要求日军撤退。

蔡公时的交涉署被日军包围，整整一天，没吃没喝。晚上十一点，野狗一样的日军蛮横地冲进来，剪断电话线，如同野猪一般翻箱倒柜搜东西。蔡公时向带队军官抗议，强盗一般的日军把蔡公时的同事全部捆起来。蔡公时据理力争，化身土匪的军官让人把蔡公时也捆起来。

如此做法，已经超出人类社会之外。

蔡公时不堪羞辱，斥之。军官扇蔡公时耳光，试图震慑。

蔡公时不屈，骂之。日军兽性大发，把蔡公时等人全部杀掉。

对付外交人员尚且如此，可见日军之兽性。

对付如此一群野兽，已经没有道理可讲，就应该用对待野兽的办法，打断他们的脊梁骨，如同美国人的原子弹和苏联人的钢铁洪流。然而很遗憾，中国因近代积弱，缺乏钢铁，蒋介石面对的日本如同张牙舞爪的怪兽。蒋介石毫无办法，只好离开济南，避开日本人，继续北伐。

日本的最高目的没能完成，便执行最低目标。

所谓最低目标：吃掉东北。

九章 巅峰与选择

一九二八年的日本，已经成了一头饥饿的野兽，嗜血致命。

济南的鲜血并没有让日本满足。因为血不能让日本满足，日本想要的是土地。为了土地，日本不在乎流血，别人的血或自己人的血，都不在乎。

蒋介石通过清党而倒向英美。日本就着急，想要拿下东北。想要东北，首先要解决张作霖，要么让张作霖俯首听命，甘心当傀儡，要么干掉。

根据田中义一制定的政策，日本逼迫张作霖解决所谓“满蒙悬案”。那个方案要求在东北修路、开矿、办厂、移民。直白说，就是要殖民东北。日本的贪婪激起东北反日浪潮。张作霖起家受日本支持，但张作霖一代枭雄，志在争霸天下，自然不愿意当玩偶，拒绝。

一九二八年五月中旬，奉军对北伐军逐渐不支，日本数次威逼张作霖，要他答应日本的条件。张作霖依然拒绝。不仅如此，张作霖在五月二十五号发表书面声明，拒绝日本的要求。离开北京之前，张作霖依然表态：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侵犯。

既然张作霖不肯屈服，只有除掉他。除掉他的最好办法是在路上干掉他。一旦张作霖回到东北，他手上还有几十万军队，要动手，必

然大动干戈，列强不会视而不见。

河本大作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坚决主张对外扩张的少壮派。河本大作认为“一切亲日的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他精心布置行刺计划，地点选择在沈阳南部的皇姑屯，把两百公斤烈性炸药放在铁路交叉点，号称“必死之阵”。

河本大作开创了一个先例：少壮派军人冒险行事的先例，日后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到把大和民族带入死胡同。通过刺杀张作霖，河本大作名利双收，日后在“伪满洲国”敛财，抗战之后又成了阎锡山的座上宾。但他终究没有逃过命运的惩罚：最后落入共产党手中、在监狱里交代罪行，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正义没有缺席。

出关之前，张作霖也得到一些消息，三次更改行程，试图放烟雾弹，但依然没料到日本关东军会要他的命。六月三日晚六点，张作霖的列车出北京，深夜过山海关。四日凌晨五点二十三分，日军按下电钮，炸药爆炸。张作霖身受重伤，被送到沈阳时已经奄奄一息，死前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快回沈阳。”

一代枭雄，就此殒命！这就是乱世的悲哀，国人朝不保夕。即使强如张作霖，也惨遭外人之毒手。如果国家统一强势，十年之前张作霖和徐树铮联手，外东北都可能解决，还能成为民族英雄。彼此争斗的结果却是分别死得不明不白。

所以中国人就是这样，和则胜，斗则败。

评，张作霖不是好人，但很讲义气，对敌人从不手软，一辈子坑人的事没少干；但也不是恶人，大节无亏。他是一个枭雄，乱世之中，横行天下，想当救世主而不得，仅此而已。

张学良的选择

张学良未归之前，奉系要人对张作霖之死秘而不宣，只发表公报说张大元帅重伤。他们把张作霖的头部用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例摆了鸦片炉具和水果。五夫人照样浓妆艳抹、接待客人。日方探访者在卧室外观望，信以为真。

东北的命运，落到年仅二十七岁的张学良身上。

张学良生于一九零一年。那一年，二十六岁的张作霖从黑道转向白道。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正酣，张学良进入军校，被张作霖当作接班人培养。

早期的张学良属于花花太岁，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比方说他和各种女朋友的关系，混乱异常。他自己回忆说，自己原本也是一个优良少年，自从十六岁被风骚的表嫂勾引之后，就有点瞧不起女人，放纵了。他有中外各种女朋友，而且都是——用现在的话说——白、富、美。有些女朋友是有丈夫的，她们的丈夫也是有权有势之人，而且知道她们和张学良的关系，但他们做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假装看不见。

但张学良终究不是纨绔子弟。他有过吸毒史，但他凭借自身毅力，

硬生生把毒瘾给戒了，了不起。要知道对一般人而言，戒烟戒酒都有点儿难。确切说，张学良是一个自我放纵的生命体。他常常夜里自己骑摩托车从北京去天津兜风，有时间还开飞机到处耍耍。领兵打仗也行，十六岁进入奉军，戎马生涯十几年，直到“九·一八事变”稀里糊涂撤退之前，基本上没有在战场上耽误过事。

张学良一辈子干过两件影响全局的大事：东北易帜和发动西安事变。

东北易帜帮助国民党，西安事变帮助共产党。张作霖死后，二十七岁的张学良要做一道选择题：日本政府或南京国民政府。

那是一个不仅关系到张家家业，而且关系东北存亡，关系张学良历史定位的选择。当时的张学良才二十七岁，放现在估计还在念研究生或博士。

国民政府，有仇。正是蒋介石带着一帮人打败了张作霖，挫败了张作霖一统天下的梦想。如果不是蒋介石，张作霖在北京吃得好睡得香，断不会遭到鬼子毒手。可以说蒋介石等人虽然没杀张作霖，张作霖却因为蒋介石等人而遭毒手。

鬼子那边，更有仇。张作霖就是死在鬼子手上。长时间以来，鬼子阴险毒辣，无恶不作，张学良也是明白的。鬼子逼迫张学良独立，看似条件开得比国民政府高，实际是一个圈套。鬼子的真实目的是要让张学良带着东北脱离中国，充当后来溥仪的角色。

那情形好比一个女人夹在一个书生和恶棍之间。书生对女子说，做我老婆吧，不会管你太严的。恶棍则张牙舞爪、拿着大棒比划着：

你要选择俺，虽然俺刚刚杀了你家人，但是俺不会对你家庭暴力，不会虐待你。张学良就是那女子，书生是蒋介石，恶棍是鬼子。

综合比较起来，归顺国民政府，虽然在官方文件上低了一个等级，但至少可以保住东北军和张家。相信鬼子搞独立，那相当于自己跳火坑。不仅仅东北军保不住，自己也可能步老爹的后尘。最后一点，张学良是中国人。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汉奸，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都有一种天然的归属感，因为大家血液里都沉积着华夏文化的因子，尽管华夏当时处于历史低谷。

张学良改旗易帜，认蒋介石为大哥。那女子希望恶棍再来骚扰时，书生能做自己坚定的靠山。张学良希望蒋介石能帮助他对抗鬼子。然而那女子误解了书生的意图。书生娶女人回家，并不是要支持女人干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价值；而是希望女人老老实实给自己暖被窝生孩子，若不行，就把那女子扔给恶棍蹂躏，达成暂时谅解。蒋介石认张学良当小弟，最终目的也不是帮助张学良做大，而是通过张学良的东北军威慑其他兄弟，再通过日本人肢解东北军。那就是蒋介石的权谋所在，也是日后西安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号，张学良通电全国：“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五色旗下降，青天白日旗升起！

赞：张学良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保持头脑清醒，不畏境外的强权压力，捍卫了国家统一，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他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军阀，成为最独特的一个。

人生巅峰

十六年之前，孙中山在南北议和之际，想挂青天白日旗而不得，只能把它挂在自己办公室里，每每想来，黯然神伤。十六年之后，这面旗帜终于插遍神州大地，此时孙中山已经死去三年，是蒋介石帮他完成了心愿。蒋介石因此登上人生巅峰。

四年之前，蒋介石到黄埔军校上任之际，并不起眼。那时的神州大地一片乱象，军阀多如牛毛，都在为扩大地盘努力着。那时最有可能一统天下之人还是吴佩孚。那时的民国大总统还是曹锟。那时候张作霖还在关外，还在喊“联省自治”。那时候的国民政府只有广州那一片地方，广东大部分地盘还在陈炯明手上。谁也没有想到，四年之后，当初不起眼的蒋校长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人。

四年时间，蒋介石带着黄埔子弟纵横四海，褶褶生辉。他们东征消灭陈炯明，稳固广州根据地，再联合西南新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等人一路向北，灭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等人，收服奉系，可谓战功卓著。蒋介石证明了他在那个时代的最强者。

时代最强者，也是孤独者。因为他要告诉国人，接下来该往哪儿走。特别是处于历史周期律最后两层的强者，面对崭新的局面，尤其孤独。

两千年前的秦皇汉武是孤独的，因为他们统一帝国，要把帝国带向全新的方向。

一千年前的唐宗宋祖是孤独的，因为他们要推广科举制，要培养文官集团。

民国时代同样处于体制更替的边缘之上，要建立新体制。如果成功，将光照神州大地，如同帝国时代那些伟大的君王。但走错一步，就会满盘皆输。

十六年之前，当孙中山在办公室对着青天白日旗黯然神伤之际，袁世凯正春风得意。那时的袁世凯用高超的手腕赢得国内所有势力的认可。大家愿意跟着他走，视他为英雄。众人的期望，把袁世凯推到历史前沿。如果路子走对了，他将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然而很遗憾，雄心勃勃的袁世凯走错一步棋，要把大总统制服换成龙袍，最后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袁世凯时代的蒋介石更像一个愣头青，为争权夺利刺杀革命志士。十六年的时间，袁世凯的追随者没能找到出路，只留下一系列诸如复辟、贿选等丑闻，以及另外一系列诸如独裁、穷兵黩武等悲剧。国人倦了。

十六年时间，北方的沙俄变成苏联，更为强大；东方的日本进入昭和年代，在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白白浪费十六年！

十六年之后，蒋介石扛着孙中山的大旗横行天下。袁世凯的粉丝要么归附，要么被消灭。青天白日旗迎风招展。和当年的袁世凯一样，蒋介石成为天下英雄，众望所归。

正如改旗易帜的张学良所言：“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张学良信服之人，便是蒋介石。

袁世凯是军人出身，蒋介石也是军人出身。

袁世凯起于军事，蒋介石也起于军事。

袁世凯机警无双，有出神入化的政治手腕，蒋介石也是。

如果袁世凯更进一步，搞好民权和民生建设，那么他将赢得光照神州之机遇。一九二八年的蒋介石赢得同样的机会，结果如何呢？

蒋介石的一九二八年

把四年分开来看，好像还缺点什么。东征时代有几场硬仗，但规模不大。第一次北伐分别在武昌和南昌有过硬仗，规模依然不大。第二次北伐，规模足够大，但基本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也就是说，从军事角度看，蒋介石成为中国第一人的过程中，缺少真正的血与火的考验。当然喽，兵者，凶器，动一动都可能血流成河，愿神州大地永世不见刀兵。

但是历史周期律的每个层次，总是伴随着决定性战争。

政权更迭，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未见战争，意味着分配不彻底。

一九二八年的蒋介石，名义上是中国最强的人，但实际控制的地盘却还是江苏、浙江、福建和上海全境，以及江西、安徽、山东一部分。虽然是最富有的地区之一，但总面积不到百万平方公里，不足国家面积的十分之一。除关外依然在奉系之手，还有一大堆问题。

桂系控制广西、两湖，卡住长江中游，同时控制安徽、江西、河

北一部，势力范围从南段延续到北段，首领李宗仁文武双全、白崇禧精于算计，加上广西狼兵英勇善战，如果运用得当，或许能成就一番事业。

冯玉祥控制中西部广大地区和山东一部，势力从东延伸到西。西北军起于苦寒之地，久经考验，战力很强。冯玉祥是个理想主义者，对现实不满就要翻脸，先后和满清朝廷以及北洋政府翻脸。面对同样现实的蒋介石，冯玉祥能忍么？

阎锡山的晋军原本实力较弱，但因为占据平津而实力大增。阎锡山本人和蒋介石一样精于算计，狡猾如老狐狸，有好处就出来抢，没好处就龟缩到山西境内。

另有粤系盘踞在广东和福建南部，虽然实力不是很强劲，但对蒋介石一直不买账。从李济深到陈济棠，从不会让蒋介石的日子好过。

西南四川有一大堆大大小小品种齐全的军阀。

除了这些，广大地盘上还有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星罗棋布，如同星星之火。

那么蒋介石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也难，也容易。

说容易，归根到底无非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利益分配，首先要确立国家体制。当时世界主流有三种模式：英美模式，德日模式，苏联模式。

所谓英美模式，经济立国，辅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保证经济利益。中国当时很穷，国人平均寿命三十多点，而且是以农业为主。想搞贸易，必须优先发展工业。

所谓德日模式，军事立国，辅以贸易，开拓海外空间，抢地盘。当时的中国部队看见洋大人的士兵就避让，部队有量而无质。要发展军事，必须优先发展工业。

所谓苏联模式，政治立国，重新整合国内资源，也就是把土地以相对合理的方式重新分配，在这个基础上自力更生。不论整合到什么样，都要优先发展工业。

不论哪种模式，政治上都要消除内患，经济上要自力更生。

更直白点说，就是推动三民主义之民权和民生主义。

所谓消除内患，就是杜绝内战，就是解决新军阀问题。方法无非有两个：军事上，建立一个相对有效的制度，改编军队；政治上，彻底共和，上层之间和解。如此可以免刀兵。

蒋介石需要一个类似军事委员会的组织，把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张学良、李济深、何应钦等有限几人安排进来。所谓乱世军人，无非是为了个人前途或国家前途。个人前途方面，给予崇高的地位和荣华富贵。国家前途方面，让他们既有机会指点江山又不至于一人独大且可以彼此制约。

有了这样一个组织，那些笔杆子、政客再无理取闹就要掂量掂量。

有了这样一个组织，那些地方上的小军阀都要安分听话。

围绕这个组织安排四大野战军精英军官（如韩复榘、傅作义）进入黄埔军校担任教官或进入国会当议员。这些人无非为了荣华富贵，他们均有投降或投诚的履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以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裁军，方才可行。

按照蒋介石当初的处境，要做到这些很难，那个时代割据一方的军阀都想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但想收拾他们并非不可能，只要具备足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所谓硬实力，就是足够的军事实力和超强的政治手腕。所谓软实力，就是一种理想，让他们为之共同奋斗。简而言之，需要一种新体制，让大家通过战争以外的形式争名夺利。

从硬实力角度看，蒋介石控制中央政府，占领道义制高点；蒋介石拥有钱袋子，比其他人富有；蒋介石拥有中央军，拥有黄埔军校，军事实力位居四大集团军之首。至于政治手腕，蒋介石强于那个时代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人。如此态势下，蒋介石占据主导地位，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都不敢轻易开启战端。比起筹建美国的华盛顿或苏联的列宁，蒋介石的处境要好很多。比起列宁死后的斯大林，蒋介石的处境也不错。但蒋介石却演砸了。这是后话。

从政治上融合军人只是治标。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本在于历史周期律第四个层次上的没落，核心物力生产律已经从农耕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军阀也好，土匪也罢，放弃笔杆子和锄头，拿起枪杆子，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吃饭、并且在吃饱饭之后敛财。想要终结乱世，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只能是继续乱下去。它远比任何一个列强复杂。

满清以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应对，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倒台。

北洋政府在共和和帝制之间摇摆，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倒台。

现在这个问题摆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眼前，考验蒋介石的时刻到了。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大建设，建设需要原始资金和工人。这些

都可以想办法。

既然旗号是革命，可以对前清遗老进行适当清算，把那些企业、工厂、矿山收归国有，既可以聚拢资金、又可以收买人心。同时可以把裁掉的军人变成工人。军人打仗，每个月几块钱，冒着生命危险。工人上班，每个月不少赚钱，还能老婆孩子热炕头。

此时的世界正值金融危机前夕，欧美需要资本输出。如此可以掀起新一轮的洋务运动，如同日本明治维新那般。比起晚清时代，政治体制问题已经解决。

如果建设搞得好，没人愿意去打仗。做到这些，便可以彻底止乱，成为光照神州之标杆性人物。那时候离日本全面侵华尚有九年光景，英美尚且支持蒋介石。如果把九年之内的战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费用拿去搞建设，如果把那些战争中死去的无数生命变成生产工人，那么国家将由虚弱变为强壮，渐渐长出肌肉。

当然这些都是站在事后诸葛亮的立场上放的马后炮。当局者身在局中，受到很大的羁绊。当时军阀之间信任度有限。站在蒋介石的角度看，有孙中山被军阀玩弄的前车之鉴。但蒋介石忽视了孙中山搞军事，从来都是借鸡生蛋。

一九一二年的袁世凯，如果有一套方略带领国人搞建设，那么后来一系列的事都不会发生。然而他没有那么做，而是选择当皇帝。那是袁世凯在政治上犯下的致命错误。一九二八年的蒋介石犯下两个大错：一错政治（三民主义之民权），二错经济（三民主义之民生）。

两个错误把止乱变成致乱，把功劳变成祸患。要理解这一层，必

须谈谈蒋介石的爱情。 一九二六年底，蒋介石拿下南昌之后，和一千兄弟在庐山牯岭共谋大计。就在那个时候，宋霭龄和蒋介石以爱情的名义做了一笔交易。

十章 蒋介石的爱情

天地之间，阴阳互依，男女互补。男人，无论纵横天下，还是在菜场卖菜，内心中最柔软的那部分总是放在女人身上。然而世界是错综复杂的，人的感情也是错综复杂的，纵横捭阖之人的感情更是错综复杂的。蒋介石是那个错综复杂时代的佼佼者，尤其复杂。

蒋介石的第一个女人，他的原配夫人，蒋经国的母亲，叫毛福梅。她是一个很不幸却又幸运的女人。她的不幸就是在十九岁那年嫁给了十四岁的蒋介石。蒋介石对毛福梅从来没有真爱，只有伤害。她的幸运在于儿子蒋经国是个大孝子，毛福梅的欢乐和精神寄托都来自蒋经国。

蒋介石情史上的第二个女人是姚冶诚，与蒋介石同岁，父母早亡，由叔父抚养长大，后来嫁给当地一个农民。夫妻两人到上海谋生，丈夫不久就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而死掉，她在青楼中讨生活，结识了蒋介石。她虽不是名门闺秀，却也是明眸皓齿、皮肤白皙、体态丰腴。他当时也就是一个小军官，从事高危工作，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可能。他们沦落江湖，彼此吸引，彼此安慰。

蒋介石一生中，最炽热的感情给了陈洁如。陈洁如的好朋友朱逸民嫁给老男人张静江为妻。张静江是蒋介石的大哥。陈洁如常常去看望朋友，碰到蒋介石。

那是一九一九年，三十二岁的蒋介石不得志，便和大哥张静江一起在上海干投机生意，某日在大哥家看见一位窈窕淑女——年仅十三岁的陈洁如，日渐冷漠的心突然开花，立刻开启攻势。蒋介石经历过很多女人，但多半是风尘女子，少女那曼妙的羞怯很少触及到。于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眼前的女孩弄到手。接下来的情节比较老套，蒋介石送人家回家、又是跟踪、又是约会，又是把张静江请出来做工作，把追女孩的一招三式（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反复施展，却始终没有打动陈洁如。直到一九二一年，陈洁如的爸爸死了，家中没了顶梁柱。蒋介石闻讯之后，直接穿孝服吊丧，帮助母女料理丧事！直接把自己当陈家人了！孤儿寡母仿佛有了依靠，就接纳了蒋介石。

新婚之夜，蒋介石向陈洁如说出了平生三个梦想：一，娶陈洁如为妻；二，得到孙中山赏识；三，将全国统一于一个中央政府之下。

在对着佛祖发誓爱陈洁如一生一世一辈子之后的第七年，蒋介石的梦想全部实现了，但他却又对着《圣经》发誓爱宋美龄一生一世一辈子。

其实陈洁如是个不错的女子，当她还是一个花骨朵时，就走到了蒋介石身边，在他身边完成人生的绽放。她的娇羞，她的绚丽，完全给了蒋介石。就一个历经过花花世界的中年男人而言，该满足了。然

而蒋介石并不是一般的男人，他要纵横天下，他还需要从他的女人那里得到资源。陈洁如缺乏那些，而宋美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家族。

宋家三小姐

民国时代，宋氏家族的名头很响。缔造者宋嘉树原本姓韩，原名韩教准。韩家世代农民，穷得叮当响，生活难以为继，韩教准跟了堂舅，改名宋嘉树。堂舅在美国做茶叶生意，他去美国，有了读书的机会，后加入基督教，成为一名牧师，回国传教。

宋嘉树在传教过程中遇到过很多优秀的人物，比方说胡适。但宋嘉树的传教事业并不愉快。因为耶稣基督的解释权被西方教士垄断了，黄皮肤的宋嘉树受到排挤。郁闷的宋嘉树为教会印刷《圣经》，歪打正着，淘得人生第一桶金，然后又创办了书社，然后又参与创立基督青年会，还搞了一个面粉厂，自己当了老板。总之是发财了，娶大学者徐光启的后代倪桂珍为妻。

宋嘉树能在那样一个时代逆流而上，很不简单。他和张静江一样，对孙中山一见倾心，支持孙中山搞革命。至于原因么，可以说是理想：想要一个民主新中国；也可以说是现实：看好孙中山，准备搞风险投资。然而宋家后来之所以比张家显耀，倒不是因为宋嘉树比张静江厉害，而是宋嘉树生了三个了不起的闺女：鼎鼎大名的宋氏三姐妹。她们不是一般的女孩子，而是精通数种语言、能玩数种技艺（钢琴什么的）、拥有高超的社交水平、懂得东西方礼仪、并且视野开阔的新女

性。她们或许不是最漂亮的，却是最有魅力的。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她们把几个男人联系到了一起，形成那个年代中国大地上最有权势的关系网。

宋霭龄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卫斯理女校，精通好几种语言，拉得一手绝妙的小提琴，回国后当了孙中山的秘书。宋霭龄对孙中山有好感，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宋霭龄考虑再三，决定嫁给中年丧偶的孔祥熙。她看中他四个特点：名门之后（孔子七十五代孙），名校毕业（耶鲁大学），非凡的敛财能力（笑着就把钱的事弄好了），脾气好（听她的话）。

宋庆龄接替了宋霭龄的工作，并最终和孙中山走到了一起。宋霭龄和宋庆龄条件相当，孙中山为啥爱上了宋庆龄而非宋霭龄？这是一个比较无聊的问题，但对宋家非常重要。宋霭龄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精于算计。宋庆龄身上理想色彩比较浓，和孙中山比较对路。从世俗立场看，还是宋霭龄更适合孙中山，因为宋霭龄更为务实。

宋霭龄嫁给了孔祥熙，孔宋两家联合，威力无穷，孔祥熙很快从富裕变成巨富。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孔宋两家都获得了极大的利益。特别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以连襟和大舅子的身份混得风生水起。在大姐获得财富、二姐获得地位声望之后，美貌、才华均不差、眼界和欲望更高的宋家三小姐怎么办？

宋美龄，生于一八九七年，比大姐宋霭龄年轻八岁，比二姐宋庆龄年轻四岁，比蒋介石年轻十岁。一九零八年，十一岁的宋美龄和十五岁的宋庆龄去美国念书。一九一七年，二十岁的宋庆龄回国。从此

之后，宋家三小姐就成了一个大大的问题，嫁给谁？

放眼整个天下，比孔祥熙更有钱的难找，比孙中山更有威望的更难找。开始谁也没想到那个人是蒋介石。一九二一年，蒋介石费尽千辛万苦把陈洁如娶回家，老家还有大老婆毛福梅和小老婆姚冶诚。宋小姐是绝对不会给人家当小老婆的。

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兵变，蒋介石去救驾，赢得信任；随后在孙中山的寓所中遇见宋美龄。蒋介石突然意识到，宋美龄才是当老婆的人选。当时宋美龄二十五岁，陈洁如十六岁。论风姿、论学识、论见识，宋美龄完胜。论家族力量，云泥之别。有了宋美龄，相当于有了财富，相当于和孙中山成为一家人。要一统天下，就要有一个像宋美龄那样的女人当老婆。

当时的蒋介石只是一个小军官，奔四了，脑袋上的头发越来越少，有过三个老婆，数个情人，女人数量未知。他最大的资本也就是刚刚赢得孙中山的信任。而孙中山信任的人有很多。按照那个条件，蒋介石没有任何指望得到宋美龄。蒋介石让孙中山代为向宋美龄传达爱意，直接在宋庆龄那里就卡住了。理由是蒋介石的生活过于荒唐（实情）。

然而蒋介石是那种一旦认准了目标就会拼命实现的人。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就创造条件上。此后的几年里，蒋介石创造了如下条件：成为黄埔军校校长，两次东征搞定孙中山的死敌陈炯明，奠定广东革命根据地。随后挥师北伐，赢得半个中国，以火箭般的速度上升。一个地地道道的强人形象诞生了。

论财富，一场战争打掉的炮弹比得上孔祥熙半个大院子。

论威望，蒋介石虽然比不上孙中山，但是比孙中山打下更大的地盘、指挥更多的军队，也就是说比孙中山更有权势。

而此时的宋美龄则奔三去了，正在贬值。蒋介石不满四十岁，花朵一样的年纪。

此消彼长之下，蒋介石有了娶宋美龄的资本。宋霭龄也看到了局势的走向，察觉到蒋介石将成为孙中山之后的领袖。宋霭龄看中时机，下请柬邀蒋介石夫妇去做客。时间是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

一九二六年底，北伐军攻下武汉，蒋介石就迁都问题和中央闹得不愉快。那是蒋介石一辈子最为关键的时候，他正在和一帮兄弟们谋划如何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他们所有的策略很完美，但是他们需要一样东西：钱，很多钱。

不论是张静江、黄郛，还是陈氏兄弟，都没有那么多钱，也没法筹集那么多钱。

这个问题将由宋霭龄解决。宋霭龄也不会自己筹钱，但可以让宋子文去筹。宋子文可以打通江浙财阀。有了财团支持，钱的问题就解决了。

宋霭龄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宋霭龄负责把弟弟宋子文从汉口拉到蒋介石这边。当时宋子文是武汉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因为武汉政府继承了二姐夫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二姐宋庆龄也支持武汉中央政府。蒋介石虽然战功显赫，终究是个“外

人”。但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后，蒋介石就成了宋子文的妹夫，和孙中山同样的地位。孙中山死了，蒋介石活着。所以为了宋家利益，宋霭龄把宋子文拉到了蒋介石这边。

联姻之后，大家就是一家人，在中国这口大锅里，肉要自己人先吃：让耶鲁毕业的孔祥熙当行政院长；哈佛毕业的宋子文当财政部长。蒋介石一拍大腿，就这么定了，娘希匹。

于是当初反对宋庆龄嫁给已婚老男人孙中山的宋霭龄全力撮合宋美龄嫁给已婚老男人蒋介石。那是一桩政治婚姻，在宋霭龄的操纵下，宋美龄开始对蒋介石有了感觉。因为心比天高的宋家小姐需要政治舞台。

宋美龄的个人条件就是：四十岁的蒋介石只能属于她一人。

派头

接下来蒋介石首先回到老家，从原配毛福梅那里拿到离婚手续，然后把姚冶诚送到苏州。至于陈洁如，她要去更远的地方——美国。

蒋介石告诉陈洁如，他并不爱宋美龄，但是必须要完成这桩政治婚姻。因为没有宋家的帮助，他的南京政府就不稳定。如果南京政府没了，那么他也不活了，到时候陈洁如仍然得不到他的人。所以他需要她去美国进修，去五年，学知识，充实自己，完成梦想。五年之后他一统天下，她再回来和他生活，继续他们的爱情。

五年之后，蒋介石并没能搞定中国。陈洁如回国之后隐居在上海。

共和国诞生，陈洁如当选为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晚年移居香港。陈洁如等了蒋介石一辈子，晚年时给蒋介石写信：“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唯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可谓字字千斤、字字真情、字字见血。

一九七一年，陈洁如死在香港。你心中只有天下，我心中只有你，先走一步了。

送走陈洁如，蒋介石终于把家中的房子清空了，他决定在情场上大干一场，如同战场上那样。他要向宋家小姐展示自己的不同。

二十六年之前，十四岁的蒋介石在疑惑的目光中迎来十九岁的老婆。那时候他还是一个顽童，根本不知道老婆的含义。

十六年前，二十四岁的蒋介石自己选择了一个老婆，姚冶诚。

六年之前，三十四岁的蒋介石把感情给了陈洁如。那时候，他还不是一个成功者，还没有资格摆谱，也没有实力对自己的女人展示自己。

如今，他已经拿下半个中国，坐拥东南，要枪有枪，要人有人，终于能和自己追求了五年的女人约会，那么自然要摆谱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号，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一个月之后，南京和武汉正在剑拔弩张的时候，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镇江第一次约会。

下午三点钟，镇江东站，警察依次排开，形成一道惹眼的警戒线。蒋介石光头配西装，在站台上等候，身后站着大大小小的公务员。宋美龄的列车车厢正好停在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快步走进车厢，向宋美

龄亲切地打招呼。随后两人一起下车，步入高级轿车中，向江边驶去。一路上明警暗哨，阵势袭人。

什么叫牛？这就叫牛。现在富家公子哥追求明星，搞一个车队啥的就让报纸尖叫好几天。在半个世纪之前的蒋司令面前，简直是太寒酸了。

蒋介石这么干也不是显摆，他是要告诉宋小姐自己的大腿足够大，足够你和你的家族依靠。耀武扬威之后，就是柔情蜜意了。二人一起去了位于江中央的焦山。山上有大庙，庙里有大和尚。五月时节，天气不冷不热，正是约会的大好时节。

蒋介石向宋美龄展示了他写诗的才华。当然那些诗多半出于陈布雷之手。宋美龄见惯世面，但还是被蒋介石的“诗歌”吓了一跳，因为她从来没听过蒋介石能写诗。此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就算确定了关系。两个月之后，蒋介石在斗争中下岗。下岗中的蒋介石并不悲伤，他首先给宋美龄写了一封情书，说自己现在一无所有、无牵无挂了，只有她的爱情才是价值连城的。

二人的婚姻中还有一个障碍，就是宋老太太倪桂珍。倪桂珍是虔诚的基督徒，讨厌杀伐。当初宋庆龄私下去日本找孙中山已经把老太太气得不轻，如今宋美龄又要干同样的事，她是坚决不会同意的。为避开蒋介石，倪桂珍带宋美龄去了日本东京，蒋介石追过去。倪桂珍又带着宋美龄到镰仓，蒋介石又追过去。倪桂珍实在跑不动了，也感动于蒋介石的执着，心想年轻人的事就让年轻人去解决吧。于是倪桂珍见了蒋介石，给了蒋介石一本《圣经》，好好看看吧，年轻人。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号，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婚礼分两次进行，一次私下里以基督教礼仪进行，另一次是公开的，以豪华的中式婚礼举行。

婚礼是在上海最豪华的地方以最豪华的方式进行的，号称世纪婚礼。

参加婚礼的人士包括政客、军人、墨客、青帮大佬、知名人士，冠盖云集，五毒俱全。

又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基督徒。

政治与爱情

蒋介石的婚姻把蒋家、宋家、孔家联合在一起，形成民国后半期最具实力的关系网。

对孔家而言，孔祥熙更加充分地发挥其敛财本领，化国为家，把大批的美援搬到自己家里。国民政府虽然不在了，孔家的财富还在。最后巨富而死，悲哀。

对宋家而言，宋美龄嫁给了一个成功的男人。尽管那男人不再年轻，但是他可以给她提供一个舞台。在那个舞台上，她赢得一个自我绽放的机会。幸福不仅仅是嫁给一个有权有势呼风唤雨的丈夫，更重要的是，自己要有自己的事业。

真正的受益人还是蒋介石。

在那段政治婚姻里，蒋介石赢得一个美人。她不仅拥有美丽的外

表和显赫的身家背景，还有惊人的政治头脑。她不仅把他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还以第一妇人的身份把南京政府高官显贵的夫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看哪个将军有前途，直接去当媒婆。比方说陈诚同志，就是宋美龄把自己的干女儿介绍过去的。当然也有不成功的案例，比方说胡宗南和陈明仁。

在那段政治婚姻里，蒋介石赢得宋家的支持。宋子文从武汉政府跳到南京政府，打通蒋介石和江浙财阀的通道。江浙财阀做空了武汉中央政府，使得武汉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从此之后，江浙财阀就成了蒋介石的钱袋子，打仗伸手，不打仗也伸手。宋家丰富的关系也给蒋介石带来好处。比方说，张学良和宋家关系也很好，蒋介石劝张学良归顺中央政府，最初就是通过宋家的关系联系上的。

在那段政治婚姻里，蒋介石成了孙中山的连襟，更有理由继承孙中山的革命法统。日后挟中央以令军阀，玩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了。

在那段政治婚姻里，蒋介石找到一种通往英美的途径。从黄埔建军到北伐胜利，革命军的外援都是苏联。英美支持直系的吴佩孚和孙传芳，日本在东北支持张作霖。蒋介石北伐，搞定了吴佩孚与孙传芳，用胳膊和大腿把孙传芳的地盘抢到手。英美的主要利益都在长三角一带，谁占了那地方，他们就和哪位合作。蒋介石和英美达成谅解，便转头反苏反共，民国再次撕裂。美国成为横在中国的一座大山。如今台湾问题的主要障碍还是美国，因为台湾问题而牵连出的南海问题，都是美国。

恰好因为那个政治婚姻，拉开蒋介石一生一系列致命决策之帷

幕，开启止乱到致乱之转折。顺便多说一句，政治婚姻也可以有爱情。

九年之后的西安事变把南京的达官贵人炸成两派：何应钦想强硬，宋美龄想和平。当宋美龄低声软语恳求何应钦不要那么粗鲁，何应钦则斥责宋美龄曰：“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个什么，只知道救丈夫！国家的事，你不要管！”宋美龄则回应：“以后我要你这个姓何的瞧瞧，到底是女人家懂得什么，还是你这个臭男人懂得什么！”说完之后，宋美龄擦干眼泪，开始一系列反击。宋美龄首先争取人马，和何应钦的主战派对抗；接下来和英美达成谅解。更狠的一招，深入虎穴求虎子，亲自去西安解救蒋介石。

宋美龄利用和张学良的私人关系，以私人的名义去西安。当时的蒋介石正在审时度势，一边和张学良软磨硬泡，一边感叹世态炎凉。听说宋美龄要来，蒋介石心中一热，心想还是夫妻靠得住；转念一想赶紧传信曰：千万不能来啊！宋美龄还是来了。宋美龄出现时，蒋介石感动得老泪横流。那一刻的宋美龄是了不起的女人，更是一个勇敢的妻子。

宋美龄告诉蒋介石，南京那边暗流涌动。蒋介石警觉起来。宋美龄在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得两个已经化身为公牛的男人开始沟通，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正如宋美龄所言，西安事变之前，他们之间只有政治婚姻，西安事变之后，政治婚姻经受住了现实考验，有了爱情。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最大影响是让他变成基督徒。

宋家因基督起家，满门基督徒。宋老太太也希望蒋介石皈依基督，

还送了蒋介石一本《圣经》。宋美龄找到机会就向蒋介石灌输宗教思想，宣扬基督教义。蒋介石比较传统，年纪又大了，习惯早睡早起。宋美龄喜欢晚睡晚起，但为了帮助蒋介石修习《圣经》，宋美龄还特意改变了作息时间，拉着蒋介石作祈祷，读《圣经》，时不时找牧师帮蒋介石解惑。

通过宋美龄的努力，一次机缘巧合（倒戈将军石友三投靠蒋介石又背叛，炮击南京，据说蒋介石因宋美龄的一个梦而避开险境，被认为上帝显灵）之后，一九三零年十月二十三日，蒋介石成为基督徒。要知道华夏文明自始皇帝开始已经完全世俗化，帝国时代信仰宗教的皇帝们寥寥无几，北洋巨头们也不是宗教信徒，共和国领袖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有意思的是民国的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马英九都自我宣称是基督徒。

原始的基督思想是救世，爱世人，必要时牺牲自己。然而信基督的人却并没有做到，各个教派之间的战争历时千年，杀戮无数。蒋介石成为基督徒的过程恰恰是他一生杀戮的开始，由止乱变成致乱，也是莫名的讽刺。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对革命党痛下狠手，试图把追随孙中山的人赶尽杀绝，由此造成无穷战乱，最后以北洋政府垮台而告终。但战胜北洋军阀的蒋介石并没有吸取教训。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试图把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连根拔起，由此造成无穷战乱，战争持续了二十二年，最后以国民政府垮台而告终。

第三篇 致乱之祸

所谓历史周期律运转，本质上就是一个止乱和致乱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很复杂，牵扯到很多人和事。但仔细研究下还是有规律可循：所有历史风云人物都在止乱和致乱中演绎人生，凡是只能致乱而不能止乱之人都成了历史的炮灰。

所谓历史周期律之炮灰律，简单点说，就是新阶层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中会释放很多毒素，会让处于风口浪尖的个人或组织中毒倒下。个人比如项羽，比如黄巢，比如李自成。组织比如秦，比如隋，比如民国。

民国有些特殊。按照炮灰律的一般运行，北洋军阀的崛起和灭亡已经足以吸收帝国更迭时的毒素。蒋介石北伐成功，相当于重建民国，止乱之功足以让他彪炳史册。如果处理得当，民国还是有前途的。然而很遗憾，止乱变致乱，功劳变祸患。

当蒋介石率领北伐军以风卷残云之势向前推进，声势如同当初的袁世凯。辛亥暴动之后，袁世凯赢得一切，却又输掉一切。十多年过去，蒋介石重复了同样的故事。

一九一三年的袁世凯试图清理国民党，结果南北分裂，动乱民国。那个时候的蒋介石也是受害者之一。十多年之后，蒋介石的杀气比袁世凯更重，犯下的错误比袁世凯更为致命。

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还没有统一全中国便对共产党举起屠刀。袁世凯清理国民党，还没有大开杀戒。国民党痛定并没思痛，而是将更大的暴力施加于共产党。

如何利用历史周期律解释这些呢？所谓历史周期律运行，所谓止乱和致乱，不过是一个政权取代另一政权，一种体制取代另一种体制。

当初慈禧太后终结维新变法，是因为维新党人推崇的“君宪”和“君主专政”相差甚远。

袁世凯清党，是因为国民党捣鼓宪政和共和，与他骨子里的“君权梦”相差甚远。

蒋介石是地道的革命党，以孙中山粉丝自居，怎么也去清党呢？
答曰，历史周期律第四层运转，必然把一切推倒重来。

一章 梦想缺失：致命的失误

一九二二年，经历中山舰陈炯明叛乱之后，蒋介石赢得孙中山的信任，代表孙中山去苏联考察，寻求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据蒋介石自己回忆，当初他对苏联模式并无好感，但从全局考虑，没有透露任何个人情绪，依然和苏联合作。

一九二五年，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性，蒋介石于第二次东征之前送蒋经国去苏联留学。蒋经国在苏联加入共产党，并且娶了一位苏联老婆，生下中苏混血儿。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打败陈炯明之后，搞出中山舰事件，结果汪精卫见风向不对出走，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妥协，蒋介石摸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底。

一九二六年底，蒋介石打下南昌，在庐山牯岭等来他的兄弟们。黄郛告诉他“离俄清党”，戴季陶写下《离俄清党谋略纲要》，张静江一边和武汉政府打嘴仗一边建议：清党的事交给陈果夫去办。他们一起定下计策：定东南，清党，反苏亲英美。

大致在相同的时间，蒋介石和宋霭龄谈妥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政治婚姻，把蒋介石的枪杆子和江浙财阀的钱袋子联系在一起。

一九二七年春，蒋介石拿下长三角，定东南成功，相当于有了一份家业，有了枪杆子和钱袋子，接下来就是清党。

所谓清党，名义上清理共产党，实际上连国民党左派一起清理。

所谓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就是革命积极分子。

所谓革命积极分子，在不同时代又不同。满清和北洋政府时代，张静江、戴季陶、吴稚晖、包括蒋介石等人，都是革命积极分子，属于被清理的对象。到一九二七年，他们的旗号还是革命，但已经变成保守派，开始清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国共双方虽然都是闹革命，但方式完全相反。

国民党主张自上而下的精英革命。也就是商人出钱，文人出笔杆子，革命者买武器。至于社会基层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一边待着不要动，围观看戏即可。

共产党走大众革命路线，主张从下而上闹开，把基层的工人农民

组织起来，闹他个天翻地覆。如此便妨碍了江浙财阀和欧美列强赚钱。

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离得近一点。

孙中山一辈子走精英路线，虽然把朝廷折腾没了，但三民主义的民权和民生遥遥无期，梦想如同镜中花水中月。不是孙中山不努力，不是孙中山身边没有人才，而是历史趋势使然。

爱新觉罗家族退出历史舞台，因为清帝国已经被历史淘汰。

康有为和袁世凯的失败，因为君权梦已经落伍。

宋教仁被刺杀，新时代的政党政治梦破灭。

孙中山郁闷了一辈子，皆因他的路子仅仅局限于精英阶层。历史转折关头，精英很重要，但仅仅依靠精英已经无法解决问题，因为这片大地上的主体人群是农民和工人。要改变主体人群的命运只能靠他们自己，神仙不能，皇帝也不能。精英阶层能做的就是历史大潮中扮演引领者的角色。任何违背主体人群崛起的个人或组织都将被淘汰。所以慈禧太后绞杀维新变法，试图巩固帝制时，朝廷便不可避免地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她在往回走。所以袁世凯试图带着民国往回走，让站着的人下跪时，便众叛亲离，因为他在往回走。

因为在历史周期律第四个层次上，农业帝国相对于工业帝国是普遍意义上的、根本意义上的、绝对意义上的落后，加上中国体量如此巨大，不是一两波精英努力就能解决的。论勇敢，爱新觉罗家族也有勇敢的人，看看咸丰皇帝，同时和太平天国和列强作战，看看光绪皇帝，也敢发动维新变法。汉族精英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是难得一见的帅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均有非同寻常的思维高

度。然而他们都没能依靠精英的力量解决帝国的难题。

孙中山晚年试图从精英路线转向大众路线，和苏联合作，和共产党合作，创建黄埔军校，闹得热火朝天。孙中山活着，大家没法说。孙中山死后，左右两派斗得天昏地暗。

孙中山死前，列宁死了，苏联和第三共产国际的领导权落到斯大林手中。列宁是一个有着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曾主张废除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只是中国当时内乱，错过千载难逢之机遇。斯大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着浓烈的沙文主义色彩，开始对各国输出共产主义革命，其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与英美背道而驰。

蒋介石看到巨大的运作空间。他的方式很简单，调转枪头，镇压下层讨好精英，相当于用枪杆子换钱袋子，重走精英革命路线。国际方面和苏联翻脸，与英美达成谅解。

慈禧太后往回走，绞杀戊戌六君子。袁世凯往回走，杀革命党。蒋介石往回走，杀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三人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方式不同，但本质都是往回走，结果都是导致更大的动乱，自己被历史淘汰。这叫天下大势，逆之则亡。

当初谭嗣同死后，汉族精英不再和朝廷合作，帝国命运已定，但无人能阻止慈禧太后的决定。当初宋教仁死，南北精英难以合作，南北对立不可避免，但无人能避免宋教仁被杀。

孙中山死后，民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把革命进行到底，打破帝国千年以来造成的精英和凡夫阶层的隔离，唤醒古老的中华民族，才可以全方位建设民国。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方能从历史周期律第四个层次

的低谷中慢慢爬上来。站在当时的历史看，应该把国共合作进行到底，同时发动精英和凡夫阶层的变革。当时国民党占据主导地位，孙中山之后唯一有可能继续推进国共合作的人是廖仲恺，但廖仲恺却不明不白地被刺杀于国民党党部大楼前。中山舰事件证明汪精卫根本无法独当一面，所以蒋介石和兄弟们在庐山密谋，已经没有人能阻挡他们，正如没有人能阻挡绞杀维新变法的慈禧太后与清理革命党的袁世凯。

清党，势在必行，致乱不可避免。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协助指挥东路军的白崇禧逼近上海。但那个时候上海已经落到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手中。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之后回到上海党中央，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和江浙区委军委书记，把精力放在领导工人纠察队武装起义上。当时共产党还处于国民党领导之下，工人纠察队拿下上海之后准备欢迎北伐军入城。

但白崇禧的部队并没有入城。白崇禧在等待蒋介石，和蒋介石策划于密室，定下清党战术。具体过程分成三步走：黑帮挑衅，军队出动，图穷匕首现。

刀光

帝国时代以农耕为主，上海并不显眼。列强带来海洋文明，上海扼守长三角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开始展露。那时的上海滩乌云密布，龙蛇混杂。有一种人介于龙与蛇之间，他们就是黑帮大佬。他们起于蛇中间，体型庞大如巨蟒，样子有点像龙，但永远成不了龙。似龙非

龙的人物中，又以黄金荣和杜月笙为最。当初蒋介石在上海滩还向黄金荣送过拜老头子帖。

和所有人的印象一样，黑帮大佬通常心狠手辣。和所有人印象不一样的是，他们面善且精明。比方说杜月笙羽翼丰满之前，放下身段投入黄金荣门下；壮大之后又可以放下身段和当时的无名小卒戴笠结为兄弟。蒋介石在庐山谋定之后，便决定使用黄金荣和杜月笙。他们也乐意为蒋介石所用。黑帮看场子收保护费，共产党要为工人谋福利，两者水火不容。

蒋介石打着革命的旗号清党，当然不能上来就砍杀。他要用黑帮为导火索，用“劣币驱逐良币”之手腕达到目的。四月十二号早晨，黄金荣对门徒说：“价码嘛，一个人头十块银元。”杜月笙对门徒说：“今天的事，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唯有尽力。”

随后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徒子徒孙就出动了，那或许是上海滩黑帮最大的一次集体行动。他们之间的利益原本也是盘根错节，但在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时却团结一致。他们在自己的胳膊上缠上白布，从租界出发，到总工会搞事，遇到工人纠察队的反击。

杜月笙和黄金荣那种人，欺负一般人是可以的，和有头脸的人搞关系也是可以的，偶尔刺探情报也是可以的，对付有组织的硬势力是不可可以的。工人纠察队就是他们对付不了的，搞事的结果是碰了一头疙瘩。

蒋介石也没指望黑帮能搞定工人纠察队。他们只是诱饵，闹事的，给附近的军队提供了参与进来的借口。埋伏在周围的二十六军出现

了，借口非常动听：调解纠纷。

怎么调解呢？就是把双方的武器都收了。工人纠察队在第三次起义时，从军阀那里缴了很多枪，手中有武器。此时军队在纠察队眼中还是同志，以为军队了解情况之后会秉公处理，毕竟大家都是站在革命大旗之下的嘛。

然而二十六军领导白崇禧说工人内部搞不好，出了乱子，所以缴械。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工人素质低，野蛮爱闹事，要好好管管。

——赤裸裸的栽赃陷害！工人再次罢工走上街头，要求惩罚凶手。

向谁提要求呢？蒋介石！

此时大家还没有明白蒋介石才是整个事件背后的总设计师。此时蒋介石正让周凤岐镇压工人运动。于是军队向游行队伍开枪了，然后就是流血满大街！

这就是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号的事，史称“四·一二政变”。

流血事件仅仅是序幕。因为故事的主角，蒋介石，还躲在幕后。

两天之后，蒋介石从幕后走出来，现身了，出手了，而且是重手，宣布抓捕共产党。

白色恐怖时代来了！

凡是共产党，抓住之后，要么杀掉，要么宣布脱党。许多共产党精英死于非命，比方说毛泽东的同窗好友蔡和森被钉死在监狱的墙上，比方说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在监狱中被乱刀砍死。残酷程度，连当初的清政府也自愧不如。

蒋介石动作之迅速，力度之大，效率之高，动作之熟练，堪称典

范。其实早在一年前已经在中山舰事件中演习过一次了，只是那次他干得比较隐蔽，没有暴露出来而已。直到清党之后，大家才反应过来：哦，原来蒋介石心机如此之深，手腕如此之高。

那段时间究竟杀了多少人，现在已经搞不清楚，据斯诺统计，人数在五千到一万之间。英国作家韩素音回忆，一周之内就杀掉八千人。更多的共产党人被迫脱党，比方说姚文元的爸爸、左翼作家姚蓬子就是其一。日后姚文元因为这事给了姚蓬子不少白眼。

杀人尚在其次，关键在于手段之残忍。如果是军队抓人杀掉，或许还痛快一点。最可恶的是黑帮。所谓黑帮分子，平时就是经营吃喝嫖赌抽那些见不得人的营生。白色恐怖期间，他们耀武扬威，把人家的男人抓住杀掉，把人家的妻女送到血汗工厂和妓院，丧尽天良！他们以最人渣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同胞，猪狗不如。

最搞笑的是，坏事干尽的杜月笙还成了英雄，成了蒋介石口中的社会中坚。不仅如此，在上海的欧洲女人也觉得杜月笙特别有雄性魅力。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乱世之中人不如狗。人模狗样之辈，多半是不干人事。建国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虽然也带来很多负面因素，但是在铲除黑帮的问题上，绝对没有任何错误。对于那些曾经对同胞满手血腥的人渣败类，就要打断他们的脊梁骨，扔到野地里去喂狗。因为他们本来就猪狗不如。

晚年扫大街的黄金荣是否想过因果报应？如果他想过这个问题，那么他就应该很庆幸，他得到的惩罚非常轻微。抗战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当上海市市长。蒋介石不鸟他，直接让擅长捞钱的钱

大钧当市长。还学共产党的手法，让人在车站贴标语：“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搞得杜月笙回上海时改站下车。后来杜月笙竞选参议长，撒了大把银子，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冷眼，赶忙在当选之后辞职不干。晚年的杜月笙愤愤不平：“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听起来好像很不爽。实际上蒋介石已经对他很客气了，还把他当夜壶用一用，用完后还塞到床下，而不是直接砸了、扔掉。

劫难

——那是蒋介石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其影响超出东征、北伐、抗战等任何一个决定。那个决定中，蒋介石把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充分曝光。他的聪明和愚蠢，一览无余。

精明之一，通过清党，蒋介石赢得钱袋子，赢得英美支持。

精明其二，通过钱袋子，打败了汪精卫和其他竞争者。比如通过经济战争整垮了汪精卫的武汉中央政府，再比如李宗仁和白崇禧虽然把蒋介石整下岗，却无法筹足钱。

不仅名利双收，而且抱得美人归。一时之间，世间好事仿佛被他一个人占完。那一年，蒋介石四十岁，不惑之年，到达人生巅峰，可谓春风得意。

然而世事如硬币，都有正反两面，祸福相依，利弊共存。至于说愚蠢，通常认为，蒋介石通过清党让共产党大受损失，党员由六万多人变成一万人。但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他们学会使用枪杆子，四处起

义，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终于在二十二年后赢得最终的胜利。但这只是表象。蒋介石真正的愚蠢在于清理国民党左派。

人，得意就会忘形。忘形之下的蒋介石失去了控制，连同国民党左派一起杀戮，妄图把共产党人赶尽杀绝。然而因为做得太绝，导致如下一个结局：摧毁了国民党的根基。

清共，最大的难题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陈立夫当时想出一个办法：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要他们相互打斗，从中判断共产党。是不是很儿戏？这还算比较文明的。看看野蛮的部分：平日思想比较激进的国民党员和老百姓，均被怀疑为共产党，清理掉。要知道那是革命年代，大家都是很激进的。

广州清党：军警将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装的，一律当共产党逮捕，什么情况？更过分的是，凡是头发向后梳的（当时比较潮的发型），一律当共产党逮捕。

上海清党：清党委员会由不相干的人负责，看哪个不顺眼，干掉再说。那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不负责任的杀戮。

当时国民党正在夺权全国政权，士气正旺，基层党员大多数思想左倾。各地土豪劣绅借机报复。越是忠实的党员，遭遇越惨，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要么被杀戮，要么被驱逐，要么被迫害，要么心灰意冷。

一九二八年，清党一年之后，江苏省（国民政府所在地）国民党登记党员的情况：只有两成党员重新登记。广东省（革命故乡）：百分之三十五的党员重新登记。广州市（国民革命核心之地）：只有一

成党员重新登记。汉口（辛亥革命发源地）的情况：六分之一的党员重新登记。长沙，基本没剩下。清党之前，国民党全国党员在百万以上，此时只剩下不到三成。这个数字还包括清党开始之后乘机加入国民党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投机倒把分子。比方说四川，清党那个时候的党员反而变多了，因为各种投机分子来了。

看到了吧，在清党中损失的国民党远远多于共产党。更糟糕的是，共产党的精英骨干保存完整，国民党有气节之士则损失殆尽，国民党基层组织毁于一旦。

清党，摧毁了国民党的魂魄。数十年以来，国民党培养的中下层精英毁于一旦。孙中山如果地下有知，定然眼睛睁得很大。如果说中共历次肃反、整风、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都有整人，都有迫害自己人。但是所有破坏对共产党的影响加在一起，也不如蒋介石清党对国民党的损害大。清党把国民党左派摧毁，造成国民党的活力丧失殆尽，

蒋介石为何剿共总是失败？原因很简单，国民党摧毁了自己的基层组织，相当于把基层全部让给了共产党。蒋介石动辄数十万大军，看似威风凛凛，却拿毛泽东几万人没办法。因为蒋介石失去了基层。基层之中的毛泽东，如同蛟龙在大海中。

更致命的是，国民党从此断了一条腿。任何一个党派都需要讲平衡。简单说，就是左派相对激进，右派相对保守。两派综合，方才是一个成熟的政党。如果没有右派，左派会成为一团火，把一切烧成灰烬。比方说共产党搞的大跃进和文革，都是在绝对左派名义下进行的，破坏力前面已经说了。同样，如果只有右派，不好意思，政党就会腐

朽堕落，失去生命力。

清党之前刘峙还是猛将、福将、飞将军，日后娶了莺莺燕燕的小老婆，堕落成长腿将军、酒囊饭袋之辈，丢光了自己的脸和国民党的脸。清党之前的蒋鼎文在战场上勇猛冲杀，日后堕落成精通吃喝嫖赌抽的窝囊废。抗战过程中，日军一边前进一边宣传蒋鼎文的烂事。清党之前的钱大钧还是光明磊落之辈，日后竟然赢得一个响亮的绰号“钩大钱”。

一九二七年之后的国民党为何腐朽堕落？根源就在于左派被摧毁。

一八九八年，慈禧太后杀掉戊戌六君子，斩断了朝廷自我更新的血脉，留下一帮迂腐老朽，改革之梦被堵。因为任何人卖力做事，都可能和乱党挂钩。朝廷失去“左派”。

一九一三年，袁世凯讨伐革命党，斩断北洋政府自我更新的血脉，留下一帮投机钻营者，革命之路被堵。因为任何人卖力做事，都可能和国民党挂钩。北洋政府失去“左派”。

蒋介石清党的效果也是一样，斩断国民党自我更新之血脉，留下一帮喜欢当官发财的右派，继续革命之路被堵。任何积极的组织想干点事都将和共产党挂钩，任何积极的个人行为都将和共产党人挂钩。和共产党与共产党人有联系，意味着随时可能丧命。

然而在那个时代，民族意志崛起，各种抗争与运动层出不穷，已经如同喷薄的洪流，不可能被阻挡。那喷薄的洪流成了共产党力量的源泉，让共产党有了一股永不枯竭的力量。

正所谓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等到蒋介石想明白这一层，人已经在台湾孤岛上，遥望天涯，归期无期。

清党，致乱之根源。正如慈禧太后清理“乱党”往回走，以为清理一帮书生很容易，却不知书生没清理完，内部却乱成一团，最后南洋军暴动，清王朝倒台。正如袁世凯清理“革命党”往回走，蔡锷在西南振臂一呼，北洋军内部乱起来。蒋介石清理共产党，导致共产党拿起枪杆子，建立工农红军，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但八一南昌起义之后的三年时间，共产党最弱小的时候，蒋介石的主要心思和精力却不在剿共。

因为清党之后的共产党成了“外人”，阻碍蒋介石施展权谋之人在国民党内部，是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人。攘外先安内嘛。当初慈禧政变上台，攘外（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先安内（灭太平天国）。蒋介石崇拜曾国藩，对那一套自然很熟悉。只是蒋介石善于创新，把那一套复杂化了。没有强敌入侵，共产党是外，兄弟是内。要攘共产党，首先要安内部兄弟们。所以昔日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兄弟们纷纷翻脸。政见不同的笔杆子都无法容忍，派系不同的枪杆子同样无法容忍。

——什么是致乱，这就是！

北洋政府驱赶国民党之后，重心便转移到内部斗争上。袁世凯试图通过登上帝位构建自己的权威，也就是独裁。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一直被内部斗争困住。南京政府清党之后，重心同样在内斗上，蒋介石始终追求独裁而不得。

所谓独裁，说穿了很简单，就是唯我独尊，就是收拾笔杆子和枪杆子。

所谓收拾笔杆子，就是天下只能有一个声音，我认可的声音，否则就要被消灭。

所谓收拾枪杆子，就是天下只能有一种武器，忠于我的武器，否则就要被消灭。

要做到这两点很难。帝国破灭，民国崛起，原本就是笔杆子从帝王之家走向天下人。任何逆流而动都将困难重重。但蒋介石还是去做了。消灭笔杆子的事，由陈氏兄弟和戴笠去做，有很多经典案例，比方说枪杀史量才。这事后面再谈。

蒋介石本人忙着消灭枪杆子。内战一触即发。

当然喽，蒋介石这一套也不新鲜，那年头流行独裁者。墨索里尼在欧洲招摇过市，希特勒在狱中撰写《我的奋斗》，裕仁天皇正在日本清除元老和财阀。他们比蒋介石幸运又比蒋介石不幸。幸运之处在于他们成功了，不幸之处在于，成功之后又失败了。

内斗，兼谈一个消失的群落

让我们再回到一九二八年，祭祀完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裁军。

蒋介石的议题：除东北军之外（当时还没有改旗易帜），四大集团军改编为五十个师。

冯玉祥认为，改编应该遵循一个原则：“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根据这个原则，冯玉祥提出，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不属于各集团军的军队共编八个师。按照这个原则，东南的蒋介石和西北的冯玉祥形成战略轴心，为稳定天下之石柱，其他人围绕这个轴心转。

但阎锡山看穿了冯玉祥的用意，拿出自己的方案：四大集团军各编十一个师，另设一个中央编遣区，亦为十一个师，由蒋介石掌握。这个方案抬蒋压冯，离间冯、蒋。桂系双雄担心冯、蒋结盟，同意阎锡山的方案。

冯玉祥也好、阎锡山也好，蒋介石全不放在心上，因为他已经成竹在胸。那竹子是一个名叫杨永泰的人种下的，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特群落里的最后一人。

帝国时代有一个群落依靠出卖智力为生。他们绝顶聪明，能看到时局走势，反应极为迅速；但他们自己不会占山头、拉大旗。所以他们依附于强者。他们可能用半辈子时间寻找一位强人，然后翻江倒海。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号，叫谋士（军师）。姜太公钓鱼到晚年方才钓到周文王，诸葛亮拒绝刘备三次方才出山，还有刘基、姚广孝等人，都是那一行的精英。清朝末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军之后试图中兴，幕僚赵文烈则认为大清只有五十年的寿命。他们是帝国时代的“智力英雄”，很犀利，又有点神秘。

但是工业时代日渐趋于集体决策，智力英雄主义如同侠客一样逐

渐远去。民国是帝国向共和国的过渡。共军内部不乏杰出的参谋，但已经集体领导。民国派系林立，派系组织还有很强的帝国痕迹，谋士还有腾挪的空间。比方说袁世凯信任的杨度，段祺瑞信任的徐树铮，都是那个时代杰出的谋士。在比方说二十九路军参谋长萧振瀛，不太出名，但同样杰出。

杨永泰一生展示出谋士的全部特点。杨永泰生于一八八零年，广东人，家境殷实，受过帝国时代的正统教育，考中秀才。其人思维敏捷，满腹经纶，写得一手流畅文章，前半生想报国却无门路。为施展抱负，他赞同过君主立宪，又因为同样的理由反对君主立宪。为施展抱负，他当过袁世凯的议员，又被袁世凯赶走。为施展抱负，他追随着孙中山，又因为同样的理由和北洋政府合作。他的前半生像奸商一样投机，又如同政客一样到处奔走，但始终找不到一个人肯信任他，如同妓女一样得不到真爱。桂系双雄把蒋介石赶走，杨永泰试着找机会。李宗仁和白崇禧很佩服他的才华，却很鄙视他的为人，不肯给他名分。最后他等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原本视黄郛为智囊。庐山牯岭，黄郛给蒋介石的计策非常实用。但是济南惨案之后，黄郛替蒋介石背了黑锅。黄郛告诉蒋介石：“海内有奇才杨畅卿先生，胸罗经纶，足以佐治，凡吾所能者，畅卿无不能，畅卿所能者，有时吾还不及，国家大计，望公商之。”蒋介石半信半疑，后又经亲信熊式辉推荐，决定见一见这位奇才。

见面之后，彼此客套一番。杨永泰给蒋介石的计策只有两个字：削藩。确切说，就是削平所有军阀，蒋介石一人独大。蒋介石也想那

么干，关键是合适的方式。杨永泰成竹在胸，如此这般一番，蒋介石如同听完“隆中对”的刘皇叔，心服口服，收他为首席智囊，下定决心使用武力，和兄弟们战场相见。

杨永泰的策略很简单：用武力对付桂系，用经济手腕瓦解西北军，用政治手段压阎锡山，用外交手腕拉拢张学良。简单说就是，征西南、瓦西北、霸中原。

蒋介石一生中第三个系列——致乱之战——拉开大幕。

二章 征伐西南

西南精英

根据战争法则，强势的一方想要实现武力统一，要远交近攻。西南桂系最近，又有虎狼之心，为心腹之患，必须武力解决。

杨永泰说：“以吾之见，当今天下，广西第七军横行两湖，李济深负隅两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三个军，称霸一方，三分天下有其一，如勾结冯、阎，则南京无法立足。好在桂系的政敌俞作柏能拆李宗仁的台，唐生智也可以收回残部为辞进逼白崇禧，再用重金收买冯玉祥的大将韩复榘、石友三等，则李宗仁、白崇禧的势力就不难瓦解。如果再收买陈铭枢、陈济棠，以缚虎之势，扣留李济深于广州，则桂系的一分天下可以变成蒋先生的三分天下。”就是要武力解决桂

系。

所有新军阀中，桂系离蒋介石最近又最远。如果想要和平，蒋介石要先与桂系双雄讲和，因为他们曾经让他下课。如果想要战争，蒋介石要先灭桂系，因为他们曾经让他下课。而且桂系占据长江中游，随时可以威胁下游。蒋介石灭掉桂系，相当于再打一遍吴佩孚。

两广之地原本是帝国边陲，存在感不强。近代文明来袭，各种工商产品连同鸦片和上帝一起从东南登陆。广东人洪秀全带着东来的上帝主义去了广西，再北上搅得天翻地覆。从此两广精英登上历史舞台。广东的康有为和孙中山不必说，广西人也没闲着。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半个世纪之后，广西精英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再次影响大局走势。如陆荣廷等人都曾是一方霸主。影响最大的当数李宗仁和白崇禧。

蒋介石纵横天下几十年，有很多对手，分布在国民党内外。纵观天下，蒋介石一生最大的对手是毛泽东。国民党内，最大的威胁则来自李宗仁和白崇禧。蒋介石一生三起三落，其中两次是因为桂系双雄逼宫。蒋介石恨李宗仁和白崇禧，却又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是广西临桂县人，二人合称李白，为桂系双雄。加上黄绍竑，桂系实际上有三巨头。只是黄绍竑站在台前的时间少，不如另外两位出名。

李宗仁，字德邻，生于一八九一年，比蒋介石小四岁。李宗仁家境一般，念了几年私塾便辍学，去学纺织技术，结果不成功。怎么办呢？只好乱世从军，试图寻找出路。

白崇禧，字建生，比李宗仁年轻两岁。中国战史上，主要是汉人

的身影。在少数民族中，也有天才级别的人物。比方说粟裕将军，侗族，没有上过一天军校，数度出生入死之后，终于百炼成金，成为一代名将。白崇禧是穆斯林后裔，他的成长经历和蒋介石很相似。

白崇禧的爸爸做买卖，家庭条件还行，他很小开始上学，从私塾到小学，生活中还是充满欢乐的。然而在一九零三年，白崇禧十岁那年，白爸爸死了。不仅如此，家中一个帮手席卷财产而去，白家破落了。这样的生活环境在那个年代是很正常的，国破之时，家也破。蒋介石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成长，养成了多疑敏感的个性。白崇禧类似，也是多疑敏感型人物。

白崇禧从小就机智刻苦。在经历家道变迁之后，更加机智刻苦。和蒋介石一样，为寻找出路而入军校，弃文从军。身为军人的白崇禧，在军事生涯中获得过如下绰号：智多星，小诸葛，当代张良，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的绰号意味着啥。毛泽东对国民党中的将领一般评价不高，但是对白崇禧却说，“中国境内第一个阴险狡诈的军阀”。来自敌人或来自竞争对手的称赞，都是荣耀。

一九零八年，蒋介石去日本振武学校进修时，李宗仁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年轻两岁的白崇禧已经提前一年入学、为李宗仁的学长，但两人年少时并无太多交集。随后李宗仁去了广西陆军速成学堂，白崇禧经过一番周折去了保定军校。二人依然无交集。

一九一六年，二十三岁的白崇禧毕业，原本申请去新疆见习。但是兵荒马乱走不通，只好回广西，成了广西军阀陆荣廷帐下的一个小卒子。当时兵荒马乱，小卒子的出路如下：一，成为炮灰；二，成为

兵油子；三，成为成功人士。军阀战乱的年代，绝大部分小卒子都要成为炮灰或兵油子，白崇禧不仅仅成为一个成功人士，而且是超级成功人士。

广西是陆荣廷的地盘。为扩大势力，陆荣廷组织了一个模范营，招收基层军官的第一选择是海龟，如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第二选择就是中国名校，如保定军官学校。白崇禧和黄绍竑一起加入，担任基础军官，为排长。此时，还看不见发迹的征兆。但世界就是这样，不是看你处在哪个位置，而是看你在你的位置上干了啥，所谓事在人为就是这个意思。

经过一系列军阀战争，白崇禧有幸没有成为炮灰，就从排长升为连长，仍然看不见前途。在连长的位置上，白崇禧干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剿匪。

战乱的中国有很多土匪，其中有两个地方的土匪最强悍：东北和西南。这两个地方中，又以西南土匪名声最大，招牌最响亮，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历朝历代都拿他们没办法。远的不说，陆荣廷本人就是广西土匪的杰出代表。由于出身问题，陆荣廷一直主张对土匪招安，而非剿灭。陆荣廷没有想到，手下的小连长白崇禧居然会出狠招。

陆荣廷决定招安土匪，白崇禧下去执行。一番折腾下来，白崇禧招来两百多号土匪。白连长一调查，发现其中有八十号是土匪油子。兵有兵油子，土匪也有土匪油子。土匪油子就是招安榜来了，接受招安，出来装几天孙子，领一笔奖金，继续上山，涛声依旧。也就是说把招安当作生存之道。明朝末年的张献忠，就是这类人的代表。

白崇禧很生气，便笑着把那八十几号来骗奖金的土匪兄弟骗到一个地方，借着月黑风高之夜，把他们全部解决掉。杀掉了不说，还罗织罪名说土匪兄弟们不够意思，来袭击。这事干得太绝了，机警善变，心狠手辣，展露无遗。比起狡猾的土匪油子，白崇禧更狡猾。比起凶狠的土匪们，白崇禧更凶狠。凶狠和狡猾，成为白崇禧在那个动乱年代成功的法宝。

白崇禧的名头打响了。这仅仅是开始而已。又经过一系列战争，白崇禧又升职了。然而白崇禧意识到，跟着军阀混下去是没有出路的，就跟黄绍竑分析了一下局势：“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和北洋军阀；二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联省自治；三是归附广州之孙中山先生之革命政府。北洋军阀是我们所厌恶。联省自治非统一全国之良策。因而只有走第三条路，即归附广州革命政府。”

当年诸葛亮和刘备在隆中论及天下大事，搞出一个隆中对。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也就是一个山寨版的诸葛亮，把广西当作天下，搞出一个山寨版的隆中对。诸葛亮原版的隆中对，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白崇禧山寨版的隆中对，决定了广西的未来。

做好决定之后，白崇禧和黄绍竑跑去见孙中山，说俺们非常佩服大元帅先生的雄才大略，俺们痛恨军阀陆荣廷小肚鸡肠，所以俺们愿意跟着大元帅。孙中山一看两位年轻人如此热忱，就说，好吧，你们回去干吧，虽然钱和枪没多少，军队名号还是可以有的，就叫讨贼军，回去讨伐陆荣廷。从此之后，白崇禧有了自己的炉灶，专门跟陆荣廷过不去。此后白崇禧和另一个专门与陆荣廷过不去的炉灶联合起来，

就是李宗仁。

没有军费不要紧，小诸葛自有妙计。白崇禧用军队给鸦片贩子护送鸦片，获得暴利。按照黄绍竑回忆，护送十万两鸦片过境，能获利三万块。什么意思呢？算笔帐：当时国军士兵平均月收入大约八块，一个拥有一百亩土地的五口之家的农民每月收入也就八块钱。

一九二五年，蒋介石东征，李宗仁和白崇禧统一广西，以双雄并立。稍后唐生智在湖南驱赶赵恒惕，引起吴佩孚干涉。李宗仁去广州，通过李济深的关系找到蒋介石，建议北伐。蒋介石见李宗仁在广西干得很不错，决定拉拢他，结为异姓兄弟。

整个北伐战争，桂系表现出色。拿下东南的过程中，李宗仁和白崇禧并不比蒋介石与何应钦干得差。正因如此，李宗仁和白崇禧才有资本把蒋介石逼下岗。

蒋介石一辈子都在算计别人、逼迫别人，被逼宫下野简直是奇耻大辱，耻辱程度仅次于在西安被张学良扣押。北伐结束，秋后算账，蒋介石决定拿桂系开刀。蒋桂战争爆发。

战争双方从账面上看，实力并无多大悬殊。地盘上看，蒋介石控制华东，桂系则有广西、两湖，并且有广东李济深的支持。军事实力上看，都是龙鱼混杂。

但战争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球：桂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溃败。

蒋介石的招数很简单：通过战场之外的招数搞定三个人，第一个便是李济深。

战争和政治

要灭一个派系须有三招：断其后路，斩其拳头，再在心脏来一刀。断桂系后路，必须斩断两广之间的联系，因为广东的李济深和桂系双雄的关系非同一般。按照正常思维，蒋介石应该拉拢李济深，孤立李宗仁。而蒋介石直接耍流氓。

李济深，广西人，贫农，生于一八八五年，年长蒋介石两岁。

性格，绵里藏针。

军人经历，二十四岁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参加过辛亥革命，此后一直跟随孙中山。在军人资历上，李济深和蒋介石差不多。黄埔建军之前，李济深甚至得到比蒋介石更多的表现机会。然而在黄埔军校开学之后，两人拉开了差距。蒋介石北伐，李济深以第四军军长的身份坐镇大后方。整个北伐，第四军立下赫赫战功。

蒋介石和李济深的关系开始还是不错的。蒋介石通过一系列谋略逼走了粤军元老许崇智，李济深也没有表示不满。北伐之前，李宗仁和李济深两个人一起去找蒋介石，共同谋划北伐。正是在二人的拥戴下，蒋介石成功当上北伐总司令。两个人的分歧始于观念不和。

从行为和思想上看，李济深是典型的孙中山的追随者。正因如此，他的第四军和共产党走得近一点，叶挺的队伍就属于第四军。从第四军分离出来的张发奎，也是和共产党比较近。李济深之后的陈济棠和陈铭枢，也是铁了心反对蒋介石的。当蒋介石背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往右转，李济深还停留在左边。从此之后，二人走上对抗之路。

李济深是如何反对蒋介石的呢？当初北伐之前，蒋介石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埋下一系列钉子，基本上控制了广东大后方。蒋介石北伐之后，特别是何应钦的军队北进之后，李济深趁蒋介石下野那会儿，用巧妙的手段把蒋介石的钉子全部拔掉，甚至弄得黄埔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因为李济深，蒋介石再次对广东失去控制。所以蒋介石对李济深是愤恨的，李济深也明白蒋介石对自己的恨。

尽管如此，蒋介石以中央的名义邀请李济深北上商谈国事，李济深还是去了。虽然他知道蒋介石想要他的命，但还是去了。因为他认为蒋介石不敢拿他怎么样。在李济深看来，自己和蒋桂两边都能说上话，在战争即将爆发之际，他是双方的一个缓冲区。而且蒋介石是喊他去开会的，如果借开会的名义扣人，连军阀也不如，直接退化为野蛮时代，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李济深认为，此次北上，蒋介石应该是拉拢自己。

但是李济深低估了蒋介石的决心。蒋介石是要彻底消灭桂系，从而消灭所有军阀。所以就在大家都以为蒋介石是要争取李济深、孤立桂系时，蒋介石直接把李济深给扣押了，也就是以最野蛮的方式行事。李济深很愤怒，桂系很愤怒，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很愤怒（将来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扣押了李济深之后，蒋介石才开始使用大家熟悉的手段，收买李济深手下的台柱子，陈济棠和陈铭枢，瓦解李济深的势力。尽管陈济棠和陈铭枢最后都走上反蒋道路，但蒋介石的手腕是有效的，斩断了桂系和广东的联系。

英明一世，跟着孙中山混了半辈子，和蒋介石资历相当，国民党

军界老资格之一的李济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栽在蒋介石手上，而且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可谓是稀里糊涂。只能说蒋介石太可怕了。之后李济深虽然再度出山，却一直没能恢复昔日雄风。

李济深被扣押，桂系后援断绝。接下来要斩拳头。桂系的拳头就是白崇禧。

蒋介石和白崇禧

白崇禧和蒋介石的关系就两个字：冤家。

所谓冤家，在情人那里是爱恨纠缠；在政治舞台上是分分合合。天下虽大，在冤家那里却又很小，所以冤家路窄。白崇禧和蒋介石，原本有各自广阔的天地，最后却在狭窄的小路上成了冤家，有时候手挽手共同前进、相依为命，有时候则相互推搡、你死我活。不管是相依为命还是你死我活，目的都是一致的：把对方踩在脚下。因为支撑起那条羊肠小道的，只有利益。只有利益，才能让精英们有时候相依为命，有时候你死我活。

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冤家关系，是从相依为命开始的。

蒋介石一辈子赢的三个系列性的战役中，除了两次东征的立身之战，均有白崇禧的身影。由于白崇禧在广西内战中表现出的杰出才华，北伐腾飞之战，蒋介石点名要白崇禧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本来不想去，李宗仁更是不想放人，说广西部队需要有人指挥。

为了得到白崇禧，蒋介石甚至复制了两千年前刘邦“借”张良的

好戏，对李宗仁说，老弟你放心，老哥我只是“借用”数月，攻下武汉必定归还。话说到这个份上，蒋介石又是总司令，李宗仁只好同意，白崇禧也没话说，只好跟着蒋介石去了。

这一切都是利益角逐。从桂系角度讲，白崇禧是军队支柱，离开白崇禧，桂系战斗力会下降。北伐，说白了也就是抢蛋糕，谁抢的多，最后谁腰杆子就硬。所以李宗仁不愿意白崇禧离开桂系，白崇禧也不想去。

白崇禧在蒋介石身边的职责是参谋长，出点子的，没有实际指挥权，也抢不到地盘。也就是说，出好点子打胜仗，那也是总司令英明神武。总之是出力不讨好。

蒋介石把白崇禧挖到身边，除了想要白崇禧的军事才华之外，还有就是想通过一系列手段形成永久挖墙脚的态势。蒋介石也是那么干的，一路上跟白崇禧称兄道弟，对白崇禧的意见也很重视。两人合作得相当愉快，连战连捷，攻占了很多地方。

然而攻下武昌之后，蒋介石并没有按照约定让白崇禧回到桂系，而是让他去东线帮助何应钦。这次白崇禧没有任何迟疑，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因为有实际指挥权。蒋介石放白崇禧出去，也认为相处数月下来，拉拢得差不多了，应该表示一下信任了。白崇禧去东线之后，雷厉风行，很快帮助何应钦拿下上海和浙江。正是那段时候，白崇禧和何应钦建立了亲密友谊。所以才有日后逼迫蒋介石下野的过程中，白崇禧表演、何应钦沉默的那一幕。

蒋介石清党，白崇禧又帮了蒋介石大忙。两人的合作达到高潮，

如同糖与蜜那般融洽。蒋介石非常得意，以为拉拢白崇禧成功。然而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有时候，从相依为命到以命相搏，只需要很短一段时间。两个月之后，白崇禧就伙同李宗仁，顺便把何应钦拉上，借着时局把蒋介石撵走。蒋介石很郁闷、很惆怅、很惊讶、很来火，骂了无数次娘希匹。

白崇禧当然知道蒋介石的用意，也知道跟蒋介石混会有一个不错的前程。白崇禧同样知道，蒋介石的嫡系是黄埔班底，跟了蒋介石也就成了杂牌军，像没有编制的员工，吃苦受累，却没有荣耀。在桂系，他是军阀白崇禧。离开桂系，他只是参谋长白崇禧而已。军阀可以逐鹿天下，参谋长只能眼巴巴等着司令大人重视。所以无论如何，白崇禧都不可能放弃桂系投奔蒋介石。历史证明，那些放弃自己的系统投奔蒋介石的人也没有落得好下场，比方说韩复榘和石友三无原则地放弃原则，下场都不好。

留在桂系的白崇禧成了桂系的拳头。蒋介石要消灭桂系，必须首先消灭白崇禧。既可以雪耻，又能扳倒桂系，公私合二为一，干。

二期北伐，白崇禧带着十万人马从武汉一路向北，相当威风。蒋桂战争爆发之初，白崇禧在华北，盯着蒋介石的动作，打算给蒋介石一点颜色看看。白崇禧说：“自古以来，只有由北向南方能一统中国。”言下之意，要从华北进攻蒋介石的东南地盘，甚为狂妄。然而很遗憾，白崇禧忽视了蒋介石的阴险，十万人马不战自败。

蒋介石没费一兵一卒便解决了白崇禧。他只用了一招：启用唐生智。

北伐之初，唐生智的第八军是前锋，攻下两湖，有汗马功劳。在宁汉对立之际，唐生智是蒋介石的死对头。但在蒋介石下课那会，李宗仁和白崇禧击败了唐生智，把唐生智逼得出国流亡，还改编了唐生智的部队。白崇禧指挥的二期北伐的人马，就是唐生智的湘军。蒋介石决定利用唐生智在原湘军的威望消灭白崇禧。蒋介石让唐生智携巨款去活动，策动老部下李品仙倒戈反桂，引发连锁反应。

白崇禧原本打算带着自己的十万人马南下，和李宗仁一起夹击蒋介石。突然发现军队不听指挥了。与此同时，蒋介石收买杀手去干掉白崇禧。关键时刻，白崇禧想到廖磊。

廖磊原本起于湘军，唐生智一手提拔，但廖磊是广西人，和白崇禧算老乡。在廖磊的帮助下，白崇禧孤身一人躲在杂货车里从北平出逃。白总指挥没有坐在杂货车驾驶室，而是如同杂货一样，混在杂货中间。加上廖磊在背后打点，机智无双的白总指挥才如同杂货一般逃到唐山开平的廖磊公馆。谁能想到显赫一时的白总指挥会变身为杂货？正是因为没人想到，所以白崇禧才溜掉了。

廖磊公馆并不安全，在那里，白总指挥为进一步逃亡，被迫男扮女装！

要知道在战场上，那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当年诸葛亮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装，把司马懿周围那些人的鼻子都气歪了。民国时代虽然进化不少，但统帅千军万马的大元帅化妆为女人逃命，也绝对是奇闻。谁也想不到，白总指挥会甘愿当“白妇人”，所以白崇禧才得以从唐山溜到日本人的船上，然后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抵达上海，然后转道香

港去广西。

那逃亡也是白崇禧一生的耻辱，考虑到对手是蒋介石那个级别，又不算太丢人。身边带着十万大军，未见硝烟便被人扒光，对任何军人而言都是耻辱。何况以机智见长，号称当代张良、小诸葛的白崇禧？张良或诸葛亮都是去扒别人的衣服，何曾那般狼狈过！

这就是蒋介石谋略的过人之处，不费一兵一卒，就解决了白崇禧在华北的十万大军，同时出了一口恶气，痛快。当然对白崇禧而言，是奇耻大辱。

那只是蒋介石和白崇禧这对冤家的第一次过招。白崇禧让蒋介石耻辱下岗，蒋介石让白崇禧死亡线上一游，旗鼓相当。随后一系列争端，蒋桂战争，中原大战，蒋介石胜利，却依然没能拿白崇禧怎么样。而日后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二人再次合作。这样分分合合十九年，两人的关系又回到原点。白崇禧再次把蒋介石逼下岗，随后蒋介石再次让白崇禧很难过。

致命一击

蒋介石接下来发出致命一击：一共两招，一招为枪，另一招用钱买枪。

枪的一招：蒋介石一方面让刘峙、蒋鼎文等人武力压迫。

用钱买枪的操作方式就是派人以中央的名义去游说桂系阵前将领，给官、给钱、给房产，让他们倒戈。蒋介石占有南京中央，手中

握有大印，官位可以批量生产，至于钱财，蒋介石也不差，至少比李宗仁富有很多。

桂系发源于广西。广西地方穷，没啥钱，好处是，广西兵的战斗能力很强。李宗仁和白崇禧明白自身优劣，所以拼命向外扩张。桂系扩张过程的关键是如何融入当地，也就是广西将领如何和当地人在一起过日子的的问题。一帮带兵大老粗，如何能治理地方？那情况在两湖地区尤为严重，广西籍的将领和两湖地区将领存在天然的矛盾。中国太大了，地域隔阂很大，这样就留下很多缝隙，被蒋介石抓住了。最大的缝隙就是何健。

何健是湖南人，生于一八八七年，和蒋介石同龄，保定陆军学校毕业，毕业后一直跟着军阀赵恒惕混饭吃。经过几番折腾，何健从小军官一路往上升，练就了一身墙头草的本事，投机钻营不在话下。蒋桂战争之初，何健表面上是听命于桂系的。然而乱世之中的军人是靠不住的。何健从出道以来，跟过赵恒惕、谭延闿、唐生智、李宗仁，当然，他也可以跟蒋介石，只是看价码的高低。

蒋介石可以开价更高：湖南省主席。所以何健反过来表示拥护蒋介石。为表示忠心，何健派人挖了毛泽东祖坟、杀掉杨开慧。

一个何健还不够。杨永泰手持蒋介石的亲笔信秘密到香港，找到被李宗仁、白崇禧排挤的俞作柏，凭着一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之。杨永泰向俞许诺：“如果俞将军活动李明瑞、杨腾辉倒桂成功，中央委你为广西省主席，省府委员由你决定。”俞作柏拿着杨永泰赠送的巨款到南京和蒋介石合作，后去广西和第七师师长李明瑞表弟密谋。蒋桂战

争打响，身为前敌总指挥的李明瑞临阵倒戈，桂军一败涂地。从账面上看势均力敌的双方，演变成一边倒。

战争演变的关键，并不是地盘的对比，也不是兵力的对比，也不是直接战力的对比，而是蒋介石的手腕高超，又代表中央占据道义制高点。彼时的蒋介石已经达到当年曹操的境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蒋介石挟中央以令军阀。曹操没能搞定当年的乱世，蒋介石又如何呢？

按照蒋介石的想法，要对桂系铲草除根，干掉李宗仁老弟。然而蒋介石没有来得及追杀李宗仁老弟，西北的冯玉祥大哥亮出了肌肉。

三章 瓦解西北军

蒋介石和冯玉祥完全是两类人。

冯玉祥理想色彩很浓，看什么都不顺眼。他在满清当兵，在北洋政府当将军，都因为看不惯腐败、受不了派系倾轧而反叛。但冯玉祥总是找不准方向，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很感兴趣，对列宁的社会主义也很感兴趣，他本人甚至还信仰基督教。

蒋介石一直打着革命旗号，处处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但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以后，从来都是现实主义者。顺他者吃肉，逆他者挨打。

话说北京政变之后，蒋介石在南方东征，北方的冯玉祥被吴佩孚和张作霖夹击下岗，又在蒋介石北伐之前而复出。宁汉分裂那会，蒋

介石和汪精卫斗得不亦乐乎，争相拉拢冯玉祥。但冯玉祥最后倒向蒋介石。一个原因是两人都是成功的军人，都处于事业上升期，都想打仗，想要更多的地盘，有合作基础。地盘瓜分完了，合作基础没有了，就要彼此斗争了。汪精卫是个政客，只有嘴皮子。另一个原因是蒋介石拿下东南之后，口袋有钱。冯玉祥虽然控制西北，但是地广人稀，冯玉祥的人马又多，吃喝拉撒都需要钱，而且枪支弹药也需要很多钱。蒋介石也很够意思，见面就送几十万零花钱，解决西北军的燃眉之急。

于是冯玉祥和蒋介石结为异姓兄弟。

蒋介石送冯玉祥的帖子上：“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冯玉祥回赠蒋介石：“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蒋介石给冯玉祥电报，言必称“大哥”；冯玉祥给蒋介石电报，口不离“我弟”。

然而冯大哥和蒋小弟的亲密关系并没有持续太久。大哥也罢，小弟也好，都不是重要的。因为蒋介石不仅是冯玉祥的小弟，还是很多人的小弟。冯玉祥也是一样。

蒋介石决定武力统一中国，重复段祺瑞和吴佩孚的路线。根据强者连横原则，蒋介石原本拉远处的冯玉祥大哥一起讨伐近处的李宗仁老弟，冯玉祥答应了。李宗仁也拉冯玉祥讨伐蒋介石，冯玉祥也答应了。也就是说冯玉祥耍起了两面派，于是派大将韩复榘带兵逼近武汉，相机而动。在冯玉祥看来，究竟是蒋介石打胜或者李宗仁打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帮助胜利者一方打失败者一方，可以乘机捞地盘。和谁交朋友无所谓，关键是利益，利益就是地盘。朋友是变化的，地盘是

永恒的。

按照冯玉祥的力量和军事手腕，在西北当个土皇帝足够。想在全国范围内抢地盘，必须有超强的政治手腕。强悍如张作霖都没能成功。冯玉祥在政治那一栏，休说对比蒋介石，和李宗仁与阎锡山差距都很大。所以李宗仁和阎锡山可以混到一九四九年，而冯玉祥不能。李宗仁和阎锡山可以落了再起，而冯玉祥不能。政治差距暴露了冯玉祥的致命缺陷。

冯玉祥算盘虽精，却怎么也没想到会遭遇致命一击！

精明的蒋介石迅速击溃桂系的李老弟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和冯大哥决裂。蒋介石原本许诺冯玉祥，打败桂系之后给地盘。攻打张作霖之前，蒋介石也这么允诺过冯玉祥地盘，食言了。打败桂系之后，蒋介石再次食言，不仅没给地盘，还扣发军饷。

冯玉祥一看那阵势，啥也不说了，拿起枪，准备打仗。

蒋冯战争爆发！

打就打吧，冯玉祥打了一辈子，还没怕过谁。军事是冯玉祥的强项。

打仗之前，先得搞战略部署。冯玉祥设想收缩兵力回西北，战略防御。蒋介石的地盘在东南，到西北去打冯玉祥，别的先不说，那么远的路要走呢。中国历史上几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基本上都是兵多的一方长途远征，兵少的一方以逸待劳。赤壁之战，曹操带人从北方跑到南方，很惨。淝水之战，苻坚带人去打东晋，很惨。萨尔浒战役，明军出关被伏击，很惨。劳师远征从来都不容易。蒋介石北伐

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人心所向，实际上也算不上劳师远征。第一期北伐，攻占两湖的主力是湖南唐生智。第二期北伐，出力最大的是北方的冯玉祥。

让蒋介石把中央军嫡系拉去西北打冯玉祥，劳师远征，兵家大忌。何况中间还隔着老滑头阎锡山。春秋时代，秦国隔着晋国远征，结果被晋国狙击，全军覆灭。那便是“崤之战”。阎锡山当时的势力延伸到华北，隔着阎锡山去打冯玉祥，搞不好会落个惨败而归的下场。冯玉祥想把战略收缩到西北，应该说是一招好棋。然而棋还没有落子，冯玉祥就哭了，哭着扇自己巴掌，而且是边扇自己巴掌边配音：我混蛋，我该死，我瞎了眼。

因为韩复榘和石友三被蒋介石诱惑，叛变了！

前面蒋桂战争中，蒋介石在关键时刻买通了桂军将领李明瑞和杨腾辉。二人临阵倒戈，桂军猝不及防。蒋介石尝到甜头，推广成功经验，挖走韩复榘和石友三。在冯玉祥的部署中，韩复榘和石友三是两个拳头，未战先断。

韩复榘和石友三

经过二度北伐，冯玉祥的力量大大增强，以至于《时代》杂志都拿冯玉祥当封面。此前只有吴佩孚与蒋介石上过封面。一九二八年冯玉祥登上《时代》封面，不仅仅因为他是基督将军，善待传教士，而是因为手上那几十万战力非凡的西北军。

但西北军的结构是有问题的。近代军队必须有依托，要么依托国家，要么依托党派，有自己的旗号与组织。冯玉祥没有自己的政治旗帜，也没有完善有效的组织，只有他自己。整个西北军就是建立在冯玉祥的个人权威之上。冯玉祥对西北军实行至上而下的家长制管理。为控制军队，冯玉祥必须培养忠于自己的军官，那些人必须视冯玉祥为老爹。冯玉祥前后提拔了十三个军官，号称十三太保。也就是说冯玉祥把西北军组建在不存在的“血缘”关系上，基础注定是不牢靠的。不管官多大，打过多少胜仗，只要冯玉祥不爽，巴掌直接抽过去，还不能躲。总之，还是帝国时代的老一套。而帝国已经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灰飞烟灭了。

西北军内部高级将领也是一样。石友三喜欢拿鞭子抽人，梁冠英喜欢用扁担打人，张自忠开口就是“看我不扒了你的皮”。如此结构下的西北军将领，个人命运如何，要看人品和机缘。西北军将领，日后的英雄如孙连仲、张自忠，战场上都很勇猛，同样勇猛的韩复榘和石友三却成了狗熊、倒戈将军。

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中，韩复榘和石友三排前两位，正是他们害苦了冯玉祥。

韩复榘，山东人，生于一八九零年，二十岁那年参军，在冯玉祥手下混饭吃。一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冯玉祥在滦州起义中失败，两人共患难。日后冯玉祥崛起，韩复榘也跟着起来。冯玉祥对韩复榘有再造之恩，所以韩复榘称冯玉祥为“父亲”。

不管日后如何，韩复榘在战场上非常有种，打仗冲在最前面。从

连长冲到旅长、冲到团长、冲到师长，一路往上冲，一直冲到军阀。韩复榘虽然称冯玉祥为“父亲”，但儿大不由爹。当韩复榘统兵一方时，他就成了一个筹码，一个所有人都全力争取的筹码。阎锡山拉拢过韩复榘，成功过，又失败了。蒋介石也要拉拢韩复榘，曾经成功了，最后还是失败了。

按道理说，韩复榘是冯玉祥一手培养出来的，应该不容易拉拢。这个要从人性说起。当韩复榘还是穷小子饿肚子时，当然是对冯玉祥毕恭毕敬，对冯玉祥的家长作风也觉得无所谓。然而人总是有需求的嘛，按照马斯洛的解释，人在不同层次有不同需求。

等到韩复榘可以独当一面时，他的需求就变多了，需要生活，需要女人。当然韩复榘不缺生活，也不缺女人。他有三个老婆。第一个老婆姓高，是一位世家小姐，和韩复榘同龄，他们十四岁结为夫妻。因为同甘共苦的经历，韩复榘对她还不错，一直让她持家，人称管家夫人。

发迹之后，韩复榘不甘寂寞，在三十八岁那年娶了第二个老婆，就是纪甘青。纪甘青唱戏出身，口齿伶俐，带人接物都还不错，人称外交夫人。第三个老婆是名妓，供娱乐的，那就是娱乐夫人了。三个老婆，各司其责，各行其是，俨然是一个山寨版的王国。

冯玉祥为人简朴。不仅仅在生活上简朴，感情上也简朴。冯玉祥二十三岁和刘德贞结婚，夫妻相敬如宾。刘德贞和冯玉祥一样，也很简朴，平时与孩子们吃的都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出门不坐轿，在家里经常缝缝补补。刘德贞死后，冯玉祥娶了一个和刘德贞类似的

女人，贫苦人家出身的李德全。

别的不说，就从作风上看，冯玉祥和韩复榘就不对路。不对路的结果就是让蒋介石钻了空子。冯玉祥看不惯的事，蒋介石那里无所谓，吃好玩好招待好，给房子给钱给乌纱帽。宋美龄还拉着纪甘青的手，以姐妹相称。

一边是冯玉祥的粗茶淡饭，而且伴有扇耳光和踢屁股。另一边是蒋介石的锦衣玉食，高官厚禄。所以韩复榘倒向了蒋介石，成了山东省主席。

石友三比韩复榘小一岁，生于一八九一年。尽管韩复榘在投降和叛变方面的业务流程非常精通，但和石友三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看看他的光辉业绩吧。

石友三是冯玉祥带出来的，但是在和阎锡山交战的过程中投降过阎锡山，然后又背叛阎锡山重返冯玉祥的怀抱，然后再次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然后背叛蒋介石再次投靠阎锡山，然后再次背叛阎锡山投靠冯玉祥，然后第三次背叛冯玉祥投靠张学良，然后背叛张学良投靠韩复榘，韩复榘死后投靠了日本，然后又联合共产党，然后又背叛共产党。石友三的一生，把军阀演绎成妓女。在倒戈这一栏，石友三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即使把时间跨度扩展到整个中国历史，恐怕也没人能与之媲美。即使把地图扩展为全地球，也很难找到吧？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只有一个倒戈将军，那就是石友三。幸亏石友三在抗战时被部下杀掉了，如果活到抗战之后，不出意外的话，还是要投靠蒋介石再背叛的。

所以蒋冯战争之前，钱大钧带着五百万去见石友三，石友三想也不想就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韩复榘好歹还有要求：不和原来的西北军兄弟作战。石友三倒好，收了五百万的大红包，第二天就宣布冯玉祥的“十大罪状”。蒋介石非常高兴。然而蒋介石也没能从石友三那里捞到好处，中原大战之前，石友三炮轰南京城，把蒋介石和宋美龄吓出一身冷汗。要不是之前宋美龄做了一个怪梦，蒋介石很可能就被石友三的炮弹给轰了。据说正是因为石友三的炮声，促使蒋介石成了基督徒。

老狐狸阎锡山

因为韩复榘和石友三的叛变。战争尚未开打，冯玉祥就失败了。之前蒋桂战争，桂系在战力和蒋介石相当的情况下，被蒋介石三下五除二搞得狼狈不堪。特别是那骄傲自信的白崇禧，十万大军没有走上战场便孤身逃亡。大家心里偷笑，笑桂系徒有其表。

西北军账面战力也不输蒋介石的中央军，但是结局更惨。桂系好歹还在两湖打了一段时间，西北军没上战场就败了。冯玉祥那个窝囊，那个不服气就不用说了，更胜白崇禧。出道以来都是打击别人，何曾遭受如此打击！

但是冯玉祥必须振作起来。因为蒋介石步步紧逼，要置他于死地，不能坐以待毙。

按照杨永泰的谋划，武力解决桂系，相当于解决长江流域的威胁，

消除后顾之忧。但是对于远在西北、战力非凡的西北军，最经济实惠的方式应该是一个字：钱。

然而钱虽然很有用，但并非万能。冯玉祥失败，但西北军并没有伤筋动骨。拿钱收买的叛徒毕竟不可靠。看看俞作柏，转眼就和汪精卫合作。至于石友三，脑袋有反骨，收了钱也不办事，把蒋介石气得直骂娘希匹。

既然自己没办法对抗蒋介石，那就拉盟友吧。中国虽大，有力量帮助冯玉祥对抗蒋介石的人只有张学良和阎锡山两人。两个人之中，首先要排除和冯玉祥有私恨的张学良。

能帮助冯玉祥的只剩下一个阎锡山。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冯玉祥拉着阎锡山出面挽留。蒋介石复出，得到冯玉祥和阎锡山力挺“蒋总司令国之勋贤，党之柱石”。如果二人当时和桂系合作，估计蒋介石再度出山就很困难了。两年之后，身处困境的冯玉祥再次想到阎锡山，希望拉着阎锡山和他一起对抗蒋介石。但是阎锡山当时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暧昧，冯玉祥却认定阎锡山会和自己合作。

阎锡山首先把冯玉祥给软禁起来，软禁起来之后又把冯玉祥给放了，然后拿出全部家底和冯玉祥合作，与蒋介石开战。这又是哪一出呢？很古老的一出，完美地诠释了新时代军阀们的智慧。由于长期宣传的因素，大家对军阀没啥好感，认为他们不过是一帮大老粗。其实不对，他们都是人精，老狐狸。

在新军阀巨头之中，能在政治层面上和蒋介石过招的，只有阎锡

山。

阎锡山，生于一八八三年，小冯玉祥一岁，大蒋介石四岁。

和蒋介石一样，阎锡山出生商人之家。和蒋介石一样，在私塾念了一大堆四书五经。

蒋介石进入军校，是因为父亲病故，家道中落，乱世之中前途没有着落。阎锡山呢，是因为父亲投机失败，被人追债，家道中落，乱世之中前途没有着落。

阎锡山也去日本留学，也是振武学校，是蒋介石的学长。振武学校之后去了士官学校，还是蒋介石的学长。只不过学长和学弟之间差了好几届，没有接触罢了。区别在于，阎锡山从士官学校毕业了，而蒋介石没有毕业。因此从文凭上讲，阎锡山高于蒋介石。

阎锡山比蒋介石高的不仅仅是文凭，还有革命资历。同盟会成立时，阎锡山已经是成员，资格相当老。要知道一九零五年的蒋介石还在为前途问题愁呢。阎锡山回国之后成为大清帝国的一个兵。辛亥革命爆发时已经混到团长（大清标统）那个位置，中层军官。他接到的命令原本是抄家伙上，结果没有领导、没有武器、没有弹药，就没上。十六天之后，阎锡山逮到机会，起义杀掉山西巡抚，成立军政府，阎锡山也成为山西都督。

那一年，阎锡山二十八岁，开始山西土皇帝的岁月。此后他跟冯玉祥打仗，跟蒋介石打仗，跟日本人打仗，跟共产党打仗。西北军解体了，鬼子来了又走，蒋介石恨到牙痒，但阎锡山还是山西土皇帝。直到三十七年之后，另一个山西人出现：十大元帅之中唯一的北方人

徐向前元帅，彻底摧毁了阎锡山在山西的根基。

以军人身份控制山西的阎锡山，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手腕。按道理说他是第一批同盟会成员，应该跟革命党人共进退。但阎锡山不是，他瞅准时机，和袁世凯搅合在一起。袁世凯称帝，阎锡山支持。袁世凯一看阎锡山很识时务，和其他同盟会成员不同，就没动他。

这样一来，革命者出身的阎锡山成了一个旧军阀。从这个经历看，阎锡山和蒋介石非常类似，重权谋而轻名号。如果阎锡山和早期那些热血的革命党人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去拼命，那么可以肯定，他在山西待不了三十七年。

袁世凯死后，山西都督阎锡山又和手握实权的段祺瑞勾搭在一起。

那个过程中，阎锡山干了一件事，就是把山西的各个位置安上自己的人，并且形成一套理论，叫做“三不二要主义”。三不：不入党（也就是和党派划清界限，等局势明朗时站队），不问外省事（也就是奉行中立，实际上是等待机会），不为个人权利用兵（忽悠人的）；二要：要服从中央命令（谁拳头硬和谁勾搭，现实主义者），要保卫地方治安（也就是加强自己的控制力）。对内，则是信息封锁，让山西老百姓觉得生活很幸福。甚至山西的铁轨和全国都不一样，轨道窄一点，山西之外的火车进不了山西。

一句话，就是要把山西建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要知道山西地处中部，自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山西再也没有独立过。阎锡山能把山西搞成实际意义上的独立王国，可见其手腕之高明。应该说阎锡山的策略，和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很相似，就想守住

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炕头热。

那一套已经证明了是行不通的。陈炯明失败了，阎锡山也注定不能成功。但是阎锡山比陈炯明聪明或者说走运（陈炯明和孙中山近），不会贸然用炮弹招待孙中山。因为北伐军势如破竹，很快打垮了吴佩孚与孙传芳。精明的阎锡山意识到，不转身，将死无葬身之地。

通过一系列谋略运作，阎锡山摇身一变，来了一个华丽大转身，从旧军阀变身为新军阀，成为二次北伐序列的第三集团军首领，成功跻身四大巨头之列。

看看这些就知道阎锡山是多么现实。看看这个就知道，阎锡山和蒋介石一样，是一个彻底的权谋主义者。冯玉祥那样的军人不能和蒋介石对抗，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不能和蒋介石对抗，广东的李济深不能和蒋介石对抗，能和蒋介石对抗的只有阎锡山了。因为新军阀内斗，首先是权谋和政治。

四大巨头中，李宗仁和冯玉祥都和蒋介石义结金兰，唯有阎锡山没有结拜。但是在蒋介石急着灭掉李老弟和冯大哥时，和阎锡山的关系还是很暧昧，何解？谋略也。

阎锡山的谋略和缺陷

阎锡山虽然精明，却很抠门。一九四九年从大陆撤退之前，载国民党大员去台湾的飞机因超载无法起飞，陈立夫从机长那里得知答案是阎锡山带了太多金条。陈立夫对阎锡山说：要么精简随员，要么丢

下金条，其他国民党要员表示赞同。阎锡山见众怒难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让两个卫士带着侍女留下，金条带走。阎锡山窝在山西十几年，不见兔子不撒鹰，让他拿出全部家底，需要很大机缘。冯玉祥去找阎锡山，阎锡山立刻把他软禁，观察行情，但是很快，他就亲自去见冯玉祥，表示愿意拿出全部家底和冯玉祥一起对付蒋介石。

原因之一：冯玉祥让鹿钟麟回西安代理总司令，并秘密和何应钦接触。如果成功，将对阎锡山大不利。山西土皇帝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原因之二：机缘。人生充满机缘。但到了阎锡山那个层次，只有两个字能诱惑他：天下。或者说没有人能拒绝“天下”的诱惑。狡猾的狐狸、残暴的豺狼，都为“天下”竞折腰。

天下，是国人的痛苦，乱世之中，群雄逐天下，天下百姓苦。

天下，是中国长存至今的秘密，即便是天下大乱，国人还是想要大一统。所以尽管近代衰落到最低谷，还是熬过去了，没有被肢解或瓜分。即便在最失望的日子，“联省自治”仅仅是一阵风，吹过就散。即使是最混乱的日子，军阀想的还是一统天下，而非各自独立建国。因为数千年的大一统思维已经融入骨髓。所以阎锡山虽然精明，却也认为自己有“帝王福相”。

按照中华民国惯例，一旦某人独大或身居高位，会立刻成为众矢之的。所以民国大总统无一例外地成为玩偶。实力强大的段祺瑞和吴佩孚遭受到同样的命运。蒋介石实力强大且身居高位，时不时耍流氓，想低调都不行。

一九三零年的中国分成两半：一半是蒋介石，另一半是蒋介石的

反对者。

蒋介石的反对者汇集在山西，以阎锡山为核心。他们分成文武两拨。

文的一拨，既有国民党元老汪精卫，也有西山会议派各位老古董，连杨度都出来亮了相。

武的一拨，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还包括石友三（又返回来了）等人。

四章 大决战

辛亥暴动之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扯皮、混战之后，一九三零年的决战终于来了。

战争双方：蒋军和反蒋联军。双方投入兵力均在六十万以上，总兵力达到百万级别。放在中国战争史上，国共决战之前，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寥寥无几。放在世界战争史上，世界大战之前，罕有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如此内战对任何民族都要伤筋动骨，甚至可能四分五裂。

战场：沿平汉线、陇海线、津浦线展开，涉及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安徽、山东六个省，中国之腹地。自古以来，绝大多数战争都发生在那一带。所谓逐鹿中原，就是在那一带决战。所以战争被称为中原大战。结果永远一样：胜者为王。

会战核心：武汉和徐州。反蒋联军如果拿下这两个地方，相当于

把蒋介石卡死在东南，陷入绝地之中；如果拿不下这两个地方，将失去战略主导地位，只能窝在西部苟延残喘。

蒋军主要分成四个军团：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对阵津浦线的晋军；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以徐州为核心，统帅中央军对阵西北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叫何成濬，指挥杂牌军守平汉线；陈调元为预备兵团总指挥。核心力量是刘峙指挥的第二军团（这也是十八年之后蒋介石让刘峙指挥淮海战役的原因之一）。

反蒋联军比较复杂：副司令李宗仁指挥第一方面军，出湖南逼近武汉；副司令冯玉祥指挥第二方面军，从河南出发，沿平汉线向南进攻武汉，沿陇海线向东进攻徐州；总司令阎锡山指挥第三方面军，从山东境内沿津浦线向南逼近徐州。还为张学良、刘文辉等人预留了位置。其他杂牌军如石友三、孙殿英等人从旁协助。核心力量是冯玉祥的西北军。

看这阵势，如果反蒋联军胜利，历史书将写上“南伐”。两年之前，蒋介石带着他们北伐张作霖。两年之后，他们组织起来“南伐”蒋介石。历史就是这么热闹。

战争轴线：陇海线，中央军对阵西北军。中央军的刘峙、顾祝同、陈继承、蒋鼎文、熊式辉、陈诚、卫立煌等精锐部队汇聚于此。西北军猛将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郑大章等严阵以待。由于蒋介石控制铁路和航运，所以中央军在后勤和机动能力上占优势。但西北军起于苦寒之地，吃苦耐劳，军队素质高。打起来是天昏地暗。

按照惯例，打仗之前要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

四月份之前，双方彼此指责，还算克制，仅仅把口水当作标枪匕首；之后便拿口水当炸弹使用，恨不得要对方老命。阎锡山撕破脸皮，悲叹“党国不幸”，骂蒋介石“专制独裁”，号召大家讨伐之。蒋介石回敬阎锡山“素昔狡诈”，不懂“党国为何”，并下令通缉。还不解恨，蒋介石再次把阎锡山和冯玉祥一起骂为“逆贼”。反蒋联盟也不含糊，编《打倒老蒋》之歌到处传唱。双方你来我往，热火朝天。口水终究解决不了问题，战场见。

所谓战争，千变万化，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字：弹。

弹分三种：子弹、肉弹、银弹。

子弹杀身。

肉弹蚀心。

银弹噬脑。

子弹

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一、采取陆战为主，空军协同的战术，威慑联军，采取‘银弹’外交，瓦解冯玉祥的西北军；二、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取观望之势的张学良。”

大战之前，军阀刘振华不想跟随阎、冯反蒋，把指挥权交给胞弟刘茂恩，自己出走。大将万选才对此不满，投靠阎、冯，得到河南省长之职。刘茂恩极为不满。蒋介石让张钫抓住机会给刘茂恩送上厚礼，刘茂恩倒向蒋介石，诱捕万选才。蒋介石占得先手，拿下归德。

归德便是今日之商丘，为河南冲要之地之一。

五月九号，蒋介石下命令全线进攻，并亲临归德督战，试图一鼓作气打垮陇海线方向的晋军，用子弹解决问题。但晋军善于防守，在西北军的帮助下，毫不动摇。冯玉祥调来西北军猛将孙良诚和吉鸿昌反击，战场进入白热化。

五月下旬，蒋介石心腹陈诚带领十一师精锐试图从中间突破，遭遇孙良诚狙击。

陈诚号称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孙良诚位居冯玉祥十三太保之一。

双方打得天昏地暗，头破血流。加上吉鸿昌从旁协助，陈诚几度被包围，依赖火力猛突围而出。战后算账，陈诚通过蒋介石把刘峙的侄子给毙了。蒋军在陇海线受挫，双方在开封以东的地面上陷入拉锯战。

就在那个时候，西北军中猛人郑大章出现在风口浪尖。他是冯玉祥的老兵，从底层干起，摸爬滚打，一路上升。中原大战那会，郑大章指挥一支骑兵。双方胶着之时，郑大章利用骑兵的灵活性找到一丝缝隙，出现在蒋军侧后方，决定给蒋介石一个惊喜。

五月三十一号夜，郑大章的骑兵部队疾奔八十里，奇袭归德机场，炸毁十二架飞机，俘虏机械师几十人，差点抓住蒋军航空司令。这些损失倒是其次，更大的损失是士气，空军是蒋军的优势，机场被袭击，很伤士气。更要命的是，把蒋介石惊出一身冷汗。因为当时蒋介石就在归德机场附近的朱集车站，身边只有两百名警卫。如果郑大章的骑

兵动作再大一些，就可能逮住蒋介石。只能说蒋介石的运气很好。事实上蒋介石运气一直不错，几次躲过暗杀。

当时周佛海（共产党元老兼叛徒）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巧合的是，若干年之后，周佛海跟随汪精卫当了大汉奸，郑大章成了周佛海下面的小汉奸。

由于西北军战力奇强，蒋军嫡系士气低落，出现畏敌现象。蒋介石写信给嫡系将领：“我军始终诱人来攻，而并不反攻一次，不惟逆焰日张，而且为革命军人之羞也。……观近日各将士恐怖之心，忧兵力不足之念，使中正为之悲愤，何我革命军人之精神竟至不振如此耶？”。

为扭转士气，蒋介石试图以刘峙、蒋鼎文、陈诚部队奇袭开封。冯玉祥将计就计，命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迅速后撤，诱惑之。蒋介石以为西北军露出缝隙，便命令各军向开封挺进。冯玉祥让孙良诚、庞炳勋和吉鸿昌部从正面堵，让孙连仲、张自忠部向蒋军左侧背兜抄，再依靠晋军防堵，形成一个口袋形包围圈。

战局按照那么发展，蒋军将损失惨重。关键时刻，运气再次帮助了蒋介石。他得知孙连仲部调动的密电，知道大事不好，赶紧变更部署补救。尽管如此，西北军已经把蒋军截成数段，双方拼起刺刀！幸好张治中忠肝义胆，关键时刻不顾自身安危打掩护，让其他部队撤退。西北军除截获一批物资外，没能真正击溃蒋军。

经过一段时间血拼，蒋介石明白，子弹快速解决问题的希望很渺茫。

一九三零年六月份的蒋介石处于人生低谷，不仅陇海线失利，平汉线也失利。身居高位固然容易被众人反对。如果身居高位又吃了败仗，更容易被反对了。蒋介石第一次下岗，就是因为吃了败仗。反蒋力量此起彼伏，蒋介石本人倒无所谓。因为他手中有两样东西：肉弹和银弹。

肉弹和银弹

平汉线上，何成濬指挥的杂牌却干得有声有色。

蒋介石身边有四种人，杜聿明、陈明仁那样的军人，很有能量，很显赫，很致命；顾祝同、熊式辉那样看似军人的政客，很有能量，很显赫，但不致命；黄郛、杨永泰那样的智囊，很有能量但不是很显赫，很致命；还有最后一种不是很有能量，也不是很显赫，但同样很致命。他们就是何成濬、张钫那样的人，虽然活跃于军中，却不是军人。

何成濬这个人，现在大家对他不是很熟悉。但是在西安事变之前，绝对是弄潮儿。他曾经先后追随过黄兴和孙中山，革命老资格。随后又以老资格的身份追随蒋介石，跟随蒋介石东征、北伐，大出风头，一直是杂牌军领袖。

何成濬最大的能力是把打仗变成搞关系。打仗一辈子，搞关系一辈子。所以中原大战，蒋介石让何成濬统领一帮杂牌军坐镇平汉线。何成濬明白，指望一帮杂牌军出战绩那是不可能的，但出成绩是可能

的。论战力，何成濬的杂牌军挡不住西北军，但并没有受到致命攻击。蒋桂战争中，桂系元气大伤，在南方行动不力，导致在武汉之战中成为鸡肋。冯玉祥认为，与其去歼灭平汉线上的那些虾兵蟹将，不如集中力量击垮蒋介石的中央军。

面对如此情况，换成一般人该躲在一边偷偷笑。何成濬也在笑，但也要出成绩。怎么办呢？何成濬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他叫人从上海、汉口等大城市收罗了一批妓女，在前线建立了一个“军人之家”，慰劳双方将士们。啥意思呢？就是自己的将士可以玩，对方的将士也可以玩。敌方将领过来好吃好喝招待，烟酒送上，美女（妓女）随便玩，不收任何费用，来去自由，回去时还按照官职大小给一些银元。如此糖衣炮弹袭击，反蒋联军心里都是“军人之家”。

平汉线枪炮声几乎销声匿迹，只闻划拳之声，只见吞烟之雾。何成濬，有你的。

如果说何成濬的肉弹只是从旁协助，那么张钫的银弹就是致命攻击了。何成濬和张钫，与其说是将军，不如说是说客。和何成濬一样，张钫也是孙中山的追随者，行走江湖半辈子，只会搞关系。当时张钫是河南省主席。当初蒋介石挖韩复榘，就有张钫的功劳。

蒋介石心腹邵子力对张钫说：“战事胶着不能解决，实为国家之患，地方人民都受其害。你纵然不放一枪，冯也不会对你原谅，公谊私恨，你都应该尽力，希望你本着辛亥革命的精神，为国家效劳。”张钫提出要求：“准备大宗款项、子弹，由我自己分配。”

战争开始，别的队伍越打越少，张钫的人越打越多。蒋介石买通

刘茂恩，就是张钫的功劳。蒋介石成功诱捕万选才，也是张钫的功劳。由于张钫挖人功力深厚，最后连冯玉祥的铁杆梁冠英和吉鸿昌都被他挖走了。战后他手上凭空多出十万人马！

为此蒋介石的人特意为张钫编撰了一本书，吹捧说张钫“全战役中，以一身冒万险，出入敌垒，游说百端。并命使四出，招致逆军将领，涣散逆军之心，使其内溃。而国军乃得力乘便，乘虚直入焉！”张钫并非无所不能。为建立更大的功劳，张钫瞄准孙殿英。

孙殿英号称盗墓将军，挖了乾隆和慈禧的陵墓，得了一大堆宝贝。叛变什么的，根本就不算个事。张钫认为，挖走孙殿英轻而易举。冯玉祥得知张钫到孙殿英军中，马上发电报，就地枪毙。蒋介石赶紧发电报给孙殿英，放了张钫，十万大洋。冯玉祥发电报，就地枪毙，二十万大洋。三十万，赎回！四十万！双方如此抬价，最后还是蒋介石更有钱，以六十万大洋保住了张钫的脑袋。张钫保住了脑袋，但未能挖走孙殿英。

大家或许很纳闷。张钫怎么就在孙殿英身上失手了呢？因为张钫打错了算盘。孙殿英虽然没节操，却视冯玉祥为偶像。孙殿英盗墓，别人鄙视之。战争之前，冯玉祥对孙殿英说，那是“革命”行为，把孙殿英感动得一塌糊涂。滑头一辈子的孙殿英终于靠谱了一次，被包围在亳州几十天，决不投降，硬是苦苦支撑到孙连仲前来解围，很有一丝虎将之风。

由此可见，子弹打不倒冯玉祥，但战争不仅仅是子弹，还有肉弹和银弹。何成濬的肉弹和张钫的银弹固然有威力，但在蒋介石那里只

是小把戏。蒋介石真正的银弹打向了张学良，这事先放一放。冯玉祥不仅没有肉弹和银弹，连子弹都不够用。

决战

蒋介石的肉弹和银弹到处乱飞之际，阎锡山抠门爱算计的毛病又犯了。

孙连仲到亳州解围孙殿英，按照计划，二人随后向东奔袭宿州和蚌埠。时光快进十八年，淮海战役开打。刘伯承拿下宿州，黄维前去救援，被灭。随后粟裕在东线吃掉杜聿明，蒋家天下轰然倒塌。如果西北军打下蚌埠和宿州，徐州将孤立，蒋军退路被截断，直接威胁南京，蒋军必败无疑。然而孙连仲和孙殿英根本就没有东进。原因很简单，再猛的人也要吃喝拉撒。孙连仲连日奔波，需要给养。给养在阎锡山手上。晋军有罐头吃，西北军的粮食越来越少，只能吃窝窝头和咸菜。晋军和西北军原本是仇家，只因蒋军过于强大方才联合。反蒋联盟尊阎锡山为盟主。所以分兵部署，晋军主力开到津浦线，试图一路南下到南京，建立阎锡山的权威。所以阎锡山绝对不想看见西北军拿下蚌埠、威胁南京，就故意扯后腿。冯玉祥的计划泡汤。

在津浦线，阎锡山为忽悠石友三作战，答应让他当山东主席。石友三为此奋力向前。六月二十五号，阎锡山指挥东线反蒋联军攻占济南。阎锡山忘了之前对石友三的承诺，把自己的人到处安插。石友三很生气，直接停止不前，左顾右看。

韩复榘为蒋军第一军团总指挥，本身就是西北军出身，也不是全力作战，和石友三一样东张西望。如果阎锡山大度一些，加紧活动，事情大有可为。此情此景，阎锡山和蒋介石做了相反的选择。阎锡山时不时断供石友三的军饷，试图敲打。蒋介石则赶紧调人支持韩复榘。一念之间，阎锡山和蒋介石高下立判！

占领济南之后，阎锡山让傅作义南下，试图夺取徐州。晋军在山西那么多年，练就一身被动挨打的本事，主动打人的本领很一般。加上阎锡山听了张荫梧的小报告（傅作义暗通张学良），削了傅作义的兵。傅作义到曲阜也就走不动了。

与此同时，蒋介石把第二兵团的胡宗南、蒋光鼐、蔡廷锴等猛将抽调到津浦线，把傅作义打得落花流水。傅作义一路北逃，一口气跑回济南才算止住脚。晋军受挫。

阎锡山虽然抠门，但并不愚蠢，意识到再省那几个小钱，将遭受更大的损失，马上派特使带着大把钞票、大批弹药和面粉到郑州找到冯玉祥，要求西北军在陇海线发动更大的攻势，减轻晋军压力。冯玉祥的幕僚感叹：“阎锡山就是会‘急来抱佛脚’，早些时候送来这些东西，孙连仲不就打到蚌埠了吗，津浦线哪里会有今日的情况。”

决战时刻来了。冯玉祥决定调动全部力量攻克徐州，打垮蒋介石！

冯玉祥制定计划：陇海线以南：左翼孙良诚、吉鸿昌向宁陵以北地区进攻，中路孙连仲部进攻归德，右翼孙殿英进攻马牧集；陇海线正面的是晋军；陇海线以北的刘春荣、鲁西的石友三部同时出击；郑大章部的骑兵深入敌后。

从军事角度看，这个计划还可以。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如果把蒋介石和阎锡山的位置对调一下，阎锡山绝对不会去解救冯玉祥，很可能背后插一刀。如果冯玉祥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不但不会全面进攻，而是直接占领山西阎锡山的老巢，彻底打垮阎老西。

八月六号，最残酷的战斗开始了。

陇海线以南的孙连仲和孙殿英同时攻击蒋军左翼，取得一定战果。但是很遗憾，八月雨季，河水泛滥，道路泥泞，不适合进攻。孙良诚和吉鸿昌在大雨和烂泥里进展缓慢。冯玉祥把宋哲元的预备队投入进去，但大雨依然不停。西北军拼尽全力，也仅仅把蒋军阵地从原来的一条直线攻为一个直角。

与此同时，陇海线正面的晋军并没有全力进攻。晋军大量的炮兵团没有发挥作用。西北军每攻占蒋军一个据点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西北军的将士因为过度疲劳得不到休整，进攻机会就这样白白断送。蒋军则可以通过交通线，把兵力抽调到河南战场。此情此景，冯玉祥心痛叹息：“阎百川这个老弟真不是好东西！”

西北军在陇海线受挫，阎锡山和他的同僚们认为，局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成立中央政府，军心涣散，人心不附。于是决定立即在北京成立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峙。经过风水先生一番捣鼓，民国十九年（一九三零年）九月九日九时是黄道吉日。其实反蒋政府早就应该建起来，一直等到这个时候，就因为等待那几个“九”。

根据《易经·乾挂》中“九五，飞龙在天”。龙者，皇帝也。帝

国时代，国人用九数附会帝王之位。其实还可以等到九时九分，可以“五九”交汇。但阎锡山又想搞点特殊“现在的佛不拜过去的佛”，舍“五九”，取“四九”。阎锡山特地让人在卧室的靠枕上绣了一条龙，对左右说：“咱有的是好靠山。”因为没存在几天，被后人称为“四九”小朝廷。当然喽，对很多人而言，一辈子有那么几天当一个政府首脑也不错。

第五章 无法完成的任务

潘多拉魔盒

蒋介石继续银弹攻势，大把银弹射向张学良。蒋介石不计成本地投入，凡是和张学良有关之人皆拉拢，前后共花销三千万银元，这是其一。其二，把北京天津青岛划归张学良支配，并进一步许诺黄河以北由张学良治理。张作霖巅峰时期也没有控制那么多地方。

九月八号，阎锡山登上“九·四”之尊的前一天，张学良在东北开会，商议对策。一周之后，张学良在全体会议上宣布武装调停。九月十八号，东北军入关，蒋介石获得压倒性优势，阎冯联军崩溃。但东北军入关，给了日本可乘之机，混乱由此开始。

晋军离山西近一些，一部分主力撤了回去，成了日后阎锡山立足的本钱。

西北军基本解体。石友三宣布支持张学良。梁冠英、吉鸿昌、宋哲元等人倒向蒋介石自保。当时中国战力最强的军事集团瓦解。因为善后不力，祸患无穷。抗战爆发，昔日西北军猛将如孙良诚、郑大章成了汉奸。孙连仲、张自忠等人成了英雄。

随后冯玉祥隐退，专门反对蒋介石。阎锡山以去日本游历为名，到大连躲了一阵子，又找到机会回山西当土皇帝，依然是蒋介石的对手。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零年，蒋介石看似赢得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他证明自己确实比冯玉祥大哥、李宗仁老弟、阎锡山老滑头强大威猛。但仅此而已。

战争打了半年，把中国腹地破坏一遍，千里尸骨，万里哭声。如果那片土地上不是枪炮声，而是建设工厂，那么国家将逐渐强大。

——战争伤害了中华民国的大地。

军费支出五亿银元。什么概念？普通基层公务员每月工资不到十块钱，一家中农的每个月收入不到十块钱。冯玉祥恨张钫，超过六十万，便要不起他的人头。蒋介石拉拢韩复榘，也就五百万。如果把那些钱都拿去搞建设，可以建很多工厂、修很多路、解决很多就业问题。

——战争伤害了中华民国的财政。

双方直接死伤军人有三十万，殃及平民百姓无数，无数家庭因此支离破碎。他们原本可以不用去死、不用去哭，可以到工厂当工人，靠自己的能力领工资。

——战争伤害了中华民国的民心。

当然喽，历朝历代都有战争。但政权更迭之后就是稳定，就是修生养息。中原大战的规模和残酷程度超过历史上绝大多数政权更迭。但是战争改变了什么？除冯玉祥被淘汰之外，阎锡山和桂系双雄依然是蒋介石的政敌，时不时让蒋介石难堪。大大小小的军阀依然存在，蒋介石的嫡系人马依然没能控制北方。

蒋介石根本没有弄明白，按照那个方式，仗永远打不完，旧军阀永远无法了结。军阀的枪杆子没有消灭，结果却导致原本只会玩笔杆子的共产党学会了使用枪杆子。共产党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缔造了一支全新的军队。共军如何与众不同？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后面再谈。

蒋介石赶紧收拾枪杆子去剿共，增加了新乱。但他很快发现：剿共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为什么？这个问题也放一放，先看看蒋介石剿共的过程。

高手过招

共军的诞生和发展都是拜蒋介石所赐。共产党原本是一群试图笔杆子救国的书生，蒋介石清党逼得周恩来策划南昌起义，逼得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以及一些其他起义。

刚开始共军力量薄弱，也没什么经验，蒋介石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忙着和各位兄弟打内战。毛泽东利用那段时间改造军队，并且在井冈山站稳脚跟。那段时间里，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完成共军大融合；彭德怀等人带队伍上井冈山；林彪等人在井冈山经受磨练。蒋介石回

过头，以为新生的红军和其他军阀并无区别，全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落伍，历史的天平已经向另一端倾斜。因为共军已经扎根中华大地，蜕变为了一支极具特色的崭新军队，极为灵活，极为坚韧，看似弱小但战斗力极强。

中原大战结束，豪华办公室里的蒋介石刚刚成为一名基督徒。他的嘴角挂着胜利者的微笑，调兵遣将十万，决心一举消灭共军，如同湘军消灭太平军，自己将成为中华大地上新一代的主宰。然而山野之中穿着粗布衣服和草鞋的毛泽东如同村夫一般，恭候蒋介石的到来，他准备给蒋介石一个大大的礼包。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二十五号，面对咄咄逼人的蒋介石，毛泽东和战友们放下南瓜稀饭，开会。穷乡僻壤，环境也不好，会议主席台是临时搭建的。毛泽东就在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上给大家讲课。两边的柱子上挂着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副对联已经把要说的话讲完了。毛泽东还是强调了几条：

第一，军民团结一致。——人民是水，军人是鱼，鱼离不开水。

第二，选择有利阵地。——保证第一条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主场优势。

第三，集中优势兵力。——保证前两条的基础上，更容易建立局

部优势。

第四，先打弱敌。——保证前三条的基础上，先挑软柿子捏，建立信心和作战经验。

第五，要跑起来，钻空子。——为前四条服务。

看到了吧，这样就是共军战术的全部秘密。这些东西简单易懂，但行之有效。它们看似很土，实际上环环相扣，紧密如一，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天才。近代能把政治和军事如此紧密结合起来，除毛泽东之外，还没见其他人能做到。

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黄公略带兵阻击张辉瓒，彭德怀带领队伍配合林彪的红一军团围剿张辉瓒。林彪抓住机会，抓住了张辉瓒。大家齐心协力捉住张辉瓒，赢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的策略完全成功。

这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第一次过招，蒋介石在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完败。对此蒋介石有些意外，但并不是很在意。一九三零年的蒋介石，经历了东征、北伐、中原大战，过程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狼狈，最终都成了胜利者。

围剿共军，小负一局，输得起。而且从大局上看，蒋介石还在胜利。李立三当时在中央冒险，共产党在城市中疯狂搞运动，组织损失惨重。所以蒋介石还是很淡定。

三个月之后，一九三一年二月份，蒋介石改变部署，动用多一倍的兵力，采用稳步推进的方式，企图干掉共军。

毛泽东故伎重演：诱敌深入，逐个击破。共军此战出彩的是黄公

略。

黄公略生于一八九八年，和彭德怀同年，和彭德怀是老乡，和彭德怀一起发动起义、一起上井冈山。彭德怀在军中出了名的俭朴，黄公略也一样，寒冬腊月，仍穿着单衣单裤和自己做的鞋子，脚常常龟裂。裤子破了，就把裤腿撕下来补上去。但作为黄埔三期精英，黄公略打仗向来不含糊。当初彭德怀带着平江起义的主力上井冈山，黄公略在本地打游击。上井冈山之后先出任红六军副军长，随后担任红三军军长。当时对手给黄公略的标价：“若有捉拿共军头子黄公略者，赏大洋五万元；若有击毙黄公略拿头来见者，赏大洋两万元。”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黄公略的人头价格暴涨到十万。何健（杀杨开慧的家伙）赶紧派人去挖黄家祖坟，连续挖了两次，并且扣了他的妈妈和老婆。黄公略不为所动。第二次反围剿开打，毛泽东让黄公略带红三军担任主攻，在白云山设伏，静候国军。毛泽东亲自到红三军军部，和黄公略一起实地考察。他们在老乡的帮助下，找到一条通往白云山的捷径。

第二天拂晓，红三军人马沿着小道占领制高点，以逸待劳。上午十点，国军二十八师到达预设阵地。红三军从山头冲下来，以泰山压顶之势攻击二十八师，狼入羊群，毫无悬念。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伪装技术过关（比张辉瓒强），冒充炊事员，逃命去也。此战打得干净利索，相当漂亮。缴获的战利品中有一部电台，毛泽东再次和中央取得联系。

此后共军连续五战，五战五捷，赢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毛泽东非常高兴，提笔填词《渔家傲》一首：“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飞将军何人？黄公略是也。遗憾的是，第三次反围剿中，黄公略阵亡，否则建国之后至少是大将军衔。毛泽东上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此战之后，蒋介石动了肝火。如果说第一次围剿失败是因为轻敌，那么第二次准备已经相当充分，再失败，只能说明对手的力量非同一般。他非常明白：抛开理想大义不谈，国共双方的仇恨不共戴天。国军对共军无所不用其极，扣押老母、杀害老婆、挖祖坟，株连都用上了。

什么节奏？不死不休。

所以第三次交手，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

毛泽东和蒋介石斗了一辈子，战场上直接交手的机会并不多。解放战争中，两人都是在领袖位置上遥控指挥。蒋介石乘坐“美龄号”飞来飞去，但毛泽东从没亲临战场，两人并无面对面直接交手的机会。一九二七年之后，国共十年内战，双方打得面红耳赤。特别是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更是你死我活。第一次和第二次蒋介石没有参加，第四次和第五次毛泽东没有参加。只有第三次算是两人直接交手，也是平生仅有的一次在战场上直接较量。

一生一次

之前的蒋介石人生相当辉煌。东征陈炯明，蒋介石亲自出马，胜。北伐若干年，蒋介石亲自出马，胜。中原大战，蒋介石亲自出马，胜。尽管中间经历了这样那样的狼狈，结果总是赢得胜利。对共产党这边，也是辉煌无比。共产党缔造者陈独秀是他的阶下囚，他甚至还抓住另一位共产党一把手：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杀掉。

这次面对毛泽东，蒋介石依然处于绝对强势。但弱勢的毛泽东和其他人完全不同。其他人处于弱勢，却想方设法挑战强势中的蒋介石，结果不论是武装起义还是工人运动，到处碰壁。弱勢中的毛泽东则选择于己有利的生存环境等待蒋介石，以逸待劳，反客为主。

前两次失败，蒋介石感受到毛泽东的不同，遂调动三十万人马，亲自挂帅，想要毕其功于一役。队伍军官基本上都是黄埔毕业生，军事顾问来自于英、德、日等亚欧诸强。蒋介石的反应相当迅速，第二次围剿刚刚失败，立刻组织第三次围剿，前后仅一个月时间。

毛泽东虽然赢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手中只有三万多人马，远离根据地，还没来得及休整。相当一部分队伍还在打土豪、分田地。

但战争的结果却相当意外：九比一的兵力对比，竟然在两个月之后以失败告终。

战争过程是这样的，毛泽东和朱德冷静地指挥部队集结、收缩，利用纵深空间抵消国军部分优势。他们原本想在福建和江西的交界处打一仗，消灭一部分国军。但发现国军实力强劲，难以达到目的，当机立断，绕道千里回江西南部的根据地内，打算利用主场优势寻战机。

然而国军也很快，可以走直线，特别是陈诚的队伍，于七月十三号占领广昌。

毛泽东和朱德决定，再绕一圈，到国军背后去。七月酷暑，共军沿着武夷山脉向南，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后，又是千里跋涉，经于都县向西、抵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此时蒋介石指挥的国军成了山中野兽，到处追杀共军，却找不着。高温之下千里行军，对起于苦寒之中的共军而言是正常生活，国军哪里享受过如此待遇，肥变瘦，瘦掉队，士气由高变低。幸好国军占据绝对优势，不然仗没法打了。当国军发现共军主力又转到背后，立刻组织九个师的人马杀奔而来，想要把共军消灭在赣江以东。共军再次面临危机。

毛泽东和朱德再次开会，再次重申游击战理念：诱敌深入，避实击虚。根据情报，富田一带只有三个团防守。两人决定选择富田作为反攻的突破口。突破富田，就可以向北行军，拖着国军寻找机会。但是现场观察一番才发现陈诚和罗卓英两个精锐师已经先于红军赶到，打不得，掉头折回高兴圩，白白浪费一番力气。

与此同时，蒋介石指挥各路国军纷纷向高兴圩压来。共军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如果犯下一点错误，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和朱德冷静下来，观察一番之后瞄准了上官云相的人马（非蒋介石嫡系，战斗力较弱）。蒋介石在南北两翼放置的队伍较强，把上官云相放在中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蒋介石观察到共军作战的规律：善于从两侧迂回

奔袭。中间只有二十公里左右的缝隙，一支数万人的队伍想要悄无声息地穿过，难度很大。

毛泽东和朱德一番计较之后将计就计：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假装向赣江方向运动，主力部队则翻山越岭，用一夜加半天的急行军，从缝隙中溜出，跳出包围圈。时间是八月五号。国军竟然没有丝毫察觉，蒋介石大骂娘希匹。他有理由愤怒：开战一个多月，耗费粮草无数，连毛泽东的身影都没见到，相当于领着几十万人在江西中南部免费观光，相当郁闷。

就在蒋介石郁闷之际，毛泽东和朱德却转到一个叫莲塘的地方，轻松吃掉国军一个旅，揉揉肚子，又顺便消灭了上官云相的一个营。他们乘胜北进，在良村包围国军第五十四师，歼灭该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而且他们没有要走的打算。毛泽东“估计敌在我莲塘、良村战后，必将调兵东向，找我主力决战。善战者自然应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敌军大部调往东边，以便我向西打敌人的后方薄弱之处。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更靠东边的敌军毛炳文部为歼灭对象。”

八月十一号，毛泽东指挥共军冒大雨进攻，一个小时突入黄陂，歼灭毛炳文师两个团；乘胜追击，又打胜仗，缴获大批战略物质：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前后四天时间，毛泽东和朱德抓住战机，三战三捷，消灭国军一万多人。蒋介石还在南边寻找共军主力，赶紧调部队到黄陂消灭毛泽东。

如此一来，共军主力再次陷入国军包围圈，再次面临危机。毛泽

东和朱德再次开会，再次告诉大家：咱们还是老一套。所谓老一套，就是用一部分队伍伪装成主力向东，真正的主力迎着国军向西，再一次用一夜急行军从缝隙中溜掉。

至于如何做到的？好吧，那是艺术，一种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学习的艺术。

蒋介石指挥国军向东追剿，起初还能听到一点声音，随后就啥也没有了。根据习惯，蒋介石再次骂人。骂完人，大军掉头向西，继续追剿。但国军在东西南北的千里大游行中，人数进一步减少，士气进一步低落，队伍内部的裂痕在扩大。

毛泽东已经在前方休整了半个月，继续寻找机会。眼见国军进一步衰弱，抓住机会在兴国县向蔡廷锴进攻。蔡廷锴军队战斗力挺强，且占据有利位置。双方打成对峙，很辛苦。毛泽东再次转移，于九月十五号抓住战机，咬住了韩德勤，激战到九时，全歼该部，师长韩德勤被俘。但韩德勤逃脱技术超一流，竟然伪装成炊事员逃脱（十年之后，此人又在苏北被粟裕击溃擒获，再一次逃脱，多年后跟随蒋介石去台湾，郁郁而终）。

按照官方说法，蒋介石亲自挂帅的第三次围剿失败。蒋介石前后忙活了两个月，唯一的收获就是灭了黄公略，省去十万大洋。但浪费的弹药何止百万。

这次战争也成了两个人一生的缩影：蒋介石一手好牌，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输了。毛泽东以弱胜强，笑到最后。正所谓，既生瑜何生亮，空叹息。

剿共已经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蒋介石自己不这么认为。他要聚集力量，发动更强大的攻击。但拳头还没伸出来，他下岗了。因为蒋介石犯下平生第二愚蠢的错误。因为饥饿的日本已经等不及了。这便有了攘外先安内的终极版本。

第六章 错乱的攘外与错乱的安内

第三位伤害者

近代史上对中国伤害最大的人有三。

其一是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她领导的大英帝国把鸦片卖给中国，伤害国人身体。

其二是亚历山大二世。他的沙俄帝国拿走了中国的沃土，伤害国家完整性。

其三便是昭和天皇。他想要中国的全部地盘和所有不屈国人之性命。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完成农业国度向工业国度的过渡。经过甲午战争，日本赢得亚洲主导权，并且赢得一大笔资金。经过日俄战争，日本坐上列强餐桌。一九一二年，明治天皇死时，日本站在军国主义的门槛上。从日本历史看，明治天皇是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

明治天皇的儿子中，只有大正天皇（取《易经》“大亨以正，天

之道也”）活到成年，但也是体弱多病，四十岁患脑血栓。他想大干一番，可惜空有雄心壮志而缺乏政治手腕，受到财阀和元老的制约，深受刺激，犯下精神病。经常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一些可笑的举动。比方说观看军事演习时心血来潮，跑下检阅台打开士兵的背包乱翻，形如顽童。一次国会开幕式时心血来潮，一边傻笑，一边把讲演稿卷成望远镜的模样放在眼睛上，对着外国使节们乱照。如果在影视作品中，如此领导人很适合担任老顽童的角色。从那以后，大正天皇逐渐淡出，由裕仁皇太子监国。

一九二六年，大正天皇死，裕仁继位，为昭和天皇（取《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他生于一九零一年，那年月日本帝国蒸蒸日上。他二十一岁替父亲监国，对日本自丰臣秀吉以来追求的大陆政策深信不疑，对于日本历代狂人的学说深信不疑。台湾和朝鲜半岛无法满足他的胃口，他要完成大和民族自古以来的心愿，彻底登上大陆，称霸亚洲，胜过他爷爷明治天皇，成为日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袖。二十年之后，当大和民族再次回到海岛上，当麦克阿瑟成为东京太上皇，他才明白，所有一切不过是南柯一梦。

按照伊藤博文设计的政体，日本是君主立宪制度，所以缺乏手腕的大正天皇被财阀和元老架空。那么日本是怎么变成法西斯国家的呢？根源就在裕仁天皇。他和佐藤信渊、吉田松阴、大川周明是同一种人。不同之处在于他是掌控战争机器的天皇。他为人狂妄，很像一战前的威廉二世和二战前的希特勒。

任何一位狂人推行政策都需要一系列手段推动战争机器。明治维

新以来，日军陆军被长州藩势力控制，海军被萨摩藩势力控制，派系重重，尾大不掉，难以驾驭。想要大干一番的裕仁天皇需要做好两手准备：必须搞一个自己的班底，这是一手；另一手，必须有一个晋升系统打破原有的军内结构。这里先说说裕仁的班底。

一九二一年秋天，裕仁以皇太子身份监国之前，去欧美考察历练。明治天皇的女婿带领一批日本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前来晋谒，裕仁特意为那批少壮军官举行了宴会。

十月二十七号，参加宴会的三位军官在莱茵河上游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地秘密结盟。他们的名字是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都是士官学校第十六期高材生。国人对罪恶累累的冈村宁次比较熟悉；事实上前两人影响更大，只是因为内斗而陨落，此为后话。

结盟第二天，另一位年轻军官加入，他叫东条英机。随后四人又从日本驻各国使馆中选出七人组成“巴登巴登集团”，分别是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驻北京武官矶谷廉介。这十一人就是裕仁天皇的班底，也是日军二战的骨干，也是日后日本甲级战犯的骨干。那个时候，希特勒还在为一战失败的事郁闷，墨索里尼刚要往罗马进军，蒋介石还在为前途而叹息，斯大林还在构造权力。

裕仁以皇太子身份监国之后干的第一件事便是建立一个“大学寮”。那是一个特殊而神秘的地方，确切地说是个别特殊人物为特殊群体讲课的地位。

个别特殊人物，就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创立者，北一辉和大川周明。

北一辉是中国通，早年在中国流浪冒险，曾经帮助过孙中山和宋教仁搞革命，试图浑水摸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北一辉认为之前日本蚕食中国的办法已经过时，在上海一家小旅馆写下一本《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一套日本法西斯化方案：一、以天皇的名义发动政变，抛弃宪法，解散议会，全国戒严；二、依靠复员军人建立以天皇为首的军事独裁政权；三、向海外扩张，不仅要占领中国、印度，还要把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并入日本的版图。评：北一辉很有才、很无耻、很狂。

大川周明更有才：除日语之外，还精通汉、英、法、德、俄等主要语言，连印度梵语都不放过，写文章层次分明、逻辑清晰。

大川周明更狂：要征服中国、南下征服东南亚、征服南亚的印度。

大川周明更无耻：大和民族更优越。

裕仁不喜欢北一辉而更钟爱大川周明，就让他到“大学寮”讲课，听他课的年轻军人构成二战日军骨干。大川周明就通过他的才华、狂热和无耻把法西斯主义灌输给听课的中下级军官。所以二战之后的东京军事法庭上，没上过战场的大川周明光荣登上甲级战犯榜单。但他凭借他的才华和无耻装疯（在法庭上对东条英机又打又骂）躲过一劫。

和大川周明相反的是，一个曾经活跃在战场、本该进入战犯名单的狂人却逃过一劫。他就是拉开日本入侵中国大幕的石原莞尔。他生于一八八九年，是当时日本军界最大的异类。

日本人培养孩子，注重团队和纪律性。石原莞尔出身贫寒，为人聪明，调皮捣蛋，曾因摆弄军刀伤到自己裤裆。士官学校时代，他的毕业成绩原本是第三名，却因为和老师关系极为恶劣被评为第六名（前五能拿到天皇御赐的银怀表）。帝国大学毕业成绩原本是第一名，又因为过于狂妄而被剥夺资格。作为学生的石原莞尔是独特的一个，作为军人也是独特的一个。进入军队之后，石原莞尔又和领导闹不和，最后因为不合而退役，很郁闷。他有那个时代日本军人的狂热，又有那个时代日本军人没有的理性。

石原莞尔是军国主义时代日本唯一堪称战略家的狂人。他不主张全面侵华，认为那样会陷入战争的泥沼。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按照那个主张，日本占领朝鲜半岛、东北、台湾而停止，躲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今将拥有将近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地盘，何等恐怖！

但石原莞尔的狂热不输于任何人。

他认为，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各有特长和特点，如今随着工业化的来临，形成对峙局面。必然在经过战争之后走向统一，创造最后最高的文明。——战争不可避免。

他认为，最后的战争必然是“以日美为中心而进行的世界大战争”，先是持久战争，然后是决战。——日本代表东方文明（东方版的大和民族优越论）。

为给撕破脸皮的“侵华战争”提供理论依据，石原莞尔很无耻地论证“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唯一途径”：一、为解除国内的不安要素（经济危机），需要对外进出；二、解决满蒙问题不仅为日

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支那国民的利益；三、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汉民族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民族。——什么叫无耻，这就是。

在石原莞尔策划下，九一八事变爆发。

短期角度看：对日本而言，发动事变可以获得梦寐以求的利益；对中国而言，灾难的开始。

长期角度看：对日本而言，彻底激发了日本军人的狂热，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等人的欲望无法克制，最后走上绞刑架；日本本土被美国驻军，明治维新以来获得的成果化为乌有，一夜回到解放前。对中国而言，熬过最艰难的时刻，依然雄踞世界东方。

苦命的张学良

昭和天皇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苦主，首先是东北张家的苦主。当他以太子身份监国时，便通过扶持张作霖试图在中国谋利。随后他成为天皇，因战略目的没达到便干掉张作霖。之后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张学良身上。张学良虽然通过“改旗易帜”当了一次英雄，但无力独自对抗外部压力。

张学良和昭和天皇同岁，却被压得喘不过气。东北军内亲日派势力强大，以扬宇霆为甚。

东北军中原本有士官系（扬宇霆为核心）和大陆系（郭松龄为核心）竞争。张学良敬重郭松龄，和扬宇霆的关系本就不怎么样。张作

霖死后，扬宇霆更是肆无忌惮，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张学良和蒋介石联络，扬宇霆就和其他派系联络。张学良为树立自己的威信，杀扬宇霆于老虎厅，威信立了，却损害了东北军的实力。

张作霖想的是逐鹿中原。张学良没有那个野心，只求得到更多的支持，反击日本和苏联的压迫。阎锡山也打算拉拢张学良，但投入的成本太小。阎锡山本人占据北京，张学良也就没有发展空间。所以从感情上，张学良倾向于蒋介石。

东北军精锐入关，给予日军更大的操作空间。

悲剧过程是这样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号开始，在石原莞尔的策划下，日本关东军炸毁柳条湖铁路，却污蔑是东北军干的，挑衅进攻。相当于扇张学良耳光，张学良，忍。

九月十九号，日军有计划地进攻从安东到沈阳铁路沿线的十八座城镇。特别是占领营口，利于海军登陆。沈阳则是东北的中心地带。如此有序的进攻，证明日军是有预谋的。这相当于在张学良的屁股上踢了好几脚。张学良，忍。

九月二十号，日军攻占长春，九月二十一号占领吉林，相当于脱张学良的衣服，要强行非礼。张学良再忍之余眼巴巴地看了一眼蒋介石：当家的，怎么办？

蒋介石给出三条意见：一，坚决抱定保护我国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二，维持东方和平而达到维持世界的和平；三，尊重一切国际公约，尤注重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看看这三条，要维护领土完整没错，可是人家都打进来了，他却要求和平，是不是很矛盾？我

们看起来很矛盾，蒋介石却看不见，还要通过第三条把列强拉进来，重复当年李鸿章的老路。天知道列强啥时候能扯进来，所以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字：忍。

忍到什么时候呢？忍无可忍的时候。具体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

蒋介石和张学良强调一忍再忍的时候，日军开始进攻黑龙江，非礼张学良到没理由。张学良忍着羞辱南望：当家的，怎么办？发现蒋介石下野了！

政府老大变成了绣花枕头孙科。蒋介石这一招狠呐，名义上是被党内竞争对手逼下野，实际上是借下野之名避开棘手的问题。张学良败退到锦州，全身只剩下最后一条裤衩。

接下来日军又用很短的时间攻占热河，随后建立伪满洲国，为日本附庸。它的总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土的三倍，相当于日本本土加上朝鲜半岛面积的两倍。那是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上风水宝地之一，有丰富的资源和肥沃的土地。有了东北，日本可以直接威胁中华民族根系命脉之所在地——华北平原。整个中华民国在日本的笼罩之下。

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中央政府如果不能控制东北，将遗患无穷。比方说当年的宋朝，比方说后期的明朝，都是因为无法控制东北而陷入万劫不复。站在整个国家民族的角度看，谁丢失了那个地方，谁将是历史的罪人。毫无疑问，罪人有两个：蒋介石和张学良。

蒋介石是当时的政府领袖，于法理上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学良负责东北、甚至整个北方，是东北丢失的罪魁祸首。

晚清如此不堪，东北尚且在手；北洋政府如此不堪，东北尚且在手；到了民国，东北竟然“独立”了出去。所以九月十八号就成了民国国耻纪念日，蒋介石和张学良就成了耻辱的背景帝。他们都不想那样，却又没办法。

攘外先安内

九月十八号那天夜里，蒋介石正在前往江西部署围剿共产党的事宜。用天才谋士杨永泰的计策：攘外先安内。这话要从两个层次解读。

日本没有撕破脸之前，共产党属于党外敌人。所以红军前三年发展的关键时期，蒋介石并没有其中精力对付“心腹之患”，而是忙着消灭党内兄弟。

日本人撕破脸之后，日本为外部敌人。国内敌人有三波，党内政敌，军阀，工农红军。

党内政敌是谁呢？汪精卫是一个，另一个是胡汉民。廖仲恺被刺杀，胡汉民被逼出国，蒋介石前面只剩一个汪精卫。胡汉民到苏联逛了一圈，原本想通过申请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挽回局势，被斯大林拒绝。胡汉民外出期间，蒋介石完成统一。

胡汉民回国之后，蒋介石为拉拢他对付其他人，送去很多高帽子。蒋介石之所以在军阀战争中占据优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胡汉民用

崇高的威望稳住了国民党的局面。

中原大战打完，蒋介石试图集权，想把那些高帽子收回来，把胡汉民变成跟屁虫。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有知识分子的孤傲，是陈独秀一类的人物，不愿任蒋介石摆布。蒋介石决定再次耍流氓。当初打下南京，蒋介石依靠耍流氓赢得夺取东南的时间。蒋桂战争之前，蒋介石通过耍流氓扣押李济深，斩断桂系的后援。蒋介石想通过再一次耍流氓，镇住党内异己。

蒋介石先给胡汉民敬酒一杯（试图让胡汉民听话），胡汉民不同意。蒋介石立刻罚酒一瓶——把胡汉民直接扣押！时间是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号。

——这是蒋介石平生第二愚蠢的决定。

当时的局面是，国民党内部，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人虽然战败，却并没有被消灭。毛泽东在江西建设根据地，抓住了张辉瓒。脑筋稍微正常一点，就算党内耍流氓，都应该先把大军阀整合完毕。或许是赢得中原大战之后太得意了吧。

得意忘形的后果很严重。

胡汉民被囚之后，国民党内一片哗然。如果连胡汉民都可以无端被抓，那么还有谁是安全的？没有人。于是蒋介石之外的国民党实力派，迅速结成一个反蒋大联盟。汪精卫、李宗仁、孙科等人南下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对抗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也表态加入。韩复榘、石友三等人再次蠢蠢欲动，打算叛变。怎一个乱字了得。

正是国民党内部的混乱，让关东军决定行动。蒋介石一看日本人

动手了，局面难以控制，双手一摊，下岗。

看着来势汹汹的日本，蒋介石喜忧参半。忧的是日本来得太早，自己还没搞定中国，日本就来。喜的是，看见一个借刀杀人的好机会。

中原大战打完，整个北方落到张学良手上。那时候，蒋介石真正的心腹之患与其说是工农红军，不如说是奉军。因为奉军控制东北和华北，地盘比第二次北伐之前还大。东北军依然是独立的系统。说不好听点儿，就是割据状态。三十年代的蒋介石如果要彻底统一中国，头等大患不是已经残破的西北军；不是龟缩回西南的桂军；甚至不是井冈山红军；而是张学良的东北军——那可是盘踞北方、不受中央控制、且隐隐有和中央抗衡之势的独立军系啊。

日本在东北搞事，正好可以借日本人之手摧毁关东军。

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前的八月十六号，蒋介石给张学良密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翻译过来：老弟，我没空理你，你不要惹事。

想当初张学良顶住压力搞东北易帜，承担巨大的风险。三年之后，张学良基本控制东北军，势力范围延伸到华北，成为国民政府中名副其实的二把手，怎么就当了孬种呢？说不通啊。其实很简单，一九三一年的张学良明白了一九二八年没能明白的事实：尽管有了盟兄蒋介石，一切还是只能靠自己。

此时张学良隐隐约约看到了蒋介石的心思（借日本之力摧毁东北军），果断从锦州撤退，裤衩也扔了，裸奔入关。

评，东北易帜的张学良，民族英雄；东北撤退的张学良，民族罪人。

一点假设

尽管历史不需要假设，但此处不妨假设一下：如果蒋介石和张学良硬气一点儿会怎么样？日本肯定增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外战中基本上没尝过胜利的甜头，不能指望东北军创造奇迹。不过就算东北军最后不是对手，结局也必然是另一番模样。

接下来蒋介石再次赢得党内斗争，第二次上岗。张学良眼巴巴地指望盟兄蒋介石。但蒋大哥对张老弟说：“现在全国群情沸腾，我们两人（指蒋张）同乘一条小船，现在风浪太大，必须下去一人，否则船沉；将来局势平稳，下船的人再上来”。张老弟表示：“我下野，你在船上。”张学良下野后去欧洲“考察”。

原本已经纷乱的中国局势因日本直接介入，更乱了。此时以政府领袖自居的蒋介石想终结乱世，有如下选择：要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付日本（攘外）；要么对外敌视而不见，专心整合内部（安内）；要么一边整合内部，一边对付日本（两手抓）。

但蒋介石没有力量也没有胆识和日本摊牌，攘外也就无从谈起，于是提出那个——攘外先安内——之战略方针。对日本假装看不见，集中力量围剿共产党。

由于前三次围剿失败，蒋介石决定全力以赴。与此同时，首席智

囊杨永泰再次出场，给蒋介石呈上一份“万言书”。杨永泰指出：“吾随先生出师，细观察江西诸地，渐觉共党不足为虑。所难之点为共党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作，实为一严重问题。民众与共党合为一家，在于吾地方官吏风气日下，致使民众为共党所利用。而他于共党诸项方针政策，一富煽动性，二富实效性，较之吾地方官吏更有效力。欲扑灭共匪，必须使用新的谋略。”

——看看这段，杨永泰很有观察能力，看出共军和民众融为一体，但是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国民党左派也可以和民众融为一体，但是被蒋介石“清”了，把民众推给共产党。

杨永泰的新谋略：“我之所言新的谋略，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活给予指导和帮助。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共党，不为共党所左右。为此目的，即剿共也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对匪区共党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

——看看这个谋略，如果能“澄清吏治”，救济民众，确实可行。但是想做到那一切，又要重拾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又要违背江浙财阀和英美列强之利益，蒋介石不干。

如此一来，更乱了。乱成什么样呢？杨永泰号称蒋介石的首席智囊，给蒋介石出过不少锦囊妙计，蒋介石也对他言听计从。但杨永泰

的“得宠”遭到很多人的嫉恨。最后为平息各派的怨言，蒋介石把杨永泰外调到湖北担任省主席。

到任不久，杨永泰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杀！

按照游戏规则，刺客必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七章 运气和劫数

日本给蒋介石送来灾难，苏联却给蒋介石送来运气。

斯大林上台之后，第三国际加紧对外输出革命。由于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的主张很容易传输出去。由于共产国际以苏联为利益核心，很容易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当时世界局势恶化，共产国际希望他国共产党赶紧活动，赢得胜利。于是就有了冒进，首先是李立三的冒进主义，试图“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把共产党在城市内的地下组织暴露出来，损失惨重。蒋介石对大城市的掌控力加强。中共中央在城市难以立足，向苏区转移。

接下来在苏联的帮助下，王明成为共产党的招牌，博古率领领导班子进入中央根据地，一帮年轻书生（围绕在王明周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掌控了共产党。他们满腔热血、满身书生气、笔杆子打仗一流，不认识枪杆子。他们自诩为正宗马列主义者，对本土革命派看不顺眼，认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不足以成事，便展开清洗和斗争。比方说位列“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夏曦，去了红二方面军

之后，整风差点把贺龙辛辛苦苦拉出来的部队整残疾，连段德昌（彭德怀的革命引路人）那样的骨干都被杀了。

中央根据地内，毛泽东失去了领导权，蒋介石失去最大的对手。按照杨永泰的建议，蒋介石对红色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张国焘和徐向前领导的第四方面军被迫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在朱德和周恩来的指挥下赢得胜利，但内部环境正在恶化，国际派的年轻人按照苏联模式搞清洗，邓小平被批斗，肖劲光差点被枪毙。最可悲的是军事指挥权落到李德手中，李德是一个外国人，汉语都不会说几句。

蒋介石抓住时机，立刻对红色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博古和李德决定打出自己的风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用人数、装备、资源、地盘均处于劣势的红军和国军硬碰硬。

红军一直在劣势中作战，但都是依靠运动战变被动为主动、在不利的大局下寻找局部优势、赢得一次次战役性胜利，消灭国军有生力量。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红军从擅长的运动战变成阵地战，失去了灵魂，将士从艺术家变成泥瓦匠。

国军精锐师团在堡垒的依托下，借助重武器稳步推进。博古和李德让没有重武器的红军集中在狭窄的地带“短促突击”。在一定范围之外，国军可以打到红军，红军打不到国军。必须等国军到一定距离，红军才能给国军杀伤。国军看穿了共军的战术，红军进攻猛，国军暂时停止前进，其他部队掩护。刘伯承看到战场情况后痛心疾首：不叫打仗，叫“滚仗”。

一九三四年十月，毛泽东到达井冈山七年之后，苏区发展到巅峰之后，损失惨重的共军被迫离开江西，去和湘西的贺龙会师。对此蒋介石早有准备，已经布置好天罗地网以待。博古和李德对此尚不知情，带着盆盆罐罐慢慢晃悠，在湘江岸边遭遇惨痛失败。

红军长征，历时一年，大小百战，唯湘江之战最为惨烈。

红军从一九二七年建军，大小战争无数，唯湘江之战最为惨烈。

前后十天时间，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损失过半，殿后的红五军团只剩下一个师，红八军团只剩下一千余人，红九军团只剩下三千人。红军总人数只剩下三万多，战损比超过百分之五十。若非其他地方军阀有私心，红军的损失将更大。按照那个态势打下去，中央红军肯定要玩完。失败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心头，连林彪都抑郁起来。

蒋介石对此很得意，试图再接再厉，剿灭红军，同时顺便消灭地方军阀。他仿佛看到了最后的胜利，微微一笑，似乎天下在手，却不知劫难将近。他的劫难来自国内和国外，差点让他提前完蛋。

劫难

日本占领东三省，建立“满洲国”，蒋介石的策略是向国联求援。战前他让张学良“避免冲突”。九月二十二号，蒋介石在南京全体国民党员抗日救国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

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这个表态让国人大吃一惊，然后就是一系列骂声，以冯玉祥的骂声最为有力：“日本大肆屠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表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之工具而不悔。”

须知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挂着主持公平正义的招牌实行分赃之实。因为它的弱肉强食，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因为它的贪得无厌，美国拒绝加入。

想从那样一个机构寻求正义，如同羔羊向狼群诉苦。

在国内问题上如此精于算计的蒋介石为何在国际问题上如此天真？

因为此时的蒋介石不是没有先例可寻。三十年前精明的李鸿章已经给他探过路了。甲午战争之前，精明的李鸿章试图寻求列强支持而无果。日军在战前炮击英国船只，英国都没吭声。要知道英国告别“大陆政策”之后开始玩平衡，让欧洲大国之间彼此制衡，玩得很成功。英国希望把自身成功经验推广，在亚洲利用日本平衡沙俄。一九二零年的苏联威胁远比十九世纪之前的沙俄大，所以英国更不可能替中国出头。

当然喽，类似的事儿，蒋介石没少干。正如他的武力政策，段祺瑞已经证明走不通，他还要走一遍，葬送了第一次光照神州之机。一遍走不通，再走一遍，葬送了第二次机会。

其实蒋介石也不完全是天真，他是想拖延时间，一举剿灭共产党。

但事情进展不是那回事。打着公平正义旗号的国联也得表示一下。

裕仁天皇和巴登巴登骨干成员策划于密室之中，干了两件事。其一是对内，利用极右翼的铁血团在国内搞刺杀，通过杀掉三菱财团领袖团琢磨等人震慑财团，把各大财阀纳入帝国轨道之中，使之为法西斯帝国服务。其二是对外，一边在国联全面游说，一边暗示准备向北进攻苏联，挑逗欧洲列强。列强一直希望德国和日本从东西两面进攻苏联。

国联一个调查报告整了一年多，最后象征性地表示制裁日本。日本直耍流氓：退出国联！国联傻眼了。蒋介石也傻眼了，既被国联忽悠，又被日本忽悠。蒋介石表示很受伤：“这是主持公道？娘希匹！一年来，我国军人含愤忍痛，一再退让，打则任打，杀则任杀，如此大度之表现，还不足昭示人心于天下？良心丧尽，公理丧尽！”

日本退出国联之后再一次摆出一副无耻嘴脸，威胁南京政府。当时蒋介石刚刚耍流氓完毕，碰见一个更强大的流氓，立刻软下来，派何应钦北上谈判。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号，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共军的间隙，何应钦的助手和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主要内容是长城以南一百公里为非武装区。这个条约意味着承认溥仪的“满洲国”，放弃东三省，性质之恶劣堪比奕訢和沙俄签订的《北京条约》。

有理的原告竟然屈服于无理的被告！

丧权辱国！割肉喂虎！

没了东三省，中华民族面临现实和生存空间上的危机。对此蒋介石

石在南京剿共会议上训话：“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步步退让，日本并没有因此而满足。

就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之际，日本继续南下，威胁华北。蒋介石虽然赢得第五次围剿的胜利，日军却步步紧逼。蒋介石一边追剿长征中的共军，一边继续妥协退让，还是让何应钦北上谈判。

一九三五年五月份，经过一系列扯皮，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主要内容：取消国民党在河北以及平津一带的党部；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退；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

总之一句话，放弃华北主权。

国民党高层腐败，只有汪精卫和何应钦在生活上堪称楷模，不怎么贪污腐败，不乱搞男女关系。然而汪精卫成了日后天字第一号大汉奸。中央军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何应钦在抗战之前的一系列表现堪称灾难。看看那两个条约，放眼整个近代史，也只有爱新觉罗家族的超级败类、丢失外东北的奕山堪与之比肩。若非日后日军投降，何应钦从冈村宁次手中接过军刀，他将落得万世唾骂。

蒋介石牺牲如此之大，只求剿灭共产党，然而却事与愿违。

红军还魂

蒋介石在大陆从拥有一切到一无所有，都因为毛泽东。按照唯物史观，没有毛泽东，共产党或许也会战胜国民党，但一定会慢很多。

按照唯物主义史观，历史是由老百姓创造的。因为老百姓的需求不同，所以天下纷争不断。所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总是在变。老百姓创造的历史，如同一波洪流，在更迭变化的过程中，会有风流人物站在风口浪尖，为时代之标签。有时候孤星耀眼，如秦皇汉武；有时候双星闪耀，如刘邦和项羽，如袁世凯和孙中山，如蒋介石和毛泽东。

代表共产党的毛泽东和代表国民党的蒋介石各有精彩，但更多的精彩在于彼此之间的交相辉映。毛泽东在共产党内失势，局势会往利于蒋介石的那个方向发展。毛泽东一旦得势，局势又会往利于毛泽东的方向发展。

蒋介石纵横大陆数十年，对其他人屡战屡胜，唯独对毛泽东屡战屡败。毛泽东创建的枪杆子打败了蒋介石的枪杆子，毛泽东统领的共产党战胜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毛泽东缔造的共和国取代了蒋介石的民国。毛泽东把蒋介石的生存空间压缩到台湾小岛。

毛泽东下台，蒋介石赢得空前胜利。但共产党的特色之一就是纠错能力，不会一直犯错。关键时刻毛泽东再次站出来，告诉同志们不要去湘西，应该向贵州方向去，那里国军薄弱。共军转向，避开即将面临的灭顶之灾。惨烈的失败终于让共产党惊醒：国际派的王稼祥和张闻天站出来支持毛泽东，领导班子中的周恩来站出来支持毛泽东，

军队顶梁柱朱德、彭德怀等人支持毛泽东。共产党精英在遵义开了一次会，决定把军事指挥权给毛泽东。

毛泽东复出，红军还魂。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号，遵义会议结束两天之后，红军离开遵义向西北挺进。重新拿到指挥权的毛泽东想要表现一下，攻打土城，结果由于情报不准搞成两败俱伤。

毛泽东随即领兵向西渡赤水河。那是一条流经云南、贵州、四川的普通内陆河，却成了共军的生命之河。红军的战斗力在赤水河两岸复苏。

如果事情顺利，红军再向北渡过长江，可进入四川。

如此道理，蒋介石也明白，所以他要全力阻止红军入川。让红军入川犹如纵虎归山。比蒋介石更不想红军入川的是四川军阀。因为如果红军入川，蒋介石必然跟着入川，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川军优势兵力向长江渡口集结。那种情况下，渡江损失太大。毛泽东当即决定，挥师东进，并于二月中旬二渡赤水河。之后再次占领娄山关，再次占领遵义城，俘敌三千，缴获大批战略物资，赢得长征之后第一个大胜仗。时间是二月二十九号。

二次占领遵义城，困境之中的毛泽东豪气干云，写下千古绝唱《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重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再次回到遵义城，战略态势仿佛并没改变，还在敌军的包围圈中，表面看相当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回到原点，有什么好高兴的？纵观

毛泽东一生，他也不会把那种级别的小小胜利放在眼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内心深处已经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办法。

——把西边的滇军调出来，引诱到包围圈中，那么红军就可以趁云南方向空虚之际，西进再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相当于绕一个圈。

红军要渡江向北。

蒋介石也知道红军要渡江向北，拼命阻拦。

军阀们也知道红军要渡江向北，拼命阻拦。

按照绝对实力，国军没有任何问题。结果红军还是成功渡江向北，就是因为毛泽东的这个计划。

——但是这个计划差点就破产了。因为它欺骗性太强，骗过了所有人，不仅骗过蒋介石和各怀鬼胎的各路军阀，甚至把共产党高层那些人都绕迷糊了。

客观地说，前两次渡赤水是压力之下的被动选择。再次回到遵义城，毛泽东要主动出击。与此同时，蒋介石坐飞机到重庆，亲自坐镇指挥，希望把共军消灭在长江南岸。薛岳已经指挥大军从北面压上。另一边，则是黔系军阀，实力较弱。

就在此刻，红一军团截获蒋介石发给黔军的电报。林彪和聂荣臻发了一个“急电”给中央，建议攻打金沙县（打鼓新场）的黔军。金沙县是贵州北部的交通要道，黔军战斗力一般，打下来之后有很多选择。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所有人都同意打金沙县，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因为他的目标是调动滇军，而非去咬黔军。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虽然拿到军事指挥权，但并无决策权，军

事行动依然由二十多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集体商讨决定。行军打仗，二十多人在一起讨论，那种情况下肯定是什么样的意见都有。毛泽东认为参与决策的人太多，影响效率和决断，向周恩来提议，成立“军事三人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行使军事指挥权。

三月十二号，军事三人组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接下来毛泽东指挥红军佯攻金沙县，吸引国军前来，再主动撤离，并于三月十七号第三次渡过赤水向四川方向挺进，一副急于向北渡江的模样。蒋介石嘿嘿一笑，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集结队伍准备消灭红军。

但四天之后，毛泽东让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向南转移，摆出一副强攻贵阳的姿态。贵阳是贵州第一大城市。蒋介石大惊，赶紧亲自飞到贵阳指挥作战，并且把滇军调过来增援。

毛泽东等的就是这样一个机会，留下小股部队伪装成主力攻打贵阳，带领主力渡过乌江（三月三十号）向西赶路。接下来进入预定计划：途径云南，绕了一大圈之后进入四川！

国军还在贵阳以北准备消灭红军。计划失败，蒋介石气得直跺脚，嘴里大骂娘希匹。

蒋介石赶紧调整战略，重新考虑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畔，让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然而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毛泽东已经带着共军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从此蛟龙入海，天地变色。蒋介石只能望着毛泽东的背影兴叹。

毛泽东对着地图调侃：“这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漂亮。

——那是一个伟大的男人在生死之际迸发出来的智慧之光。

——那是一个伟大的组织在生死时刻创造的奇迹。

四渡赤水，共军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找不到先例。后世观众只能对着往事感叹历史巨人的神奇。此后共产党由死路走向生路，红军由死路走向生路。

绝境中的张学良

此后毛泽东带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完成人类行军史上的奇迹。一九三五年六月份，就在南京政府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之时，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见红一方面军人少，想控制中央，过曹操的瘾，没有成功。随后毛泽东带领红一方面军北上抵达陕北。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被国军击败，被迫北上。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关系很有趣。毛泽东原本被国际派知识分子排挤到一边，是蒋介石反复围剿把他逼上台。张国焘比毛泽东兵多，蒋介石又把张国焘打个半残。如此一来，共产党和红军在蒋介石的打击下团结在毛泽东周围。就在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和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蒋介石又把张学良送到了陕北。

话说张学良下野去欧洲“考察”，原本指望着在“注定一统天下的真命天子”的光荣领导下光复东北、洗刷“不抵抗将军”之骂名，

没想到自己反而被委任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打红军。东北军的老家都被日军抄了，再让他们去和打着抗日旗号的共军作战，军心士气可想而知。两次交手，损失了两个师。军队没了，蒋介石不仅不给补充，还直接取消番号，明摆着对东北军釜底抽薪。张学良很失望。想当初就是支持你中原大战，我才调东北军入关，给了日本可乘之机。如今你又让我和共军拼死作战。看来你的“攘外先安内”，不仅要“安”共军，连兄弟也要一并“安”啊。好吧，你可以不仁，我也能不义。

张学良没有政治家的手腕，但有军人的性格。平时政治上的反应也许迟钝一些，但是关键时刻又敢破釜沉舟，放手一搏。一九二八年的张学良顶住日本的压力，改旗易帜。八年之后，张学良同样能抗住蒋介石的压力。

恰在那时，共产党派王一哲和李克农前往张学良的地盘谈判：互不侵犯，联合抗日。

联合抗日对张学良和东北军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一旦联合，不仅东北军兄弟不用在西北损失生命，同时有机会打回老家。即使机会很渺茫，活着，就是机会嘛。

你来我往几个回合的试探之后，张学良终于下定决心：只有联合共产党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和共产党联合，下场将会很悲催。和共产党联合，下场可能也很悲催，但是会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再一次成为民族英雄。

张学良的个性正好适合这个角色。张学良的目标有两个：通过和红军谈判，保存东北军实力，这是近期目标。远期目标：通过共产党

缓解和苏联的关系。这层一直被忽略了。张学良的动机很明显：如果国民党靠不住，在东北能真正威胁到日本的，只有苏联。唯有借助苏联的力量，才有可能恢复东北。

经过一系列试探，张学良传来信息：请毛泽东或周恩来前来相见，共商抗日大计。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去吧。

一九三六年十月七号，周恩来从瓦窑堡去延安（肤施）。九号，张学良乘飞机去延安。当天夜里，两人在一座教堂里谈判。天空有些灰暗，教堂里点燃了五支蜡烛，每人面前一杯热茶。

那是两个当时排名前四的美男子平生第一次见面。他们的那次会面影响了天下的走势。世人不记得他们的帅气，只知道他们都是强劲有力的男人。张学良一生中，有两个让他一见倾心的人：女人宋美龄，男人周恩来。倾心于宋美龄的才貌，倾心于周恩来的魅力和智慧。周恩来见张学良也是仪表堂堂、为人豪爽，和传说中一样，感觉也是相当良好。

日后张学良回忆：“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经过一番试探磋商之后，张学良建议两步走：第一步联蒋抗日，行不通再走第二步：逼蒋抗日。周恩来表示赞同，双方达成如下几条协议：

第一，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建抗日联军。

——合作的基础，避免双方在内斗中各自损耗实力。

第二，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先出绥远。

——做好抗日准备，同时不给蒋介石让张学良进剿的口实。

第三，中共派代表去苏联，中共方面的人由张派人送至新疆，他可以联络盛世才。

——修复和苏联的关系，寻找外援。

第四，蒋介石公开抗日之前，不接受蒋介石的任何命令。

会谈顺利结束。

十月二十二号，蒋介石飞往西安，强令张学良进攻红军。张学良则对蒋介石表示：停止内战，抗日。蒋介石很生气，教训张学良，张学良反驳。两人大吵一架，无果。

七天之后的二十九号，张学良去洛阳给蒋介石祝寿（蒋介石生日是三十一号，提前两天去，有机会说话），趁机劝蒋介石联共抗日，两人再次不欢而散。

张学良消停了一段时间。十一月二十七号，张学良上书，请缨抗战，蒋介石不同意。

俗话说，事不过三。张学良觉得，事情已经这样了，再搞下去也不是办法。按照计划的第一步——劝蒋抗日——走不通，那只好两步连起来走了，所以就换了一个方式。十二月二号的时候，张学良又去洛阳找蒋介石，说部队军心不稳，自己罩不住了，请伟大、光荣、正确的大哥前去训话，蒋介石同意了。

两天之后（四号），蒋介石到西安，驻华清池。张学良和杨虎城一起去提要求：联共抗日。蒋介石被他们搞得很不耐烦，向二人表态：要么去剿共，要么就去福建安徽那边待着去。会面又一次不欢而散。

三天之后（七号），张学良又去华清池见蒋介石，要求抗日，蒋介石拒绝。张学良已经成了即将点燃的火药桶。十二月九号发生的一件事，成了导火索。当时共产党发动学生运动，规模不大。但是某位脑残的特务军警打伤了一位学生，引起公愤。一群学生奔向临潼，找蒋介石请愿（讲道理）。蒋介石正烦着呢，就让张学良前往制止，必要时可以开枪。

张学良看见请愿学生，劝他们回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然而学生中有很多东北人，对张学良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还要求：“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

——张学良触景生情，瞬间爆棚，豁出去了！妈的。

张学良告诉大家：稍安勿躁，三天给答案。学生呢，还原了当年垓下汉军唱楚歌的场景，来了一曲《松花江上》，把东北军唱得眼泪汪汪。

有趣的是，张学良接下来的行动不仅超出他自己的掌控范畴，把蒋介石推向低谷又推向巅峰；也超出蒋介石的掌控范畴，再次登上巅峰却又跌入谷底。

现如今很多人感叹蒋介石生不逢时，赶上好一点的年月，也许就能消灭共产党，也许就是开国领袖了。实际上历史老人待蒋介石不薄，已经给了他不少时间。从一九二八年理论上统一全国，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后八年时间，蒋介石既没有搞定军阀，也没有搞定共军。对比一下，刘邦从公元前二零六年进入西安城，到公元前二零二年建立西汉帝国，前后四年。杨坚从建立隋朝开始，到一统天下，也就八

年时间。朱元璋从南京出发，仅仅数年功夫，就削平北方。对于开国领袖，八年时间也够了。

然而八年的时间，蒋介石在东征西讨、南进北上，效果却不大。一九二八年，朱德和毛泽东刚刚在井冈山会师，只有几千人。八年过后的一九三六年，共军经历长征转移，还有数万人，而且都是久战之兵，干部比例相当之高。一九二八年的桂系，一九三六年还在。一九二八年的阎锡山，一九三六年还在。一九二八年四川军阀混战，一九三六年继续打。如果说有啥改变，那么好吧，就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散了，散在蒋介石和日军手上。张学良的东北军基本散了，散在日军手上。

一九三六年的蒋介石全力安内，但失败了；攘外，也失败了。蒋介石的独裁还是没能完成。同时期的裕仁天皇不声不响地在日本完成法西斯改造，把完成工业化的日本变成一架战争机器，对尚处于农业时代的中国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同时期的希特勒完成独裁，把德国变成一部战争机器。同时期的斯大林完成独裁，把苏联变成战争机器。同时期的罗斯福基本完成集权，带领美国准备迎接各种挑战。唯有蒋介石，独裁而不得，让民国陷入无休止的内战，成为致乱之祸源。

总之一句话，八年时间，蒋介石都在致乱。历史周期律演绎过程中，很少有人能“致乱”八年而不倒。接下来怎么办？再来一遍！

第四篇 山河与战火

一章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六年的西安

西安，位处关中平原，为中华帝国魂魄所在。纵观中国历史，有一半浓缩在西安。

两千年前，第四层历史周期律启动，始皇帝在西安一带完成帝国体制设计，随后汉武帝又在西安一带完成帝国意识形态建设。中华帝国诞生。

一千年前，第三层历史周期律开启，隋文帝开创科举制，唐太宗把它发扬光大，完成帝国官吏体制设计。中华帝国到达巅峰。如今西安周围，秦皇、汉武、隋祖、唐宗的墓地静静待着，任凭时光冲洗，记录着往日的辉煌。

西安，从宋王朝开始衰落。原因有两个：一，经济中心南移，从原来的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二，东北少数民族崛起，北京一带的争夺空前激烈，政治军事中心向北京转移。

红军完成长征之后，西北再一次走向历史前沿。蒋介石认为：本

人一统天下，红军和军阀为心腹之患，所以攘外必先安内。所以九一八事变开始，国民政府逐步退让，丢掉国土无数，却终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十二月九号，张学良听完学生版的《松花江上》，再次去找蒋介石，要求联共抗日。蒋介石又把张学良教训了一顿，张学良不服气，两人再次大吵一架。吵完之后，张学良下定决心走第二步，逼蒋抗日！但张学良没有立刻动手，他还在犹豫，估计是在幻想转机吧。

张学良的异常举动，使蒋介石有所察觉，决定调蒋鼎文和卫立煌前来取代张学良和杨虎城。十二月十一号晚上，蒋介石请大家吃饭，宣布人事调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心彻底凉透，蒋介石不仅没有联合抗日的意思，还要自己靠边站！那就动手。

蒋介石十一号的日记里记载：“汉卿今日（张学良）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张学良的人）之言而不安欤”？张学良何止不快，简直快要爆炸了。事实上蒋介石在西安还是安排了不少内线的，有不少特务，号称五虎上将之一的钱大钧跟张学良的关系极为密切，就在西安办事。但是蒋介石的人，关键时刻总有机会出纰漏。

蒋介石没有机会解决这些疑问了。因为当天夜里，他在被窝里听到了枪声，忙从后门翻墙逃跑，被一个叫孙铭九的东北军小军官从后山的山坡上揪出来，变成阶下囚！

一生的奇耻大辱！实际上更像一个笑话。

中国历史上领袖被兵谏，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最有名的就是杨

广。翻遍史书，与此类同者，也就是冯玉祥关押曹锟，使曹锟最后成了一个笑话。但笑话的结果却不同。曹锟被囚禁之后退出历史舞台，张学良反而成就了蒋介石。

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突然明白，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和还是战，还可以慢慢折腾，摆在眼前的是人身安全问题。形势很明显，张学良敢如此对他，肯定是跟共产党那边沟通好了。落在张学良手里，相当于间接落在共产党手里。十年来，杀共产党人无数，关共产党人无数。即使活着的共产党人，如朱德、毛泽东等人，都在蒋介石的通缉令上，人头还是明码标价。落到共产党手上，有生命之忧，前途很不乐观啊。

所以西安城里的蒋介石很郁闷（戎马半生，历险无数，成为国家老大时反而当了阶下囚），很伤心（自我感觉和张学良关系不错，没想到落得如此下场，自己养的那群特务啥的，根本就没起任何作用），很悲愤（坚持那么久的攘外先安内策略到头了）。

反正就是各种难受，时不时在心中感叹，难道天要亡我？

然而很快，蒋介石再次振作起来。他虽然身陷囹圄，仍然是各方博弈之焦点。他本人已经牵动整个中国之局势，关系整个民族之前途。

处于生死之间的蒋介石前所未有的重要！

一九三六年的南京

张学良一怒之下抓了蒋介石，之后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等其他

各方反应。

十二月十二号的南京城乱成一团麻。那些身居要职的皇亲国戚和兄弟好友们平时风风光光，派头很大，危急关头才发现离开蒋介石，他们是如此的脆弱。孔祥熙也好，宋子文也罢，宋美龄也好，陈氏兄弟也罢，都是藤条，蒋介石才是大树。真正决定性的力量是何应钦。

中央军内，蒋介石第一，何应钦第二。何应钦的态度决定一切。

十二月十二号，何应钦是南京军政大员中第一个得到消息的。短暂的慌乱之后，何应钦平静下来，思考对策。随后他召集国民党大员开会，主张讨伐张学良。

按照一贯风格，会场上再次吵吵嚷嚷一团糟，有主战也有主和，各有各的道理，唾沫星满天飞。双方打出来的旗帜都是解救蒋介石，区别在于：主战派认为，要猛烈一点，必须亮出战刀，架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脖子上，才能逼迫他们放人；主和派则认为，要温柔一点，好好谈判，诱使张学良和杨虎城放人。

会议一直吵到十三号凌晨，最后主战派占了上风。何应钦通电全国：讨伐西安。

也就是十三号清晨，宋美龄乘飞机从上海赶到南京。得知何应钦要拿飞机大炮去解救自己的老公，急匆匆去了何应钦家，使出女人的绝招，用她那富于魅力的音容苦苦哀求何应钦，不要动粗，要冷静。由于宋美龄的出现，主和派再次高昂起脑袋，继续用口水战斗。

在宋美龄的记忆里，何应钦同志是个善于和稀泥的人。然而宋美龄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将军和女人毕竟不是一回事。平日里，何应钦

要给宋美龄面子，不是宋美龄多么有魅力，而是她有个脑袋上头发不多的丈夫叫蒋介石。她告诉何应钦：“张、杨目前只是要求抗日，别无他求，我们可以暂时答应他们的要求，何必非要大动干戈，把委员长往死路上逼。即使要讨伐，也要等救出委员长后再动手，此时切不可轻举妄动。”何应钦收起平时那张笑脸，拿出罕有的决绝：“为维护政府威信，只有讨伐，别无选择。”

宋美龄对何应钦的说话习惯很不适应，从小到大，从中国到美国，她听到的都是恭维和赞扬，都是你好美、好聪明、好能干、和蔼可亲等等。嫁给蒋介石之后，更是拿阿谀奉承当饭吃，啥时候被人家如此呛过？宋女士拿出女人的绝学：哭！“你究竟是安的什么心？”

何应钦被宋美龄这一连串的搅合闹得心烦，对闹腾不休的宋美龄说：“你一个妇道人家懂得个什么，只知道救丈夫！国家的事，你不要管！”

双方大吵一架，完毕宋美龄和戴笠等人一起去西安营救蒋介石。何应钦采取如下几个步骤：让汪精卫回国（当时不在国内）主持大局；加强和桂系的联系，保证南方稳定；和南京的日本领事馆谈了一些关于和平之类的空话；军事方面，派遣刘峙和顾祝同，各带一路人马威胁西安；同时派空军轰炸潼关，如果局势进一步不明朗，很可能直接轰炸西安。

但何应钦的态度不能决定一切，真正能主导中国局势的是列强。

一九三六年的世界

一九三六年的世界已经到了决战的前夜。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掌控德国，继续走在威廉二世的老路上，组建德意志第三帝国，希望为一战复仇，找回日耳曼人的光荣。他已经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合作，建立柏林—罗马轴心，欧洲各国围绕那个轴心站队。

东方的日本吞掉朝鲜半岛、台湾、东北之后，国力达到巅峰，军国主义思潮达到巅峰，布局已经完成。日本的全部心思就是继续侵略中国，占领这片地球上的风水宝地。所以日本当然希望中国乱，最好大乱，降低日本的入侵难度和成本。所以日本声称：“南京国民政府决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不能坐视不理”。何应钦和汪精卫都是亲日派。

但蒋介石是亲英美的。为了拉近关系，他还改信了基督教。

英美远离中国，没有直接的领土诉求，但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而稳定的中国才能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所以英美主张，只要把蒋介石拉出来，不妨和共产党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合作。宋家就是铁杆的亲英美派。宋家坚决主张和谈，捞回蒋介石。

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苏联更能决定蒋介石的生死。

孙中山晚年亲苏，蒋介石一开始也是亲苏，清党后反苏。按照斯拉夫人好战的本性和对领土的贪婪，中国乱了，他们也可以乘机扩张。但一九三六年的苏联面临来自东西方的压力，希特勒的德国已经亮出獠牙。苏联不愿腹背受敌，只能指望中国拖住日本。如果蒋介石垮台，中国将再次陷入内战，一旦日本占领华北，实力将再次壮大，对苏联

的威胁会更大。所以苏联指责张学良坏事。

苏联还能影响共产党的决策。共产党这边的反应最复杂。从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舰事件算起，蒋介石向共产党人挥舞屠刀的时间已经有十年，究竟有多少共产党员人头落地已经难以数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凡是到陕北的共产党人之中，均有亲人、朋友、战友因为蒋介石死掉。听见蒋介石被抓住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终于可以报仇雪恨：杀掉蒋介石，或公审后再杀掉。

会议上争得不可开交，但危急关头一贯高效的共产党很快就达成共识：和平解决。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也就是苏联的意见：蒋介石不能死。另一个是客观形势决定的：共产党辛辛苦苦跑到延安，是为了过去还是未来？是为了自身党派复仇还是为民族未来考量？如果仅仅为了党派过去的仇恨杀了蒋介石，痛快一时。但天下从此大乱，引起各种报复不说，日本趁乱入侵，中华民族将万劫不复！如果和平解决，放弃党派仇恨，为民族谋利，可以发展，可以争取民心。共产党精英决定选择后者。

暂时放弃过去，着眼未来，高！

十二月十七号，周恩来和博古、叶剑英一起去西安，展示他出神入化的谈判技巧。

周恩来首先协调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步伐，加强他们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系。

军事部署：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带；红军在延安一带布防；三方面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政治部署：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法保障。拿出和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抗日；三、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

经过一番谈判之后，达成口头和平协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号，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一直软禁了半个世纪，错过抗日战争大潮。

张学良一辈子当了两次英雄一次狗熊。东北易帜的张学良是英雄，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是英雄，九一八事变中的张学良是狗熊。

蒋介石的角色和日本的功课

其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只是口头承诺抗日。按照蒋介石的作风，兄弟可以开战，可以和正牌中央政府耍流氓，可以无辜囚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那么否认一个口头协定简直是轻而易举。之所以没有否认，大势使然。

站在宏观大历史看，西安事变中，张学良让蒋介石难堪，实际上挽救了蒋介石。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一系列致乱已经非常危险。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已经把“攘外先安内”的决策做到极致。对于《何梅协定》那般丧权辱国之条约，蒋介石的回应：奢谈抗日者，杀无赦。

蒋介石如此做派伤害了南北两拨人：残存的西北军系和东南粤系。

中原大战之后，西北军瓦解，但仍有部分将领为国事努力。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把目光由内战转移到外部，开始在北方组织军队抗日。吉鸿昌将军在冯玉祥身边成长，九一八事变之后对旧军阀失望之极，秘密加入共产党，并且在北方组织抗日同盟军，在蒙古一带作战，曾经取得相当不错之战绩：收复多伦、把日军赶出察哈尔。但他的行为让蒋介石很不爽。特务组织千方百计抓住吉鸿昌，杀掉。

吉鸿昌临死时留下绝命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悲情堪比谭嗣同。如此一系列举动，南京政府民心丧尽，绝境中的共产党逐渐赢得更多的支持。

对蒋介石而言，北方反抗者固然让人厌烦，但远不如南方反抗者有杀伤力。

粤系将领蔡廷锴和蒋光鼐指挥的十九路军不堪屈辱而独立抗战。粤军原本是孙中山起家的老班底，但时不时和孙中山闹矛盾。孙中山理想远大，但现实执行中出了漏子，所以粤军闹。蒋介石和孙中山恰好相反，一心构建自身权谋而忽略了理想主义，惹起粤军不满。

国军各个派系中，粤军因为其理想色彩和共产党比较近。当初叶挺独立团，就属于李济深的队伍。八一南昌起义，蔡廷锴差点参与。中原大战之后，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驻扎上海。“伪满洲国”诞生之后，川岛芳子等间谍到上海搞阴谋，十九路军不让步，和日军打了起来，史称一·二八事变。最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随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塘沽协定》签订，粤军将士失望之极，在福建发动

政变，建立“中华共和国”。蒋介石让卫立煌等人大兵压境，同时用钱收买粤军将士倒戈。但事情没完，《何梅协定》签订，李宗仁和李济深对蒋介石的退让甚为不满，欲借机反蒋，掀起“两广事变”。

李宗仁认为蒋介石的“不作为”让中国陷入“不死不活”的状态，并声称中国必须实行“焦土抗战”方能图存。蒋介石再次试图消灭桂系。当他试图让粤系新领袖陈铭枢对付李宗仁之际，两广再次联手合作，反蒋。幸好最后双方妥协，要不然可能再次爆发蒋桂战争。此时离西安事变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西安事变，蒋介石终于看清天下大势：继续打内战，国军内部将再次战乱；如果继续那么玩，估计内战没结束，中国就变成日本的地盘了。

与其一切被日本拿去，不如带领大家和日本搏一搏。若胜利，功在千秋。

当初爱新觉罗家族因对外无法满足洋大人的贪婪、对内无法处理国人诉求而倒台，帝国瓦解，帝制崩溃，帝国梦化为尘埃。当初北洋政府虽然挂上民国的牌子，同样因为对外无法满足洋大人的贪婪和对内无法处理国人诉求很崩溃。西安事变之前的蒋介石同样内外交困，内外失败，人生和事业陷入低谷。但是相比满清皇帝和北洋首脑，蒋介石再次得到一次机会，一次带领大家抵抗日本的机会，再从低谷走向巅峰。

——这就是蒋介石的角色。在西安事变之后，以一种尴尬的方式走上领袖岗位。

蒋介石干过很多混蛋事，绝对不是君子。他杀气很重，杀戮太甚。但蒋介石和历史上真正的混蛋有本质区别：他重权谋，重利益，但和石敬瑭、秦桧、汪精卫不同，他绝不会当汉奸。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已经准备抗战，但还有些犹豫。

犹豫之一：国际势力上，英美和日本同样关系暧昧。

犹豫之二：国内局势错综复杂。

犹豫的根源在于蒋介石深知日本的厉害。

西安事变之前，日本已经准备好全面侵华。裕仁天皇把日本从君主立宪变成法西斯国家，用了两手准备。前面已经说过，第一手是建立军人班底；第二手是打破军方原有的人事格局，成功地在日军中植入“陆大”参谋系统。常言道，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但是在日本那里却是另外一个概念。要明白这个局，需要理解一下日本陆军大学。

当初清朝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同时进行，主要项目之一便是办军校。因为甲午战争失败，中国的军校逐渐衰亡，比方说马尾军校和天津武备学堂；日本军校则逐渐壮大，比方说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因为甲午战争失败，中国不少有志青年去日本学军事，从振武学校开始学（如蒋介石），成绩好的可以去士官学校（如何应钦）。陆军大学比士官学校又高个一档次。

陆军大学创办于一八八三年，比天津武备学堂早两年，但是毕业生极少。开始十几年，每期只有十名左右毕业生。一九四五年最后一期也才一百二十人。陆军大学前后六十多年时间，只有三千多名毕业

生。只有士官学校的精英（成绩前二十名）日本学生才有资格去进修，毕业前六名可以获得天皇御赐军刀，号称“军刀组”。只有“军刀组”才能铁定进入参谋部。所以日军陆军中枢首脑清一色的参谋出身。日后被执行死刑的甲级战犯中，只有文官首相广田宏毅和罪恶的松井石根没在参谋部干过。

裕仁天皇通过参谋部掌控陆军内部的人事升迁，可以高效率执行恐怖的法西斯主义。与之对应的蒋介石连用八年时间，也没能控制国内局势。这是领袖地位之差别。

战争千变万化，归根结底是将和兵。日军军官素质上强于国军，黄埔军校基本上模仿日本军校。校长蒋介石只是振武学校毕业，并没接触到日本最高层次的军事教育。黄埔教官基本来自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精英人物如何应钦、汤恩伯等人在士官学校也就是芸芸众生。黄埔军校比不上士官学校，更比不上陆军大学。至于士兵，日本兵野兽多，中国兵则是兵油子和热血汉子的混合体。所以抗日战争中（抛开民族大义），正面战场如同教学演练。

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号卢沟桥的枪声彻底击碎了他所有的不确定。七月十七号，蒋介石发表讲话：“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

沉着，准备自卫。”

日本的谋略和手段

如果从日本试图侵犯大陆开始算，那是一千年前的唐朝。

如果从丰臣秀吉攻击朝鲜半岛算起，那是五百年前的明末。

如果从甲午战争算起，日本系统执行“大陆政策”已经将近半个世纪。

如果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日本经营东北已经六年。

千百年以来，日本人最大的心愿就是登上大陆，日本谋求过的最大战略便是大陆政策。帝国时代，日本看不见成功的希望。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成功完成工业化过渡，并且通过甲午战争打断清帝国向工业国家过渡，翻身成为亚洲实力最强者。如果民国统一，过渡到工业国家，必然再次胜过日本。日本要想永久保持优势，唯一的选择便是征服中国。

从历史和现实看，日本侵华不可避免。实力弱小之时尚且觊觎这片土地，强大之后更是毫无顾忌。日本人以精细执着著称，凡事认定一个方向，便死不松口。长久以来，日本精英一直围绕着“大陆政策”仔细琢磨。他们研究历史，研究少数民族南下的进军路线。

北方马背民族南下成功的经典案例有二：蒙古和满清。

蒙古人首先灭了西北的夏和北方的金，完成北方的占领。蒙古人由北向南，但是在长江中游的湖北遇到挫折。后来蒙古人占领四川，

再向东占领云南，把南宋压缩到东南一角。最后形成合围，陆秀夫背着小皇帝在崖山跳海。

满清比蒙古走运。李自成的农民军逼得崇祯自杀。多尔衮打败李自成之后占领北京，随后兵分两路，一路过山东向南，一路经中原向西南。鳌拜等人追逐张献忠到四川。满清原本很顺利，但是在东南推行剃发易服时遇到激烈抵抗，后以杀戮解决问题。

日本人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进军路线应仿效蒙古和满清，把中国精锐压缩到东南，灭掉；如果遇到反抗，以杀戮震慑。他们认为自己发现了历史的秘密，以为这样就能征服中国。

按照那个战略，首先要效法满清，从东北出发占领北京。随后从北京兵分两路，一路由北向南，沿津浦线进攻，拿下山东威逼长三角；另一路沿平汉线，占领中原，再占领西南。

日本为此进行了长期而周密的策划。他们伪装成商人、学生勘测进军路线。日本军校有一门写生课程，并不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艺术细胞，而是要练习绘地图的能力。未来走上绞刑架的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都曾秘绘过中国地图。按照既定战略，日本需要拿下北京。

九一八事变，日本测试出列强的虚弱。当时仅仅一个苏联存在，列强便投鼠忌器。六年过去，纳粹德国已经露出獠牙，英法美更没心思“主持正义”了。

蒋介石浪费八年时间证明“攘外先安内”不可行，同时期的日本并不太平，各派角力异常激烈，新仇旧怨交织在一起，堪比中国各派军阀。长州藩控制的陆军和萨摩藩海军的旧怨依然是解不开的死结，

若非向外扩张，很可能发生内战。旧怨难解，新仇更强烈，日本军方分裂为统制派和皇道派，拔刀相向。

所谓统制派，以裕仁天皇的“巴登巴登集团”骨干为核心，成员包括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等人。他们身处高层，主张用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改造国家，建立“军部”控制的法西斯政权，对外扩张。所谓皇道派，核心人物是荒木贞夫（精神领袖）、真崎甚三郎（核心）、小畑敏四郎（皇道派组织者）等人，他们代表下层军官，主张“天皇”直接统治军队、建立法西斯政权，试图用暴力推翻内阁，清君侧。两派斗争异常激烈。

裕仁天皇老谋深算，起初利用激进的皇道派威胁压制国内军阀和元老，凡不配合者就可能被刺杀。陆军大学校长荒木贞夫对学生滔滔不绝地灌输他自己的思想。真崎甚三郎则是坚定的执行者。皇道派那些下级军官越来越过分，整天喊打喊杀，惹是生非。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六年，日本经历了五任首相，其中四位面临恐怖威胁！

裕仁天皇真正支持的统制派躲在幕后，利用“巴登巴登集团”成员控制军部。正是这个决策让他在战后免遭清算。随后皇道派逐渐失势，真崎甚三郎决定大干一番。

一九三六年六月，就在蒋介石和桂系闹矛盾之际，裕仁天皇批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同年八月七号，日本五相会议通过《国策基准》，具体规定了侵略中国的战略方案，并制定一九三七年侵华计划，开始增兵华北。

八月十二号，西安事变前夕，真崎甚三郎杀掉统制派首脑、“巴登巴登集团”核心、号称日军第一大脑的永田铁山！看看这内斗，比中国还强悍。如果永田铁山不死，轮不到东条英机当头号战犯。皇道派组织者小畑敏四郎转入预备役。“巴登巴登集团”四位核心人物损失一半，只剩东条英机和冈村宁次。冈村宁次政治能力不足，东条英机登上历史前台。

东条英机生于一八八四年，他的爸爸是陆军大学首届毕业生，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因被长州藩系排挤而不得志。所以日后东条英机得势之后努力铲除长州藩势力。和那个时代的所有精英一样，东条英机毕业于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和那个时代所有人不同的是，东条英机比绝大多数日本军人更狂热。

日军内部，永田铁山属于众望所归，东条英机毁誉参半，石原莞尔很另类。永田铁山看重东条英机的行动能力，石原莞尔认为东条英机一无是处。东条英机和石原莞尔是天生的冤家：石原莞尔表面吊儿郎当，但狂热而不失理性。东条英机表面一本正经，骨子里相当狂热。石原莞尔反对扩大中日战争，东条英机坚决扩大中日战争。石原莞尔看不起东条英机是上等兵，东条英机直接把石原莞尔弄成预备役。

一九三七年，在河本大作策划皇姑屯事件、石原莞尔策划九一八事变成功之后，中日战争爆发前夕，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军参谋长，一手策划了卢沟桥事变。卢沟桥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掌握了这个据点，

进可攻退可守，可切断平汉线，包围北平，占领华北。

借口还是老一套：一个士兵在演习中丢失，开火。

宋哲元指挥二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但无法抵挡日军的优势兵力和火力。日军于八月底占领平津。随后八年，是日本战争狂人走向绞刑架的八年，也是蒋介石再次赢得光照神州之机遇的八年。八年抗战，八年血光，能坚持到最后才是胜利者。

根据历史周期律走势，中国近代史属于被动性体制更迭。中华帝国原本在历史周期律第二个层次内缓慢运行，突然面对工业文明，加速解体。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周期律第四个层次上依然落伍，无法面对列强。但列强必须面对。相比帝国时代，英国只想要白银，沙俄只想割土地，日本实力还不够。蒋介石时代，中国暴力升级，国力更为衰弱，依然围绕农耕运行。日本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国力逼近巅峰。为了更为直观地展现双方差距，我们需要回顾一些细节。

一八四一年，三元里的老百姓抗英尚能取得局部胜利。因为那时候英军的枪炮还比较简单，前膛枪和前膛炮还有很多缺陷，容易受客观条件（下雨）限制。

一八六零年，英法联军改用后膛枪和后膛炮，在八里桥会战中屠杀了增格林沁的蒙古骑兵。那支骑兵是清帝国最后的精锐，使用冷武器和简单的火器。

一九零零年的义和团运动，团民只有冷兵器，面对列强或清军，毫无还手之力。因为当时清军的武器已经胜过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英法联军。列强已经开始装备机枪和巨炮。

抗战开始那会儿，列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轻重武器都

达到一个巅峰。步枪、机枪、冲锋枪都是基本装备，重炮、坦克、飞机已经广泛运用。极端情况下还有各种毒气之类的生化武器。作为史上最无耻的军队之一，日本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内战，不论是蒋介石还是地方军阀，军队数量和装备均有所提升，但很多队伍还配备大刀队。比方说冯玉祥西北军的大刀队，还能让很多军阀胆寒。中国各派系军队能装备“汉阳造”（八八式步枪，前身是德国毛瑟系，洋务运动产品，一直使用到一九四四年，为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轻武器）都算是精锐部队，和日军“三八式”存在代差，在射程和精确度上差距明显。蒋介石嫡系装备的“中正式”步枪性能上不输“三八式”，但枪身短，不利于拼刺。

轻武器本身的差距还算小的差距。因为中国工业水平落后，正宗的“汉阳造”只是小部分，大部分是各地的山寨版，性能又差一截。如此一来，双方差距更大。所有武器装备中，轻武器的差距是最小的。重武器如机枪、坦克的差距就更大了，因为民国根本就没法生产。随着抗战的推进，国军精锐方才装备了一些机械部队（如杜聿明第五军）。

战场的根本是士兵。正是士兵这一栏，是中日之间差距最大的。日本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几十年，战士从精神到身体，都非常强悍。帝国崩溃，国人精神迷茫；民国虽然诞生，却并没有完成真正的统一，国人的精神依然处于分裂的状态。国军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严重。军队士气方面，日军占绝对优势。中国一直在战争，民不聊生，身体素质都跟不上，和日军相差甚远。中国战场上的日军，虽然武器占据压

倒性优势，但更喜欢白刃战。除蔑视中国军队武器不行，就是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强。战争之初，一个日军可以对付好几个中国军人。但在其他战场上，例如对英美军人，日军就很少大规模拼刺刀，因为占不到便宜。

这些都是细节，农耕国家对工业国家的细节。战场上，很多时候，细节决定胜败。要抹平那些差距，必须在其他方面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生或死，要选择。站着或跪下，要选择。每每想到那些时刻，《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便浮现在脑海。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进！

那是一场历史大戏，一个伟大民族浴火重生的大戏。

那是一个历史拐点，一个伟大文明低谷反弹的拐点。

只要人类文明史继续存在，那场戏，那个拐点都将被记载、被反

思。那八年的时间有太多的画面，那画面有太多的苦难，太多的血光，太多的英雄，太多的故事，太多值得说的东西。我想我没有能力再现那个画面，也无法全面描述所有的英雄和汉奸，但我必须、也会努力去诠释画面的脉络和拐点。

二章 横向战线的聪明和愚蠢

破敌

战争的本质是破敌。

提起中日战争，不少人的感觉是老鼠差点掀翻大象。实际不是那回事。一九三七年的日本控制的领土大约有两百万平方公里，均能有效利用。中国能控制且有效利用的土地只有长城以南除新疆和西藏的部分，也就四百多万平方公里。开战之后，华北和长三角迅速丢失，能掌控的资源 and 土地已经处于劣势。

在一场生死存亡的较量中，破敌须做好三方面的功课：战略，战役，战术。

战略上无法破敌，战役赢得再多，战术再怎么漂亮，最后还是失败。

战役上无法破敌，会造成惨痛的损失，如果战略得当，最后还是能胜利。

战术上无法破敌，仗会很难看，如果战略和战役指挥得当，最终还是能胜利。

战略能破敌，战役和战术失败，那么最后只能是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的惨胜。这项功绩首先要归功于所有不甘于当奴隶的中国人，活着的或死去的。功劳最大的两个人是领导正面抗战的蒋介石和敌后游击的毛泽东。

蒋介石的贡献：领导国军打破日军既定战略，以空间换时间。

毛泽东的贡献：领导共军在敌后开辟根据地，提供持久战的理论基础。

用一句话概括正面战场：国军赢了战略而输了全部战役和部分战术。

按照日本既定战略：以四十到五十万兵力、三个月时间拿下大城市，逼迫国民政府投降。具体措施：拿下北平之后沿津浦线和平汉线南下，复制蒙满落线，把蒋介石压缩到东南，聚而歼之。如此战略之下，日本机械化部队会穿过华北平原，抵达长江沿岸的南京和武汉。按照那种方式拼力量，中国无论如何都不是对手。中国或许能赢一两个局部战役的胜利，但战略上是失败的。一旦有生力量被压缩到东南，在海陆空的打击之下，只能是南宋的结局。

欲破那个战略，只有两种办法：对内或对外。

对内破解法：利用天时地利与人和，抵消硬件装备之差别。

对外破解法：寻找强有力的帮手。

基于这两个考虑，蒋介石把决战地点选择在上海：一个极为合适

又极为不合适的战场。

从外部看，上海极为合适做战场：上海号称东方巴黎，国际性大都市，列强租界林立，战火容易引起列强干涉。蒋介石清楚地记得，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情形。蒋介石天真地认为，只要在上海打起来，破坏了列强的利益，列强就会阻止日本。如果换成别的年头，或许有可能，一九三六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订盟约，出兵莱茵区。淞沪会战之际，希特勒正要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在一九三八年如愿以偿。英法美默认之。

从内部看，上海极为不合适做战场：低洼海滩，无险可守，日本海军可以直接攻击中国阵地，对装备处于劣势的国军极为不利。但是能把日军引到上海，即破了日军的战略。因为日军即使拿下上海，也只能沿长江向上进攻。长江流域河流密布，出了长三角更是山峦起伏，越向上越难以进攻，日本装备的优势将大大降低。

淞沪会战开辟了原本不存在的横向线争夺，击破了日军的战略构思，蒋介石大功一件。

但是在战役组织和战术方面，国军只有一个字：糟。

双方参战兵力对比：日军八个师团（每个师团人数在两万两千到两万五千不等）和两个旅团，约二十万人。国军前后投入四十八个师、十五个独立旅，加上中央教导队等部队，超过六十万人。兵力上国军占优势，但因军队腐败和派系问题严重，整体难以协调。比方说蒋介石原本想让陈诚担任战区长官，因资历太浅而作罢。冯玉祥名义上是战区司令，实际上没有一兵一卒。战争指挥权在顾祝同手里，顾祝同

并不以军事能力著称。而日军头脑里塞满军国主义精神、训练有素、战术思想严谨而统一，如同战争机器，攻击性极强。

兵贵精而不在多。日军不仅仅是陆军，还有压倒性的海军和空军。日俄战争之后三十年，日本海军在萨摩藩人手中取得长足发展，原始航母已经服役。战场摆开，日军四艘航空母舰带着几十艘军舰停泊在长江口，火力可以覆盖整个战场。四百毫米口径巨炮的破坏力超过国军一个炮兵营。战斗巅峰，日军可用于对国军同时开火的大炮多达一千二百门。这还没算日军随时可以出动的几百架飞机。国军完全被日军的火力压制，白天在战场上抬不起头，晚上又找不准方向，很多时候放空炮，显得可怜又无助。

李宗仁说：“当时我军参战约五十余师，战斗兵员在七十万左右，约全国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当时淞沪战场离苏嘉铁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投入战场人数既多，然而上海是十里洋场，四面平旷，无险可守，日军陆海空三军的火力可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来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如此情况下，把中国半数兵力投入到狭窄的战场上组织一场规模巨大的战役，很愚蠢。但这仅仅是淞沪会战犯下的愚蠢错误之一，还不是最愚蠢的一个。最蠢的错误是在撤退时变成溃退，精兵变成散兵。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竟不分步骤，全线尽撤，绝无规律，痛心盍

极！”他却忘了，他自己应该为此负主要责任。

打仗一辈子的蒋介石，怎么会忘记组织后撤的事儿呢？两个字，天真。他以为只要在上海坚持三个月，列强就会干涉。用顾祝同的话说：“国际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侵略行为，所以委员长有意要贵师留在闸北作战……尽量争取时间，换取友邦同情。”

仿佛军队不是抵抗侵略者，而是打给外国人看。用顾维钧的话说：“是运用这些军队坚守上海，从而在国外产生心理上的效果呢？还是要后撤到一个偏僻角落进行战斗。这地方不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会有任何人表示关心，但损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在什么地方，战斗是为了什么。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国最大利益……所以我们主张政府尽可能坚守上海一线。”

但是列强并没有表示同情，整个战局就落成那个样子。用战后汪精卫的话说：“战被动、和亦被动。就战来说，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横著一个‘战给国际看’的念头。中苏缔结《不侵犯条约》当时，武断苏联必于三个月内出兵参战。《九国公约》国在比京开会时，武断会议结果必能制止中日战争，一切战略因此之故，皆处被动，以致败坏不可收拾。”

九一八事变过去六年了，还没有放弃对列强的幻想，悲。

血战三个月

战争从八月十三号开始，到十一月二十六号结束，前后三个月零十三天，打破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战略。在战役组织如此糟糕的情况下，还能达到战略目的，只能依靠将士的决心和勇气，这是以血肉之躯换来的成功。

冯玉祥说：“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无数部队填进去就融化了！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

淞沪会战之前，中国已经在内忧外患中动荡了百年。无休止的内战中，清政府垮了，北洋政府垮了，到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至于外战，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国人已经患上恐惧症。要知道从民国元年开始，军人就没打过外战，面对外敌挑衅基本上能忍就忍、不能忍强忍。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九一八事变。因此大片国土丢失，军人背负骂名。他们都需要一个机会洗刷耻辱。也许他们不想和外敌作战，但是在那个时代，如果军人不能洗刷耻辱，那么中华民族就会灭亡。那是历史的宿命。

百年屈辱、百年积怨促使他们同仇敌忾。所以淞沪会战出现这样一幕：不论地方杂牌军还是中央军精锐，均能视死如归。正是他们的悍不畏死，才能在上海那样一个不适宜作战的战场上打破日军的战略规划。

杨森是标准的军阀，曾经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占领重庆和成都，后被刘湘击败、逃出四川，再后来又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杀回四川。吴佩孚失败之后，杨森又投靠蒋介石。蒋介石怂恿他打汉阳，结果被唐生

智击溃，失去争雄四川的资本。抗战开打之际，杨森的部队为二十军，在云南，开赴淞沪战场后归第六集团军的薛岳指挥。

按照正常思维，杨森的队伍战斗力一般，兵油子众多，即使在内战战场，都是不值得信赖的。但在淞沪战场，那帮兵油子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强悍。顿悟寺是最残酷的阵地之一。杨森带着二十军奔赴战场之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重新夺回顿悟寺，并坚守之。

夜幕来临，二十军 804 团团长向文彬带队冲锋。经过一夜的冲杀，占领顿悟寺。但是第二天白天，日军的炮火呼啸而来。一天之后，阵地守住了，但向文彬的一千人只有两百人能走下来，中下层军官只剩一个营长和四个排长。

杨森的二十军坚守了七天，打退日军无数次进攻。双方杀得尸横遍野，战场上到处是断臂残肢。二十军伤亡惨重，轮换下战场之时队伍基本瘫痪，但也让日军付出了血的代价。

地方军阀队伍尚且如此拼命，中央军精锐同样不含糊。

桂永清是黄埔一期毕业生，随蒋介石东征时因贪财险被枪毙，北伐随何应钦在东路立功不少。革命军和孙传芳大战于龙潭，桂永清坚守桥头主阵地，打退孙传芳部多次进攻，最后还俘虏七千人，大出风头，随后去德国留学，为重点培养对象。桂永清回国后吹捧蒋介石：“德国出了一个希特勒，德国复兴。中国有了蒋校长，只要大家拥护，必然可以复兴。”深得蒋介石欢心，被任命为中央军教导队总队长。

教导队是嫡系中的嫡系，德籍教官、德式训练、德式装备，包括炮兵连、工兵连、骑兵连、迫炮连、特务连及通信连，为各军种之楷

模。淞沪会战开始，教导队副队长周振强带领教导队第一团攻击公大纱厂日军阵地，可惜缺乏海空炮火优势，伤亡惨重。何应钦原本打算让桂永清带着教导队到长江上游，为日后抗战留下火种。桂永清却召集教导队军官慷慨陈词：“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到后方扩军，大家升官，我升集团军总司令，你们营长升团长，团长升师长，旅长升军长。另一条是到前方作战牺牲。长期以来，其他部队拿国难薪，只有我们拿全薪，论装备我们是全新德式。现在全国部队纷纷请缨参战，我们却到后方扩编，虽属命令，扪心自问，能无愧疚？”结果全体军官一致要求上火线。

战争过程中，教导总队的任务是进入苏州河八字桥接替胡宗南第一军防线。桂永清亲自督战，阻止日军强渡苏州河，和日军杀得天昏地暗。淞沪会战结束，教导队打成一支空壳军。随后南京城下，那支残兵再遭重创，再也没能恢复元气。

陈诚是蒋介石最宠爱的将领（之一），经过北伐和中原大战，陈诚已经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国军内部，他通过经营十一师和十八集团军建立了自己的“土（十一）木（十八）系”。蒋介石希望通过陈诚制衡黄埔元老派。陈诚参与了国军抗战过程中的全部战略决策。淞沪会战，陈诚指挥第十五集团军，负责宝山以北的防区。最残酷的战斗发生在罗店镇。

罗店交通发达，向南可达刘行、大场，威胁张华浜；向西可到嘉定、安亭，占领宁沪铁路线。松井石根（裕仁天皇心腹之一，日后上绞刑架的主角之一）认为，控制罗店，就掌握了淞沪战役的主动权，

便指挥第三师团抢占罗店。张治中发现日方企图之后汇报蒋介石。蒋介石命十一师占领阵地，残酷的争夺战开始了。

罗店镇只有三平方公里，而且镇的四周小河、小水塘多，双方展开拉锯战。八月二十五号，松井石根指挥十一师团向罗店进攻。双方从中午打到晚上，多次贴身拼刺刀，均伤亡惨重。日军退去之后，十一师长彭善错误判断日军当晚不会进攻。松井石根恰好当夜增加兵力去进攻，并依靠优势火力攻击到第二天，经过疯狂的五次冲锋之后，攻占罗店。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越过陈诚，急令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夺回罗店：“如果不在中午前夺回罗店，军法审判！”罗卓英不敢怠慢，命令三个师去夺阵地。由于地方太小，容纳不了那么多兵力，每个师各派两个营，轮番冲锋：“只许前进，不许后退，谁后退便毙了谁！”

双方杀得天昏地暗，国军拼死拿回阵地。但日军一轮炮击让国军伤亡惨重，随后再次发起冲锋，又把阵地夺了回去。阵地得而复失，罗卓英心急如焚。蒋介石依然在电话里大叫，拿不回阵地就开枪自杀（军事法庭都不用去了）。

新一轮冲锋开始前，师长彭善对旅长蔡炳炎说：“反正我们师的弟兄们都要死在这鬼地方了，你就准备带着弟兄们出击吧，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快告诉我，如果你回不来，我负责照顾你家的一切。”蔡炳炎回应：“战死也是死，自杀也是死，反正是一个死字，不如和小鬼子拼个鱼死网破。我家里的事就别提了，再大也是小事，国亡了，家就完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不是敌生我死，就是敌死我生！”说

罢，带着两个营的兵力，冲向战场。

经过两小时的殊死搏斗，国军以决死气概再次夺回阵地。蔡炳炎刚松了一口气，日军炮弹飞来，蔡炳炎倒在血泊之中，殉国。

生死就在一瞬间！

陈诚赶紧让十四师增援罗店。师长霍揆彰和参谋长郭汝瑰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决定正面迂回、侧面包抄夹击，经过一番苦战，重新占领罗店。日军再次组织兵力，依仗猛烈的炮火夺回罗店。中日精锐部队如此争夺，小小的罗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九月二号，陈诚见部队伤亡严重，想把阵地后撤五公里。蒋介石告诉陈诚：“罗店至关重要，必须限期占领。要求将士有进无退，有我无敌，不成功便成仁！”接下来两日，陈诚未能组织人马夺回罗店，蒋介石大发雷霆：“今天夺不回罗店，师以上军官统统就地处决！”好吧，那或许是蒋介石说过的最狠的话之一。

陈诚把攻坚任务交给十四师。参谋长郭汝瑰写下遗书交给师长霍揆彰：“拿不下罗店，请你将我的遗书交给我的家人。”随后带领两个团冲向罗店。当日傍晚，国军将士再次舍命拿下罗店，跟随郭汝瑰冲锋的八十三团只剩十二人。

战争打到这个程度，活人和死人的距离已经很近了。上一秒活，下一秒可能就死。凶狠的日本人也胆颤了，称罗店为人肉磨坊。确实，血肉磨坊，很形象。

如此残忍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十一月初，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对上海形成大包围圈，国军必须撤退。此时陈诚的十八军和桂永清的教

导队一样，只剩一个空壳。死去的人或活着的人都是英雄。英雄气在，神州不沉。如同鸦片战争中的葛云飞，如同甲午战争的左宝贵、邓世昌一样，上不愧天地，下不愧自己，前不愧祖宗，后不愧子孙。

悲

淞沪会战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军人流血牺牲，如果不能达到战略目的，便是领袖的失误。蒋介石试图利用淞沪会战把日军主力引向长江流域的战略值得肯定。但是上海本身是一块战役上的死地，在那里和日军血拼，损害巨大。

损害之一：全国半数精锐部队投入到上海，直接伤亡数十万，却没有引来列强干涉。如果把投入上海的兵力以南京为中心在长三角层层设防，日军即使拿下南京城也要付出更多的有生力量。日军侵华，兵力并非无限。

损害之二：因为没有纵深防御，撤退的士兵在日军追杀之下成了散兵游勇。国军十一月十二号从上海撤退。十八天之后，日军便到达南京。

第二件蠢事，在明知南京守不住的情况下，没有疏散市民。

日军在十二月十三号攻陷南京，随后实施持续六周的大屠杀。

近代中国弱势，遭受各种欺凌，但列强的全部欺凌加在一起都不如日本一国残酷。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大屠杀、北伐时代的济南惨案、东北“七三一”部队的活人实验。残忍程度，罪恶程度，放在人类历

史上都极为罕见。南京大屠杀是那些罕见事件中的罕见特例。

我不想去描述那些场面。直到今天它依然是鲜血淋淋，依然是白骨森森。它是国人心中最深通的伤疤之一，是华夏大地上最深重的伤疤之一，是世界文明史上最深重的伤疤之一。这里我不想去描述那些场面，谈谈一些外围的东西。

之所以说是国人心中的伤疤，是因为数十万同胞遇难造成的哀伤、痛惜、甚至仇恨难以消散。那种哀伤萦绕在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心中，那种痛惜刺激了许多志士，那种仇恨至今撕咬着很多人，并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消散。

自古以来，华夏大地就是时光老人眷顾又嫉妒之所。这里曾经有无数辉煌，有各种人物英灵长存。这里也是多灾多难之地。历史周期运行，王朝更替起伏，百姓苦。被日本仔细研究的蒙满马背民族南下，就伴随着各种杀戮。蒙古人屠城，满清人留发不留头。近代也有曾国荃屠戮天京。但是这些和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性质。如果日本的行为发生在野蛮的帝国时代，那么把它作为野蛮史的一页，翻过即可。但日本是东方世界第一个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国家。

蒙满南下，性质就是古代通行的野蛮征服。帝国时代，东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都是明摆着的，也必然要被文明淘汰的。日本侵华过程中的屠杀，完全是研究历史之后做出的针对性战略决策，是有意而为之。

回顾一下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它是华夏文明圈的一员，因工业文明入侵而第一个脱离华夏文明圈。回顾一下日本的大陆政策，明治

维新前后的那些人都有深厚的汉文化功底、推崇宋明理学。侵华的那些人，如石原莞尔、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都是中国通。和陈诚对阵的松井石根也对汉文化了解很深，也是中国通。正是他们制定并执行了屠杀。

他们披着文明的外衣，打着文明的旗号，玩屠杀。进入工业时代以来，还在玩大规模野蛮屠杀的只有军国主义的日本和纳粹德国。

纳粹一边宣传建立世界新秩序，一边建立各种集中营。

日本一边宣传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一边各种屠城。

两者把世界文明的毒瘤当成文明本身，却又是近代工业世界的集大成者。所以它们是世界文明史的伤疤。它们的所作所为告诉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有时候很致命。更为致命的是，日本迄今为止并没有彻底反省那一切，那也就意味着，战争可能再来一遍。

日本希望用疯狂的屠杀瓦解国人的抵抗意志。但是日本人想错了。如果依靠屠杀可以征服中国，那么中华文明早已灭绝。日本人看见蒙古人成功，看见满清取代明朝成功，看见蒙满成功时的血腥杀戮，也跟着学习。其实他们不了解中国历史。不论任何层次的历史周期，中国的历史趋势都是大一统。自古以来华夏文明除了农耕部分，还有游牧部分。宋朝没有真正意义上统一中国，在鼎盛年代也没能控制平津一带，实际上就是第二次南北朝。灭了南宋的是北方汉人。明朝亡于内乱，而非亡于满清。中国从没有被纯粹的外敌征服，更没有被野蛮的武力征服。特别是在近代民族意识觉醒之后，蛮力更不可能征服中国。所以南京大屠杀没有换来国民政府投降，而是继续抵抗。答案在

纵向线上。

三章 纵向线之争夺

日本预设的战略计划是由北向南，具体行军计划有两路。一路沿津浦线向南，拿下山东、安徽，兵临南京。另一路向西南，拿下中原之后挺进长江中上游。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很快拿下平津，在南口遭遇汤恩伯狙击。

蒋介石喜欢用浙江背景或黄埔背景的人，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均拥有双重背景。与陈诚善于彰显与众不同和胡宗南老谋却未必深算不同，汤恩伯把国军的优点和缺点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抗战之初，国军表现可用四个字形容：虽败犹荣。抗战后期，国军也可以用四个字形容：惨不忍睹。

汤恩伯生于一八九八年，和陈诚同龄，浙江金华人，通过各种层次的学习后进入军校，得到老革命党陈仪的赏识，去日本士官学校进修。回国后，汤恩伯跟随恩师陈仪在孙传芳帐下上班。孙传芳败退后转到蒋介石那里，通过一番关系，到黄埔军校当教官。汤恩伯并非蒋介石嫡系，因写了一本兵书赢得蒋介石的信任（类似于冯国璋写兵书送给袁世凯）。

汤恩伯喜欢模仿古代名将，他早期经常出现在基层各个地方，赢得一些美名。中原大战后升任师长，剿共过程中升任军长。抗战爆发，

汤恩伯为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率嫡系驻华北。日军占领平津后，可以直接进入华北平原入山西、临中原。

南口位于北平西北四十五公里，为居庸关南侧的长城要隘，有“绥察之前门，平津之后门，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千百年来，它的主要功能是防御京城免受威胁。如今它成了抵御来自京城盗寇的屏障。

八月七号，淞沪战役开打前几天，日军甲种师团板垣第五师团为主力向南口进攻。南口战役规模不大，但战斗相当激烈。国军占地利优势，据险防守。但日军有火力和装备优势。

日军把重炮排列好，周围用坦克车圈起来，以防国军的进袭，不停开炮。国军临时掘的工事挡不住重炮轰击，兵士只好每两人为一单位，在山石上掘开一个小小的隐蔽洞。日军每发炮弹只能打掉两人。但日军火力猛烈，一步一弹，杀伤力很大。

十三军也是国军精锐，下面有两个整装德械师，装备和训练都不错。他们死守阵地，绝不后退。日军冲锋，被打退。如此这般恶战了半个月。八月二十六号，蒋介石给汤恩伯的命令仍然是死守不退。但日军优势明显，坦克逐渐突破国军的防御阵地。与此同时，刘汝明支援不力。汤恩伯明白，再不撤，必然全军覆没。

八月二十七号，日军坦克冲入南口工事，守卫山头的国军大部分殉国。板垣征四郎感叹：“13军毕竟是支那军精锐，皇军在南口遭到了坚强的抵抗。”按照当时的力量对比，十三军能阻挡日军一个甲种师团二十天，已经非常不容易。汤恩伯一战成名。但成名后的汤恩

伯日后精明过度，台儿庄会战就不再出全力。日后经营河南，更是只顾自己不顾百姓，搞得民怨沸腾，被河南人称为“汤灾”，何其可悲！

南口战役之后，日军西进，先后占领张家口和大同，逼近雁门关和平型关。太原会战爆发。太原是第二方面军辖区，也是阎锡山的老巢。阎锡山以第二方面军司令的身份主持会战。如果说太原会战和其他会战有何不同，那便是八路军登上了历史舞台。

第一场局部胜利

抗战开始，共产党在洛川开会研究对策。毛泽东说：“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八路军高级将领战意很浓。彭德怀建议：“用我军擅长的运动战打几场歼灭战。”彭德怀认为：八路军只要有二十万军队，有国民党嫡系部队那样的装备，再加若干炮兵，凭险防守，机动出击，日本人是攻不进山西的。林彪表示：“内战时期我们可以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可以考虑以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最后毛泽东总结：“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他，轻看他。同日本人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作战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采用的策略应该是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为配合国军正面作战，八路军三个师开往前线，林彪的一一五师开往平型关。他们的任务是骚扰敌后，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包括一二九师奔袭阳明堡机场在内，最有代表性的一次行动便是平型关战斗。

林彪，共和国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位，混乱时代最为璀璨的将星之一。

他是那个时代的韩信，也是那个年代最卓尔不群的统帅之一。

他出生于黄埔，也是黄埔的标志。

他是沉默的，沉默的天才。

他是战争艺术家。

林彪最大的特点就是看地图。林彪说：指挥员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决心和信心。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进行实地勘察，校正地图，把战场地形和敌我双方的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景，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

一九三七年，林彪紧锁浓眉、犀利的目光聚焦在平型关。通过各方面沟通协调之后，中共决定由林彪指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和鬼子打一场。林彪知道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斗。大道理就不说了，此战打胜，将开创抗战以来战胜日军之先例，那是无上的荣耀；若失败，之前战争中的英明也都是明日黄花。但是林彪就是林彪，敌人越强，战意越浓。没走上战场，林彪已经把精神意志提升到顶点。作为前敌指挥官，林彪的任务是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在天时地利人和等所有有利因素都在自己这一方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雄鹰般的迅捷撕下猎物，然后迅速隐蔽。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超出常人的冷静，精益求精的算计，残酷无情的部署。可以有仇恨，决不能被仇恨蒙蔽了眼睛。

天时：不利也有利。

八路军是九月二十四号晚开赴预定战场埋伏的，为了隐蔽，选择了小路走。天黑，小路肯定不好走。偏偏又下起了大雨，更不好走了。一九三七年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的晋西北，到阳历九月下旬已经很冷了，冷雨夜行军非常艰难。李天佑回忆：“每个人只得拽着前面同志的衣角，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前赶，一不小心，就会摔倒。行军速度慢下来了。我们希望多打雷闪，好趁着刹那亮光放开步子往前跑……最糟糕的是山洪暴发了，而我们却要沿着一条山溪绕过来趟过去。浪涛咆哮，水深齐胸。有几个战士急于趟过去，被水冲走了……战士们把枪和子弹吊在脖子上，手拉着手结成一条坚固的链索，向对岸趟去。九月末，这里已经降霜了，河水寒冷透骨。战士们不声不响地同山洪搏斗，趟过去趟过来，不下二十多次！许多人的牙齿碰得咯咯响，我也感到两条腿麻木了。经过大半宿的艰难行进，我们快赶到目的地时，天亮了，雨也停了。这时我才看清忍受了一夜寒冷和风雨的战士，一个个唇青嘴乌，有的因为摔跤过多，滚得象个泥人。队伍在公路南的山沟里隐蔽下来，天还是阴沉沉的，冷风飕飕，又不许生火，战士们只有咬牙忍受，让沸腾的热血来烤干湿淋淋的衣服。”将士们从雪山草地过来，能克服严酷的自然环境。

地利：主战场是一条十公里的山沟，对八路军有利。八路军就是在山沟里锻炼出来的，啥环境没见过？日军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离开城市依托和先进装备就玩完。八路军占据高地，俯冲而下。日军只能在躲在汽车周围，伺机夺路逃命。

人和：对八路军有利。

这是中国的地盘，八路军主场作战。想知道主场作战的优势么？李天佑回忆：“一路上（行军途中），有多少事情使人激动不已啊！我们每到一地，那些拄着拐杖的老大爷、老大娘、怀抱婴儿的母亲、热血沸腾的青年男女，就悲喜交集地围拢来，询问我们是不是上前线打日本队伍。当我们回答说：‘我们是八路军，是上前线打日本侵略者的。’他们便转悲为喜，脸上立刻露出希望的微笑，接着便把大量的食品、香烟塞到我们手里。”

九月二十五号，八路军经历了艰难行军到达预设阵地，在冰冷的空气里等待日军。

进攻平型关的日军属于板垣第五师团二十一旅，一共四千余人。板垣是个中国通，基本上参与过鬼子在中国干过的、在干的、将要干的所有坏事。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徒步勘察过进军路线，知道平型关一带很重要，但防守薄弱。所以拿下大同之后，就想快速抢战平型关，直插太原腹背。正是因为战前勘察过地形，心里有底，才会搞出几千人冒进。板垣以为他的对手只是晋军，没有计算到林彪已经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带队迂回到平型关等着他。

按照国共双方事前商定，平型关一战为国共联合作战。林彪带着一一五师，以陈光的三四三旅担任主攻，以徐海东的三四四旅辅助。国军方面第七十一师、新编第二师、第八独立旅一部协同作战。现在大家的印象是平型关之战是一一五师伏击鬼子的一个运输大队，实际上不是那样。按战略计划是，国共双方约三个师伏击板垣第五师团二

十一旅的那四千人（三个大队），只是后来出现了偏差。

战斗从八路军的阵地上打响。日军一千多人的运输大队进入那条山谷中，还在哇哇乱叫，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当枪弹倾泻而下，日军洋洋自得的表情僵硬在脸上。原来他们并非不可战胜，并非牛气哄哄，只是没有打到要害而已。只要把他们打痛，他们也会像所有遭受打击的可怜虫一样，哇哇乱叫，仓促应战，在混乱中求生存。

林彪的战术也就是共军经典的伏击套路：拦头、拖尾、斩腰。

甲午战争以来，日军已经习惯了中国军队的溃散。然后他们接收地盘，抢劫、强奸、放火、偷盗，展现鬼子本质。他们想不到竟然有人敢于主动伏击他们。

他们更想不到，给他们这盘大餐的设计者，是林彪将军。这是现在写在史书上的设计，查一查史料就能得到的。平型关之战，原本还有另外一种设计，把附近的四千鬼子全部干掉。

林彪整日整夜看地图、看地图、看地图。据他的警卫员回忆：看地形回来，人累得不行，一躺下就睡着了。半夜醒来，发现师长还没有睡，他的眼睛紧盯着地图，锁着眉头在沉思。那一刻，我觉得师长的影子是那么巨大。

是啊，巨人之所以是巨人，不是因为高大的躯体，而是强大的精神意志。

天才，百分之九十九是汗水，这话没错。战前李天佑去看望林彪，林彪刚刚设想好战术的最后一招：用四挺重机枪封锁鬼子的退路。

战斗的大致过程和设想的一致，但是过程并不完美。遗憾之一：

日军虽然乱，虽然被包围分割，成为板上鱼肉，却并没任人宰割，一一五师本身付出很大伤亡。

遗憾之二：另一侧的国军没有出战。如果国共配合，日军四千人估计走不掉几个。那样就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共联合抗战。

——可惜！可惜啊！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之所以敢一步步挺进中国腹地，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四分五裂，内战不断，不能拧成一股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黄埔学生汤恩伯在黄河以北和日军血战，黄河南岸的黄埔教官蒋鼎文竟然视而不见，等到日军绕过来，蒋老师一夜狂奔几百里。汤恩伯和蒋鼎文，都是蒋介石的心腹。如果中国能够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所谓抗战，何须八年！

整个平型关战斗，规模并不大，歼敌千余人，不算多；自身损失也不小，七百余人。但是结果相当积极。把一个运输大队的鬼子消灭干净，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如果说在遭遇战中打掉一千鬼子，也许算不了啥，最多算是伤其十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十指有伤，很快能痊愈。一指被断，心中会留下阴影。

但平型关战斗只是一场局部战役，不足以改变整体。整个太原会战最终还是失败了。虽然失败，总算赢了一场，鼓舞人心，意义重大。有小的胜利，就会有大的胜利。

台儿庄的血性

按照日本的纵向战略，另一个方向是沿津浦线向南，过山东威胁长三角。然而因为淞沪会战开打，纵向线变成主战场，津浦线的进攻变成次重点。山东省省长韩复榘不满于蒋介石在紧要关头将重炮团调给其嫡系部队汤恩伯而消极抗战，导致津浦线北段一溃千里，日军最精锐部队之一的矶谷师团，轻易突破山东北部和中部山区及黄河防线，占领济南。

蒋介石把韩复榘召到河南，就地处决。手段虽然残酷了一些（按照那个标准，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要被杀掉大半），但也无话可说。从日军立场看，必须拿下山东，必须从济南到徐州打一遍，打通南北、把国民政府封锁在内陆。从国军角度看，不论南京是否在，都必须努力守住山东，赢得一个面对海洋、争取外援之窗口。

徐州是连接南北之咽喉冲要，平汉线和陇海线交汇之地，为华北、华南和华中之间的交通枢纽。蒋介石赢得国民党领袖地位，就是因为打赢了以徐州为中心的中原大战，输掉大陆是因为输了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日军占领长三角的情况下，可以南北夹击徐州。

徐州必然要有一场大会战。

徐州会战归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指挥。国民党群雄中，李宗仁是军政两栖之人，他是桂系领袖，也是蒋介石党内最大的政敌之一。和顶级政治家军事家相比，李宗仁或许很一般，但在乱世之中算顶级强人。他不是能改变历史走向的巨人，但绝对可以独当一面。国共两党之中，独当一面的帅才都不少。但蒋介石把国民党中的帅才变成了政敌，毛泽东则让他们充分施展，这个区别最终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命运。

徐州会战，正是因为李宗仁的才能，充分糅合了中央军、原西北军、各地杂牌军，打出还算不错的成绩。

日军夹击徐州的关键在台儿庄。它地处徐州东北三十公里的大运河北岸，自古是南北漕运枢纽，为徐州门户。李宗仁把台儿庄正面抗击日军的任务交给孙连仲，一个近代战争史上不容忽视却常常被忽视的纯粹的军人。

孙连仲生于一八九三年，生得膀大腰圆，典型的北方大汉。他在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跟随冯玉祥征战。因头脑机灵，作战勇敢，受赏识，为冯“十三太保”之一。跟随冯玉祥参加过旧军阀时代的直奉战争，以及新军阀时代的中原大战。孙连仲是纯粹的军人，在战场上是最值得信赖的拳头。中原大战中，孙连仲东征西讨，让蒋军吃足苦头。战后西北军瓦解，孙连仲部被改编为二十六军。

抗战爆发，蒋介石提拔孙连仲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团司令，配合刘峙。然而东征北伐时代的猛将刘峙，到了抗战期间已经变成拥有若干老婆、若干房产的腐败将军，见到日本人跑得飞快，堪比叶志超当年，得长腿将军之绰号。蒋介石为树军威，把刘峙撤职，扶正孙连仲。台儿庄战役，孙连仲撑起了华夏军人的脊梁骨。

一九三八年春，日军矶谷师团等五万精锐部队南下，试图一举拿下徐州。李宗仁决定利用日军冒进之心在台儿庄打击日军。由于国军在临沂和滕县（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阵亡）的拼死抵抗，为台儿庄布防赢得了时间。孙连仲部署如下：台儿庄城寨由第三十一师一八四团防守；该师其他部队一部分防守台儿庄以西七里之范口村及以东约三

里之官庄，准备协同台儿庄核心之作战；另一部分沿大运河南岸布防。师长池峰城在城寨外指挥。第二集团军的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师和第四十四旅陆续集结于贾汪东北和台儿庄以南地区。

三月二十三日，两军对峙，发生零星战斗。

真正的战斗于二十四日打响：日军三个联队约六千人，在飞机、坦克、重炮的配合下，向台儿庄猛扑。孙连仲亲赴前线调令下属：“面临强大的敌人，我们只能依靠地形挡住它，再利用夜里的小突击拖住它。没有命令，决不撤退。”日军的炮火摧毁了台儿庄北城墙，从突破口冲了进来。

池峰城生于一九零四年，十七岁入冯玉祥部参军，一直跟随孙连仲东征西讨，在台儿庄战役中展现出中国军人的铁血风采。各路军阀中，晋军以防守为特长。晋军标志性人物傅作义对其他人不屑一顾，唯独对池峰城拜服，称他为“中国抗战史上一神人”。

当日军从缺口进来之际，三十一师装备处于绝对劣势，所有的兵法、经验、战术都是摆设，池峰城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敢死队贴近日军，肉搏。三十一师的将士们争相报名参加敢死队。明知有去无回，依然前往，真勇士！

入夜，五十七名敢死队员穿戴日军军服、钢盔，腰间挂满手榴弹，手持短枪，分数路爬墙入城，插入敌人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敌阵，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拼杀。敢死队员受伤倒下，便拉响身上的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激战至午夜，收复阵地。战斗结束后，英勇的敢死队仅剩十三人。池峰城亲自接见他们，决定奖励他们每人三十

块大洋。但战士们表示：“我们以必死的决心去战斗的目的，是要确保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不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是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比起死去的弟兄，我们是幸运的。如果收下了钱，我们将对不起死难的弟兄们。”什么叫真正的战士，这就是！他们铁骨铮铮，他们柔情似水。

池峰城率领三十一师如此这般和日军围绕台儿庄血战了八昼夜！池峰城已经不记得组织了多少次敢死队，唯一清楚的是，一帮兄弟出去，回来者寥寥。他们都是华夏大地普普通通的儿郎，原本该娶妻生子、侍奉爹娘，如今却因为盗寇侵我国土而成为忠骨。他们的死虽然遗憾，却重于泰山。他们的故事将在华夏大地长存。

贪婪的日军没想到会在小小的台儿庄受挫。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逐步蚕食台儿庄阵地。等到四月三号，日军已经把台儿庄占领了三分之二，并对外宣布完成占领。池峰城的三十一军已经到了极限，再拼下去就是全军覆没。他不忍看见兄弟们牺牲，便向孙连仲请示，能否转移阵地，暂时撤到运河南岸。

三十一师是孙连仲带出来的兵。将士阵亡，如同割他的心头肉。但第二集团军其他部分同样战事吃紧，也在组织敢死队。汤恩伯的二十军团迟迟未能就位，未能发起有效反攻。孙连仲把战场情况报告李宗仁，李宗仁告诉孙连仲：“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天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孙连仲表示：“长官有此决心，我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连仲亦以一死报国家。”孙连仲集合可用之兵，组成一个敢死队，夜

袭日军。

孙连仲给池峰城命令：“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过河者，杀无赦！”池峰城和残存的将士们明白军令如山，抱必死之决心，炸毁运河上的浮桥，背水决战，和日军逐屋争夺厮杀。日军也已筋疲力尽，于当日黄昏停止进攻。午夜，三十一军将士再次组织敢死队，日军溃逃，夺回三分之二阵地。

十月六号，国军完成合围。汤恩伯兵团迂回到日军侧后方，国军全面反击，日军溃散。

血战台儿庄，中国胜！

那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那是一场血肉拼出来的胜利。此次胜利固然荡气回肠，但仍然是一场战役性胜利。徐州会战，国军还是失败了，向西撤退。此次撤退没有重蹈淞沪会战覆辙。但蒋介石又干了一件愚蠢的事：掘开黄河花园口，试图阻挡日军西进，结果没能杀伤日军，却造成大面积黄泛区，中原大地百姓损伤惨重。

这便是纵向线战场。按照日军的战略，赢得纵向线，就可以胜利了。然而国民政府并没有被压缩到东南，而是沿着长江向上游搬迁到西南，共产党更是跑到敌后创建根据地。中国败而不亡。日本倒是逐渐陷入泥潭，来之不易的千年国运，依稀到了转折关头。

纵观国军抗战，并不缺乏英勇之将士，理当取得更多的胜利。然而国军内部最大的问题便是不团结。汤恩伯在南口和日军血战之时，刘汝明支持不力。林彪打平型关，国军支持不力。孙连仲顶在台儿庄，汤恩伯支持不力。

都是内战留下的裂痕。内战害人呐！

四章 节点和压力

日军叫嚷三个月灭亡中国，是建立在快速占领中国大城市，然后国民政府投降的基础上的。然而他们没想到，首先，战争走向和他们预测的根本不一致，主战场变成纵向线，一个淞沪会战就打了三个月；其次，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远比他们想象的坚韧狡猾。日军占领了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占领了党国首都，按说应该投降了。然而中国和他的岛国家乡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日本国土上，装甲车开足马力，用不了多久就跑完了。在中国随便跑。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随后迁往重庆，据说还有迁往西康的打算。总之是一路向西，决不投降。

淞沪会战，指挥官从冯玉祥到蒋介石，均僵硬笨拙，无辜牺牲很大。

太原会战，指挥官阎锡山没有精彩表现，除八路军赢得一场局部胜利之外，其他乏善可陈，但也没有出现淞沪会战那种无谓牺牲。

徐州会战，有了前面的经验之后，不仅没有出现刻板僵硬的牺牲，而且在局部战役中赢得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这就是进步。日军占领徐州之后向西扩大战果。兰封会战中，土肥原贤二的十四师团孤军冒进，差点被薛岳包了饺子。

一九三八年夏天，战争开始一年之后，日军纵向线和横向线进攻

到了一个节点，武汉。

开战一年，日军投入的兵力已经超过战前预算，被迫增兵。增兵的另一层含义是投钱。日本本土是岛国，资源匮乏；虽然占领了大片中国沃土，却没有时间消化。战线拉长，财政匮乏。武汉会战之前，日本被迫进入战时经济，颁布《国家动员法》。裕仁天皇召开御前会议：为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而发起致命一击。国军希望通过武汉会战迟滞日军。

节点，武汉

武汉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前面已经说过很多了，洪秀全、曾国藩、孙中山的兴衰均和武汉息息相关。武汉会战，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会战，中日战争的转折点。

战场涉及安徽、江西、湖北。双方投入兵力均超过淞沪会战。国军投入兵力过百万，日军投入兵力达三十万。但战斗态势发生了很大改变。由于之前数次会战的经验，国军改变部署“故欲确保武汉，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国军决定依托鄱阳湖设置要塞，阻止他们溯江而上攻向九江；利用鄱阳湖及大别山的地障与长江两岸的丘陵、湖沼，在武汉外围布置主力军，逐次和日军交锋，消耗日军力量。

主战场分南北两片。江北战场由李宗仁指挥，部队以地方精锐部队为主。桂系李品仙指挥第四兵团在安徽，依托大别山布阵。湘系廖

磊指挥二十一集团军依托太湖迎敌。孙连仲兵团游弋在武汉以北。但李宗仁没有重现徐州会战时的战绩，反倒是江南战场赢得了几场胜利。

江南战场由陈诚指挥。淞沪会战中，陈诚还只是一个集团军司令，负责战术执行，到武汉会战时，陈诚身为第九战区司令，湖北省主席，武汉卫戍司令，已经负责战略性工作，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实际战略地位已经超过何应钦，成为中央军内第二号人物，号称蒋介石的替身。陈诚的作风较为清廉，在湖北期间以军人风格主政（后期在东北以政客风格主军，惨败），禁烟禁毒，效果不错。

陈诚指挥的队伍以中央军精锐为骨干：第一兵团薛岳所部防守南浔线，并沿鄱阳湖配置兵力，以南昌为基地，以外线之势击破西进日军，防止日军进攻南昌及迂回长沙；第二兵团张发奎所部确保九江至瑞昌线正面，并沿江构成阵地带，防止日军由瑞昌西进，直趋岳阳、蒲圻、咸宁；汤恩伯军团控制于各重要据点之间，以便随时策应一线作战。

战争从六月份开始。日军还是老一套，在优势炮火的掩护下，正面进攻加侧面迂回。不同之处在于，因长江水雷、沉船、人工暗礁太多且无法排雷，日军的海面力量无法发挥威力，只能完全依仗陆军。国军的表现还是老一套，很抽风，英雄和狗熊都有。

淞沪会战拼命的杨森部旧病复发，守安庆时脚底抹油。

战争开打之前，国民政府耗费巨资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在江西马当沿长江设计了一条要塞防线：两岸山峰险要处设有炮台、碉堡等，水

面布置三道水雷防线，共设人工暗礁三十五处，沉船四十九艘，布水雷一千七百多枚，同时配置重兵防守。

蒋介石原本对马当要塞寄予厚望，希望能阻挡日军一个月。然而由于十六军军长李韫珩（湘系）战场开小差，导致要塞很快被日军占领，长江门户洞开。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下令中国守军全力反攻，收复马当要塞。

搞笑的一幕出现了：在中国军队手中没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马当要塞，反而成了日军坚固的盾牌。国军连续反击十几次，大批勇士战死，始终没有撼动马当要塞。

蒋介石气得把陈诚大骂一顿，又把十六军番号取消，把李韫珩革职，把救援不力的薛蔚英枪毙。真正的决战开始了。陈诚帐下的薛岳出自粤军，并非蒋军嫡系，但他指挥的第一军团都是蒋介石嫡系。薛岳的对手是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生于武士之家，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起于情报工作，中国通。裕仁天皇以太子身份监国之前赴欧美考察，冈村宁次以驻德武官的身份参见未来的天皇，并替他在驻外武官中收罗党羽，为未来掌控国家做打算。

裕仁天皇的军人班底为“巴登巴登集团”，一共十一人，核心发起人分别是统制派核心永田铁山、皇道派组织者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东条英机。前两位因内斗一死一失势，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成为裕仁天皇的左右手。东条英机凭借政治能力登上高位，冈村宁次一直在军部翻云覆雨。冈村宁次想在战场上建立大功，便指挥一零六师团

横冲直撞。战场上骄傲的人通常不会有好结果。骄横的一零六师团试图进攻德安未遂，孤军转入到万家岭。薛岳决定抓住战机消灭之。经过蒋介石和陈诚同意之后，薛岳抽调第六十六军、第七十四军等精锐部队从各方围过来，十万国军在万家岭建立起对一零六师团的绝对优势。冈村宁次发现他的一零六师团进入薛岳的圈套之后，赶紧下令转向，但已经晚了。国军已经完成合围。

十月七号晚，薛岳下达全线进攻命令。日军虽有优势火力，但国军有兵员优势。双方在每个山头上拉锯，伤亡均很重。由于日军被围困在绝地，没有补给和救兵，逐渐绝望。日军幸存者回忆：“战友们大部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来。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茶色而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十月的月亮，我放声大哭。”

蒋介石命令薛岳，必须在十号之前结束战斗，给双十国庆献礼。十月九号，日军被压缩在三四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万家岭、扁担山、张古山，国军从四面猛攻。由于日军仍然拥有火力优势，国军各部队挑选勇士组建各种突击队，不顾敌机轰炸，英勇冲锋，奋勇杀敌。第六十六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围歼万家岭敌人。第四军将士选择夜晚仰攻扁担山，他们赤膊上阵，看见穿军服的就杀，甚为勇猛，夺回扁担山。七十四军组织了两支突击队，在五十一师王耀武的指挥下，一五三旅张灵甫率队血战五小时，终于攻克张古山。

万家岭大捷，抗战之中又一场来之不易的战役性胜利。和台儿庄大捷一样，一场战役性胜利无法改变整场会战的结局。日军再次赢得会战。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但武汉会战之后在中日之间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

日方压力：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占领了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标志性城市。蒋介石曾经说过，谁控制这些城市，谁就控制中国。之前日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然而他们很快发现，他们不仅没能控制中国，反而掉入中国这个大泥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日本占领东北和华北，但云贵川还在、两湖还在、两广还在，他们也是中华好男儿，他们北上东出，和日军周旋，浴血混战。

中方压力：国军缺陷充分暴露。

中央军内，蒋介石早期的五虎将中，蒋鼎文因为吃喝嫖赌抽惹了一身麻烦。日军把蒋鼎文一手抱着美女一手拿着钞票的画像画在墙上，打击国人抗日士气。刘峙趁机娶了一位漂亮的老师当第三任老婆。顾祝同找了战地夫人，把人家搞怀孕，原配笑着脸找上门用一碗毒药结果了那位可怜的女人。中央军尚且如此，地方军阀更不在话下。廖磊手下一个团驻扎在安徽，没多久变成了一个旅。因为团里官兵娶老婆生孩子，相当于扩军了。廖磊把团长叫过来训话：“你升旅长了！”团长一头雾水：“报告总司令，尚没有接到命令。”廖磊板起面孔：“你自己有权当了旅长，又何必奉命令！”

捞钱娶老婆生孩子，这些还是小事。因为富裕之地沦陷，政府财政崩溃，各地驻军只能各自筹款。自己筹款必然造成军民冲突。比方

说顾祝同的第三战区经常和沦陷区搞贸易。驻守安徽的桂军也是一样，也要靠特殊贸易生存。有些地方搞不好，就变成灾难。比方说汤恩伯在河南就搞得一团糟。

最严重的后果是，很多软骨头在重压之下成了叛徒汉奸卖国贼，协助日军对付同胞，对不起列祖列宗和后世子孙。要解释大大小小品种多样的汉奸是不可能的，分析特例则可行。

所以国军在接下来的战役中越来越糟。原因就在这儿。

重压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但部分国人陷入前所未有的悲观，厌战和恐惧笼罩在华夏大地上。很多人看不到前途，被无形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要理解那种压力，就要了解那个时代最特殊的那个人——汪精卫。他有很多面孔，每一张都很精致。

汪精卫面孔之一：精英。

汪精卫生于一八八三年，广东人，商人之家。那一年他的爸爸已经六十二岁，他上面有三个哥哥和六个姐姐。少年时代父母相继去世，他和哥哥一起生活。他天生读书的料，四五岁就能朗诵诗词，八九岁就可以做文章，十七岁就在私塾教书，十九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以广州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第二名是他二哥，第三名是他侄子）。因为成绩优异，汪精卫被清政府以公费留学生的身份送去日本进修。两年后遇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和

流亡日本的维新派公开论战，赢得孙中山赏识。彼时的汪精卫年仅二十三岁，年轻、帅气、阳光的外表下有一丝忧郁的气质，被称为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穿越到如今足以让很多偶像明星黯然失色。另外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堪称大才子，可谓才貌双全。

汪精卫面孔之二：勇士。

一九一零年，辛亥革命前夕，汪精卫决心献身革命，伙同他人刺杀王室最重要的成员——光绪皇帝的弟弟、溥仪皇帝的爸爸、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被判处死刑。他在狱中写下《被逮口占四绝》，其一便是：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面孔之三：生活楷模。

国民党高层之中，腐化堕落者不知凡几。汪精卫却是楷模。他风度翩翩却不好色，他位高权重却不贪污。他不抽烟、不赌博，堪称好男人。

汪精卫面孔之四：领袖。

孙中山在世时，汪精卫已经跻身核心决策层。孙中山死后，他是国民党四大巨头之一。廖仲恺被刺杀后，汪精卫离国民党领袖的位置只有半步之遥。

如果不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一张面孔都足以使他功成名就。如果不是那个特殊的时代，汪精卫可以成为天之骄子。然而在那

个时代，他却成了汉奸，而且是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青史上堪比秦桧的人物。怎么会这样？答案是性格决定选择，选择决定命运。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已经二十七岁，理当成熟的年龄却依然如此热情奔放。同志们不赞成他如此选择，但他依然前往。他以为，只要解决掉载沣，就会扭转乾坤。从这层性格来说，他更适合当文人，而不适合成为政治家。因为他缺少政治家最基本的素质——狡猾和坚韧。

在和蒋介石斗法的过程中，汪精卫原本占先机，最后却活在蒋介石的阴影之下。因为情况一旦不利，汪精卫就开溜。当初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原本可以发挥影响，制衡蒋介石，但是他去国外“出差”了。清党时，汪精卫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野，汪精卫没有乘机发挥影响，反而“生病”进了医院。完全是一副懦夫的形象。

勇士的汪精卫和懦夫的汪精卫是不是同一个人？是。

所有对汪精卫的评价中，以他的追随者、同为大汉奸的陈公博最为贴切：“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血气上涌之际，两眼一抹黑，啥都敢干。

——汪精卫，一个具备血气之勇而不具备血性且不敢担当之人。

理解了这层，才能理解汪精卫在抗日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为何要以国民党二号人物的身份组建伪政府？要知道有头有脸有气节的人物，宁死也不会当汉奸的。比方说老军阀吴佩孚，在北平落在日军手上，宁死不合作。以汪精卫的身份，他完全没必要投降。国民政府战还是和，他个人都有保障。他投降的原因无非两个：表层因素和根本

因素。

所谓表层因素，汪精卫和蒋介石不和。孙中山死后，汪精卫虽然比蒋介石年长，比蒋介石地位高，比蒋介石长得帅，比蒋介石名气大，但却被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中，被牵着鼻子走，最后终于落在蒋介石的阴影中。但他从来不敢真的反对蒋介石。凡是蒋介石做出的决定，汪精卫即使挣扎一番，最后都是妥协退让。因为他力不如蒋介石，技不如蒋介石。

对待蒋介石尚且一再退让，对待比蒋介石更为凶猛的日本人，必然是退让更多。当初何应钦签订的《何梅协定》，就是汪精卫批准的。那是赤裸裸的卖国协定，何应钦又是蒋介石的心腹，汪精卫都批了，原因无他，日本人太猛了，能退就退，能让就让。汪精卫的行为让革命党出身的超级刺客王亚樵（比燕子李三、大刀王五之类的传奇人物更猛，黄金荣和杜月笙听了都要绕道的人物，他刺杀蒋介石未遂，刺杀早期侵华日军司令白川义则得手，后被把兄戴笠刺杀）都看不下去了，派人刺杀之。结果子弹射入汪精卫的脊椎无法取出，医生断定他活不了十年。由此可见，汪精卫对日本人的恐惧远胜对蒋介石的恐惧。

所谓深层因素就是悲观绝望。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就很悲观，认为打不过日本，不如认栽吃亏，苟活图存。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号，卢沟桥事变二十二天之后，日军正向平津进攻，身为国民政府二号人物的汪精卫竟然在广播讲话中宣称：“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悲观

之情溢于言表。

汪精卫询问冯玉祥，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冯玉祥告诉他，日本无条件投降。汪精卫嘲笑：丘八狂妄无知。历史证明，并非丘八狂妄，而是秀才太无知。

随着平津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广州沦陷，汪精卫的眼前再一次黑暗。汪精卫看到，所谓抗战不过是更多的土地沦陷，更多人遭殃，最后还是要失败。时光仿佛回到一九一零年。那时的汪精卫认为，要在黑暗中存活，只有舍身刺杀摄政王载沣。此时的汪精卫认为，要想在黑暗中存活，只有和谈，也就是卖国当汉奸。

当然以汪精卫之才华和品味，即使当汉奸也是与众不同的，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汪精卫最初想要游说蒋介石和谈，幻想回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态势。

但是到一九三八年，中日武汉会战之际，重庆遭到日军战略轰炸。汪精卫的幻想破灭了，妄图故伎重演——组建新政府对抗蒋介石。汪精卫之前多次干过类似的事，但这一次不同，他要组建新政府和日本和谈。和日本沟通一番之后商定：“让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到前台主持政府工作。”经过一番游说，汪精卫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比方说云南军阀龙云（蒋介石决心除掉龙云的原因之一）。比方说陈立夫兄弟（正是从那时开始，蒋介石让戴笠组建军统，削弱陈家兄弟的功能）。

汪精卫的如意算盘是把新政府建立在云南，那样看起来不像真的汉奸。如果成功的话，他将再一次胜过蒋介石，而且成为中国人民的

大救星。但是汪精卫太天真了。当他转到越南河内表态之后，不仅被蒋介石追杀，支持者们纷纷表示不认识他。如此一来，超级大帅哥只能去沦陷区当名副其实的汉奸了。

如何评价汪精卫的行为呢？四个字，书生意气。

他以为他是救国救民，他是舍身喂虎，是有功之人。正如他妻子陈璧君在法庭上为他辩护的那般：“日寇侵略，领导无力护民，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铁蹄下，这是蒋中正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有那一吋国土是汪先生卖去日寇的？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汪先生从未向一将一兵招降。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真是如此么？那是自以为。

汪精卫被蒋介石骗，被龙云等人骗，很受伤。但骗他最惨的是日本人。他到南京之后就成了日本人手中的玩偶，上演了一系列历史小丑才会上演的闹剧。如果说蒋介石丢地盘，那么好吧，地盘丢了还可以拿回来。暂时技不如人、力不如人，可以苦练技术，增加力量，没啥大不了。汪精卫在南京丢的是民族的灵魂。历史上凡是丢了灵魂的民族都消失了，都不存在了。

可以设想如果汪精卫成功了将是什么情况：中华大地上东部地区会落入日本手中，中部会不间断的抵抗，西北会分裂独立。日本占领

区内，会对满洲和满洲之外的地方分而治之，让彼此斗争不断。如此一来，中国相当于被肢解。那样的话，五千年历史将被终结，中华文明将成为传说，中国将永远没有翻身的可能。

要说汪精卫需要同情，那就是被骗得太惨了。落下秦桧那样的骂名却没干成秦桧那样的事业（好歹杀掉岳飞，和谈成功），可恨又可怜。但问题的根源在他自己。

汪精卫纵然有这样那样的优点，但是在生死存亡之际，只能当可怜的花瓶。他应该负责写文章搞宣传，而不是站在领袖的位置上或试图站在领袖位置上。让他当领袖是悲剧（参见廖仲恺死后短暂的领袖日子），不自量力往领袖位置上去，更大的悲剧。

中国需要领袖型的人物，需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需要把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就算是惨败、惨败、再惨败也绝不低头屈膝之人，那怕是为个人的野心和利益站立着，哪怕个人小节上有污点，也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那样的人。蒋介石通过正面抗战，从实践上破了日军的战略；毛泽东则用自己的智慧从理论上破了日军的战略。

正面战场的蒋介石展现出神与魔的两面性。如同神一样，坚决不投降。但除了坚决不投降之外，总是一败涂地、再败涂地。那些失败足矣让人发疯。若非中国足够大，早已退到国外了。毛泽东完成抗战理论之后，指挥共军逆向而动，走向另一种新生。

五章 逆向而动的共军

要描述国军和共军的不同，可以写很多东西，但归根结底三个方面，其一是纪律，其二是领袖，其三是组织方式。关于纪律性的事儿有很多，就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抗战前夕，国军将领张灵甫因为怀疑妻子而杀之，本应死罪，国军让他戴罪立功。抗战之初，共军将领黄克功杀掉恋人，直接处死，作为反面案例教育全军。

领袖的个性会在组织中延伸。

国军性格，某种意义上反映出蒋介石的个性。蒋介石标榜革命旗帜而推行个人专政，本身就是矛盾体，只对立，不统一，有组织而缺乏纪律。国军正面抗战，勇则勇矣，愚则愚矣。

共军性格，某种意义上反映出毛泽东的个性。毛泽东性格中也有矛盾，但矛盾对立又统一。比方说“枪杆子出政权”和“党指挥枪”就是对立统一体。所以说共军有严谨的纪律性。

整个抗日战争，毛泽东没有在前线指挥过任何具体战役。共军初期东进，甚至在和国军的配合上，以朱德为主。前线具体指挥官是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这些人。毛泽东甚至不太赞同林彪的平型关战斗和彭德怀发起的百团大战。但这些都不能忽略一个事实——毛泽东是战略设计者。他也没有什么秘密，如果说有秘密，就在那几篇文章中。

一九三七年七月份，也就是卢沟桥事变那会，毛泽东写下两篇文章《实践论》和《矛盾论》。它们名义上在谈论哲学，实际上奠定了

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也为共军在敌后生存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脑袋里打通了共产党人的奇经八脉。

所谓实践论：实践，认知，再实践，再认知。这个有点类似于古人推崇的“行知合一”。通俗一点说，先干，再想，再干，再想。干多了，想多了，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用在具体事物上，到天上摘月亮或许不可能；敌后生存，则有可能。事实上共军就是这么实践的，而且很成功。

所谓矛盾论：事物本质上一分为二，是对立的。但是在彼此交替作用时又合而为一，是统一的。归纳起来就是事物都遵循对立统一规律。这些是政治教材上的东西。不禁要问，这个东西对敌后生存有何现实意义？答案是意义很大。

按照这个思想，胜败也遵循对立统一规律，彼此共存，相互转化。今日失败，来日总结经验教训再战，那就可以成功。一时失败没啥，只要能换来最后的成功，那么失败也是一种胜利。一时的牺牲，只要能换来最后的胜利，那么牺牲就是有价值的。项羽百战胜九十九，垓下一战而亡，所有胜利果实化为乌有。项羽胜或刘邦胜，中国还是中国。抗日战争这种事，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是必须要达到目的的，不能只讲一时成败得失。如果达不到那个目的，亡国灭种，啥也不要谈了。所以不论付出多少代价都要干。

毛泽东干事情，显然不喜欢赔本。他要带领共产党和共军开创一番事业，而不是让追随者无谓地牺牲。所以他认为，尽管敌后生存环境如此恶劣，但确实可行，而且一定可行。详细论证写在《论持久战》

中间。

这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证了中日战争的走向和结局：中国大而弱，日本小且强。在日本的强势进攻下，中国应该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战术。

根据这个标准。蒋介石在战略上是对的，且战且退，并且迫使日本沿长江向上游进攻。但是他在战术上犯了若干错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系统的作战方针：“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

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这就是共军的作战指导思想和作战精髓所在。不仅敌后抗战如此，日后解放战争也是如此，抗美援朝还是如此。日后重庆谈判，蒋介石在日记里记载，毛泽东让人琢磨不定。其实这话不对，毛泽东已经把他的思想精华写在文章里了，还要琢磨什么？不愿正视而已。

看到了么，《实践论》是一种决策，《矛盾论》是一种认知，《论持久战》是一种战略战术分析。三篇文章可以看成是三部曲，共军就是在这三部曲的指导下完成了全部事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事走向都验证了这些观点。

——这件事完成，毛泽东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战友和对手们。

逆生长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再次合作。共产党尊蒋介石为领袖，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共和国未来的十大元帅基本都在这里了，十大将军们都是下面的旅长，上将们都是旅长和团长。然而抗战之初，他们的地

位并不高。日后能成为开国元勋，是因为他们用一种与众不同且行之有效的方式战斗。

共军从建军之日起就和之前的所有军队不同，他们来自于民。离开了人民，共军就完蛋；有了民，共军弱小时不会被消灭，壮大后便不可战胜。

当国军在正面战场英勇搏杀却被迫步步撤退之际，八路军却在逆向前进，到敌后去。当时共军的实力并不强大，一共只有几万人，但就是敢开过去。共军将领分散到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察哈尔等日军已经占领或即将占领的地方去。日军掉入泥潭，一个原因是蒋介石领导的国军在正面战场屡败屡战，另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领导的共军在敌后壮大。

毛泽东的策略很简单也很复杂。

说简单，就是让共军渡过黄河向东，配合国军抗战，比方说林彪取得平型关大捷，刘伯承奔袭阳明堡机场。国军败退以后，共军就在日占区落地生根，星罗棋布，一个又一个根据地冒出来。贺龙在晋西北生根，聂荣臻在五台山搞建设，陈毅在苏北立足，罗荣桓在山东布局，如此等等，还有很多小根据地。

说复杂，是因为敌占区生存环境恶劣。没有退路，没有后勤、没有支援、没有友军，要得到一定保障，需要先把某一地区的日军和汉奸消灭，抢他们的地盘，抢他们的武器。所以《游击队歌》曰：“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敌后战场反而变得更为艰难。以国

军为例，一开始落在敌后的国军数量远多于共军，蒋介石也希望他们可以像共军那样在敌后生存，建立根据地。但是不行，条件太艰苦了。最后要么当了可耻的协皇军，要么散了。

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已经无力组织大规模进攻，回过头发现占领区内已经被共产党建设了各种根据地，赶紧进行“扫荡”，巩固胜利果实。日军借助城市和交通线部署封锁网，修建岗楼，设置据点。岗楼之间的距离是步枪射程，可以相互支援。看看那些残酷的日子。

一九三八年晋察冀秋季反扫荡，共军和日军大小战斗一百三十多次。

一九三九年冀南春季反扫荡，两个月的时间，共军和日军大小战斗百余次。同年北岳区冬季反扫荡四十多天，共军和日军交战百余次。

一九四零年晋西北反扫荡两个多月，共军和日伪军大小战斗两百多次。

一九四一年苏北夏季反扫荡，共军和日伪军大小战斗一百三十多次。

如此等等。敌后反扫荡这些战斗，规模不大，但数量频繁，牵制的日军数量越来越多。为何共军可以在敌后发展壮大？有很多原因。其中一条很重要，就是毛泽东创建共军之时，本来就没有军饷、没有武器。毛泽东带出来的队伍，不发工资但能保证军队纪律，可谓是奇迹。所以敌后虽然艰苦，那是对其他人的。对毛泽东和共军而言，是正常生存。因为他们原本就在一无所有中诞生，在一无所有中壮大。他们从来都是面对炮火，面对穷山恶水。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穿越无

人区，相比这些，敌后并不算特别艰难。所以其他人无法生存时，他们能。

敌后的共军武器更落后，如何面对日军呢？苦练。日军喜欢拼刺刀，共军就加强拼刺刀训练。比如陈赓要求“必须以真枪在野外不齐地形或山地练习刺杀，不能停留在基本教练上面”。比如吕正操麾下部队在战斗间隙一般只做两件事，除了吃饭，就是进行刺杀训练。老八路王汝林回忆：“拼刺刀时，兄弟们配合，抗住其他鬼子，局部形成二打一或三打一，其中一人佯攻，其他人突刺，突刺的人一定要坚决。”

经过如此磨练，共军在和日军交锋过程中，自身战斗力越来越强，控制地盘越来越大，达到了一个伟大的战略目标：以战养战。

共军不但能应付日伪军扫荡，还能发起反击。要理解共军的特点，必须了解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

一九四零年下半年，汪精卫投敌之后，太平洋战争之前，是中国在抗战中最黑暗的日子，看不见胜利的希望，许多人心灰意冷，汉奸越来越多。那段时间，日本占领的地方越来越多，正面战场已经推进到长沙，正面抗战陷入低潮。扩大到整个二战战场，纳粹德国在闪击完波兰之后，攻占丹麦和挪威，接着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此时日不落帝国正仓皇从敦刻尔克海滩退回老窝。此时的希特勒

正在柏林地下狼堡中得意洋洋地看着世界地图，心中默念“巴巴罗沙”、“巴巴罗沙”。非洲战场上，希特勒的警卫连长隆美尔整装待发。

就在那个时候，朱德、彭德怀、左权等人策划和指挥八路军抗战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投入兵力最大、破坏力最大、影响力最大的一场战役。一二九师、一二零师、晋察冀军区等部队，共一百零五个团（未算民兵）主动出击，在华北地区对日军掀起将近半年的攻击波，取得一系列胜利。

但迄今为止，谈到那场胜利，多半局限于战斗本身，而忽略了更为宏观的东西。

从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二号发布预备命令到最后下达行动命令，八路军总部部署的都是二十二个团参加战斗。但是到八月二十二号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首次对战情进行综合整理时，彭德怀、左权意外地发现竟有一百零五个团参战。——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观。

也就是说多数部队是“自愿参战”。那么以纪律严明著称的共军为何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纪律和战术组织也是矛盾统一体。共军当时遵守“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用毛泽东的话说：“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给下级自主权，和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恰好相反。

毛泽东给下级自主权，八路军总部也给下级自主权，各下属部队也部署军队参战，同时还有游击队和民兵，所以就弄出一百多个团。为何会这样呢？用一位老民兵的话说：“我们实在是受够了汉奸和小日本的气了！听说正规部队要打日本人，能拿起武器的人全跟着部队跑。”再反过来看国军那边，蒋介石和高级将领们也想扩大军队，也想有更多人参与，也想有敌后游击队。然而国军扩军常常依靠拉壮丁，高级将领（如汤恩伯）把军民关系搞成灾难，陷入敌后的军队多半沦为伪军。

百团大战实际上是华北敌后军民对日伪军的回应，是八路军组织方式和作战方式的典型反映，是共军处理军民关系的杰出代表。

整个战场过程是独特的共军模式，虽然主动出击，却不硬打硬拼，而是运动起来破坏日军的交通运输线，拔掉日伪军的碉堡，打破日军所谓的囚笼政策。以极其简陋的装备配合灵巧的战术打日军的正规军，某种意义上就是后来朝鲜战场的一个预演。但必须指出，一九四零年的共军和十年后的共军还不是一个档次，还没有经历大规模运动战的考验，依然无法和日军正面对抗。虽然在敌后建立了局部优势，却无法对日军形成致命打击。比方说关家垸战斗，打得并不好。

百团大战的意义在于给低谷中的中国战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让国人从正面战场之外看到另一层希望。但代价也很大。共军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成长，引起国军和日军的双重不安。

代价

日军不需说，更加疯狂地围剿。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湖南人，生于一九零五年，黄埔一期毕业，参加过东征，去苏联伏龙芝学院（刘伯承校友）进修，回国后一直在红一军团战斗，神枪手，能写文章。抗战时期是八路军最活跃的高级将领之一）因此而牺牲。

可悲之处在于国军。民族存亡之际，原本应该团结一致对外，如同抗战前两年那般，放下仇恨，紧密合作。那时候，国民政府终于承认了共军的地位，又把八路军番号升级为十八集团军，给军粮和子弹。那时候八路军配合国军作战，如平型关大捷。武汉会战之后，中日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局面发生微妙变化。日军兵力并不多，之所以能占领大量地盘，皆因伪军相助，伪军数量比日军还多。伪军的作战对象是共军。抗战中的中国军队，尤其是敌后共军，歼敌数量不少，但大部分都是伪军。

真正可悲之处在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闹分裂。国共合作只是暂时放弃分歧，并没有绝对的信任。比方说平型关战役，本该出现的国军就没有出现。蒋介石最信任的黄埔学子之一的胡宗南一直坐镇西安，目的便是防备共产党，中后期还曾制定计划闪击延安。

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战逐渐演变成日军抢占国民党原本控制的地方，共军又在日战区的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国民党在正面以空间换时间，越换空间越少，大城市基本丢光，逐渐推向西南，赋税来源逐渐枯萎。共产党在敌后搞持久战，逐渐站稳脚跟，渐渐壮大。

早在百团大战之前，国共双方就发生过一场“内战”。韩德勤试

图进攻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被击溃。韩德勤本人再次被抓（之前围剿红军时被抓过一次，逃脱），再次逃脱。国军原本就想找机会报复新四军，加上共军在百团大战中展示出来的实力，让国民党核心集团如锋芒在背。

如此下去共产党将取代国民党，那还了得，娘希匹。

百团大战刚刚结束，蒋介石让何应钦和白崇禧以国军军委名义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撤到黄河旧河道以北。如此要求相当于让共产党放弃南方所有的根据地。共产党严词拒绝，但考虑到国共合作的大局，答应新四军撤退到长江以北。

蒋介石给新四军规定了北撤路线。但由于国共分歧，双方如同不和谐的夫妻，摩擦不断。如果新四军坚定北上，悲剧或许可以避免。但项英的犹豫成了导火索。

新四军原本是留在南方的游击队。叶挺名义上是军长，但大权掌握在项英手中。项英虽然只是副军长，同时也是东南局书记。项英和叶挺矛盾很深，叶挺的一切决定都要经过项英同意方能执行。那个情况导致叶挺变成了空架子，在新四军军部的时间很少。那么项英为何犹豫呢？因为他的处境很尴尬。项英虽然是工运出身，但却是国际派的支持者，是毛泽东的党内政敌，长征之前还提醒博古防毛泽东。长征之后，国际派已经失势。

项英的犹豫给了国军借口。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揣摩到蒋介石的心思，决定表现一把。早期的五虎将中，顾祝同最善于揣摩蒋介石的心思，也只有顾祝同一直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早期的顾祝同战绩不如

刘峙，仕途也不如刘峙。西安事变中，何应钦让顾祝同和刘峙兵分两路威慑西安。刘峙去了，顾祝同磨磨蹭蹭不上任。之后蒋介石认为顾祝同比刘峙忠心。

顾祝同一生中取得的最为辉煌的军事成绩便是在皖南消灭了新四军主力。项英一直磨蹭到一九四一年一月四号才决定向北撤退，此时顾祝同已经布置妥当。

一月六号，两军交火，八万国军向九千新四军进攻。项英发电报向中央求救，但中间出了差错。一月九号，江北的刘少奇给毛泽东发电报问项英的情况，毛泽东回电表示一无所知。直到一月十号，毛泽东方才收到叶挺和饶漱石的求救电报，同时收到项英的电报，表示突围不成功，又回到部队。中共开始和国民党交涉。然而一切都晚了。经过七天七夜的血战，新四军弹尽粮绝。和国军谈判的叶挺被扣押，项英和袁国平（政治部主任）遇难。

——民族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出现这样一场内斗，是不是很悲哀？

——国共斗争二十年，皖南事变是国军在战场上赢的最大成果之一，是不是很讽刺？

战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共产党针锋相对，以陈毅、饶漱石为核心重建新四军。双方均不满意，但没有进一步动作，毕竟共同敌人还在，还没到翻脸之时。四年之后，日军退回东瀛列岛，所有账一起算。那个时候，新四军在天才的粟裕指挥下，给了国军大大的惊喜。

抗日战争，不论是正面的国民党还是敌后的共产党，均没有能力

独立驱赶日军。不是因为中国军人不够勇猛，不是因为国共精英能力不够，而是农业国和工业国之间存在代差。事实上中国赢得抗日战争，是因为顺应了世界潮流。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作为文明不曾中断的华夏大地，自古以来就有能力顺潮流而行。所谓潮流有内外两层。

对内的一层：中国虽然失去工业文明先机（直到十九世纪下半段才睁眼看世界），又在追赶途中败给日本（甲午战争），但国人没有放弃，精英一直在努力尝试，断头流血在所不惜。二十世纪前半段的中国虽然落后，却处于浴火重生的前夜。所以日本步步紧逼，攻城占地杀人，却未能换来中国投降。这层前面已经谈过。

对外一层：日本虽然已经是工业化国家，亚洲最强者，国力和武力远胜中国，但并不是世界走势的决定性力量。决定性力量还是基督教之新教世界和基督教之东正教世界。这些事将在另外一个篇章里全面按照历史周期律演变的方式重新描述。这里先简单描述一个大概。

第六章 大局势

中日开打之际，欧洲也在磨刀霍霍。欧洲的局势和一战一样，仍然是德国从中部崛起，试图挑战英法。希特勒重建的第三帝国更胜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法对德国毫不退让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法对德国的咄咄逼人采取绥靖策略，甚

至配合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不是英法心地仁慈，而是世界发生了变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东正教世界的沙俄已经变成无神论的苏联，英法希望希特勒向东和苏联死磕。美国还在奉行功利主义，和双方同时做军火生意发大财。

所以抗战之初，蒋介石希望列强干涉而破产。因为列强同样希望日本从东方进攻苏联。所以淞沪会战打得那样惨烈，列强也没有干涉。所以南京大屠杀那样残忍，列强也没有干涉。蒋介石寄予厚望的美国还在和日本做生意。一九三七年，美国对日本仅军事输出就有一亿八千六百万美元（那时美国的 GDP 不到一千亿美元）。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说：“如果没有这种援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可能被制止。”九月十四号，罗斯福宣布同时放弃向中日两国输出军火（国军处境更为艰难）。蒋介石多次要求美国“绝对禁运军用材料与器具与日本，尤以钢铁、煤油为最”，但被拒绝。给蒋介石最大帮助的反而是希特勒和斯大林。因为希特勒试图在东方寻找盟友，当时的日本和英国是同盟关系，斯大林则希望蒋介石在东方拖住日本。

然而希特勒却选择进攻波兰，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英法没办法，被迫和德国宣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完全不同的是，西欧没能出现绞杀战。希特勒的钢铁洪流绕过马其诺防线，直接进入法国腹地。六周之后，法国投降。德国推平西欧，兵临英吉利海峡。英国没办法，和苏联结盟。

日本一直摇摆不定。日本的大陆政策中，必须的步骤是征服蒙满和远东。但是在裕仁天皇看来，那个战略固然诱人，但那时候北方还

没有完全开发，气温寒冷，不宜居住，不足以支撑战争需求；相比之下，南方气候温和，可以大规模移民，而且有战争急需的石油和橡胶。日本内部一直在争论北上还是南下。

一九三九年五月份，武汉会战前夕，日军决定做一次试探。关东军参谋辻政信策划诺坎门事件，日苏双方大打出手。战役过程互有胜败，但日军看到了苏联的钢铁力量。日本对付国军是足够的，对付苏军是不足的。特别是朱可夫上任之后，让日军吃足苦头。但由于德国在西方的压力，苏联无力扩大战果。日苏签订合约。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锐减。

但中国却迎来更大的希望。通过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尤其是国军的正面抵抗，日军在中国战场陷入泥沼，速战速决已经不可能。武汉会战之后，由于战略资源消耗扩大，日军已经无力发动战略性进攻。想要继续打，必须南下抢占橡胶和石油。东南亚一直是英美殖民地。

要南下，必须和美国开战。

一九四一年，中日开战已经四年有余，日本已经在东亚大陆推进到长江上游，德国在欧洲同样风卷残云，美国还在做生意，还在观望。当时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决定性力量。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工业力量已经超过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综合国力已经超越当时的全球霸主英国，跃居世界第一。走向法西斯的日本一直把美国当作最后的假想敌。各位战争狂人的思维中，最后的决战是在以日本代表的黄种人和美国代表的白种人之间展开。凡是稍微理智一点的日本人，都不主张和美国开战。原因很简单，同为工业国家，日本体量和

美国相差巨大。如果美国的工业机器转向战争，力量将非常恐怖。

但是在中国战场陷入泥沼、向北受阻的情况下，向南成了唯一的选择。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精英开启了第三次赌国运之旅。

甲午战争赌赢了，日本成为亚洲老大。日俄战争赌赢了，日本晋升为列强。太平洋战争如果赌赢，日本将成为世界一极。很遗憾这次最终赌输了，一夜回到解放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号，经过一系列策划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十二月八号，美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最大的后援来了。

终于宣战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号，美国宣战的第二天，中华民国发表《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对日宣战。这是一封迟来的战书。此前战争已经开打了四年，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但都没有宣战。说出来比较辛酸，如果宣战，表示双方处于战争状态，根据国际法，将无法得到中立国的支援。为了那些外援，为了外交回旋，国民政府一直在忍。直到美国参战，世界格局简单明了，国民政府方才宣战。这是弱国的悲哀。

宣战书也是典型的弱国风格。

战书第一部分：“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

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在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也。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

——，控诉日本的野心，占领道义制高点，为各国战书之基本要素。但给人感觉少了点什么。想了想，是罪行。中日之间的矛盾根源不在战争行为本身，而在于战争中的罪行，在于野兽般的屠城和三光政策，在于毫无人性的活人实验。

战书第二部分：“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这部分写得非常别扭。当时中国和英美还不是盟国，却给人感觉中国政府是因为日本侵略“友邦”方才宣战！当日本前几年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滔天罪行之际，友邦并没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宣战了，对仇雠敌战之国宣战了。但宣战之后的国民政府恰好和战书的表现类似，处于非常有利又非常不利的

局面。

有利局面在于，日军全力南下抢夺东南亚，在中国战场更没有力气发动战略进攻了。民国相当于立于不败之地。而盟国的战略物资可以给困境中的中国军队输血。由于美国超强的工业力量，那种输血基本上是无限的。民国押宝英美终于得到回报。

不利局面在于，尽管有那么多有利因素，国军依然无法在中国大地上赢得哪怕一场真正的会战。由于东部沿岸地段丢光，美国空有无限的战略物资，却很难运往中国。偌大的中国战区，只能靠区区滇缅公路输血。随着日军进攻缅甸，英国老朽不堪，国军正面抗战面临内外两条线。内线还是那样，外线反而赢得一丝颜面。

无语的内线

武汉会战后的日军已经无力发动大规模战略性进攻，但局部战争还在继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南下抢地盘和资源，但中国战区的战斗还在进行。日军的进攻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向西，沿长江向上试图进攻重庆，逼迫国民政府投降，但被胡璉阻击在三峡石牌；另一个是沿武汉向南，进攻华南地区，试图切断中国和盟国的连线。过程还是老一套。武汉向南第一个重要的大城市是长沙，西南战略大后方的屏障。

如果长沙丢失，那么云贵川将门户洞开。早在武汉会战结束，日军便试图拿下长沙，但前方有一位真正的中国将军在等他。

国军之中的白崇禧、卫立煌、孙立人、薛岳都有赫赫战功，均非蒋介石心腹。

薛岳，广东人，生于一八九六年，十五岁加入同盟会，随后一直追随孙中山，为粤军标志性军人。国军序列中，粤系只要有机会就会和蒋介石对着干。蒋介石对粤系军人没有好感，但依然重用薛岳，因为薛岳真的非常有实力。战场上的薛岳，狡猾且强硬。抗战期间，当蒋介石嫡系心腹（如刘峙）变成长腿将军时，非嫡系将领孙连仲、张自忠、薛岳等人表现出色。

薛岳参加了纵向线的全部战争，从淞沪会战到武汉会战均有他的身影，并在万家岭展露锋芒。武汉会战之后，薛岳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在万家岭吃了苦头的冈村宁次憋着气南进，指挥十一军试图拿下长沙。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军，国民政府原本打算放弃长沙，并且在日军到来之前在长沙放了一把大火，实施所谓的“焦土抗战”。但薛岳呈给军委的电文表态“誓与长沙共存亡”。白崇禧劝他悠着点，薛岳表示“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当年康有为变法，就把湖南设想为汉人最后的火种。

冈村宁次调动日军在优势炮火掩护下从赣西、鄂南、湘北三面进攻长沙，双方在湘北战场打得异常激烈。冈村宁次试图围歼薛岳第九方面军于新墙河畔。薛岳已经排兵布阵完毕，升级口袋阵为“天炉战法”，精髓在于把兵力围绕炉心（作战地带）布成网状的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瓦解敌军士气，最后把敌军“拖”到决战地区，围歼之。面对汹涌而来的冈村

宁次，薛岳且战且退，试图诱敌深入，再依托长沙城给予冈村宁次狠狠打击。

然而冈村宁次虽然气愤，却并没有失去理智。虽然他有制空权，虽然火力更猛，但是在飞机上观察战场之后，看到长沙地形之后，看到薛岳的布阵之后，他隐隐感受到前面有一张网等着他。此时日军兵力不足以打破那张网。恐惧之中，他硬生生克制住前进的欲望。薛岳指挥国军赢得第一次长沙会战，为正面战场的严冬赢得一丝暖意，为整个世界反法西斯的严冬赢得一丝暖意。薛岳，好样的。

此后冈村宁次被调离前线，失去品尝“天炉”的机会，继任者阿南惟几成了薛岳的对手。阿南惟几是乃木希典（此人在日俄战争中指挥陆军就很笨拙，日后又为明治天皇殉葬）的崇拜者，阿南惟几的指挥风格也是喜欢硬打硬拼，面对已经成精的薛岳也是一股脑猛打猛冲，情形和日俄战争中的乃木希典一致。

一九四一年九月份，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阿南惟几集中十一军按照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思路向薛岳进攻。日军的作战思路也是老套路：分兵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由于破译了国军情报，日军强渡新墙河成功，但仍然没能改变战略局势。所谓正面突破，恰好突到“天炉”的中心。薛岳临机应变，化解了情报被窃的损失，虽然战术上遭遇了一些挫折，但仍然成功把日军驱离长沙，恢复战前的新墙河界。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进攻香港。为阻止中国军队协助英军守卫香港，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十二月二十三日，阿南惟几之后的

日军再次强渡新墙河。薛岳指挥国军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等日军深入长沙后，坚决抵抗，四面合围。日军见情况不妙，立刻撤退。国军立刻主动出击，大败日军，赢得胜利。

这是三次长沙会战，前两次在中日宣战之前，第三次在宣战之初，是在没有得到盟友大力支援的状态中完成的，可歌可泣。长沙会战中的薛岳表现出色，值得大书特书。保卫了长沙城只是局部战役的成果，战略上的成果是守住了西南门户，保障了中国战略大后方和盟国的联系，为抗战立下大功。那段时间，恰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艰难的时候。

但是等到一九四四年，接受同盟国援助三年之后，国军不仅未能展开反攻，还把长沙弄丢了！

苏军挺进柏林，英美诺曼底登陆成功，美国在太平洋给日军致命打击，世界反法西斯战役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国军不仅未能展开反攻，长沙却丢了！

守军还是守军，指挥官还是薛岳。怎么回事？因为第四次长沙会战和前三次不同。前三次长沙会战的核心仅仅是长沙，第四次长沙会战只是豫湘桂会战的一部分。豫湘桂会战是日军死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也是国军抗战八年正面战场上最丢脸的一场会战。

日军当时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试图击溃国民政府，摧毁中国空军的主要基地，占领并确保中国南部陆地运输线。为此日军投入了三十六万兵力，发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势。国军当时有一百二十万以上的兵力参战，但结果却让所有人大跌眼球。因为兵力占绝对优

势的国军一溃千里，蒋鼎文、汤恩伯等蒋介石嫡系在河南一溃千里，丢掉城市上百座，损兵折将无数。总之已经不可能再丢人。

薛岳在长沙因为得不得足够支援，“天炉”阵地被日军横山勇击破。

豫湘桂战役为正面战场最后的溃败，也是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溃败，耻辱。

更大的耻辱在于正因为那场溃败，英美对中国战场失去信心，随后的雅尔塔会议上，英美请苏联在欧战结束之后出兵远东，暗地里把中国外蒙的利益出卖给苏联，情形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致。

如果要找亮点，那便是方先觉指挥第十军疲惫之师守卫衡阳，面对五倍于己日军的疯狂进攻，守卫孤城四十七天，英勇程度也只有台儿庄战役的池峰城堪与之相比。

这就是有了盟友之后的国军！是中国军人不行么？当然不是。同一时期，还有一支精英部队远战缅甸，在外线作战。和内线越打越烂相比，外线反而越打越好。

外线战争

中国远征军一共两期，第一期十万人，以杜聿明的第五军前锋、戴安澜的二零零师为先导。第一任远征军司令原本是卫立煌，卫立煌没能到任，杜聿明代理指挥。

一九四二年三月七号，戴安澜带领二零零师抵达同古，三月十九号和日军交手。那是四十八年之后，叶志超从平壤败退之后，中日军人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首次交手。四十八年之前，叶志超一夜飞奔五百里，意味着大清帝国的衰亡。这一次轮到戴安澜出场。

戴安澜生于一九零四年，安徽无为人，离合肥（叶志超老家）不远。一切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定数，两个老乡身上展现出一个民族的悲哀和荣耀。戴安澜身材高大，作风勇猛，行动迅捷，黄埔精英中的精英。日军来轰炸，戴安澜也不怯场，指挥自己的队伍施展平生所学，和鬼子一招一式较量。血战十天之后，二零零师弹尽粮绝，无救兵支援。在日军行将包围同古之际，戴安澜并不慌乱，带领二零零师的弟兄从容突围，从容撤退，留给日军一个空城。

此战史称同古保卫战。

二零零师虽然损失两千好汉，却消灭日军五千，把日军第五十五师团打到吐血。可惜天妒英才，在日后的撤退中，戴安澜负伤没得医治，和五万中华男儿长眠于野人山，年仅三十八岁。戴安澜不死，战绩不会比老乡孙立人差。仁安羌大捷中，孙立人带人成功解救了七千高贵冷艳的英国人，名扬天下。

第一期远征军本应取得更大的成就，但英国军队对中国军队不信任，未能给予支援。最要命的是国军决策层长期的恐日情绪。蒋介石下令杜聿明从野人山后撤。杜聿明指挥能力也不差，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绝对服从蒋介石。杜聿明明知原始森林危险重重，依然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结果五万英雄葬身在原始森林。

卫立煌最后还是当了远征军司令，但那已经是第二期了。

第一期远征军并没有全部撤回国，孙立人的三十八师西撤到印度，后组建为新一军。新一军还有另外一部分人马，就是廖耀湘的二十二师，组建为新六军。两支军队在二期作战中名动天下，成为国军王牌。加上陈明仁的七十一军，他们一起证明了国军不比日军差。

准备结束之后，第二期远征军开始反攻，一系列荣耀扑面而来。

他们强渡怒江……

他们血战腾冲……

他们攻克猛拉……

他们围剿松山……

日军的嚣张气焰不见了，龟缩在要塞等待死神的来临。他们很可怜、很无辜、很无奈，但是活该，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群畜生。用人性去怜悯畜生，那是对人性的污蔑。如果抗战结束之际，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能够对罪恶的鬼子进行大规模的清洗，那么他可能还可以坚持到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往往是人性泛滥，常常是菩萨心肠而忘却霹雳手段。

远征军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消灭了多少日军，而是在消灭日军的过程中证明了“中国人也行。”甲午战争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军队和日军作战基本都是失败，导致抗战中汉奸遍地。因为在汉奸眼中，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日本这也行、那也行。汪精卫就是典型。事实上那是一个误区。不是国人不行，而是装备和训练不行。第二期远征军以驻印军为基础，全面美军方式训练，美式装备。

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远征军不再受国军派系倾轧，可以配合作战。派系倾轧有多严重？比方说孙立人将军，回到国内就没有得到全力施展的空间，再也没能取得耀眼战绩。解放战争后期，新一军在东北黑土地被消灭时，孙立人已经失去指挥权。是不是很无奈？

造成国军派系倾轧的人正是蒋介石。

因为蒋介石，孙中山粉丝才能迅速战胜袁世凯粉丝，所以蒋介石止乱有功。

因为蒋介石，孙中山粉丝分化成若干派别攻伐不断，所以蒋介石致乱有过。

处于功过漩涡里的蒋介石从西安事变中的阶下囚变成全民抗战领袖，赢得第二次光照神州之机会。孙中山辛苦一辈子，也没能赢得一个那样的机会。袁世凯机关算尽仅仅赢得一次机会。蒋介石赢得两次机会，却没有抓住。

七章 神与魔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世界分成两大阵营，法西斯轴心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两大集团化身两头公牛全球角力。苏联和德国在欧亚大陆舍命相搏，美军和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殊死较量，英美在非洲和德意针尖对麦芒。作为日军陆军主战场的中国战区极为重要。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行情大涨，宋美龄到美国转了一圈，掀起一阵旋风，

带回大批美援。尽管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正面抗战趋于沉寂，国共摩擦逐渐升温（比方说胡宗南试图奔袭延安）。蒋介石的地位依然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继续升高，上升为世界性的巨头。

事实上从抗战爆发，蒋介石的地位就一路上升。即使一九二八年蒋介石理论上统一中国，也没能赢得共同拥戴。抗战开始，再也没有人否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即使共产党，也尊蒋介石为领袖，不再和蒋介石争地盘，跑到敌后日占区发展。

一九四二年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苏军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德战场大局逐渐明朗。美国在中途岛击溃日本海军，太平洋战场大局逐渐明朗。英美联军在阿拉曼之战中击溃德军，非洲战场大局逐渐明朗。其他如大西洋战场，英美海军击破德军的狼群战术，战局逐渐明朗。所以讨论战后大格局变得异常重要。通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其他地方都被打烂打碎，只有北美大陆完好无损。美国成了巨无霸，决定主导战后格局。

一九四三年夏，美国总统罗斯福分别致电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要大家在一起开会商讨一下接下来的作战部署和战后国际格局。但中苏之间很多事扯不清。斯大林以苏日之间尚未宣战为理由，不愿和蒋介石见面。罗斯福改变计划，表示美英苏三国先开会，中英美之后再开会。蒋介石认为如此安排有轻视中国之嫌疑，以军政繁忙推托。罗斯福综合考虑之后决定，中美英首脑先在埃及开罗开会统一步伐，美英苏另外安排时间地点开会。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蒋介石赴开罗会见罗斯福和丘吉尔，会

晤从二十二号持续到二十六号，史称开罗会议，又称三巨头会议。会议实际是四人参加，宋美龄担任蒋介石的翻译。

身为三巨头之一的蒋介石国际影响力空前提升。单看中华民国的历史，只有蒋介石和世界巨头一起探讨过世界局势。孙中山没有机会，袁世凯没有机会，其他人更没有机会。目光放长一点，鸦片战争以来，只有蒋介石赢得和世界巨头一起探讨世界局势的机会。更远一点看，这是工业时代来临之后，中国领袖首次有机会参与影响全球局势之会议。之前只有段祺瑞努力过，但因为国内形势一团糟，没能争取到一丝利益。他们面对列强的时候只能打掉门牙和血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蒋介石身后的中华民国地位空前提升，是因为中国人在中日战争中流了太多血。

鸦片战争之后，神州大地只有被蹂躏的份。朝鲜、越南、琉球等属国先后丢失，华夏文明圈内的日本更是反戈一击。但是抗战之后，中国顶住了日本、拖住了日本，用牺牲数千万生命的代价换来浴火重生的机会。因此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创始国之一。因此华夏文明圈在国际上赢得一席之地，为未来复兴打下基础。

但是很遗憾，蒋介石刚刚从开罗回来，便遭遇豫湘桂千里大溃败。罗斯福和丘吉尔揉揉眼睛，心里拔凉。随后美英苏在雅尔塔会晤。美国为争取苏联在欧战结束之后对日作战，暗地里把外蒙利益出卖给苏联，为外蒙独立埋下导火索。但话说回来，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一场世界性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已经超越了满清政府和北洋政府。

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国对外战争全部以失败告终。鸦片战争，败。第二次鸦片战争，败。中法战争，败。甲午战争，败。抗日战争的规模比之前所有对外战争加起来都大，抗日战争的时间比之前所有对外战争加起来都长，抗日战争的残酷远胜之前历次对外战争，但结果却胜利了。

伟大意义之一：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浴火重生。

伟大意义之二：避免了中华文明在历史转变中断裂。

虽然结果胜利了，但代价太大了。如果用一个字形容八年抗日战争，那就是“熬”。

八年煎熬，拖住日军主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巨大贡献。

——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最低谷之际给这个世界作出的贡献。因此中国在战后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有一票否决权。因为中国通过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证明，即使在历史低谷中，这个世界也必须倾听中国的意见。否则，这个世界就是不完整的。

八年煎熬，中国军民损失两千两百万以上，国统区损失一千二百万以上，解放区损失八百万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受害国之一。

——这是中华民族陷入历史低谷的惨痛代价和永远应该铭记的血的教训。常言道，落后就要挨打。现实比这个残酷的多：落后就要牺牲。历史更残酷：落后就要灭亡。史书上那些只有名字的民族反反复复证明了这一点。

八年煎熬，中国军人损失数百万，军民损失接近六比一。

——所以战争永远是老百姓遭殃。军人在战场上马革裹尸，还可

以留下无上荣耀。但是老百姓，可能连姓名都无法留下。有谁记得那荒野中的白骨姓甚名谁？

八年煎熬，国军损失三百二十万以上，共军损失五十五万以上。

——这个比例很好地反应了抗战的态势。国军在正面战场，是抗战主力。共军在敌后战场，处于辅助地位。国军在抗战之前就占据绝大多数资源，承担更大的责任理所当然。根据战场走势看，国军高开低走，共军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国民党的收获：抗战之前内部战争不断，对外唯唯诺诺，不敢说不。抗战之后，因正面战场出力巨大成为世界主要政党之一，拥有世界性影响。国民政府代表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亚洲代言人。国军抗战前不到两百五十万，抗战后达到四百万以上。

共产党的收获：以数万人为基础，在敌占区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军队发展到百万，解放区人口达到一亿人。虽然影响力不如国民党，但政策切实可行，千百年来第一次解决了中华大地上的主体群落——农民——的生存问题。

蒋介石的收获：以中国最高领袖的身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尽管中间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最后的结果为中华民族洗刷了百年以来的耻辱。因此他成了具有世界声望的领袖之一。正是因为他的成绩，中国的疆域（失去外蒙）和领海（南海九段线）有了法理依据。

毛泽东的收获：推行中国共产党本土化成功，建立了一个严密的中央组织。他的思维在党内延伸，在中华大地上舒展。他的理想和梦境正在变成现实。数千年以来，他成了第一次把希望带给底层大多数

的那个人。

不禁要问，如果毛泽东和蒋介石是一个人，就是毛泽东拥有蒋介石的那些资源，或蒋介石拥有毛泽东的思维，结果会怎么样？好吧，这个答案是不存在的。如果非要追问答案，就是如果是那种情况，那么日本人就没有机会侵略中国，抗日这个话题也就不存在。

正因为他们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即使日本人走了，斗争还没有结束。

人生巅峰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在那些号称天子的非人类滚蛋之后，曾经有两个人有过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一个便是蒋介石。

啥叫至高无上呢？这个问题不好直接说，也说不清，比一比可以了解一个大概。

站在普通人的立场看，最重要的事莫过于解决吃喝拉撒睡。要解决吃喝拉撒睡，必须首先搞定衣食住行性。至高无上之人是什么样呢？他不需要管自己的吃喝拉撒睡，却可以决定千百万人的吃喝拉撒睡。

普通人要为了一日三餐忙碌，吃顿大餐也得盘算一下；至高无上之人没有这个问题，他面对美味佳肴、山珍海味，要考虑哪些不能吃。普通人是要吃啥，用吃了啥表达自己的能力；至高无上之人是啥不要吃，然后再用不吃啥表达自己的美德，却不知道他不吃的那些正是天

下人求之不得的。

普通人要为房子辛苦很久，而且就算辛苦也不见得能成功；至高无上之人不需要这样，他会住在最好的房子里，享受最棒的服务，然后再对外宣传曰，领导为人节俭清贫。却不知，如果天下人的住宿条件赶得上他百分之一，必将把他写在历史最显著的位置。

普通人在外出时，通常是能坐火车就不会坐飞机，能买到坐票就不会买卧铺，能坐公交就不打的士，就算条件好点自己有辆车，也要考虑油费过路费问题；至高无上之人不同，只要求舒服一点快一点，有专用通道，效率至上。

对普通人而言，衣食住行都是要钱的。如果勤劳而且运气好，就能多赚钱，多搞点生活享受或者其他。至高无上之人不一样，他可以负责印制钞票。印多少，怎么印，尽管有一系列复杂的官方运作，最后决定权还在那个人手中，一切决定都在弹指之间。就普通人而言，辛辛苦苦一年，赚点钱也许只能保证不饿肚子。对于一个至高无上之人而言，在下决定的时候，也许因为被蚊子咬了一口，或者有一只苍蝇飞过，心绪稍微波动一下，就可能多印或者少印千百亿钞票。普通人赚钱非常辛苦，赚钱多少跟人际关系挂钩。通常情况下，认识的人级别越高，赚大钱的可能性越高。比方说要办实业，要干工程，必须和各个级别的领导们打交道。但是那些在外风风光光的领导们，也许只是跟那个至高无上之人的秘书的大姨妈的某个亲戚的朋友能扯上一丁点关系。

一个至高无上之人，可以决定一大批官吏、官僚、官奴的官运和

前途。一个至高无上之人，可以影响千百万普通人的胃口和肚皮。在至高无上者存在的年代，普通人吃肉或者饿肚子，普通人在家种地或者血肉横飞，都在那个人的一念之间。

一九四五年前后很长一段时间，蒋介石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决定着中国千百万官吏、官僚、官奴老婆孩子的生活费、能否养情人的问题，决定着数百万军人是否走向战场的问题，决定着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亿万同胞——普通如你我他——每年能否多吃几顿肉、穿衣服是否体面、做主人还是当奴隶的问题。

——风光啊！重担啊！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所谓责任越大风头越劲。

一九四五年的蒋介石有多牛？牛气冲天！

一九四五年，蒋介石一身戎装的大幅照片充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画面上的蒋介石身穿闪亮的制服，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穿的制服，腰悬佩剑，面色儒雅而有风度，平静的眼色中蕴含着无穷的机变，仿佛有微微的笑意，又仿佛暗藏着杀机，让人琢磨不透。彼时的蒋介石意气风发、威风凛凛、玉树临风、一颦一笑都是那么的销魂。

一九四五年，万恶的鬼子终于无条件投降了，交出了锋利却恶心的战刀，遵循历史的宿命退回到他们本来应该老实待着的狭小的海岛上。此时古老而有着光辉历史传统的中国终于告别百年积弱，重新迎来了荣光。

此前一百年，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和很多国家打过仗，时间地点过程千变万化，但结果是一致的：割地赔款。在割地赔款的过程中，

大清帝国没有了，北洋军阀没有了。无论是谁赢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都将成为国人崇拜的对象。

作为抗战的最高领导，蒋介石成为超级实力派兼偶像派，无数粉丝对蒋介石表达钦佩之情，无数名人以和蒋介石沾点边为荣，无数宣传机器张开血盆大口，吐出香喷喷的口水。一时之间，以汉字之风姿多彩，竟然不够形容一个人的英明神武，怪哉。

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等待蒋委员长的进一步指示。无数大大小小的官僚把脑细胞集中在五官之中，准备先一步探测点信息，以便为将来的前途做打算。

当时的蒋介石确实够牛。不仅仅是中国战区的最高领导者，而且通过和美国的一番利益交换，把中国推入联合国五常，国人为之一振。之前罗斯福约他亲切交谈，之后杜鲁门把他看成伙伴，给予枪支弹药和美元。当然美国总统并非山姆大叔，如此优待蒋委员长，自然是希望将来赢得更大的好处。

斯大林把他看成中国最高领导人。

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也曾喊“蒋委员长万岁”。

一九四五年的蒋介石，可以决定封疆大吏的任免，可以决定政府的走向，可以决定军队调动，可以决定印多少钞票，可以决定的太多太多，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至少他是那么认为的。放眼整个世界，除了北美野牛首领杜鲁门，除了北极熊老大斯大林，差不多也就数他蒋介石了。丘吉尔固然也很伟大，但是在他之前的大英帝国，在他之后变成了英伦三岛。蒋介石却让积弱的中国赢得了尊重。

不管怎么样，他在残酷的战争中存活了下来，比起地堡中自杀的希特勒，比起被绞死的东条英机，他的形象足够高大。

人生圆满到如此程度，放在整个历史上也不多。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一点，经过一个致乱和止乱的轮回之后，蒋介石再一次止乱成功。纵观中国历史，能在历史周期律中得到两次止乱机会的风云人物是零。

到一九四五年为止，历史对蒋介石足够垂怜，把领导一个古老而百废待兴的大国复兴的机会摆在他面前，给了他一个扮演历史设计师角色的机会，那是昔日秦皇汉武扮演过的角色，那是袁世凯没有扮演好的角色，那是孙中山求而不得的角色。

然而几年之后，蒋介石就成了一个失败的典型。

那些粉丝则翻脸无情，滔滔不绝的称颂变成连绵不绝的诅咒。那些宣传机器喷出来的原本是少妇的香水，现在变成了老翁的浓痰。

原本趋炎附势、点头哈腰、想办法到委员长面前露脸的官僚们，能出国的都出国了，不能出国的就想办法往共产党那边跑，跑不过去的也都想办法找个隐蔽之处享受多年当官收获的劳动果实。

杜鲁门则是翻脸无情，闪亮的美钞变成冷酷的声明和刻薄的指责。斯大林更不用说，落井下石的事情没少干。名义上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最高领导人竟然跑到了一个小小的岛屿上满世界博同情！前后反差之大，按照蒋经国的话讲，非亲身经历难解其中滋味也。

为什么？

因为蒋介石再次致乱，因为历史转了一个弯。

历史的弯道

如下这些东西仅代表个人观点，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跳过。如有冒犯，请原谅。

按照写文章的惯性，接下来应该说蒋介石系列战之五，国共内战。但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继续行文之前，先回顾一下历史。

鸦片战争之后的历次战争都在反复验证一个道理：历史周期律第四个层次开启，工业时代来临，农业基础上的中华帝国已经落伍。人类文明史就是一个落后学习先进、然后走向自我创新的过程。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凡不去学习新东西的国家都解体了，不懂得吸收新东西的民族都消失了；凡学习误入歧途的国家都解体了，凡学习误入歧途的民族都消失了。所以迄今为止，只有中华文明从古文明过渡到现代文明。

所谓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就是家天下向民天下转变、帝国梦向民国梦转变、君权向民权转变。其过程漫长、剧烈、痛苦、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超出任何人的掌控和想象。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或某一个时期就能完成。如此历史巨浪中，华夏精英用不同的方式应对时代变迁。其宏观排序如下：

洪秀全和他的拜上帝教领导班子试图从意识形态下手，把“上帝主义”中国化，试错。因为欧美的强大在于上帝主义去世俗化，洪秀全走反了，试图搞政教合一的政权。代价是生灵涂炭十几年，半壁山

河尽白骨。若非中华民族坚韧，元气就被折腾干了。

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帝国梦、帝国体制的忠实捍卫者，也都是一代人杰。他们剿灭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军之后，试图“工商业主义”中国化。他们建立了一系列学校培养人才，建立了一系列工厂生产商品，掀起第一轮改革开放。在取得一系列成绩、看到一丝希望之后，于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一切努力付之东流。因为甲午战争之前，枝叶型文明的日本完成了体制改革，促进工商业再一次飞跃。

面对千年学生日本的翻身成功，精英们再次不淡定了。康有为趁势而起，张开一张嘴滔滔不绝地推行变法，把“君主立宪”中国化，掀起第一场文化大革命。然而他的追随者都是一帮理论专家，没有行动能力。慈禧太后动一下小拇指，他们就成了流亡者和通缉犯。

晚清精英中，孙中山的叛逆程度仅次于洪秀全，以基督徒的身份呼吁抛弃皇帝和帝国体制，把“共和宪政”中国化。他是民国的政治理想，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力量把政治理想变成政治现实。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失败者。

民国的政治现实掌握在袁世凯手中。对比孙中山，袁世凯更务实，拥有更强的政治手腕和更大的能量。这一切原本让他成为神州大地上的一位开天辟地的人物。可惜他的心中驻扎着一位皇帝，他认为中国没有皇帝之后会大乱。所以精明小心一辈子，还是忍不住押上一切，把大总统制服换成龙袍，最后身败名裂。

袁世凯死后的局势变成一团乱麻。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如同搭台唱戏，你方唱罢我登场，尽管登台方式不同，结果却完全

一致，都是灰溜溜下岗，损害了国家权力的属性。那个时代真正的主角段祺瑞一直执迷于武力统一，直到把自己赔进去。

谁来挽救那个混乱的时代？呼声最高的人原本是孙中山，但他没有做到。帮助孙中山完成遗愿的那个人是和袁世凯一样现实精明、起于军事、权谋过人的蒋介石。所以中华民国的国旗从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旗，首都从北京变成南京，止乱。

蒋介石和袁世凯一样，赢得成为神州大地开天辟地人物之机遇。

但稍后又犯了和袁世凯一样的错误，再次掀起新一轮的内战，从蒋桂战争到蒋冯战争到中原大战，再到一系列剿共战争，他赢得很多战争，看似辉煌，却无尽头，致乱。

日本试图征服中华，“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再次成为中国的领袖，领导抗日战争。八年之后，他赢得第二次成为神州大地开天辟地人物之机遇，再次止乱。

然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最后一年，蒋介石和国民党成了失败的典型。

历史的焦点汇聚到毛泽东身上。继洪秀全“上帝主义中国化”失败之后、曾国藩李鸿章的“工商业主义中国化”失败之后、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中国化”失败之后、宋教仁的“政党政治中国化”失败之后、孙中山的“三权分立和五权宪法”失败之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成功，成为神州大地的标杆。尽管那个标杆并不是完美的。

随后中国赢得推动历史周期第四层次的机会。到如今已经将近七

十年，国人终于看到了一个希望，一个再一次走向历史前沿的希望。

从历史周期律的层次看，国共内战处于第二个层次的更迭。共和国取代民国犹如汉取代秦，犹如唐取代隋，都是更高层次的历史周期律运转之下的政权更迭。但又很不同。

近代中国史只是世界大潮的一部分。所以要弄清这些，必须放在世界大潮中看。暴力时代的一切都要放在整个世界大潮中。整个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三种体制的较量。二战结束，军国体制的德国和日本被摧毁，剩下的苏美继续以另外的形式较量。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算历史周期律第三个层次的范畴。

中国在近代落伍，是因为基督教之新教世界推动了历史周期律第四层的运转。国共内战虽然属于历史周期律第二个层次的更迭，但更迭的目的都是要带领中国完成历史周期律第四个层次的追赶，也就是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任何一个国家经历历史周期律变更都要经历战争，主干型文明的国家尤其如此。中国需要一场立国战争。

让我们回到开篇部分，历史周期律分成四个层次。

历史周期律第一层，炮灰永恒律。即历史周期律运行过程中必须有炮灰。

此层次可细化为两小段：权柄更迭的炮灰个体和体制更迭时的短暂王朝或政权。

历史周期律第二层，权柄周期律。即政权或王朝的运行趋势总是趋于走向毁灭，新的政权或王朝结构依然重复不变。

此层次也可分为两小段：政权更迭周期和王朝更迭周期，前者体

现在乱世，周期短；后者体现在大一统时代，周期长。

历史周期律第三层，体制更迭律。任何体制的运行趋势总是走向毁灭，但是在它诞生或毁灭的过程中，除必然包含前两个周期运转之外，还必然涉及思想变更。

此层次还可分为两小段：体制主动更迭和被动更迭。春秋战国之后，中华帝国体制建立，便属于主动型更迭，有百家争鸣为前期酝酿。近代中华帝国体制崩溃，便是被动型更迭，也引出近代史上这些事。

历史周期律第四层，核心物力转移律。这个层次之前有提，但说的少。行文到此，看官们有了直观印象，便可以多说一些。

——第一层周期律不可单独运行。

——低层次周期律必须在高层次周期律内部运转。

——低层次的周期律运转未必能推动高层次周期律运转，但高层次周期律运转必然带动低层次周期律运转。周期律层次越高，影响范围越大。

历史周期律的每一个层次都涉及到社会阶层变更，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涉及到战争，真实而残酷的战争。历史周期律层次越高，社会变更程度越大，战争越残酷。各位看官们仔细点便可以发现，关于抗战内容写得有些薄弱，关于共军和共产党的内容很少，基本上没有正面介绍。纵观中国历史走势，共产党和共军既是历史焦点、也是历史转折点、又是历史周期律的支点。共产党和共军赢得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在建党、建军、建国、立国、强国一系列脉络明显的走势中，和历史周期律走势基本契合。这些在下一个篇章描述。

关于这一切，我不打算按照时间和空间去写，我会试着在历史周期律不同层次的运转中阐述。让我们看看中华民族在各个层次的战争中经历的磨难和考验。